



ONLY YESTERDAY

— AN INFORMAL HISTORY OF THE 1920S —

从大繁荣到大萧条

多视角重现“一战”后美国经济的虚假繁荣

(1918-1929)



[美] 弗雷德里克·刘易斯·艾伦◎著

李思毓◎译

以史为鉴，探究经济市场繁荣与
衰退周期更替的来龙去脉

 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
BEIJING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PRESS



ONLY YESTERDAY

AN INFORMAL HISTORY OF THE 1920S



从大繁荣到大萧条

[美] 弗雷德里克·刘易斯·艾伦◎著

李思毓◎译



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

BEIJING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PRESS

版权专有 侵权必究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从大繁荣到大萧条 / (美) 弗雷德里克·刘易斯·艾伦著;
李思毓译. — 北京: 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 2017.6

ISBN 978-7-5682-1441-4

I. ①从… II. ①弗… ②李… III. ①经济危机—研究—美国
IV. ①F171.244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7)第002652号

出版发行 / 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有限责任公司

社 址 / 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南大街5号

邮 编 / 100081

电 话 / (010) 68914775 (总编室)

(010) 82562903 (教材售后服务热线)

(010) 68948351 (其他图书服务热线)

网 址 / <http://www.bitpress.com.cn>

经 销 / 全国各地新华书店

印 刷 / 北京旭丰源印刷技术有限公司

开 本 / 710毫米×1000毫米 1/16

印 张 / 20

字 数 / 232千字

版 次 / 2017年6月第1版 2017年6月第1次印刷

定 价 / 49.80元

责任编辑 / 刘永兵

文案编辑 / 刘永兵

责任校对 / 周瑞红

责任印制 / 李志强

图书出现印装质量问题, 请拨打售后服务热线, 本社负责调换

Preface

前 言

本书旨在论述一段历史，并在一定程度上对其加以说明，这段历史时期日后被称为美国历史上具有鲜明特色的一个历史阶段：从1918年11月11日德国战败至1929年11月13日美国股市大崩盘——这十一年加快了著名的柯立芝—胡佛繁荣时代的灭亡速度，这段岁月的跌宕起伏尽收眼底。

在此次美国股市大崩盘事件发生之后马上论述这段历史的人，显然必须有高瞻远瞩的突破性观点。普雷斯顿·威廉·斯洛森（Preston William Slosson）教授的著作《大圣战及战后》已经差不多描述了这段历史的末期，但是他那本书的结构与本书完全不同。尽管有很多作品均从不同角度涉及这一历史时期，但我却惊讶地注意到，这段时期的很多历史事件都没有得到全面的记录。比如，哈定总统的丑闻从来没有见诸各种史料（如今仍鲜为人知），仅在只言片语中偶有涉及。尽管大牛市被施以千次剖析，却从来没有人以叙事形式将其作为特有的经济现象与社会现象完整地呈现出来。

经过时间的推进，进一步的研究会必然提示出本书的错误与不足，也会

暴露出我的很多论断与诠释的欠缺之处。我在当代史学中必然称不上权威。在写作本书的过程中，我的乐趣大多来自总结前辈历史学家并没有涉及的大量资料，努力做到使其层次分明、有条不紊。我一直在想，也许有些读者对此项研究毫无兴趣，但很乐于回忆这些印象深刻的历史事件与历史背景，就像重温旧梦一般，将历史的各种风貌交织在一起。本书的优点将远超大多数历史著作：任何年龄大一些的读者都能从中忆起当年的旧事。

至于本书的写作重点集中在变幻莫测的大众心理以及微不足道的细节上面，我是有意这样做的。在我看来，书中所描述的那段历史时期离现在很近，对它仍然记忆犹新，所以我拥有特殊的优越环境与契机，记录下那个时代的时尚趋势、蠢人愚事，记录下千百万人人为之瞻前顾后、众说纷纭、亢奋癫狂的诸多世事，记录下他们日常生活所涉及的点点滴滴。我谨慎地将某些事件与政策，特别是外交事务方面的事，留给未来的历史学家去研究，这些对于普通市民的生活并没有什么直接的影响，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也无法进行全面系统的评价。（我在此处要特别感谢马克·沙利文先生，他在《我们自己的时代》的连续几卷书中独创了这种当代史的书写方法。）当然，我尝试着将这段历史中大量线索归纳起来，以便对20世纪20年代美国国民生活与国民思潮的重要趋势予以提示。

为了将脚注省略掉，同时为表示对于各方支持的感谢，我在附录中列举了本书所引用材料的主要来源。

弗雷德里克·刘易斯·艾伦

FROM GREAT
PROSPERITY
TO GREAT DEPRESSION

第一章 序曲：1919年5月

如果你跟随倒流的时光重返到“一战后”的第一个十年，如果你此时环顾四周，会发现有什么东西让你觉得非常奇怪吗？从1919年以来，美国人的生活环境有了大幅度的提高。这话虽然是没有问题的，但是到底有着怎样的变化呢？

让我们重温往昔，回忆一对家境优越的年轻夫妇的家庭生活状态。他们也许是住在克利夫兰、波士顿、西雅图或巴尔的摩，在哪里并不是重要的，只是那是在1919年5月的一天（我选择这个特别的日期，是1918年“一战”停战之后的六个月后，当时恰逢美国从战争时期向平时时期成功转变的阶段，战后十年所带来的深入变革才刚刚开始）。要想回想时光的流逝给你我以及我们的生活环境带来了怎样的变化，这种方法是再好不过的了。

1919年5月的这天早晨，史密斯先生坐在餐桌前吃着早饭。他的衣着打扮与20世纪30年代好像没有什么不同（也许他的窄裤腿会让你吓了一跳）。男装的样式一向没什么太多变化。但史密斯太太的装束则与我们今

从大繁荣 到大萧条

天大不一样了。

正吃着早餐的史密斯太太穿着套装，裙子长至脚踝处，离地面仅有6英寸^①之高。她在《时尚》杂志上读到了一条让人震惊的消息：裙子可能会变得越来越短，“从波旁王朝开始，上流社会女性的裙子从来没有高过脚踝”。但是6英寸仍然是裙装的正统高度。已经是春天了，她现在穿着浅口鞋；去年的整个冬天，她都将脚踝包裹得非常严实，不是穿着高筒皮靴和系带高帮软底鞋，就是穿着镶着鹿皮的漆皮长筒靴。她的脚上穿着黑色的长袜（如果穿的是棕色的鞋子，她就搭配着棕色的长袜）；一想到穿的长袜如果是肉色的，可能会让她深感不安。几分钟之前，史密斯太太还穿着长筒形的内衣与衬裙。从衬裙上面多重的褶皱可以看出，她显然不想表现出孩子气，而是偏好于成熟女性的打扮。

史密斯太太可能会扑些粉，但也许并不愿意化妆。在1919年，虽然使用化妆品不再被当成风尘女人的独特标志，胆大早熟的女孩子也已经开始化妆了，但是受到优良家教影响的女士多半对胭脂口红有着反感的情绪。美容业刚刚开始发展，美发店也不过十余家，史密斯太太从来没有听说过那充满魔幻色彩的整容手术。出门购物时，她所戴的帽子上会罩上一层面纱，规规矩矩地别在脑后。在商店里，她可能会买一套夏天游泳时穿的泳装，那将是一件真丝或印着花的棉布做的外衣罩在紧身内衣上，当然还会套上长筒袜。

她的头发留得很长，也许从来没有想象过女性也能够常去理发店。你如果忘了当时普通群众对于短发的看法，请欣赏纽约棕榈花园酒店经理接受记者采访时的观点。1918年11月的一天晚上，他刚好将酒店礼堂租给布尔什维克主义者开会使用，结果引发了一场骚乱。他解释道，有位衣着时尚的女士坐着豪华汽车到了这里，安排礼堂租用的事宜。他还补充道：

^①1英寸=2.54厘米。

“如果我们当时租的时候就注意到她那一头短发的话，而不是到现在才发现，就不会把礼堂租借给他们了。”在史密斯太太和棕榈园酒店的经理看来，短发女郎与长发男人一样，就算与自由主义的爱情无关，也和激进主义有关。

史密斯先生和他的太太坐下来吃早饭，他们也许考虑过这顿早餐需要足够的热量——他们只要去问问孩子们就会对这个名词有所了解，但夫妻二人大概谁也没有听说过维生素是怎么回事。

史密斯先生一边吃着饭，一边打开早上的报纸。无论史密斯先生读报的口味多么低级，这也肯定不是一份普通的市井小报：尽管报业大亨赫斯特已经试着宣传经停亚速尔群岛成功飞越大西洋的报道。这次飞行成为1919年5月份最为轰动的消息。（此时，英国的阿尔科克（Alcock）和布朗（Brown）还没有径直飞跃大西洋，这个报道发布几周之后他们完成了这一壮举，比林德伯格的飞行早了八年。）但是，报纸上的其他新闻也不少：巴黎和会处于进行和谈签约的最后阶段；战胜国的国债成功地实现了超额认购（宣传海报上大声高呼：“我们必然将完成任务！”）；又一批美军士兵从国外归来；新一轮罢工威胁近在咫尺；西雅图市长欧雷·汉森（Ole Hanson）在演讲中公开对第一次世界大战进行责难，称其为这个时代带来了苦难；宪法修正案有望得以通过，由此可以预见此举会让妇女在社会上的地位大幅提升；亨利·福特（Henry Ford）起诉《芝加哥论坛报》，称其诽谤；福特在法庭上将叛徒贝内迪克特·阿诺德五世（Benedict Arnold）称为作家，当律师问道：“我们这个国家发生过革命吗？”福特回答：“当然了，那是在1812年的时候。”

如果史密斯先生仔细阅读体育新闻，就会发现报上隐晦地提到波士顿红袜队（Boston Red Sox）有个年轻的投手和外场手叫作鲁斯，但是新闻

从大繁荣 到大萧条

标题上找不到他的全名贝比·鲁斯（Babe Ruth）。（1919年4月，鲁斯打出来一本垒打；5月份打出来两记；在这个赛季他还有着更大的收获。体育记者开始注意到，鲁斯不断地刷新着纪录，当年共打出29次本垒打；纽约扬基队如获至宝，在赛季结束之后以12.5万美元将鲁斯收入麾下。1920年夏天，有个男子因看见鲁斯将球击上看台兴奋而死，显然又一个新的大众偶像诞生了。不过在1919年，美国棒球大联盟的领衔人物是具有传奇色彩的老将泰·柯布（Ty Cobb），而不是鲁斯。）

史密斯先生在体育版上看到，里卡德在俄亥俄州的托莱多市举行了一场拳击比赛，对阵双方是重量级冠军杰西·威拉德（Jess Willard）与未来的大众偶像杰克·邓普希（Jack Dempsey）。（你可能会记得，1919年7月4日，有19 650名言行粗俗的观众坐在炽热的太阳下面，眼睁睁地看着邓普希在第三回合将6英尺^①6英寸高的拳王击倒。这条新闻在沉稳老练的市民中产生了轰动效果。要知道八年之后邓普希和唐尼对决的票价已经翻了五倍还多，这些体面人不知道会怎么想？）体育版面上或许有17岁的南部高尔夫球冠军鲍比·琼斯（Bobby Jones）的新闻，还有常胜将军的威廉·塔特姆·蒂尔登（William Tatem Tilden II），不过这时两个人都还不是全国冠军。就算鲍比·琼斯当年战无不胜，也很难称为盖世传奇人物——尽管高尔夫球运动日渐流行，却还没有成为美国商界人士每周必不可少的休闲运动项目。史密斯先生很可能对这项运动丝毫不感兴趣——“那么大的人竟然在一个地上的小白球上面浪费时间”。毫无疑问，他从来没有听到过灯笼裤；万一他要去打高尔夫球的话，可千万别穿着灯笼裤大摇大摆地走在大街上，不然小孩子们会指着他乱喊：“嘿，瞧那家人的裤子！”

我是否曾提到过，到了1919年5月，战争已经烟消云散？史密斯先生

^①1英尺=0.304 8米。

手中的报纸，却依然在提醒着人们战争仍在继续。那报纸上面，不仅有巴黎和会的消息，还刊登着战斗英雄阿尔文·约克（Alvin York）回国的消息，其中最难以直视而又醒目的，就是每天所登载的阵亡名单。

高额的生活开支是史密斯夫妇谈论的紧要问题。史密斯先生虽然对加薪充满信心，但物价的上涨让家庭收入捉襟见肘。食品、房租、衣服和各种税款，样样东西都在涨价。那个时候的人们笑称，就连1美元都没有的人也比过去多花50美分。假如造出7美分的硬币出来买电车的车票，下一年保证会停用这个面值的硬币，非要造出14美分的硬币来。史密斯先生希望太太精打细算，史密斯太太反而提醒他，从1914年以来，牛奶从1夸脱^①9美分涨到了15美分，沙朗牛排从每磅^②27美分已经涨到了42美分，黄油从每磅32美分涨到了61美分，鲜鸡蛋从每打34美分涨到了62美分。拿固定薪水的人大吐苦水并不奇怪，大学里也开始商讨，应用“自由公债”活动中所采用的筹款方式，来增加外界对大学的捐款。至于房租，比起食物价格的情况更加糟糕：停战以来，住宅与公寓不断涨价，那些从中谋得暴利的房东与中介成了民众公敌。史密斯先生对太太说：“比起‘一战’来，这些投机商人才更加面目可憎。”

吃完早饭，史密斯先生开着自己的车上班。这辆车可能是列克星敦、麦克斯韦尔、布里斯科、泰普勒，要不就是道奇、别克、雪佛兰、凯迪拉克、哈德森，反正绝对不会是克莱斯勒：因为此时克莱斯勒刚刚成为通用汽车公司的首席副总裁。无论这辆汽车是什么型号，车身都要比19世纪的汽车要高，乘客可以居高临下、眼观六路。史密斯先生开的大概是敞篷车（1919年制造的汽车中只有10.3%有篷顶）。当时四门轿车刚刚开始流行起来。在公众的心中，高级轿车必然和财富联系在一起，报纸漫画上画的都是些开着高级车的无耻商人形象。

①夸脱：容量单位。美制1夸脱=0.946升。

②1磅=0.453 6千克。

从大繁荣 到大萧条

假定史密斯先生开的车是那个车身很高、外观丑陋却非常具有实用价值的福特T型车，让我们来看一下他的举止。他打开右边的车门上了车（因为前座左边并没有车门），把手伸到了方向盘边上，把火花塞和油门操纵杆固定在2点50分的位置。除非他另外购买个电子启动装置，要不然就得用手摇动发动机摇柄。史密斯先生用右手转动摇柄的时候特别小心（他有一个朋友就被发动机摇柄打折了胳膊），同时用左手食指操作着控制阻气门的电线。他拉动电线，大力转起摇柄，汽车的发动机终于开始轰鸣起来。他马上跳上车，踩上踏板，把火花塞和操纵杆设置在2点25分的位置。他也许能在发动机的轰鸣声停下来之前抓到操纵杆。但如果要是在寒冷的早晨，恐怕还没等到他碰到操纵杆车就熄火了，他还要再次转动摇柄、拉住电线。史密斯先生真希望太太能够坐在驾驶座位上，在发动机熄火之前就推动点火杆。

伴随着发动机正常的轰鸣，史密斯先生终于握上了方向盘。他松开了应急手刹，左脚踩住了低速踏板，他又抬起左脚让汽车开足马力，汽车在街道上飞驰而过。眼下他唯一担心的是街上长长的斜坡——昨天他就在这个地方把刹车烧坏了。今天早晨他必须记得要用倒挡踏板和低速踏板，要么两者都得用上，要么三种踏板轮番使用（把你的脚踩在任何踏板上都能够让汽车减慢速度）。

史密斯先生开车上了空空荡荡的公路，路况要比十年之后畅通不少。他在上班路上所遇到的汽车数量，不到1929年的三分之一；1919年在美国登记的轿车不足700万辆，但仅仅十年之后就超过了2 300万辆。他附近的水泥路面不会很多，水泥路面的道路不足的情况在汽车限速上便有所体现。1919年，加利福尼亚和纽约等几个州的汽车速度被限制在了每小时30英里^①，平均时速为20英里（1931年则达到了每小时35英里或40英里）。

^①1英里≈1.609千米。

1919年伊利诺伊州的限速标准体现了当时的特色：在城市居民区行驶时速限制在15英里，建筑地区限速10英里，弯道限速6英里。两个半小时之内车辆行驶100英里在史密斯先生眼中是非常危险的，对于20世纪30年代最为谨慎的司机来说却习以为常，而在1919年的公路上开车，史密斯的观点倒也是非常可行的。

白天上班的时候，史密斯先生谈到了商业环境。就目前情况来看，这个环境有了好转。停战后有一段时间经济形势并不明朗化，股价不断下跌。由于大量政府订单被取消，战争期间加班加点运转的工厂开始大量裁员，但从那之后情况渐渐得到了缓解。如今大家都在谈论国际贸易和美国航运的光明前途，各个造船厂全线开工。工人们举行罢工的次数确实在增多，看上去他们希望涨工资的要求永远无法得到满足。但是连史密斯都承认，这并不能全怪工人们，因为物价每周都在上涨。商业活动有了明显的起色，从部队退伍的人们找工作变得更加容易，远远好于史密斯先生预料的情形。回想去年冬天和今年开春，大家对那些在街上闲逛、没有事做的退伍军人指指点点。当时的《生活》杂志刊登了一幅漫画，上面的山姆大叔对士兵说：“小伙子，为了你，我在所不辞！你到底想要什么？”这个士兵回答：“我想要份工作。”眼下，这些小伙子慢慢融入了职场之中，唯一在商界头顶上挥之不去的阴云，就是罢工、布尔什维克主义和股市中一股股的投机浪潮。

报纸的财经版面上赫然写着“牛市让经纪人身心俱疲”的标题，他们表示“员工们要长时间工作”。这话听上去是不是有些耳熟？有没有让你想到1928年到1929年的大牛市？纽约股市于1919年5月31日做出的休市的决定，让报纸发出了如此慨叹：“掌控纽约股市和债券交易的高度专业化机构感到无力负荷，需要稍作休息。”而在1919年5月，股市连续多个交

从大繁荣 到大萧条

易日达到了150万股的交易量，让金融专家们顾虑重重，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考虑对投机行为提出警告。当年股市创下了6个交易日连续达到200万股交易量的纪录，在145个交易日中每天股市交易量都超过了100万股。如果有人告诉史密斯先生与他的同事们，在此后的十一年里股市单日交易量将高达600万股，而300万股的交易量就被视为“几近停滞”，让“专业人士交易起来毫无动力，普通民众也毫无乐趣可言”，他们到底会怎样想呢？1919年，纽约证券交易所的一个交易席位，价格在6万美元到创下新高的11万美元；史密斯先生可能很难想象，到了战后第十年，一个交易席位会涨到50万美元。

在1919年5月间，证券交易所每天的交易记录很少占据报纸的专栏，场外交易市场的称号倒真的并非徒有其名，纽约百老汇大街那个非常热闹的露天市场，小伙子们一边接着电话，一边从很高的窗口探出头来，脸上带着丰富的表情，一边叫嚷着一边对着窗户下面人行道上拥挤的交易者打着手势。史密斯太太出门购物的时候，脑海里根本不会出现股票价格的事。但是1919年的那个“难以置信的牛市”却给在股市奋斗的人们带来了丰厚的回报。从1919年2月15日到5月14日，鲍德温机车公司股票从72美元涨到了93美元，通用汽车股票从130美元涨到了191美元，美国钢铁公司的股份从90美元涨到了104.5美元，国际商用船队普通股的股票价格从23美元涨到了47.62美元（归功于交易者们对航运业光明发展前景的信心）。

史密斯先生出去吃午饭的时候，由于这一天从欧洲战场归来的大批士兵都在参加游行，纽约市的几条大街都挤得满满当当，所以他只好绕路开车去了他所在的俱乐部。1919年的春天，正是胜利大游行的季节。从法国布雷斯特军港起航、甲板上站满了士兵的船只陆续驶进了纽约港。纽约市市长海兰（Hylan）组织的欢迎委员会在向那些归来的士兵们表示问

候。有时担任欢迎代表的是衣着光鲜、年轻帅气的市长秘书格罗夫·华伦（Grover Whalen），他在此后的日子里将欢迎仪式简化成一门科学，更升华成了一种艺术形式。为了纪念美军士兵们凯旋，纽约市在第五大道通往麦迪逊广场的交汇之处建造了高大的灰色拱形门，据说有40位艺术家为这个拱门的设计贡献了一份力量。（《纽约先驱论坛报》用遗憾的口吻评论道：“这件作品看上去是400个而不是40个艺术家的灵感，集各地拱门的特色于一身。这不禁让人想到，不要忘了将勃兰登堡门上的那四匹马也添上。”）沿着第五大道往前走去，在纽约公立图书馆的前面，有一处高塔与棕榈交相辉映的神圣建筑，这就是阵亡将士纪念堂，《纽约先驱论坛报》对这座建筑物的装饰效果的评价一语中的——“平添了死亡的风险”。向北走过几个街区，一座珠光宝气的拱门加在第五大道上，“仿佛布满了光彩亮丽的宝石，连着两根星光闪耀的白色柱子”；拱门上那些色彩斑斓的探照灯在夜晚分外夺目。第五大道上彩旗招展，美军27师的游行队伍通过拱门下面时，空中撒满了五彩的纸屑和白色的纸带，人行道上挤满了欢呼的人们。不仅仅是纽约沉浸在迎接归国将士们的热情气氛之中，其他城市也举行了庆祝胜利的游行。本城中有威望的年长者们站在检阅台上面，旗帜在半空中高高飞扬，士兵们手中的刺刀在春光明媚之中分外闪亮，乐队奏起一曲名为《长长的小路》的曲子。此时人们的幻想还没有幻灭，举国都在欢庆英雄们的胜利归来，但英雄们却只希望这场喧嚣平息下来，这样人们可以换上便服，睡个懒觉，做些自己喜欢的事情，将这眼前一切都抛到脑后。

当天，史密斯夫妇受到邀请去参加本地酒店举办的下午茶会，所以史密斯先生一下班就急忙去参加这场宴会。这家酒店如果紧跟着时代的潮流，就会用爵士乐队代替传统的管弦乐团给这场舞会伴奏，但是乐池前

从大繁荣 到大萧条

面的萨克斯手绝对不会吹奏出这段美妙动人的乐章：“无尽的悲伤却无声无息，没有逝去也没有回忆，没有未来也没有希望……”威廉·伯利梭（William Bolitho）称其为战后的时代精神。当时爵士乐队演奏的曲子是《我一直在追逐彩虹》，这首歌由哈里·卡罗尔（Harry Carroll）在战时谱写；而此前哈里森·费希尔（Harrison Fisher）劝他，肖邦的《即兴幻想曲》完全可以改编成悠扬的拉格泰姆音乐。乐队也会演奏《微笑》《达达尼尔海峡》《印度斯坦》《日本睡魔》和《我爱星期天》，还有一首歌的歌名成了战后十年间经久不衰、让人厌烦的俚语，那就是《我说她会》。很多身穿着笔挺军装的人在舞池中跳着狐步，其中还有位穿着蓝色军装的法国军官。当时的宴会上如果有穿着外国军装的宾客出现，会平添几分战时的浪漫气氛。灯光幽暗的棕榈厅里，也许还有耳鬓厮磨的情侣，不过史密斯夫妇对此并不在意。这时的弗朗西斯·斯科特·菲茨杰拉德（F.Scott Fitzgerald）还没有描述令全美为之震动的美国年青一代的问题。

跳完了几支舞，史密斯先生信步离开了酒店，进了一家酒吧（如果这个州还没有实施禁酒令的话）。他会看到酒吧里有一群人围在一起，一边大口喝着布朗克斯鸡尾酒和加了冰的苏格兰威士忌，一边一脸消沉地讨论着禁酒令。7月1日，战时禁酒令将正式生效（禁酒令原本是作为战时法令而制定出的，但是总统直到“一战”后才签署通过），《宪法第十八条修正案》明确写着禁酒令长期具有法律效力。而在当时，蒸馏酒和酿造酒都遭到了禁止。夜总会的常客们非常知道痛饮之后要付出的代价，所以烈性酒价格非常昂贵。但这家酒吧做的生意仍然是合法的。当然在这里看不到女人的身姿，1919年女人喝酒非常少见，在酒吧里喝酒仍然是男人特有的权利。尽管邀请史密斯夫妇的主人将在晚宴之前提供鸡尾酒，夫妻二人却

对于鸡尾酒会代替下午茶舞会这一变化一无所知。

史密斯先生靠在酒吧的铜栏杆旁边，认真聆听着人们对禁酒令的议论。有人提到禁酒令就满肚子牢骚，可也并不是所有人都对此感到气愤。有个男人将手中的布朗克斯鸡尾酒一口喝光，说他将来有一段时间会特别想喝酒，但是他话锋一转：“在一个没有酒精的国度里，他的儿子们的生活会过得更好。”有两三个人非常赞同他的看法。禁酒令得到了全美绝大部分民众的支持，战争时期的人们那种斯巴达式的激情还未冷却下来。这些人本以为待到第十八条修正案正式生效的时候，酒精就能从这片国土上消失不见，而这种想法没有丝毫嘲弄的味道。他们暗中期盼着一个永远禁酒的时代的来临。

在史密斯夫妇所出席的这场晚宴上，有几个举止大胆的女孩子竟然抽起了烟，她们吸烟的模样未免有些明目张胆地装模作样。（1919年全美的香烟销售量不足1930年的一半。）

晚宴结束后，人们可以到电影院观看查理·卓别林（Charlie Chaplin）的《从军记》、道格拉斯·范朋克（Douglas Fairbanks）的《纽约牧童》、玛丽·毕克馥（Mary Pickford）的《长腿叔叔》、女明星蒂达·巴拉（Theda Bara）和珀尔·怀特（Pearl White）主演的电影，要不就是格里菲斯导演的《残花泪》，这部催人泪下的影片得到了广泛的赞誉。他们也许会打上一局竞叫桥牌（当然不是传统的合约桥牌）。几年之后大家非常迷恋的麻将，这时才刚刚流行。他们可以谈谈当时的畅销书，比如《天启四骑士》、塔金顿的《安倍逊大族》、康拉德的《金箭》、布朗德·维特洛克（Brand Whitlock）的《比利时》和威尔斯的《不熄的火焰》（巨著《世界史纲》这时还没有出版）。他们可能会去剧院：1919年5月的时候，纽约有很多成功的戏剧粉墨登场，包括《友善之

从大繁荣 到大萧条

敌》《东方三面孔》和《好人奥莱》。这些剧目从“一战”之时就久演不衰，还有《听着，莱斯特》、吉列特主演的《亲爱的布鲁图》、女明星弗朗西斯·斯塔爾（Frances Starr）主演的《老虎！老虎！》。为了满足人们对闺房之事的浓厚兴趣，名为《马贝尔的住宅》的戏码应运而生。美国戏剧公会将要上演首场话剧——欧文的《约翰·弗格森》。普林斯顿的上流人士们刚刚选出他们最喜爱的戏剧《闪电》（《麦克白》和《哈姆雷特》排在它的后面，这两部戏有希望获得知识渊博的人们的选票）；最受欢迎的女演员按先后顺序排列，分别为诺玛·塔尔梅奇（Norma Talmadge）、埃尔西·弗格森（Elsie Ferguson）、玛格丽特·克拉克（Marguerite Clark）、康斯坦斯·塔尔梅奇（Constance Talmadge）和玛吉·肯尼迪（Madge Kennedy）。

这天晚上有一件事是史密斯夫妇绝对不会去做的，那就是听广播。

这个时候无线电广播还没有发明出来。到处都有爱好机械的小孩子们拿着无线电收发器。如果他们会莫尔斯电码，就能够收听到配备着发射器的海上船只和地面电台的无线电信号。当时已经研发出无线电话，飞在曼哈顿上空的飞机里的乘客可以和下面办公大楼里的人通电话。几年之前，发明家德福雷斯特尝试着用无线广播发表演说、播放音乐，但是没有任何进展。直到1920年的春天，位于匹兹堡的西屋公司的工程师弗兰克·康拉德（Frank Conrad），将自家的粮仓改造成了业余时间的工作研究场所，播放留声机音乐和棒球赛的比分，偶然发现竟然能吸引来大量的无线电爱好者。匹兹堡的一家报纸看到这个商机，想到了一个好主意，为无线电设备登了广告，声称“这些设备能够收听到康拉德博士的节目”。这则广告登出来之后，西屋公司才决定建立历史上第一家广播电台，来提高本公司无线电设备的销售量。

至于史密斯夫妇，我们再说一句就会将他们抛到一边不再谈及。他们不但从来没有听到过电台广播，也从来没有听说过法国心理学家库艾、代顿小镇审判案（斯科普斯进化论审判案）、填字游戏、泳装选美比赛、约翰·拉斯科布（John J. Raskob）、敲诈集团、茶壶山丑闻案、珊瑚阁、《美国信使》月刊、萨科·万泽蒂案件、试婚、经纪人贷款数据、作家迈克尔·艾伦（Michael Arlen）、华尔街爆炸案、忏悔杂志、霍尔·米尔斯凶杀案、股市广播、地下酒吧、阿尔·卡彭（Al Capone）、自动红绿灯和查尔斯·林德伯格（Charles A. Lindbergh）。

这时，他们即将步入战后十年。

FROM GREAT
PROSPERITY
TO GREAT DEPRESSION

第二章 回到常态

1918年11月11日的清晨，伍德罗·威尔逊总统（Woodrow Wilson）用铅笔在一张白宫专用的普通信纸上，写下了这封致美国民众的宣言：

“我的同胞们：

今天早晨已经签订了停战协定。美国终于实现了为之奋斗的一切。此时的我们被时代赋予了责任，用我们的严于律己、理性友善的建议与物资援助，在全世界建立正义的民主制度。”

没有什么比这份宣言更能体现威尔逊的风格了，三言两语就将他的特质表露得淋漓尽致：既是清教徒式的教师，在充满激情的年代里保持着清醒的头脑，心平气和地安排着每一天的课程；又是道德理想主义者，看重实现双方友好解决的和平，而非相互仇视的妥协；还是个武断的民主预言家，他不会想到，他用尽一生所信奉的民主制度，并非普世通用的标准。与此同时，这种精神也出现在另一位战时总统的宣言之中，而那位总统就是亚伯拉罕·林肯。如果身处白宫的威尔逊总统在写下宣言时想到了他，

毫无疑问威尔逊确实想到了这一点，也许他忽略了其中的某些东西。随着和平时期的到来，理想主义的建议有时并不起效。林肯总统没有活到那个战后十年，看到“理性友善建议”的政策带来何种结果，他在胜利到来之前就已经离开了人世。然而，伍德罗·威尔逊可并没有这么幸运。

二

11月11日是多么不平凡的一天啊！还没到凌晨3点，美国国务院就向睡眠惺忪的记者们宣布了停战协定签署的消息。四天前，一则失真的报道声称敌对形势已经终结，而这消息让全美上下欢欣鼓舞。人们从办公室和商店中拥挤着跑了出来，大街小巷中的人们高声欢呼、纵情歌唱，钟声与汽笛声一齐鸣叫，大家把帽子高高抛起，穿着军装的士兵们身披着美国国旗纵情欢呼，新闻公告栏前面被人群挤得水泄不通，这一天变成了狂欢热闹的节日。纽约的第五大道已经禁止通行，挤满了四处蜂拥而至的男女老少，纽约市的各个窗口共撒下155吨白色的纸带和碎纸片。这种情绪激昂的场景似乎不会再次上演，但这种场景确实是真实地重现在了我们眼前。

11日凌晨4点半，美国十几座城市纷纷响起了汽笛声、警笛声与钟声，将熟睡的市民吵醒。报童们沿着黑漆漆的街道高声呼喊胜利的消息。人们一开始对这则报道并不相信，因为他们已经被骗了一次，绝不会再受骗。在华盛顿的一条大街上的一家政府官员房子的窗户下面，一个报童一个词一个词地加重口气大声喊道：“战争结束啦！这个消息已经被官方证实啦！”他不像平时那样含糊其辞，因为他知道，只有清楚准确的消息才能打消人们的疑问。这句话让人们放松了下来。一个充满和平与希望的崭新时代开始了，这个新的时代已经来到了人们身边。

消息马上传遍了整个美国。在一座座城市之中，刚到上午10点，办

从大繁荣 到大萧条

公室已经空无一人，商店门外贴着“庆祝德国皇帝灭亡而停业”的公告。人们像四天之前那样在各个街道四处游行；美丽的姑娘随便亲着过路的军人；汽车在人群之中缓慢地前行，有意让发动机熄火，让汽笛轰鸣与高声欢呼的喧哗之音响彻天空；巴纳德学院的800名女学生在纽约市清晨的高地上翩翩起舞。时代广场曾为战时的运动搭起了一座名为“自由厅”的建筑。而这天一大早，就有个姑娘登了上自由厅的平台，在寂静的人群面前高声唱起了《荣耀颂》。

但是，似乎是为了讽刺威尔逊总统宣言之中所提倡的“理性友善的建议”，这场庆祝活动与此形成了鲜明的反差。人们所流露出来的情绪并不是虔诚的感激之情，而是得胜之后的愤恨快感。民众烧毁了德国皇帝的画像。在纽约，有人用消防龙头里喷出的水柱喷向代表着德国皇帝的假人；在第五大道，人们一边扛着用肥皂箱子改成的棺材到处奔走，一边高喊着，德国皇帝已经被“碎尸万段”地躺在了棺材里；在百老汇和第七十街的路口，有个男孩子人行道上画着一张张德国皇帝的画像，分给路人们用来践踏取笑。

这个和平的新时代到来了。

引用一句拜伦的话：百万人民不可能在一夜之间甩开战争的纠缠。此时仍有350多万美国人在军队中服役，仅驻扎在欧洲的军人就超过了200万，到处可以看到穿着军装的身影。即使在11月11日那场热闹的狂欢结束之后，美国远征的将士们依然置身于战壕之中，准备小心翼翼地长途远行，向德国进攻。普通民众仍然将白糖和煤炭节省下来，吃着难以下咽的黑面包。直到十天之后，燃料管理局才撤销了亮灯禁令，百老汇大街曾经灯光昏暗的道路终于又重现霓虹美景。铁路依然由政府运营，人们要在铁路管理局的统一售票厅购买车票。流行性感冒让成千上万人胆战心惊，纷

纷戴上白色的口罩；这次流感大暴发已经夺走了很多美国人的生命，死亡人数甚至超过了对德国作战的伤亡人数。如今，这场流感正在慢慢消退。

报纸上充斥着各种各样的报道：欧洲军队、德国革命、威尔逊总统的和平安排、联合战争运动，除此之外几乎没有其他别的消息。一天又一天、一周又一周、一月又一月，报纸上的伤亡名单越来越长，从缅因州到俄勒冈州，男女老少每天都忧心忡忡地在报纸上找着自己亲友的名字。

正常情况下，11月份本应为橄榄球赛季的高潮阶段，然而现在的大学橄榄球队几乎都是由学生军训团的成员拼凑起来的。他们到处参加义赛，尽量筹集到更多的战争准备金。为了提高人们捐钱的意思，哈佛大学足球队教练查理·布里克利（Charlie Brickley）朝空中抽射一脚，足球飞跃过华尔街上空，落到了纽约证券交易所阳台上的那位来自耶鲁大学的杰克·盖茨（Jack Gates）的怀里。不仅仅是报纸的新闻专栏，连所刊登的广告都流露着浓重的战时情绪。报纸上既有《有权憎恨德国人》的社论，也有建议对德国皇帝施以严惩的读者来信。在这封信中，作者表示应将德国皇帝当成“不受欢迎的外国人”，从一个国家赶到另一个国家去。读者们会在这些文章旁边看到联合战争基金打的大篇幅广告，敦促人们捐款、捐款，不断地捐款。翻开下一页，在名为《为了美国重建世界而时刻准备着》的大字标题下面，读者又会看到新一轮爱国主义的浪潮：“如今自由已经获胜，正义的力量开始重新构建人类的道德观，世界面临着同样艰巨的物质任务。”等读者们吃力地读完更多铿锵有力、辞藻华美的语句之后才恍然大悟，原来要用布兰科公司的铁窗才能够完成这个“物质任务”。

当然，军人复员正在进行，士兵们纷纷离开军营，返回家乡。稽查制度已经被废止，老百姓的家里灯光重新亮了起来，妇女们不再担忧购买白糖。可就算这种非常明朗化的和平时期已经梦想成真，这个国家仍然让

从大繁荣 到大萧条

人们的思想停留在了战争时期。这之前的十九个月里，人们学会了不容争议、毫不妥协，直接向自己所痛恨的东西发起攻击，并将其打倒。德国已经遭到了痛击，但看起来好像出现了另一个威胁。布尔什维克主义正从俄国蔓延到了欧洲，也有可能蔓延到美国。他们便对布尔什维克主义也发起了进攻，这正是他们所假想的目标。停战协定签署完一周之后，纽约市市长海兰宣布在街上禁止悬挂红色的旗帜，并命令警察“将所有非法集会驱离”。几天后，社会主义者在麦迪逊广场花园举行群众集会时，500名军人和水手从四面八方涌了过来，打算进行骚扰。当局动用了22名骑警才驱散了集会的人群，恢复了街道的秩序。第二天的晚上，靠近市中心的棕榈花园酒店门前又发生了一次骚乱。当时国际妇女联合会正在这里举行一场同情俄国革命的集会，再次引来了士兵和水手的骚扰。他们包围了第五大道的一个街区，高声叫嚷着要冲进棕榈花园酒店。在这场混乱中，有6个人被打成了重伤，其中有一个受害者是保守派股票经纪人。当时他正和一位女士在列克星敦大道上散步，刚好碰到了乱吵乱嚷的人群，便向别人打听这场骚乱是怎么回事。这时有个水手喊了一嗓子：“嘿，伙计们，这里还有一个布尔什维克党呢！”马上就有十几个人朝他扑了过去，扯掉了他的领带，将他打得几乎昏迷不醒。这些事例足以表明，战后漫长的暴乱时期马上就要开始了。

在战争时期，这个国家已经养成了马上行动的习惯，绝对不会马上将这个习惯丢掉。社会环境和行为方式发生了改变，但也仅仅如此而已。雇主们用充满怨恨的眼神盯着工人们不断提高的工资待遇，但政府并不希望工人阶层引起骚动。在政府的鼓励下，雇主们觉得他们的时机到来了。德国人被打败了，接下来就该好好教训一下这帮工人们。无论怎样，煽动工人闹事的肯定是群布尔什维克主义者，现在是让商人们获得丰厚回报的时

机了。与此同时，工人们面临着每日见涨的生活成本，并意识到为了增加工资而去罢工并不是不爱国的行为，所以他们决定回过头来再教训一下衣着光鲜、中饱私囊的雇主们。结果，城市里便出现了一系列充满仇恨的罢工和停工事件。

至于饮酒问题，政府也马上采取了措施。在战争时期，酒精一直都是对于国家战斗力的明显威胁。大部分地方都根据各州法律和当地的法规禁止喝酒，而现在国家决定彻底将酒吧关闭。战时的心理状态处于优势地位，任何打算半途中止的措施都无济于事。战时禁酒令已经写入了法律，将于1919年7月1日生效。这样做还差得很远。《宪法第十八条修正案》明确表示，禁酒令长期有效，并于1917年年底在美国国会通过，直到战争结束之前，很多州都已经批准了这项法案。1919年1月，随着各州立法会议的召开，批准法案的进程正以惊人的速度前进。根据《纽约论坛报》的报道，这种局面“就像一艘依靠着某种看不见的力量提供前进的动力，在平静的海面上飞驰的帆船。”《纽约时报》的社论则声称：“禁酒令好像成了时尚，就好像喝酒曾经流行一样。”直到1月16日，在停战协定签署九周之后，立法所需要的36个州都批准了宪法修正案。与共产党人一样，威士忌和酒杯也受到了恶毒的攻击。当然，也有人持怀疑态度，有人指出，300万军人可能并不同意这种新的举措；但是全国上下并没有丝毫迟疑的情绪，禁酒令在“不容妥协”的战斗精神中疾速前行。

尽管停战之后的人们在战时养成的急性子仍然存在，但是和平的到来还是在一个方面产生了深刻的变化。战争期间，这个国家兴致高昂地忙着自己的事业。陆军军士长振臂高呼，只有断了气的德国人才是好人，为了民主而推动世界和平这种话都是胡话。从不讲废话的演说家用尖细的嗓音说道，应该把德国皇帝扔进油锅里。但事实上，数百万美国人坚信，他们

从大繁荣 到大萧条

是为了神圣的事业而战，为了受压迫国家的权利而战，为了永远消除一切战争而战，为了华盛顿的那位教书人的振奋人心的演说而战。在时代广场高唱《荣耀颂》的那个女孩子和焚烧德国皇帝肖像的人们一样，代表着美国人民最为真诚的情感。但是，在停战协定签署的那一刻，情况开始发生了微妙的变化。

而今有一些一直都讨厌威尔逊总统的人纷纷表露心迹，认为威尔逊处于战争之外的时间太长了，他的血管里流的并不是一腔热血，而是掺了水的牛奶。至于他对待罗斯福（Roosevelt）和伍德（Wood）的行为，永远不能被原谅；他本质上是一个非常危险的极端分子，对于资本主义制度来说是一个威胁，他不应该解散国会重新选举，使得民主党控制国会；他亲自去巴黎参加和平会议是狂妄自大的标志。还有一些人，他们要么厌烦了为法国叫好；要么对于英国人以及英国人对于爱尔兰的态度有着自己的想法；要么感觉听够了“我们的神圣同盟”这样的说法；要么就是觉得美国参战是为了拯救自己的命运，而威尔逊的那套为了民主而推动世界和平的说辞是自作主张的胡言乱语。人们开始随心所欲地发表着各种言论。眼下，有人可以面不改色地说：“我们已经把德国人打垮了，还要把这些该死的布尔什维克给打垮，是把威尔逊和那帮和平主义者们都赶出去的时候了。”和平时代的最初几个星期悄然逝去，人们开始怀疑，美国是否会像威尔逊所讲的那样，准备“在全世界建立正义的民主制度”。

三

威尔逊总统的灵魂也受到了战争的洗礼。自1917年4月以来，他的意志就变得坚不可摧。在美国，公开反对威尔逊领导的意见实际上遭到了扼杀：谁和总统的意见不一致就等于不爱国。他的宣言和演讲为民众对于美

国此次参战的目标和最终和平条款的观点奠定了基调。在欧洲，他的慷慨激昂的演讲非常有效，政治家们不得不唯命是从，按照他的条件签署了停战协定。全世界千百万的人将他的演讲当成救世主般的神谕。而今，他那个打算在国际联盟（League of Nations）的基础上建立世界新秩序的设计，使他不免要亲自动身去趟巴黎，发挥仁爱精神的最强大的力量，将他的构思变成现实。他完全沉浸在绚烂迷醉的梦想之中。像参议员洛奇那样的批评家和国务卿兰辛这样的左膀右臂也许都会表达反对意见，他应该将谈判事宜留给下属去做，先和德国建立和平外交关系，然后再商讨建立国际联盟的事宜，目的是让世界那动荡的局势马上归于平静。但是既然他在战争期间能让指责他的人哑口无言，难道眼下不能让他们保持沉默吗？12月4日，离停战还不到一个月的时间，总统便乘坐“乔治·华盛顿”号轮船离开了纽约。码头上的人群高声欢呼，港口的船只拉响了汽笛，礼炮响彻云霄，向总统表示敬意。随着轮船向东驶去，站在“乔治·华盛顿”号舰桥上的伍德罗·威尔逊肯定觉得自己受到了命运女神的眷顾。

接下来几周发生的事情为他这种良好的感觉提供了有力的支撑。威尔逊对法国、英国和意大利的访问均取得了令人难以置信的成功。在英国本土，从来没有民众如此热情地欢迎一位外国来宾。当他经过伦敦街道的时候，那种热闹的场景只有英王的加冕典礼才能与之媲美。在意大利，大街小巷都挤满了黑压压的人群，大家都向他表示敬意。在法国，威廉·伯利梭这样写道：“从来没有人接受过如此热烈的欢呼。听到巴黎街头那震耳欲聋的欢呼声，我一生都难以忘怀。我在这里看到过福煦（Foch）元帅、总理克列孟梭（Clemenceau）、英国首相劳埃德·乔治（Lloyd George），看到过凯旋的将军、归来的士兵、那飘扬的旗帜……但当威尔逊坐在马车里经过这儿的时候，我看到了如圣人一般的東西。”当伍德

从大繁荣 到大萧条

罗·威尔逊见到拥挤的人群，听到热烈的欢呼，他怎么会对自己的不可战胜产生怀疑？巴黎和会召开之时，只要他一张嘴讲话，大家就静心聆听，维护着旧秩序的外交官们怎能与他的威力相抗衡？命运女神眷顾着他，全世界都和他站在一起，那闪耀着希望之光的未来就在不远的地方。

但是，命运女神还有另外的安排。在欧洲和美国，理相主义的思潮正在消退。长期以来，劳埃德·乔治都是对民众舆论极具影响力的人物，此时他正在“绞死德国皇帝”的观念基础上争取再次参选。民众可能会为威尔逊和正义公平呐喊，却将选票投给了劳埃德·乔治与复仇。如今，德国人已经被打败了，一群眼红的欧洲政客各怀鬼胎，为了国家的将来与自己的名誉，盘算着能从巴黎和会上捞到怎样的好处。他们希望将战利品带回家。他们尽管听到了民众对威尔逊的溢美之词，但他们也知道民众的变化无常，还会为占领吞并与惩治赔款高声叫好。他们来到巴黎决心要创造一个和平的氛围，并把战利品想尽办法弄回国去。

就在此时，华盛顿参议院里那些反对威尔逊提出的国际声明与十四点原则的意见也越来越多。早在1918年12月21日，参议院的共和党精神领袖亨利·卡伯特·洛奇（Henry Cabot Lodge）宣称，参议院应在缔结条约方面与总统享有同等的权力，应在谈判之前让公民了解政府的决策。他认为，就算不提出国际联盟的问题，在巴黎和会上也有很多事情需要去做。他阐述了自己对构建和平的设想，和威尔逊总统的看法完全不同。洛奇和他的同僚们盘算着让德国解除武装，承担巨额赔款，如果可能的话，瓜分德国领土，圈定势力范围。他们准备在领土方面对盟国做出巨大的让步。更为重要的是，他们不想参与和平解决方案，这样会使美国进一步承担干涉欧洲事务的责任。他们准备认真审查巴黎和会所提出的关于国际联盟的任何计划，如果涉及“职责混乱的结盟”就设法进行抵制。这样一来，欧

洲外交官的敌视，加上美国参议院和公众舆论的反对，威尔逊受到了双重围攻。他没有意识到这些反对意见对他造成的威胁，但是这些反对意见很快被散布到了各处。

事态正朝向对他不利的一面发展。如果威尔逊有所察觉，他就会发现全世界的人性的一种新的特质开始显现。其实历史上每一场战争结束之时都会如此演变，团结的愿望越来越微弱，并由分裂的局面所代替；理想主义的冲动失去了效力，现实主义的思潮占领了高地。

命运女神不但依靠旧世界的外交官和新世界的爱国议员们左右着局势的变化，还通过伍德罗·威尔逊本人的思想和性格中所特有的狭隘发挥着作用。执着专注、顽固坚持的个性帮助威尔逊成了伟大的预言家，也迫使他在巴黎和会上将负责谈判的重担扛在了自己的肩膀上，这份沉重让他无法承受。这使他无法明确告知自己的同僚们，他在十人会议和四人会议上到底做了什么，也使他了解不到同僚们的建议，更谈不上得知反对的建议了。这让他无法获得驻巴黎的美国记者的信任，也无法获得国内宝贵的支持。在这种状态下，他只能在和会上形单影只地行事。他的智慧是显而易见的，却无法用语言进行表达。雷·斯坦纳德·贝克（Ray Stannard Baker）曾经写道，威尔逊“习惯于从书本、文件和书信等文字之中获取信息，而不是从人们的口中得到消息，所以他低估了与人们面对面交流的价值”。他在书面谈判中是一位经验老到的行家，但是在小型会议的口头交谈之中却处于劣势。当克列孟梭、劳埃德·乔治和意大利总理奥兰多（Orlando）请他加入四人会议闭门谈判时，他们已经把缔结条约搞成了四人组合起来玩的牌局。超人可以远赴巴黎，然后凯旋，但伍德罗·威尔逊却失去了昔日的春风得意，并没有满载而归。

关于总统在巴黎为了理想而斗争的那长期而痛苦的过程，我无须多

从大繁荣 到大萧条

说。一言以蔽之，他坚强不屈、斗智斗勇，接着让人赞叹地修订了条约的内容。欧洲外交官们希望先解决领土与军事问题，然后再商议国际联盟的事宜，但威尔逊施加压力，让他们将国际联盟的事情放在首位。身为起草《国际联盟盟约》的委员会主席，威尔逊草拟了初步的方案，就如他所预料，美国国内的反对派主要是塔夫脱（Taft）、鲁特（Root）和洛奇等人。在巴黎，与会代表达成一致，同意吞并大片的德国领土以及所有殖民地，甚至连英国自治领的各总督都代表自己的领地大胆地要求吞并，彼此互相支持对殖民地的主权要求。但是威尔逊仍然成功地说服了与会者们接受委任统治权原则。他威胁要退出巴黎和会，迫使克列孟梭改变了对德国领土的索求；他敢于呼吁公众唤醒社会良知，导致意大利放弃了自己企图吞并的土地。威尔逊一次又一次地舍生取义，他孤身一人牵制着战胜国对于领土的瓜分，毫不考虑战胜国民众的期待。如果留意每天关于巴黎和会的报道，人们就会发现，如果没有威尔逊的努力而签订对各方代表都较为公平的条约，会议的解决方案会对未来世界的和平构成更大的威胁。最终，会议有了经过各自妥协之后的结果。这份条约在很多方面都延续了战时秘密条约的规定，威尔逊设法将《国际联盟盟约》死死地嵌进了里面；但这份条约过于严苛，承担了太多的军事职责，而美国人已经对战争产生了厌倦情绪，打算彻底从欧洲事务之中摆脱出来。

在远赴法国六个多月之后，威尔逊在1919年6月底带着条约回到了美国。他对于《凡尔赛和约》之中那些令人恶心的种种缺陷非常清楚，也肯定知道，不论他如何努力，坐在巴黎和会谈判桌前面的那些代表都如墙头草一样左右摇摆。他们的心中充满了恐惧、仇恨、贪婪和狭隘的民族主义，而不是他所秉承的高尚目的。任何一个洞察时事的人都能够发现，世间的梦想在慢慢地变成泡影，华盛顿参议院对于《凡尔赛和约》的反对意

见越来越多。而威尔逊还能做些什么呢？

事实上，他回国后难道能对参议院和美国人民说“这个条约在某些方面非常糟糕。我本来不应该接受山东条款，也不应该接受意大利边界条款，我没能将德国赔款的数额确定下来，不应该让大片的德国领土被法国割走，这些我都是被逼无奈的。但是在当时的情况下，这是我们所能得到的最好结果，我相信国际联盟会在其他事情上做出让步”？他当然不能。各项条款他都亲自负责制定，他既然签署了条约，就应该维护它的存在。难道他能坦白，在巴黎和会的谈判过程中，代表们并没有体现出他此前所宣扬的大公无私的道义精神？这样无异于承认他的失败，从而使他的威信被严重质疑。他在巴黎和会召开之前承诺解决方案将不偏不倚，在巴黎和会上宣称会议过程将充满正义的能量，又怎能在会后告诉大家结果一点也不公正呢？事态的发展让他陷入两难的困境，要摆脱这种境地看来只有一个办法，他必须在回国之后向公众宣告：巴黎和会是一次充满善意的聚会，每一项重要的决定都是以十四点原则为基础而确立起来的，而克利孟梭、奥兰多、劳埃德·乔治等人都将对人类的体恤与关爱表达得淋漓尽致；要解救全世界，人们就必须完全接受条约，将其当作伊甸园一般的世界新秩序来看就行了。

他确实是这样做了，而且他对于条约的说法并不是事实。他心里非常清楚，最起码有时候并不糊涂，这些话都含有水分。从这个角度来看，威尔逊的故事绝对是个悲剧。他落入了每个理想主义者给自己设好的陷阱之中。由于在现实中无法实现自己的理想，他就歪曲事实自我麻痹。他向自己和别人描述的世界，完全和现实是两个模样，那只是他所希望看到的景致。如此一来，乐观主义者变得易怒伤感。他回国之后，面对着美国人民将巴黎和会的经过描绘成了一段美好动人的传奇，只有高尚的人士和脚踏

从大繁荣 到大萧条

实地的奋斗，不见半点危害人类福祉的自私与偏见。他宣称，如果美国不签署巴黎和会的条约，全世界都会非常难受。可最后难受的，却只有他自己。

四

亨利·卡伯特·洛奇不仅是一位绅士、一名学者，还是美国参议院里一位风度翩翩、能言善辩的议员。当他沿着参议院的长廊信步而行时，他那身材修长、优雅得体、一头鹤发、花白胡须的外表，将贵族的特质体现得淋漓尽致。他像饰演福尔摩斯的威廉·吉尔特（William Gillette）一样，能在拥挤的舞台上将人们的目光聚集到自己身上。他不必提高声调，只要转过身，侧耳聆听同僚们发表的几句冠冕堂皇的言辞，然后再面不改色地走开，就能让坐在一旁的听众们相信，那番话根本没必要上心。正是在洛奇的身上集中体现了对威尔逊的众多反对意见。

洛奇信奉的是美国精神。他认为美国外交政策的本质应该是国家离外交纠纷越远越好，除非是牵涉到美国自身的荣誉；一旦牵扯进矛盾之中，就要做好艰苦斗争的准备；当斗争结束之后，我们就要再次从当中脱离出来，明哲保身，处理好我们自己的事情就得了。（在洛奇看来，如果我们的特权受到了威胁，就牵涉到了美国自身的荣誉；另一方面，在威尔逊眼中，国家荣誉是道德层面的问题：只有可耻的行为才能使国家失去荣誉。）身为外交关系协会的主席，洛奇认为他的职责就是保证美国不要卷入任何国际协议之中，这会危害这项由来已久的外交政策。他不相信世界各国都值得信任，在今后的时间里能表现得如同童子军一般忠诚可靠；他心知肚明，一份能够在冲突与平时时期都有效力的条约才是有用的；他看得出来，目前的这个时代会给这个国家带来不少的麻烦。

参议员洛奇也是一位政治家。他深知自己在马萨诸塞州的选民人数很多，其中有几十万爱尔兰人。于是他要求不堪重负的巴黎和会代表们举行听证会，与弗兰克·沃尔什（Frank P. Walsh）、爱德华·邓恩（Edward F. Dunn）和迈克尔·瑞恩（Michael J. Ryan）等人组成的美国争取爱尔兰独立委员会当面对质。尽管除了爱尔兰人自己之外，大家很难说清自己与爱尔兰的独立与条约有着怎样的关联。还有一点需要牢记，那就是意大利人的大量选票。在巴黎和会上当意大利面临危急关头时，洛奇有意让威尔逊下不来台，在演说中对波士顿的意大利人声称，意大利应该占领里耶卡，控制亚得里亚海。说白了就是，洛奇对威尔逊一点好感也没有。威尔逊自觉有权替美国人民代言，但洛奇却强烈地感觉到这种自我标榜毫无根据可言，也并不公正。当美国和平委员会中唯一一位共和党人亨利·怀特（Henry White）动身去欧洲之前，洛奇将一份秘密备忘录塞到了他的手里，里面是洛奇关于和平条款的与威尔逊完全相反的个人见解，美国人民会支持他的这些想法。他建议怀特在绝对保密的条件下，将这份备忘录拿给英国外交大臣巴尔福（Balfour）、克列孟梭和意大利总理尼蒂（Nitti）看。他补充道：“在适当的条件下，这些内容将对他们加强自身地位起到重要的影响。”一个光明磊落的人绝对不会提出这种建议，除非他确信总统的失败对于这个国家的光明前景是必不可少的。

不仅是洛奇本人，还有各种非常有影响力的人士，和他一样对条约满怀猜疑。其中有布兰德吉（Brandeggee）那样冥顽不化的保守党；有波拉（Borah）那样的西方理想主义者，他们并不相信任何与外国外交官打交道的勾当，就像老式情景剧里，金发碧眼的农村小伙子不信任精明狡诈的城里人一样；有参议员拉·福莱特（La Follette）和吉姆·里德（Jim Reed）那样的长期反对派系；也有共和党人，他们不会对一位民主党总统

从大繁荣 到大萧条

心慈手软，而是落井下石，特别是这位总统在战时还选出了一个民主议会；而参议员们急于表明，如果没有参议院的建议和认可，任何人都无法掣肘这个条约，从困境之中摆脱出来；还有不少人，除了有自己的反对意见之外，还与洛奇一样对威尔逊的谈吐厌恶不已。除了参议院之外，还有来自其他方面的反对意见。爱尔兰人无疑对国际联盟心怀满腔愤怒，因为联盟给了“英格兰六个席位”。而意大利人则准备公开指责致使意大利占有里耶卡的计划落空的威尔逊。许多德国人，无论他们在战争期间对美国表现得如何忠诚，都对牵制德国、国联拒绝给德国留有席位等举止反应冷漠。有一些人觉得美国从解决方案中没捞到多少好处。还有很多人反对他们所看到的《国际联盟盟约》中包含的他们并不愿意让美国承担的义务，特别是第10条内容。

除了这些人之外，还有一股不容忽视的力量，那就是数百万的美国人对于任何让他们回忆起战争的事物都日趋淡漠。美国人很快就无法忍受欧洲的混乱局面，只想和其划清界限。他们不想被通知要做出新的牺牲，毕竟牺牲的代价已经付出得太多了。在时代广场高唱《荣耀颂》的女孩表达了美国人胜利的喜悦之情，但是那天的欢庆时刻已经过去。现在一切都是过去时了，威拉德与邓普希之间的拳击比赛和英国飞艇R-34号抵达长岛的消息要比这些更有意思。

1919年7月10日，总统再次回到了华盛顿，将《凡尔赛和约》递交给了参议院。他不承认这份条约是一次妥协，美国代表团并没有“失去原则的内核”。当威尔逊在参议院发表演说时，他的言辞依然铿锵有力，像几个月前那样让世界惊叹。他说道：“舞台已经搭建完毕，命运已经注定如此。一切并非出自我们心中的构想，而是上帝之手引领我们前进。我们不能后退，只有昂起头颅勇往直前，望着远方的风景振作起精神来。这就是

我们自诞生之日起的理想。美国将明确地指引着前进的方向，光明会铺洒在这条道路的前方，照耀着我们的土地。”

这番话说得是如此激动人心，但并没有让参议员们产生强烈的爱国热情，马上批准《凡尔赛和约》。这个国家已经对昂起头颅勇往直前产生了厌倦，也对伍德罗·威尔逊那抒情散文风格的演讲感到腻歪，人们对这些话倒背如流，再也提不起任何精神。这份像小说一样冗长的条约交到了洛奇领导的外交关系协会手中，协会拿了主意，按部就班地研究了起来。一个月后，洛奇在参议院发表演说，声称他更加看重国家的独立和安全，坚决反对《国际联盟盟约》的第10条和第11条内容，这份条约让其他国家有权力“调用美国军队和美国军舰开往世界各地”。他反驳威尔逊的观点，说道：“我们不会让本国的政治受到别国冲突的干扰与侵害。我们不会永远干涉各种冲突，这些大大小小的冲突是对世界的折磨，会让本国的经济活力与道德力量损耗得干干净净。”两周之后，洛奇领导的外交关系协会开始对条约的修正案进行投票表决，各方面的优势都非常微弱：支持中国收回山东，解除美国国际委员会的成员资格，美国和英国在国际联盟之中享有同等的投票权，并取消英国自治领代表的对影响大英帝国问题的投票的条款。对于条约所做出的补充和附加有限条款的过程看起来无法避免。伍德罗·威尔逊决心殊死一搏。他要走到民众中间去，他将争取他们对自己事业的支持，准备去美国西部进行巡回演讲。

总统的医生劝他不要这样做，因为他的健康状况并不乐观。几个月以来，他的身体非常虚弱，精神一直处于高度紧张的状态。在巴黎和会期间，雷·斯坦纳德·贝克就注意到，经过一天漫长而难以忍受的会议之后，总统看上去“非常劳累、精疲力竭，他面容憔悴，脸颊的一侧痛苦地抽搐着”。有段时间总统曾经病倒，突然得了流感，剧烈地咳嗽着，一度

从大繁荣 到大萧条

烧到103华氏度，但他在几天后却又开始了工作。而今已经是9月份，持续的过度操劳让他神经紧张，想到自己为之付出全部精力的事业有可能失败，他就深感烦躁不安。他的心中所想的，只有条约和国际联盟。他唯一关心的事，就是让这两件事有个成功的结果。所以，他不顾所有人的劝说，执意在9月3日离开华盛顿，开始了巡回演讲。他每天在闷热的大礼堂里准备并发表一到两次演讲（而且没有扩音器让他缓解一下嗓子的疲劳）；他要坐着汽车穿过一座又一座城市（在这期间，他必须站在车上，不停地朝群众挥舞着帽子）；他面对着拥挤的记者、持续伸出的手掌与公众密切的关注，还有在颠簸的火车上度过一个又一个难以入睡的夜晚。

在这次漫长的旅途之中，伍德罗·威尔逊向人们一次又一次地描绘着他脑海里的《凡尔赛和约》与国际联盟的美好愿景，这幅景致和现实的相似之处却愈加模糊。他提到，巴黎和会上从头到尾都显现出了“高尚大气、有政治家典范的合作精神”；他说“克列孟梭、劳埃德·乔治和奥兰多等人的心与全世界人民的心相连”，而他们所签署的文件中闪烁着人性的光芒。他代表美国，其实也代表着其他各国，对于新的理念激动不已：

“你可以想象，现在整个世界都为此兴奋万分，每一张脸上都流着滚烫的泪水，这热泪之中不仅含有悲伤，更饱含着希望。”他警示世人，如果条约不能得到批准，所导致的混乱局面将会动摇世界的根基。他预言，这个伟大的国家走在巨大的阵容的前面，走向“只有上帝正义的圣洁光辉照耀的地方”。四十场演讲的内容每一次都各不相同，每场演讲他都有着完美的发挥、优美的言辞与鼓舞人心的热情。作为充满智慧的传奇，他所的演讲都取得了不凡的反响。但是，这个国家本能地知晓，他每次演讲中所描绘的都是那梦中的世界和梦想中的条约。（也许，当总统在私人车厢里整夜无法入睡之时会猛然清醒，发现自己所言之物与真相差得多么遥远。）

公众并没有如威尔逊所预料的那样，积极支持他的事业。参议院仍然在讨论保留条款。9月24日，第一轮测试投票以43票对40票否决了总统的提案。第二天晚上，威尔逊终于耗尽了自己的全部精力。一段时间以来，他一直消化不良、严重失眠。9月25日的晚上，他在科罗拉多州普韦布洛发表了长篇演说，就再也无法入睡。火车停了下来，威尔逊夫妇一同沿着乡间小路散步。当他回到火车上之后，便发起了高烧，“服用了镇静剂才能入睡，他的嘴角流出了口水。总体上看，他的身体马上就要崩溃了”。第二天一早，当他打算起床时，发现自己几乎无法站立。火车马上驶往华盛顿，并取消了所有预先安排的演讲计划。总统回到白宫后就一病不起。几天之后，突发的脑血栓让他的左半身瘫痪。又一出悲剧到了最终落幕的时刻。他将自己所拥有的一切全都奉献给了他自己的事业，但这远远达不到这个国家的要求。

五

至此之后是美国总统历史上最为异常的一段时期。几周以来，伍德罗·威尔逊病得很厉害，有时甚至没有办法在需要他签署的文件上签名字。有一个多月的时间里，他甚至无法在椅子上直起身来。在长达五个月的时间里，他甚至不能乘坐白宫的专车出行。在威尔逊剩下的任期内，从他病重到1921年3月4日从总统的位置上离任的十七个月之中，他的身体依然孱弱不堪，健康的状况并不稳定，要不就是卧病在床，要不就是坐在椅子上。他的左侧身体，包括他的左腿和左臂完全瘫痪。他将自己封闭在白宫之中，就像生活在医院里。他几乎不见什么人，只是处理总统办公室中最为紧迫的事务。人们只有通过写信才能与他联系上，而所有信件必须由威尔逊夫人、医生格雷森海军上将（Admiral Grayson）和其他护理人员

从大繁荣 到大萧条

代为传递。很少有人收到回信，外界没有办法知道谁应该是负责人，他们经常得不到回复，也没有按照他们提出的建议行事的批复。事实上，有人猜测正是由于威尔逊夫人负责做出白宫的很多决议，这个国家实际上处于摄政统治之中。

由于总统实际上形同虚设，整个行政机构几乎陷于停滞的状态之中。当然，政府可以按老习惯处理日常事务：像司法部长帕尔默（Palmer）那样专横的内阁成员，可以肆无忌惮地搜捕激进分子，四处驱赶他们，颁布关于罢工人士的禁令，就像他后面有着总统智慧光芒的笼罩与力量的支持一般。但是大多数政策问题还需要等白宫来处理。过了一段时间之后，人们逐渐清醒，已经不可能再指望白宫会传出什么指示了。还有各种重大问题依然需要总统的关切：生活成本居高不下，经济由繁荣转入低迷，不断攀升的失业率；劳资双方水火不相容，随着钢铁与煤炭行业的大罢工而达到了顶峰；政府部门要在和平稳定的基础之上进行重组；外交政策方面有着难以估量的问题，尽管与条约和国际联盟没有什么关系，却迫切需要解决。在大多数问题上，病重的总统根本不能发挥其领导作用。与此同时，总统对国会和整个国家的影响力，并没有因其为国际联盟的贡献而增加，而是烟消云散。

这种奇怪的局面对华盛顿产生了很大影响。一两年之后，爱德华·劳瑞（Edward G. Lowry）在《华盛顿小传》中描述了当时的形势：

“很长一段时间里，华盛顿弥漫着阴郁、危机重重的社会气氛和政治气氛。人们非常憎恨那位病重的总统，似乎是他妨碍与破坏了所有的人际关系。白宫已经自绝于世事，与国会、当地民众和政府之间失去了任何联系。高大的铁门紧紧关闭，并上了锁链。警察把守着通往白宫的道路，这里成了鲜有人至的禁区。所有一切都让人感到萧条荒凉、丧气十足、无比

悲哀。”

威尔逊总统依然神志清醒。当时有报道声称，如果他不能够履行总统职务的“权力与职责”，那么根据宪法规定，他应该被副总统所取代。

（这种报道在当时已经是陈词滥调了。）参议员福尔（Fall）和希区柯克（Hitchcock）代表参议院探望了总统，以便确定他目前的精神状况。两人发现，总统敏锐地发现了他们俩那尴尬目的的可笑之处。威尔逊如往常一般谈笑风生，还不断开着玩笑，表示他完全了解当时所讨论的各种问题。但是他已经心如死灰。他的想法单调乏味，他的头脑毫无新意。他能为换一种新的方式去适应新的环境。读着他所写的公文，只能感受得到他的思想一直被旧观念所笼罩，嘴巴里吐露的仍然是那些重新组织在一起的陈旧说辞。他仍然生活在梦想的世界里，而这个世界是他在为国际联盟奋斗的岁月里亲手构建起来的。

他一直都是一个孤单落寞的人，如今就像被魔鬼附体一般，冷落了一个又一个过去为他效力的人。豪斯上校（Colonel House）多年以来担任着总统的首席顾问，也是他的亲密至交。在巴黎和会的最后几天，人们注意到威尔逊对豪斯的态度有些冷淡。当总统离开巴黎期间，这位打算息事宁人的顾问也许在谈判中过于退让。不管这种退让是对还是错，总统都觉得豪斯在不经意之间给了老奸巨猾的克列孟梭钻空子的机会。尽管如此，豪斯还是希望他从巴黎回国之后，能让伤心失望的总统和咄咄逼人的参议员们达成和解。豪斯写信建议威尔逊接受条约所附加的保留条件，但这封信并没有得到答复。豪斯又写了一封信，却仍如石沉大海，更没有获得任何解释。长久以来，两个人的友情与政治关系对于总统而言非常珍贵，对于政策方向的制定有着深远的影响。而此时能够说的就是，这份交情已经走到了尽头。

从大繁荣 到大萧条

巴黎和会召开期间，罗伯特·兰辛（Robert Lansing）在很多事情上都与总统的观点格格不入：眼下他仍然担任着国务卿一职，并深信自己和总统的关系比较和睦。在威尔逊患病时期，他认为有必要采取一些措施，以便让政府能够处理日常政务，于是便在白宫的办公楼内阁会议室里召开了内阁会议，结果不等他进行解释便遭到了解聘。最后一个离开的是忠心耿耿的乔·塔马尔蒂（Joe Tumulty）。作为威尔逊的秘书，他从特伦顿的州长办公室发迹，饱经历练，在华盛顿任职长达八年的时间。尽管在威尔逊离开白宫之后，塔马尔蒂才和他彻底闹掰，但值得一提的是，这和其他的事也有着相似之处，并可以将这位病重总统的内心到底被什么样的病毒所感染展现得非常彻底。1922年4月，纽约将举办一场民主党晚宴。宴会召开之前，塔马尔蒂拜访了威尔逊。他本以为自己从威尔逊那里得到了一个口信，大意是威尔逊会“支持任何为了拯救美国而奋斗的人担任总统一职，而拯救美国就意味着对所有阶层的民众都将平等视之”。看上去这个口信并不重要，毕竟和威尔逊有着十年的友谊，塔马尔蒂应该会知道，何时能够引用威尔逊的话，何时不能引用。塔马尔蒂在转达这条口信的时候，刚好赶上考克斯州长在民主党晚宴上发表了讲话，于是这条口信便被外界理解为考克斯获得了威尔逊的支持。威尔逊随后给《纽约时报》写了一封短信，断然否认他曾经委托任何人传达他的口信。塔马尔蒂马上给威尔逊去信解释，他本是出于好意，但没想到却让总统感到难堪。他就像一位真正的朋友那样对威尔逊表达了深深的歉意。他的信件虽然得到了“威尔逊夫人流于客套的回复”（出于塔马尔蒂本人的描述），但威尔逊总统却对他不提只言片语。塔马尔蒂怀着一颗忠诚的心又写了一封信，表示他一直非常敬重威尔逊，并且“在您需要我的时候随时等候您的派遣”，然而这封信也从此如泥牛入海，再无回音。

在条约和国际联盟的问题上，伍德罗·威尔逊始终态度坚决，可以称为恪守初衷，也可以称为冥顽不灵。他并不赞成附加任何保留条款，除了参议员希区柯克提到的一些并不重要的解释条款；等他同意这些条款的时候也已经无力回天了，最终还是被宣告失败。总统卧病期间，参议院正在一条一条地讨论着保留条款。1919年11月19日，参议院否决了《凡尔赛和约》。当时坚持反对意见的参议员刚刚超过半数，但他们的投票已经足够影响整个局面。他们先和不希望不增加改动就通过条约的威尔逊民主党的支持者联合起来，这样便能够保证得到多数选票，反对洛奇领导的外交关系协会所提出的一长串保留条款；然后他们再和支持保留条款的洛奇和其他持保留意见的议员们联合起来，否决了不附加保留条款的条约。这个结果非常具有讽刺效果，但结果已成定局。几个月后，有人重新提出这个议题，但是条约的通过仍然宣告失败。最终，美国参众两院通过了单独与德国和解的决议，但却遭到了威尔逊的否决，因为“这种举动会让美国的英勇与荣耀沾上无法抹去的污点”。（最终，哈定总统签署了一项类似的对德和平协议。）威尔逊最后的希望是，1920年总统选举会成为“神圣庄严的全民公投”，广大美国民众会为了他勇敢地站出来。他一直声称他们是拥护自己的，会站在他的立场上，证明他为了维护这个国家而做了正确的决定。他们确实勇敢地站了出来，以超过700万张选票的优势击败了赞成国际联盟的总统候选人。可以想象，当他的事业面临着一次又一次的失败，自己为其所付出了那么多的代价竟然成了笑话，白宫里的那位病重的总统内心必然不会舒服。他到底如何清醒过来，懂得了自己已经失去了一切，我们不得而知。当他身患重病，躺在白宫的楼上时，是否仍然存有一丝侥幸的希望？这好像也有可能。外界所有消息都是经过周围人的筛选才能传到他的耳朵里。由于他生命体征还没有稳定下来，这样做是自然而然

从大繁荣 到大萧条

的事；若不是那种非让他知道不可的坏消息，人们都要保护着他，让他免受刺激。他们会告诉他国会的进展一切顺利，社会的形势会再次好转起来，从种种表现上看美国人民都不会让他失望。按照此番理解，就可以解释他为何做出与豪斯上校决裂的行为了。在总统看来，任何可能与洛奇一派妥协的建议，都是胆小懦弱的举止，是在即将胜利的最后关头竖起白旗投降。无论这个理论是否得到了论证，真相早晚要被他所知晓。而国会多次投票反对《凡尔赛和约》，必然让总统饱尝人间酸楚。威尔逊冷酷地和乔·塔马尔蒂断绝了关系，而这种事只有对人类彻底失去信心的人才做得出来。

六

回顾1919年的初春，当时威尔逊还在巴黎。经验老到的政治观察家缪尔·布莱斯（Samuel G. Blythe）在《星期六晚邮报》上发表了一篇文章，描写共产党领导人面对和平问题时的面貌：“你无法让墨守成规的人接受新的事物……保守派会退让妥协，但绝不会从此消失。就在这时，老气横秋的共产党人以为他们扼住了共和党的咽喉，但他们太自以为是了，仍然延续着1896年的办事方式与风格。战争并没有给他们带来任何变化……他们只会因循守旧。”

这种分析符合情理：尽管共和党领袖一向很有政治家的气度，坦然地接受批评建议，但他们说到底还是优秀的政客。他们有着优秀政客必备的敏感的听觉，接收到对威尔逊的很多不满的声音，这就意味着所有。他们决定在1920年的总统选举中挑出来一位领导人，能够给国家和共和党带来崭新的印象，要与他们所讨厌的理想主义者们形成鲜明的对比。竞选的这一年很快就到了。随着共和党大会召开的时间的临近，他们对候选人进行

了一番筛选。头号候选人是伦纳德·伍德（Leonard Wood）将军。这位性情秉直的军人继承了西奥多·罗斯福（Theodore Roosevelt）总统的信仰：对上帝有着敬畏之心，但要随时做好准备抗争。他和威尔逊的形象产生了非常强烈的对比，但是他表示自己很难受控。其次是伊利诺伊州州长洛登（Lowden），但他也并不是理想的对象。紧紧排在他们后面的是赫伯特·胡佛（Herbert Hoover），他曾经在对比利时的救济工作中任职，在战时担任粮食总署的署长。但是他在提名竞选中表现得非常不地道，政客们的脸上显现出一丝刻薄的讥笑，便将他排除在外。究其原因，竟然是胡佛一直到竞选开始，还搞不清楚自己到底是代表共和党还是民主党！海勒姆·约翰逊（Hiram Johnson）也在他们考虑的范围之内，尽管他有着身为参议员的优势，但是却非常固执难驯。共和党领袖们精挑细选的候选人可不是这些人，而是沃伦·甘梅利尔·哈定（Warren Gamaliel Harding），一位貌不惊人、随和谦虚的俄亥俄州参议员。

想象一下，哈定是多么符合筛选标准啊。威尔逊是一位幻想家，将自己看成“高瞻远瞩的人”；而哈定却克制保守，正如劳瑞所说的，像雪茄店门口的印第安人雕像那样普通，就好像来自“发明安全剃须刀之前的时代之花”。哈定认为，政治才能在麦金莱（McKinley）总统和福拉克（Foraker）时代已经到达了顶峰。威尔逊性情冷淡。哈定亲切和善。他出生在小城镇，和平民和睦相处。哈定的一位朋友曾经说过，他是“每周六晚上最为理想的牌友”。威尔逊总是难以亲近，哈定却容易交往。威尔逊偏好劳工阶层，对于商人阶层并不信任，好谈论“工业化民主”；哈定非常渴望回首过去，那时政府还没有用不必要的规定来干扰商界，并给商人提供了优惠的关税，并命令司法部不必盯着他们。威尔逊和国会不断发生矛盾，特别是在参议院；而哈定不仅自己就是参议员，而且还很通情

从大繁荣 到大萧条

达理。威尔逊总是四处树敌，特别是在参议院；而哈定在这世上从来没有一个真正的敌人。他确实是一个亲和友善的人。查尔斯·威利斯·汤普森（Charles Willis Thompson）这样描写道：“他处事非常圆滑，从头到脚都表里如一、精于世故。”威尔逊从全世界的角度来考虑问题，而哈定却凡事必先想到美国自身。最后，威尔逊希望美国发挥更为高尚的作用，而哈定只想让美国暂时喘口气。在共和党大会召开的前几周，哈定在波士顿明确精准地表达了美国人民日渐强烈的希望，同时在不经意为英语增添了一个新词。他声称：“美国当前所需要的并不是豪言壮语，而是医治伤痕；不是一夜痊愈，而是慢慢复原；不是革命，而是重建……不是……而是……”在一个对于承担道义和世界期冀感到厌倦的国家，这个人，才是真正的顺应民意之人。

据可靠消息称，早在1920年2月，共和党领袖们就确立了支持哈定参选的决定，这时离共和党大会开幕还有四个月的时间。但大会进行了四轮投票，仍然没有得到明确的答案，伍德将军一马当先，洛登第二，而哈定则排在了第五位。到了晚上，异常疲劳的代表们各自散去，共和党的领袖们最终决定推举哈定作为总统候选人。哈定的政治竞选总监是俄亥俄州的政客哈里·多尔蒂（Harry M. Daugherty），他曾预言推选大会将陷入进退两难的境地，有十二三个人会“在凌晨两点钟，围坐在烟雾弥漫的房间里”决定他们所提名的候选人。他的预言丝毫不差。这个房间就是乔治·哈维上校在黑石饭店的客房。身患沉疴、卧床不起的博伊斯·彭罗塞（Boies Penrose）在费城用私人电话示意约翰·亚当斯（John T. Adams）。消息很快就传开了，第二天下午，哈定被提名为总统候选人。

重病缠身使让威尔逊不再具有竞选总统的资格，这让民主党人松了口气

气，适时提名另一位没什么名望的政客——俄亥俄州州长詹姆斯·考克斯（James M. Cox）。这位总统候选人不得不背负国际联盟的重担，按前辈的轨迹前进。他耀武扬威地进行着巡回演说，声嘶力竭地高声呼吁，居高临下地指点江山，但是他并没有得到半点成功的机会。参议员哈定仍然驻守在家乡的小镇，举办着麦金利式的前廊竞选活动。他像小镇中那普通的男人一样，在房后和共和党顾问一起钉马掌，模仿麦金利佩戴着一朵康乃馨。身为各国同盟的代表，他那些恰当得体的话，既让赞成国际联盟的资深共和党人选择支持他，也不会感觉到心生愧疚；又反对了威尔逊的国际联盟，足以让大多数人相信，如果他当了白宫的主人，他们不用再响应国家的号召，去支援饱受磨难的捷克斯洛伐克。11月3日的清晨，当美国的老百姓们从睡眠中醒来，发现哈定以1 600万张对900万张选票的优势被他们推上了总统位置。考克斯州长成了这场政治竞选的陪衬，立即在挥之不去的晨雾之中消失得不见踪影。

美国经过多角度权衡之后，对于这段话做出了正确的抉择——“此时的我们被时代赋予了责任，用我们的严于律己、理性友善的建议与物资援助，在全世界建立正义的民主制度。”最终，他们选择了一如往昔。

七

铩羽而归的伍德罗·威尔逊，在华盛顿S大街他那宏伟舒适的豪宅里度过了最后的三年，他的生命即将走到尽头。那些来探望他的人发现，在朝向太阳的房间里，那靠着壁炉的大椅子上蜷缩着过早老去的前总统。他坐在那里，两手放在了膝盖上，脑袋微微地偏向一旁。他的面容和身体都比当政时要阴沉很多。他的灰白的头发向后梳着，遮住光秃秃的头顶。当他说话的时候并不将头抬起，只是用眼睛盯着来访者。当他强调自己的观

从大繁荣 到大萧条

点时，就挥起右臂，偶尔会拍下椅子的扶手。他的言语之中依然流露出昔日的得体大方：“请你原谅我无法站起来，我的身体不太舒服。”但当一谈到美国的外交政策和他的政敌，他的口吻便充满仇恨。他说道，现在并不是到处喷洒玫瑰香水的时候，而是需要斗争的时刻，必须打一场党派之间的战争，“不是提供党派之间的对立，而是明确划分党派阵营”。他依然对自己的政党存有一丝期许，希望其能够迫随着光辉的指引前行。

提到那些让他无法实现伟大规划的人们，他的话语中充满了怨恨：“我会好起来的，到那时我要东山再起，让他们知道我的厉害。”这位老人心中有着一肚子怨气，并深感无力而苦闷。

在“一战”胜利五周年的停战纪念日那天，他依靠别人的搀扶，在自家门前的台阶上勉强站稳，对着那些来向他致意的人发表了讲话。他说道：“有人并不担心自己所坚守的信仰是否会取得胜利，但我并不是这样。我看到过愚蠢的人有违天理，看过他们毁灭殆尽，而这彻底的毁灭与羞耻会再次到来。我们终将胜利，这与上帝统治我们是一样明确的。”

三个月后，他满怀着失落离开了人世。

FROM GREAT
PROSPERITY
TO GREAT DEPRESSION

第三章 红色大恐慌

在战后十年的初期，如果说美国民众对于威尔逊建立国际联盟的请求置若罔闻，并不单单是因为他们对于外交纠纷和总统所提倡的“为了崇高的理想而奋斗”的呼声产生了厌倦情绪，也因为他们在聆听着其他的声音。他们听到了可怕的流言——关于将美国政权与政府机构尽数推翻的巨大阴谋。他们倾听着炸弹爆炸的可怕巨响和无产阶级军队的沉重步伐。他们认真地思考过——至少有几百万人认真地思考过，其他数以百万计的公民则保持着清醒的头脑——下个月或者下个星期，美国就有可能爆发一场红色革命。他们关心的并不是为了民主而推动世界和平，而是为了自己而确保美国本土的安全。

那段时间，报纸头版专栏里全是些工人罢工和反对无产阶级动乱的消息；停战当天，激进分子在华盛顿桑塔利亚街道上向游行群众开枪；为了报复，爱国市民从监狱中拖出来一个世界产业工人联盟（IWW）的会员（值得一提的是，那是个美国白人），拿着绳子套住他的脖子给勒死，然

从大繁荣 到大萧条

后从桥上扔了下去；通过正当途径推选出来的纽约州议会的议员遭到了驱逐（同时他们的公民选举权也被剥夺），而究其原因仅仅是因为他们曾当选过备受敬仰的社会党成员；在印第安纳州，有人开枪杀死了一个嚷着“让美国下地狱去吧”的外国人，陪审团仅用两分钟就宣告凶手无罪；在一场校际辩论赛中，拉德克利夫学院的女学生辩手支持“雇主承认工会的存在，这点对于劳资双方谈判的成功是极其重要的”这一观点，副总统竟然将此当成女子学院存在激进主义的危险信号。在那个时代，维护法律和秩序的人目无法纪，不守秩序；执行宪法者忤逆宪法，到处是猜疑与国民冲突；用文绉绉的话形容它就是：这是一个由恐怖统治的时代。

这种全国性恐慌的局面从某种程度上而言，有其存在的正当理由。在战争期间，劳工运动逐渐壮大起来，并赢得了一定的声望。上百次罢工不断爆发，主要是由于工人各种生活必需品的价格不断上涨，另外工人阶级对于自身的力量也有了新的认识。为了保证生产和维护产业的稳定，美国政府鼓励劳资双方进行谈判，使塞尔·冈珀斯（Samuel Gompers）在华盛顿权倾一时的战时理事会中有了一席之地。和平终于到来，但工人人们的希望却似乎拖着沉重的脚步。物价依然在上涨，雇主们却组织起来抑制加薪，继续要求延长工作时间。伍德罗·威尔逊为求世界和平而远赴欧洲，却将工人们抛在了脑后。工人们的心中充满了愤怒和绝望，他们拿起了手中唯一的武器——罢工。全国的工人都在罢工，建筑工人、码头工人、堆料场工人、造船工人、地铁工人、制鞋工人、木匠、电话接线员，还有很多行业的工人都加入罢工的队伍之中。据埃尔文·约翰逊（Alvin Johnson）粗略统计，直到1919年11月，美国各工业州的罢工总人数至少到达了100万；非工业州的罢工人数则更多；还有很多人虽然没有加入罢工的队伍中，但是自愿放弃了工作；加上这些人，罢工总人数达到了200

多万人。

罢工工人所提出的并不全是承认工会组织、加薪、缩短工作时间等传统要求，有些工人还要求建立全新的行业秩序，寻求取代资本主义的政府管理对行业的控制（起码是他们所处的行业）。简言之，就是建立和社会主义体制差不多的制度。一直保持保守态度的铁路工人而今选择支持布勒姆方案（Plumb Plan）。按照这个方案，政府将继续控制铁路的发展，工人对于自身管理具有发言权。1919年9月，美国矿工联盟（the United Mine）的工人一致投票决定罢工。他们理直气壮地倡议矿山国有化；有一位代表在吵吵闹闹的人群面前发表演讲，他刚讲到“国有化是不可能实现的”，就被嘘声、讥讽以及“臭煤矿主！滚出去！”的叫骂声淹没了。在美国西北部，世界产业工人联盟为了争取全球工会联合起来的大工会牵制资本而进行斗争。在北达科他州和其他邻近的农业州，有20万农民参加了汤利领导的无党派联盟。这个联盟被政敌称为土地苏维埃，倒也有几分可信度。（顺便说一下，在汤利的无党派联盟中，有位瑞典裔美国人查尔斯·林德伯格（Charles A. Lindbergh），他在1916年成为明尼苏达州州长候选人。如果他说自己的家庭命中注定要和摩根家族联姻，你一定会吓一大跳。）在工人阶级和自由知识分子阶层中，都出现了明显具有社会主义思想倾向的潮流。社会主义党派关注着俄国革命的成功，萌生了大规模暴动的念头。社会底层的共产主义者和无政府主义者在过去多数是社会主义者，而几乎全是国外的移民，其中大多数是俄国人。他们谈论着进一步的行动，遵循着来自莫斯科的指示，也许还有俄国资金的帮助。在贫民窟和工厂、乡镇，他们经常向平民进行先进思想的宣传。

共产主义者和无政府主义者群体在激进运动中占据着极其微小的分量，当我们考虑到他们引起的动荡局势，就会觉得这个比例小得

从大繁荣 到大萧条

有些可笑。1919年年底，伊利诺伊大学的戈登·沃特金斯（Gordon S. Watkins）教授在《大西洋月刊》上发表文章，粗略计算出社会党有3.9万名党员，共产主义劳动党有1万到3万名党员，共产党有3万到6万名党员。也就是说，根据这个粗略统计，共产党最多不超过美国成年人口的1%；三个政党人数全都加起来也不到总人口的2%，而大多数党员可能满足于用合法的方式来达到其目的。如果要开展大规模的革命运动，这个比例根本不值得一提。

但是，美国商人可没有心情考虑这一比例的大小。他们刚刚从战争中解脱出来，浑身那冲劲十足的鲜血在体内奔腾，随时准备打败前进道路上的一切阻碍。他们想重返商界，获得捞取大量的收益。劳工却挡住了他们的道路，对他们的利益构成了威胁。他们从战争中继承了激进的爱国主义；在所有时代的所有人们的行为方式之中，他们选择将自身的理想主义同自私自利的目的混为一谈，并对这种混合体产生了狂热的信念，将其称为百分之百的美国精神、受到上帝的庇护、建国之父的教导之下的忠诚——这意味着，商人有权力将工会组织者从自己的工厂里驱逐出去。他们逐渐不信任源自国外的一切事物，把激进主义看成是长发的斯拉夫人和从来不洗澡的东方犹太人的产物。最后，在战争年代他们所耳濡目染的间谍密探和国际阴谋使他们始终坚信，同情德国的人在山顶用灯光相互传递着信号，还将毛玻璃藏在外科手术用的绷带里。他们养成了猜疑的习惯，觉得网球场下面埋藏着枪炮。他们变得越来越固执，最后变得不可动摇地确信自己的猜测：美国工人为了增加薪水而展开的斗争，只是列宁和托洛茨基领导下的武装暴动的开始；每一位宣传着社会主义有人赞成也有人反对的无辜教授的身后，都站着一个胡子拉碴的欧洲暴徒，他一只手握着钱袋，另一只手举着冒着烟的炸弹。

二

1919年发生的一系列事件加剧了这种恐慌情绪。4月28日，当威尔逊还在巴黎进行和平条约的谈判，回国的军队在凯旋门下列队前进时——西雅图市市长欧雷·汉森的信件中发现了一枚定时炸弹，“其分量足以将市政大楼的半边炸飞”。汉森市长曾在全国各地发表演说，目的是唤醒人们对于红色恐怖的认识。第二天下午，在佐治亚州亚特兰大参议员托马斯·哈德威克(Thomas R. Hardwick)的家里，有一个黑人女佣打开了寄给参议员的包裹，结果包裹里的炸弹将她的双手当场炸掉。而哈德威克参议员当时被任命为参议院移民委员会主席，将提议限制移民入境作为阻止布尔什维克蔓延的办法。

第二天半夜两点，纽约邮政局包裹邮递部门的职员查尔斯·卡普兰(Charles Caplan)走在回家的路上，经过哈莱姆区时从报纸上读到了哈德威克遭到了炸弹袭击的消息。新闻报道中所描述的包裹长6英寸、宽3英寸，像汉森所收到的定时炸弹一样，用牛皮纸包裹着，上面写着回信地址（那地址当然是假的）是纽约金贝尔兄弟公司。卡普兰觉得这段对于炸弹外形的描写好像在哪见过，他记得自己好像看到过几个类似的包裹。他搜肠刮肚地回想着，终于猛然间想起来了。他连忙回到了邮局，发现在邮资不足的货架上，整整齐齐地放着16个牛皮纸包的小包裹，回信的地址上全都写的是“金贝尔公司”。这些包裹分别寄给司法部部长帕尔默、芝加哥邮政署署长兰迪斯(Landis)、最高法院法官霍姆斯(Holmes)、劳工部部长威尔逊(Wilson)、移民局局长卡米内蒂(Caminetti)、约翰·皮尔庞特·摩根(J. P. Morgan)和约翰·戴维森·洛克菲勒(John D. Rockefeller)，还有很多政府官员和资本家。警方在邻近的屋子里对

从大繁荣 到大萧条

这些包裹实施了检查，发现里面装有炸弹。其他包裹已经被邮寄出去；最后查到的包裹总数达36个。（这些包裹没有一个被随意地打开，这一点不用多加解释；此后的几天里，达官显贵们在解开牛皮纸包裹时都非常小心。）这摆明了是国外的激进分子寄来的炸弹，收件人的名单就是有力的证据。

不到一个月之后，又发生了一系列爆炸案，最严重的一起爆炸发生在司法部长帕尔默位于华盛顿的宅邸前面。当时正是晚上，帕尔默刚离开一楼的书房，关上灯去睡觉。这时外面传来了砰的一声响，就好像有人在敲前门，紧接着就发生了爆炸。门外发现了一个被炸得支离破碎的男人。根据报纸的报道，在附近还放着一份激进刊物《大实话》。

美国的民众经常看到这些残酷恶行的头条报道，决定对这些激进分子施以残酷的报复行动解决这个问题。

在那段时间里，美国发生了几十起报复性事件，我们举其中两个为证，来看看他们是如何展开报复行动的。这两件事均发生在1919年五一劳动节当天，也就是卡普兰先生在邮局架子上发现牛皮纸包裹的第二天。劳动节当天下午，社会主义报纸《纽约晚报》的老板和员工正在举办招待会，庆祝他们新的办公室开张。大楼里面几百名男女老少都聚在一起欢声笑语。突然闯进来一群士兵和水手，要将“布尔什维克主义”的海报撕下来。这要求遭到了报社一方的拒绝，于是他们便撕掉了桌上的报刊信件，将办公室砸个稀烂，并将人们赶到了大街上进行疯狂殴打——这些暴徒围在门口，等那些人出来后猛扑上去殴打一顿——导致7名报社员工被送到了医院里。

就在同一天，克利夫兰举行了社会主义游行，在前面领头的人举着一面红旗。一个陆军中尉让他们把旗子收起来，接着有一群士兵冲到游行

队伍中，和在场的人发生了一场混战。警察闻风而动，也加入这场骚乱之中。从那一刻开始，一系列暴乱事件逐渐在整座城市扩展开来。骚乱之中多人受伤、一人死亡。一伙支持美国政府的暴徒将社会主义总部全部破坏掉，还将打字机和办公家具扔到了街上。

1919年夏天过去了，参议院还在对于和平条约进行着辩论；众议院通过了禁酒令；国会批准了妇女选举权宪法修正案，并在全美施行。R-34飞艇完成了首次横跨大西洋的飞行壮举，从英国飞到长岛的米尼奥拉之后安全返航。人们带着笑意谈起了《年轻访客》这本书，心中暗猜书上的黛西·阿什福特是否就是作家詹姆斯·巴里（James M. Barrie）。由于生活成本不断上涨，报纸对于囤积白糖和食品的奸商痛斥不已。世界上举行了首次飞机葬礼。政府官员悲观地谈论着年轻人不断淡薄的道德观念。新一轮罢工此起彼伏，工人们变得更加激进，革命的星火迅速在整个欧洲蔓延开来，美国民众心中充满了对于布尔什维克的害怕与憎恨。接下来，9月份发生了波士顿警察大罢工，此事加重了人们的恐慌情绪。

三

波士顿警察也有着满肚子抱怨：他们的薪水最低的只有1 100美元，其中还包括购买制服的费用。根据1919年的物价，1 100美元能购买的东西少之又少。他们紧跟着工会运动的潮流，也建立了自己的工会，并附属于美国劳工联盟。波士顿警察局局长柯蒂斯是个老顽固，他禁止警察附属于任何外部组织，并马上对违抗他的命令的19名警官和工会成员提出指控，宣布他们有罪，并暂停了他们的职务。爱尔兰裔警察愤怒不已，以罢工相要挟。市长随后委派了委员会调解纷争，并提议双方各退一步。但在柯蒂斯眼中这无疑等于妥协，他拒绝让步。因此，在1919年9月9日晚点

从大繁荣 到大萧条

名的时候，大部分警察走出警察局举行了罢工。

这座城市失去了防卫，强盗们恣意妄为。当天晚上，暴徒们将商店的玻璃窗砸碎，将各家商店洗劫一空。彼德斯市长借调了该州民团。第二天，州长召集起州警卫队和志愿警察力量，打算控制局面。警卫队士兵和志愿警察都是由退伍军人、哈佛大学的学生以及后湾区的棉花经济人组成。他们毫无经验，而暴徒们却知己知彼。在南波士顿，州警卫队向挑衅的暴徒开枪，打死了两个人。暴力案件时有发生，并持续了多日，特别是在警卫队士兵为了维护法律的尊严，禁止在安静的波士顿公园玩掷骰子游戏的时候。死伤名单越来越长，全国上下人心惶惶地注视着事态的发展。中央劳工联盟代表波士顿有组织的工会会员，表示要为警察举行一次大罢工。人们揣测，可怕的革命也许在此时此地开始蔓延。

但是从目前状况可以看出来，波士顿和全国各地的观点是一致的，对警察的罢工行为表示强烈反对，他们必然以失败告终。中央劳工联盟谨慎地下决定，不再举行大罢工。柯蒂斯局长将此前19名停职的警察全部开除，并开始招募新的警员。

身在华盛顿的塞缪尔·冈珀斯认识到了这场游戏越玩越酣，打算干预进来。他向马萨诸塞州州长发了封电报，表示警察局柯蒂斯的所为毫不讲理、独裁专制。马萨诸塞州的州长是一位面目阴沉、行事低调的人，以谨言慎行而闻名，从来不去做任何威胁到自己政治地位的失当行为。这时他做出了明智之举。他回复冈珀斯：“不管是任何人在任何地方、任何时间里，都绝对没有权利在有害于公共安全的前提下举行罢工。”他一夜之间成了国家英雄。如果有人对于罢工浪潮即将溃散心怀疑虑，等到全国的媒体都在为卡尔文·柯立芝（Calvin Coolidge）高声欢呼时，这份疑虑便可以化为乌有了。此后的好几个星期，被迫执行紧急公务的业余警察回到

了家中，晚上在灯塔街上一边散着步一边抱怨，站岗执勤比在乡村俱乐部里打一天高尔夫球可难多了。虽然补充新的警力需要花费一些时间，但最终警察的招募工作还是完成了，波士顿恢复了昔日的安宁。

然而，工会工人那罢工的情绪依旧挥之不去。加里法官表现得和柯蒂斯局长一样固执，拒绝与工会代表协商。几天之后，几十万钢铁工人离开工厂开始罢工。

这时，罢工的钢铁工人丝毫没有表现出来任何激进主义倾向。他们举行罢工仅仅是为了表示对较低工薪和工作时间过长的抗议。他们大部分人每天都要工作十二个小时，这可能是罢工的最强有力的理由。但是钢铁大亨们从波士顿警察罢工那里受到启发。公众眼下对于罢工心惊肉跳，会谴责任何与布尔什维克有关的事件。钢铁大亨们发现可以毫不费力地就能给罢工的工人们扣上布尔什维克主义的帽子。在罢工组织者中，最为活跃并机智勇敢的便是威廉·福斯特（William Z. Foster），他曾经是工会主义者（加里法官当时也没有料到他日后会成为共产党员）。福斯特编写的工会主义宣传手册出现在很多报社的办公室里，人们热衷于宣扬他是一个多么激进的革命者。福斯特打算以各种行业组织起来的联合工会来代替低效的行业工会，这些行业工会受到钢铁公司等大财团的摆布；所以，在报纸的报道中，福斯特成了“深藏不露的蛀虫”，罢工是激进主义阴谋的一部分。美国民众感到非常害怕，宁可关心怎样消灭那个隐藏极深的蛀虫，也不愿意减轻每天在钢铁厂里工作十二个小时的工人们身上的重担。

钢铁工人大罢工开始几周之后，大规模的煤矿工人罢工也随之开始了。在这种情况下，不用别人多说，公众就认定煤矿工人罢工的背后隐藏着红色的幽灵。煤矿工人对国有化的支持力度极高，这无疑意味着给自己扣上了布尔什维克主义的帽子。对不能明辨真相的报纸读者来说，煤炭业

从大繁荣 到大萧条

归为国就有就意味着共产主义、无政府主义、爆炸袭击和猛烈燃烧的烈火。

如果再不采取措施，合众国将面临威胁。政府行动了。

美国司法部长米切尔·帕尔默一向沉浸在被人唤作“好战的贵格会会员”的美誉之中。他看到了属于他的美好的机缘，开始拯救宪法。

四

执政的美国政府本应秉承新自由主义，而司法部长帕尔默在此后三个月里的所有作为却是一种带有残酷的幽默感的事实。对这点唯一的解释是，伍德罗·威尔逊在白宫久病卧床，对政府事务无力管控，心中念念不忘的只有他为之羁绊的国际联盟。

煤矿工人举行罢工的前一天，在司法部长的授意下，印第安纳波利斯的一位联邦法官发布了一道禁令，禁止罢工的工人领袖进一步扩大罢工规模。他发布这道禁令依据的是《粮食与燃料管制法》中的相关条款，这部法律旨在战时禁止对煤炭的生产的限制。其实战争不仅已经结束，而且早已经过去快一年了；但从法律意义上来说，战争还没有结束，和平条约仍然在参议院等待表决通过。更深一层的实际情况是，在参议院通过《粮食与燃料管制法》之前，哈斯廷（Husting）参议员就说得非常明确，他“获得了劳工部长威尔逊的授权，因而以谨慎的态度宣布，无论是现在或将来，政府都不得将该法案解释为禁止罢工及和平示威的法律”。帕尔默要么是从来没听过这种保证，要么是对此保证毫不在意，要么是认定出现了之前无法预见的情况。他颁布了禁令，煤矿大罢工的结局已然显而易见。尽管第二天有40万煤矿工人走出矿山举行罢工，但根据联邦政府的法令，他们失去了领导他们的工会领袖。

当然，美国公众对违背承诺的真相无从知晓；即使了解事情的真相，

也没有报社老板的胆量刊登哈斯廷参议员的声明。一份报纸就连发表此种言论都需要鼓起真正的勇气——当时的《纽约世界报》这样说道：“在美国，不管是来自布尔什维克的威胁，还是来自世界产业工人联盟的恐吓，一个尽职尽责的普通警察都能应付得了。”就像曾经对卡尔文·柯立芝欢呼赞扬一样，新闻界对这项法令纷纷叫好。“好战的贵格会教徒”勇气倍增，他随即进行了一系列搜捕行动。共产党领袖被驱逐出境，经由芬兰逃到俄国，他们乘坐的“布福德”号轮船被戏称为“苏维埃方舟”。与人们的欢呼雀跃相对，显然没有人关心政府是否有权力把清白无罪的人和家人硬生生地拆散。帕尔默决定在美国公众面前再显身手：他展开了新一轮的大搜捕，创下了美国历史上侵犯个人合法权利的新纪录。

根据战争时期通过的《煽动暴乱法》，在美国居住的任何外国人，如果遵行无政府主义，信仰、提倡以暴力手段推翻政府，附属于任何信仰、提倡暴力推翻政府的组织，劳工部长都有权力将此人驱逐出境。现在，帕尔默决定和劳工部长联合起来，将美国共产党里的外国党员全部驱逐出境。他手下的秘密特工早已潜入共产党组织之中，据说其中有个人还当上了他那一个区的领导人。（这就出现了一个极具哲理的问题：具有双重立场的政府探员劝同志们适当考察形势，会使他的本职工作陷入危机。）

1920年的元旦，在全美的几十座城市中，共产党员同时在各自的总部召开会议。帕尔默派出的探员、警察和辅警人员逮捕了所有人——一个不落，事实上，他们根本不管到底是不是共产党员（可谁能说得清呢？），有没有逮捕令都无所谓了，反正把他们全都关进监狱就对了。所有算做证据的东西，不管是文学作品、成员名单、书籍、纸张，还是墙上挂的图片，都被搜集起来。当天和随后几天的晚上，其他共产党员和被怀疑是共产党员的人在家中被捕。逮捕人数总计6 000人以上，他们关在狱中的时

从大繁荣 到大萧条

间从数天到几周不等，根本没机会得知自己被控告的罪名。至少有一位根本不是共产党的美国公民被抓了起来，结果竟然是因警方失误而搞错了名字，在狱中被关押了数日，险些被驱逐出境。在底特律，超过100人被丢进一个24英尺宽、30英尺长的狭小牢房里，度过了被整个城市称为不能忍受的一周。在哈特福德，嫌疑人被关进监狱后，政府采取了进一步行动，逮捕并关押所有来探望嫌疑人的人员，把仅仅是一个问候电话都当成了这个人和共产党有联系的初步证据。

由于缺乏充足的证据证明他们是共产党员，最终大批嫌疑人获释出狱。终于，有人透露了消息，在这场针对全副武装的危险分子的全国大搜捕行动中，唯一发现的武器就是三把手枪，根本没有找到什么炸药。而当时的报纸上，到处都在报道来自帕尔默办公室的消息。消息称发现了新的证据，揭露了危害国家安全的巨大阴谋。尽管钢铁工人和煤矿工人罢工渐渐停息，社会主义政府的威胁日渐消失，什么革命行动更不见踪迹，但大多数美国民众仍然认为，布尔什维克的阴影比以往更令人害怕。

帕尔默彻底疯了，他发表了公开声明，警告那些2 000万自由公债的持有者、900万农场主和1 100万存款账户的开户人，红色革命会夺走他们所有人的一切。他向新闻界发放程式化的宣传材料，里面附着布尔什维克党人的图片，他们胡须浓密、面目可憎。帕尔默质问，是否应该让这些家伙来统治美国。政治家们纷纷引述盖伊·埃皮（Guy Empey）的建议，表示在“任何一家五金店里”都会找到对付红色分子的利器。他们大声呼吁：“我对待红色分子的座右铭就是‘S. O. S.’，要么驱逐，要么枪杀。我认为应该把他们赶到石头船上，挂上铅做的帆，他们首先该去的地方就是地狱。”大学生要求校方解雇有激进主义嫌疑的教授；学校教师不得不宣誓效忠于政府；那些政治观点和经济观点特立独行的商人如果想继续做

生意，就要学会保持沉默。歇斯底里的状态达到了最高峰。

五

这种狂热状态没有很快平息下去，而超级爱国者和假装超级爱国者的特殊宣传员的战斗才刚刚打响。当时涌现出了无法统计的爱国团体，每个团体都有自己的行政秘书。为了生存下去，他们必须凭空设想出更可怕的新威胁。如今，无数道德高尚的人发现，只要给假想敌扣上了布尔什维克这项显眼的帽子，他们就能战无不胜。不管是海军要员、义务兵役制的拥护者、禁酒主义者、禁烟倡导者、反对进化论的原教旨主义者、道德律令的拥护者、书籍审查员、仇恨犹太人者、歧视黑人者、地主、制造商、公共事业公司的高管，还是各种事业的支持者，无论他们是好是坏还是麻木不仁，都披上了星条旗，接过了建国元勋的旗帜，把他们的反对者和列宁混为一谈。比如说，营业的商店变成“美国计划”。数年以来，演说家和作家们不断描述着“居心叵测、极具颠覆力的煽动分子”，让这个国家日夜不安。坐在富丽堂皇的客厅里的老太太们从秘书那儿听说，政府探员们发现了激进主义的阴谋，可眼下揭露邪恶阴谋的时机还不成熟。她们的丈夫在俱乐部吃午餐的时候，听说了大学里到处渗透着布尔什维克思想。一团疑虑重重的阴云笼罩在美国的上空。心胸狭窄成了美国的美德。

威廉·伯恩斯(William J. Burns)认为共产主义者的人数预计有42.2万，而国家安全同盟的斯坦伍德·孟肯(S. Stanwood Menken)把沃特金斯教授估算的人数至少放大了10倍，高达60万人。爱国团体联盟的主席德怀特·布莱曼(Dwight Braman)知会纽约州州长史密斯，说这些红色分子每周在全国举行上万次会议，在过去六个月间有350家激进主义报社成立。

共产主义者不但非常危险，还善于伪装，不知不觉地拉拢关系，打入

从大繁荣 到大萧条

了备受尊崇的领域。据全国公民联盟的拉尔夫·伊斯利（Ralph Easley）宣称，俄罗斯饥荒基金委员会里同情布尔什维克主义的成员竟达60名。叫嚣最厉害的超级爱国者断言，全国减裁军备委员会的弗雷德里克·利比（Frederick J. Libby）就是在俄国受过教育的共产主义者，他还去过俄国接受指导（尽管这位信奉和平主义的牧师从未去过俄国，与俄国人一点瓜葛也没有，他的委员会里也只有美国公民）。《国家》《新共和》《自由人》等杂志被美国国防学会的行政秘书列为革命刊物。连《调查》杂志都遭到《拉斯克报告》作者的抨击，因为这本杂志得到了“革命团体的认可”。拉尔夫·伊斯利从全国妇女选民联盟、基督教联合委员会和外交政策协会等组织中嗅到了危险的信号。那段时间，美国本土没有一个自由公民组织逃得出国家的捍卫者的法眼，这让普通公民不寒而栗。就连调查慈善机构的国家新闻局也不能幸免。这个机构的领导正是在纽约威望极高的罗伯特·德福雷斯特（Robert W. DeForest），他肯定忙得没空考虑其他事情。和他处境相同的还有拉比·怀斯（Rabbi Wise）、诺尔曼·托马斯（Norman Thomas）、奥斯瓦尔德·维拉德（Oswald Villard）、简·亚当斯（Jane Addams）、斯科特·尼尔林（Scott Nearing）和保罗·凯洛格（Paul U. Kellogg），他们大多数都受到激进组织的污蔑。

戏剧界和电影界同样危机四伏。在爱国团体联盟的布莱曼看来，莫斯科艺术剧院、歌剧《蝙蝠》和俄国歌唱家费奥多·夏里亚宾（Fyodor Chaliapin）都是苏联的宣传手段；据美国国防学会的惠特尼称，不仅电影明星诺玛·塔尔梅奇，就连查理·卓别林和威尔·罗杰斯（Will Rogers）在共产主义者的文件中均有提及。

书籍也必须受到仔细的审查，因为罪恶会见缝插针。改善美国联盟是加利福尼亚州的爱国者团体，该联盟发言人赫米娜·施韦德（Hermit

Schwed) 对小说《大街》特别不满，因为这本书“让人对美国传统的美好生活无法产生好感”，她还斥责哲学家约翰·杜威 (John Dewey) 和詹姆斯·哈维·罗宾逊 (James Harvey Robinson) 是“年轻人最大的威胁”。至于中学和大学里，威胁则更加隐蔽、影响深远。(按照惠特尼的说法，哈佛大学的教授费利克斯·法兰克福特 (Felix Frankfurter)、萨切瑞尔·乔伊斯·查菲 (Zacharia Choice Chafee) 和耶鲁大学的教授弗里德里克·威廉姆斯 (Frederick Wells Williams)、马克斯·所罗门·曼德尔 (Max Solomon Mandell) 都“过于聪明了，以至无法察觉他们所公开发表的言论和课堂上的讲话，其实是对共产主义者的煽动”。学校必须加以严控：课本要梳理清楚，挑出对美国历史上英雄人物的不敬之处；只有保守派的发言人才能进入中学或大学所在的区域；学校当然有义务开设尊重宪法的课程。

这些警示的影响力来势汹汹。出于对激进分子充满恐惧，人们害怕自己也被当成激进分子。如果你想在商界有所作为，进入戈菲尔普雷里或中心镇的最好的中心商圈，就得表现得规规矩矩。对任何偏离法官加里或司法部长帕尔默的观点，人们都会投来质疑的眼神。有位信奉自由主义的记者，前去采访一位曾经直言不讳的印第安纳州居民。这位受访者显得惊恐万分，马上锁上办公室的房门、关好窗户，才肯谈论政治问题。(窗户正对着一个50英尺长的通风井，另一头的办公室里也许有人竖着耳朵偷听他们的“异端谬论”)。据说有人从前在中西部的一座城市居住，很久以后故地重游时，发现“当地人都心怀恐惧”，不禁产生了疑惑：“他们究竟在怕些什么？”小说《中心镇》的作者引述了一位政治异见者的话，他被迫屈从于可怕的舆论压力，感叹道：“我只得从红尘之中逃离出去，埋头于书本之中。”他不敢公开发表自己的经济观点，只要与退伍军人协会和

从大繁荣 到大萧条

扶轮社的意见有丝毫不同，他就会被扣上布尔什维克的帽子。

直到1922年，凯瑟琳·富勒顿·杰罗尔德（Katharine Fullerton Gerould）才在《哈泼斯杂志》中写道：“美国，已经不再是传统意义上的自由国家，自由逐渐成了一句空话……我敢说，没有一名理性的公民能够自由发表自己诚实的信念。我当然不是指那些邪恶的想法。我是说，在任何地方，在任何人身上，都在这里或那里将自由的言论扼杀。真正对社会问题和政治问题感兴趣的美国公民，如果能保留表达意见的自由，唯一的出路就是与一伙和他深有同感的暴徒同流合污，在这伙暴徒的荫底下存活下去。”

在此后的一段时间里，人们常常表现出来这样的愤懑之情，但在1922年，能说出这样的话，此举确实让人惊讶不已，同时将此文刊登出来也需要拥有巨大的勇气。杰罗尔德夫人的文章发表之后，她的家里和《哈泼斯杂志》办公室收到了几百封来信，有的来信语言粗俗，纷纷指责她是破坏分子和布尔什维克，有些来信却表达了欢乐的情感，终于有人肯逆流而上，说出了真实的话语。超级爱国者们的喧嚣竟然把国家折腾到了这种地步。

六

那个时代，党同伐异有很多种形式。人们几乎都在用痛恨黑人、犹太人和罗马天主教徒的方式来发泄满腹愤恨。集体尽忠和集体愤恨的情绪在战争期间膨胀起来，突然间难以言说，最终通过扭曲的方式宣泄出来。他们迫害的不仅有激进分子，还有那些在美国占主导地位的白人新教徒眼中的异类或“反美分子”。

在战争期间，受到高工资的诱惑，成千上万的黑人涌进了工业化的

北方地区，征兵使各工厂空缺许多岗位。四面八方蜂拥而至的黑人不断增多。他们无处容身，只得住进了专属于白人的地区，在电车上和公共场所和白人争抢位置，在各个方面打破了种族分布的微妙平衡。无论是在南方还是北方，黑人都萌发出新的独立思想；他们难道没有像白人一样应征入伍？难道没有为民主和受压迫的少数国家而流血牺牲？如今和平到来，他们却发现要再次回到自己过去的处境，有些黑人愤愤不平。在当时惶恐不安的气氛中，这就足以点燃隐藏在人性表面之下的种族主义情绪。在白人看来，布尔什维克主义已经够糟了，如果黑人火上浇油再失控，那形势就更难以预料了。

1919年夏天一个闷热的下午，17岁的黑人男孩在芝加哥海水浴场旁的密歇根湖游泳。湖边的一部分供白人使用，另一部分供黑人使用，这是心照不宣的事情。这个男孩抓住了水上一根漂浮着的枕木，无意间游过了那条看不见的界线。石块纷纷向他砸了过去，有个白人少年朝他游了过来。这个黑人男孩子便放开了枕木，划了几下水后，就沉了下去。他就这样淹死了。他是否被石块砸中不得而知，但是岸边的黑人纷纷指责那些白人用石头打死了他，一场冲突因此事而开始蔓延。这件小事如同点燃了导火索，从而引发种族仇恨的冲天怒火。由于芝加哥的黑人在十年间扩张了一倍，导致黑人陆续涌进白人的社区，紧张局势一触即发。这场骚乱迅速扩散到城市的其他角落，最终的结果是，在将近一周的时间里，芝加哥实际上都处于内战的状态。黑人开始寻衅滋事，黑人社区里到处是打架伤人、帮派械斗，黑人开枪自卫，暴徒肆意毁坏房屋。等到秩序最终恢复时，暴乱导致了15名白人和23名黑人失去生命，537人受伤，上千人流离失所、一贫如洗。

时隔不到一年，俄克拉荷马州塔尔萨市发生了另一起大规模骚乱。

从大繁荣 到大萧条

只要有黑人居住的地方，不同种族之间就会出现紧张局面。演说家和作家宣扬白人至上的信条加剧了这种情绪，洛斯罗普·斯托达（Lothrop Stoddard）在《有色人种的兴起》一书中宣扬，比起德国人或激进分子，黑人对西方文明所形成的威胁更可怕。

对信奉纯粹美国精神的大多数人来说，犹太人也是不可信的。这个民族未免太像一盘散沙了。不可否认的是，俄国的布尔什维克主义者和美国的激进分子中很多是颇有名望的犹太人。亨利·福特发现了“国际犹太人”的威胁，在他麾下的《德宝独立报》上斥责这个不幸的民族企图征服全世界的阴谋；除此之外，他们还是美国各种苦恼的根源，比如说房租太高、农场工人短缺、爵士乐、赌博、酗酒、道德败坏，甚至还包括短裙的流行。福特的抨击夸张并荒唐，恰恰体现了反犹太主义思想的普遍存在。偏见和空气一样无孔不入：房东不想将房子租给犹太人，学校不愿接收犹太儿童；在安纳波利斯市，侮辱犹太男孩的事件成了世人皆知的丑闻；哈佛大学正认真考虑限制接收犹太学生的数量；分布在全美国的犹太人都能感觉到，在他们和基督徒之间有一道难以跨越的鸿沟。

仅占少数的罗马天主教徒也未能幸免。难道这些教会的成员不能遵从外国教皇的指示？难道这位教皇不能拥有世俗的权力？难道天主教徒不能坚持用自己的方式教育孩子，而选择不送他们进入美国的公立学校？难道这些就是与国家对抗，对国家不忠？

在这种气氛之下，三K党得到蓬勃发展，最终形成了气候。

早在1915年，有个叫威廉·约瑟夫·西蒙斯上校（Colonel William Joseph Simmons）的佐治亚人建立了三K党，但这个组织成立之初的头五年并不起眼。到1920年，西蒙斯上校的爱国兄弟会里仅有几百名成员。这个组织的灵感源自南部重建时期的三K党，通常主张白人至上主义和南部

理想主义的情感归属。在1920年，西蒙斯把组织三K党的任务交到了南方宣传协会的爱德华·克拉克（Edward Y. Clarke）手中。克拉克拥有推销员的惊人天赋，曾效力于清白可靠的组织，比如罗斯福纪念协会和近东救济协会。他深知三K党发展的时机已经成熟。对想加入三K党的人来说，三K党不仅是白人仇视黑人、基督徒敌视犹太人、新教徒仇视天主教徒的拥护者的代表，利用容易轻信的小镇居民刚出现的恐惧心理；还有白色长袍和尖头罩、燃烧的十字架、秘密仪式以及仪式中的胡说八道，都能满足生活单调乏味的人们对骗人伎俩和符咒的痴迷，对神秘探究的渴望。对乡下的老古董来说，正有个机会让他乔装打扮一番，成为隐形王国里的骑士。这个模式毫无破绽。还有条诱人的真理要时刻铭记——倘若组织得力，三K党也能成为赢利的生意。

招募新人的会员被赋予克里格的迷人称号；全国被划分为几个王国，以克里格国王为统领；每个王国再分成几块领地，以大精灵为首领；身为主要组织者的克拉克成为克里格皇帝。在赐给西蒙斯上校的头衔中，起名艺术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他竟然成了帝国的巫师。成为会员要花费10美元，其中的4美元进到招募会员的克里格的腰包里。很明显，工作勤勉的克里格不必害怕债主登门讨债。当克里格是那10年里最赚钱的行当。王国的克里格国王和领地的大精灵从剩下的6美元会费里抽走少量佣金，剩余资金归亚特兰大的帝国国库所有。

由于关于三K党涂抹焦油、粘上羽毛的说法和鞭打敌人的行径花样繁多，而《纽约世界报》暴露了三K党的很多秘闻，1921年国会对三K党进行了暗中调查，最终导致克里格皇帝克拉克遭到驱逐。得克萨斯州的一位牙医海勒姆·韦斯利·埃文斯（Hiram Wesley Evans）接替西蒙斯上校当了帝国的巫师，此人自誉为“美国最平凡的人”，这个称号倒也名副

从大繁荣 到大萧条

其实。但这个不断有新成员加入的组织已经建立起来，三K党继续发展壮大。事实上，三K党的扩张速度非同寻常，据斯坦利·弗罗斯特（Stanley Frost）的统计，该组织在1924年年初的成员人数竟达450万，扩张速度令人瞠目结舌。三K党逐渐发挥出巨大的政治力量，一度掌控了七个州，包括俄勒冈州、俄克拉荷马州、得克萨斯州、阿肯色州、印第安纳州、俄亥俄州和加利福尼亚州。三K党的大本营在新南方、中西部和太平洋沿岸，但势力范围几乎涵盖全国各地，甚至逼近了纽约犹太人、天主教徒和混居者的中心区域。迄今为止，是克拉克的天赋才能和这个时代的激情与慷慨成就了三K党。

三K党的目标正如其章程中所言，是“为了联合美利坚合众国所有的白人男子、非犹太裔的本土公民，他们品行正直、声誉良好、职业可敬，不以任何形势效忠于任何外国政府、国家、机构、教派、统治者、个人或人民；为了弘扬和培养对我国政府的爱国热情；为了彼此实现光荣的三K党宗旨；为了成为仁慈向善的典范；为了保护家园的神圣不可侵犯和女性的纯洁；为了永远守护白人至上主义；为了通过高尚的形式主义来培养和灌输崇高的精神哲学，并用实际的奉献来守护和维持与众不同的习俗、权利、特权、原则、传统和纯粹美国精神的理想”。

这不过是理论罢了。实际上，“纯粹的美国精神”各有不同。起初，在美国南方，白人至上主义是三K党的主要目标，但随着时间推移与组织不断壮大，反对犹太人，特别是反对天主教徒，成了大部分地区的三K党所争论的热点。当地三K党组织所惯用的手法也没有显现出“崇高的精神哲学”所在。各地组织基本上实行自我管理，并不接受亚特兰大总部的操控。一般来说，他们的成员多半是白人新教徒社区里教育程度低下、毫无组织纪律可言的居民。（印第安纳州某座城市的观察家直言不讳地说道：

“你真以为有钱有势的人物会待在这儿？瞧瞧他们游行时穿的鞋子，用被单都遮不住他们那鞋子。”）尽管帝国的巫师埃文斯猛烈抨击这种杂乱无章的状况，但当地三K党的成员并不满足于投票反对孩子们进入教区学校，反对天主教候选人竞选公职，或者在城镇背后的山顶上竖起燃烧的十字架而展示给黑人看白人所做的有意义之事。三K党的隐秘性招致了更为直接的行动。

倘若有消息说一个黑人小伙厚着脸皮地追求白人姑娘，即使这条罪名并没有经过证实，而仅仅是神经兮兮的想象，也会有一伙穿着白色长袍的家伙把这个黑人秘密带到树林里“好好给他上一课”，要么涂柏油粘羽毛，要么就是一顿抽打。如果在种族冲突中有白人男子站在了黑人的一边，他可能会遭到绑架和殴打。倘若有位黑人妇女觉得出价过低，不肯把自己的土地卖给三K党成员，她就会收到三K党的最后通牒：要么卖地，要么被扔出去。三K党成员还会联合抵制犹太商人，拒绝雇有天主教信仰的工人，不肯把房子租赁给天主教徒。路易斯安那州发生过一起骇人听闻的悲剧，当地有五个大遭到绑架，后来人们发现，他们被用绳子捆起来淹死在了湖里，其幕后黑手正是三K党成员。写作《当代历史》的帕顿（R. A. Patton）报道了亚拉巴马州发生的一系列可怕的野蛮行径：“有个孩子被树枝抽打直到背上遍布血痕；一个黑人女子遭到暴打后，被丢在路旁无人照管，致使她染上肺炎而惨死；有位离婚的白人女子在自己家中被打得失去意识；有个获得了美国籍的外国人与美国女子结婚，背上被打得血肉模糊；有个黑人被鞭打了一顿，直到他以微不足道的价钱把自己的土地卖给一个白人。”

有些地方即使没有发生这些暴行，至少也存在可怕的威胁。身披白袍的大军列队游行，燃烧的十字架照亮山谷，黑暗中有人窃窃私语，暗自

从大繁荣 到大萧条

猜测“他们这次要跟踪谁”，恐惧和猜疑的情绪蔓延到各家各户。此外，罪犯、暴徒、流氓团伙很快学会了利用三K党的存在而胡作非为：如果他们想把别人的谷仓给烧了，袭击铁轨旁的贫民窟，就会肆无忌惮地放火抢劫——这难道不正是三K党干的好事吗？任何人都能在栅栏上用粉笔写下“K. K. K”的符号，治安官看到了肯定会缩手缩脚地办事。因此，就像红色恐怖引发的疯狂状态一样，恐惧中孕育的行动永远摆脱不了恐惧，带来了形形色色的恶行。

随着岁月的逝去和战争情绪的消减，三K党的势力日渐衰微，在很多地区的势力最终烟消云散，而在其他地区则沦落为投机政客所掌控的政治派别；但三K党本身已经成为数百万人心中的可怕的灾难。

七

1920年年初，帕尔默大搜捕之后，对于激进分子的抓捕仍在继续。4月份，纽约州议会的五位社会党议员遭到了驱逐，根据司法委员会公告，他们是“一个完全由终生叛国者组成的不忠组织”的成员。当小西奥多·罗斯福公开反对这项驱逐决议时，遭到了议长斯威特（Sweet）的严厉斥责。斯威特走上讲台，高声诵读着西奥多·罗斯福文章中的章节，以便让父亲的美国精神和儿子的反美国精神形成鲜明的对比。在这次演讲中，议员古维烈（Cuvillier）窥探到两位社会党成员通过选举占据了议员席位。他开口叫嚣着：“有两个家伙坐在这里，脸上带着狡诈的笑容。他们和列宁、托洛茨基之流一样，都是苏俄政府的代表。他们就是混在我们中间的小列宁、小托洛茨基。”议会用压倒性的投票表决把他们赶了出去。次日《纽约时报》宣布：“这是全体美国人民的投票，是爱国主义的保守投票。绝大多数美国人都会赞成和认可议会的行动。”这段声明来自

一贯言辞谨慎的《纽约时报》，可以想见当时的政治气氛。

然而，人们已经准备拨乱反正。查尔斯·埃文斯·休斯（Charles Evans Hughes）对议会的行动提出了抗议，这差点让他在联盟俱乐部的那些沉着稳重的同僚面前中风。他们暗自琢磨，这位共和党的好小伙会不会变成温和的激进分子。1920年的劳动节来得正好，尽管此前帕尔默恪尽职守地提醒全世界，激进分子会定于劳动节这天发动大罢工，制造暗杀事件，但是这一天却波澜不惊。全部处于机动状态的警察等待着一场革命袭击，但革命却始终没有降临。各党派举行了政治会议，拥有破坏波士顿警察大罢工成果的卡尔文·柯立芝成了共和党的副总统候选人。值得一提的是，民主党并没有推选“好战的贵格会教徒”帕尔默参与竞选。柯立芝的对手换来换去，并坚持把帕尔默叫作“一惊一乍的战斗者”“伪装的战斗者”和“胆小如鼠的懦夫”。如此看来，美国渐渐恢复了原有的幽默感。

罢工、骚乱、立法行动和不利于激进分子的司法解释持续不断，但随着1920年夏天的来临，其他事件转移了美国人的注意力。当时正值总统大选，和蔼可亲的哈定站在自家前廊上侃侃而谈；而绝望的考克斯州长在全国进行巡回演说，替伍德罗·威尔逊卖力宣传。经济形势问题却刻不容缓：几个月来人们纷纷对物价飞涨抱怨连连，全国各地都爆发了游行示威。费城牧师乔治·埃尔斯布里（George M. Elsbree）身着工装讲经布道，纽约市举行了一场集体婚礼（报纸上的牧师、新娘和新郎都穿着工装），百货商店被逼降价。现在显而易见的形势是，不管有没有罢工，有没有激进分子，经济都无可挽回地衰退。

波士顿诈骗犯查尔斯·庞兹（Charles Ponzi）虚构了一夜暴富的骗局，阴谋败露后被警方追捕。8月18日，妇女选举权修正案终于得到政府同意，并正式施行。禁酒令也最终生效，而且成了家家户户餐桌上的热

从大繁荣 到大萧条

门谈资。那段时间里，人们静静地坐在一起，用心聆听着某人如何在自家地下室里酿造出美味的杜松子酒，采取什么方法能用葡萄干来酿酒，走私商人如何把烈酒从加拿大偷运到美国。所有的消息听起来既新奇又让人兴奋。到了1920年的夏末，红色大恐慌已经渐渐消散。9月16日那天降临了一场也许是一伙无政府主义暴徒所制造的真正的灾难，而这个国家尽力保持着超乎寻常的镇定，却让人另眼相看。

如果美国国土上有一个能够称得上是美国金融中心的地方，那就是纽约百老汇大街和华尔街的交会处。华尔街北边耸立着美国国库的分库大楼，与美国贵金属验证局紧紧相邻；大楼对面的东南角有一栋朴素雅致的三层石粉大厦，正是全世界资本主义的权力核心——摩根公司总部的所在地；西南角挖开了一个大坑，目前准备建造纽约证券交易所的配楼；旁边的百老汇大街上，耸立着纽约证交所的科林斯式白柱。无论是政府财政、民间金融，还是资本家手中掌控的行业，各自的总部都在此紧密相连，好像在把政府权力、金钱力量和企业融入一个系统之中。而这个系统却遭到激进分子的猛烈抨击。

灾难差不多就发生在这个地方。9月16日快到中午的时候，附近的员工正起身去吃午饭，突然闪过刺眼的蓝白色光芒。随着一声可怕的巨响，玻璃碎片从无数扇窗户上掉落下来，接着就听到男男女女的惨叫声。在华尔街的贵金属验证局门前，也就是摩根公司总部的对面，一枚巨大的炸弹爆炸了。这场骇人听闻的爆炸导致30人当场身亡，数百人受伤。摩根公司内部全部被摧毁，邻近街区的玻璃窗震得粉碎；其中一块铁皮竟穿过公正大楼（Equitable Building）34层的银行家俱乐部的窗户。

一团黄绿色的蘑菇云从摩天大楼之间慢慢升起。阴云下面的空气中充斥着烟尘，摩根大厦和其他建筑的窗口烟雾弥漫，受到重创的灰色石墙

尘土飞扬。华尔街上血流成河，死伤遍地。那些侥幸在爆炸中逃生的人从地上爬起来，惊恐逃命，玻璃碎片和石块从高楼大厦上坠落下来，吓得人们胆战心惊。大家手忙脚乱，急于对伤者进行施救，却不知所措，跌跌撞撞，高声呼救。等到消防车和救护车叮叮当当地赶到现场，警察和医护人员在人群中穿梭，街道上才终于恢复了秩序。

摩根大厦中有位主管不幸失去生命，数十人受了伤，其中17人被送到了医院里。但是仅有一位合伙人被飞溅的玻璃划伤了手掌，而其他合伙人要么在大厦的另一侧开会，要么不在城里。摩根本人此时正在国外。这次爆炸的受害者中并没有美国的金融大腕，而只是银行员工。

仅隔200英尺之遥的纽约证券交易所，正在进行股票交易。当时股市出现了“不错的成交量”，当日交易量大约为50万股。股价持续上扬，股指上涨2.125点，至93.75点，鲍德温机车公司股价强势走高，达到110.75美元；中部石油个股成交量巨大，美国钢铁公司股价上涨至89.375美元。爆炸发生那一刻，大楼陡然震动，巨大的玻璃窗瞬间迸裂，玻璃碎片纷纷落下来。幸好百老汇大街那一侧的窗口都拉着厚厚的丝绒窗帘，不然的话就会导致几十人受伤。股票经纪人在那一刻都不知道发生了什么，只是立刻冲向能够隐蔽的地方。片刻之前，交易所大厅中央的股指公告牌前还聚着大量的交易者，此时他们已躲到大厅各个角落，免得被坠落的屋顶砸到。但是纽约证交所主席威廉·雷米克（William H. Remick）和富豪们站在大厅的一侧，依然稳如泰山。他和好友说道：“我想该是敲钟的时候了。”他登上主席台，敲响了收盘钟声，当天的交易就此结束。（次日股价继续上扬，好像什么也没有发生过似的。）

在华尔街的中央，躺着一匹炸得四分五裂的死马，地上四处散落着碎铁皮、木屑和帆布片，还有马蹄铁、马鞍与马镫，通过这些物证，警察

从大繁荣 到大萧条

判断出车夫把TNT炸弹放在了马车上，然后丢下无人看管的马车逃离了现场。此后的几天、几个月乃至几年中，侦探和联邦特工对任何一条可能的线索穷追到底。城里的每辆马车都受到了盘查，更不必说运输过火药的马车。落到周边大厦里的铁块经过检查，发现是破碎的铁窗框。尽管进行了大海捞针般的调查，也没有得出任何结论，只知道这场爆炸是有预谋的犯罪。经过鉴定，有人发现这个马蹄铁正是自己数天前给马钉上的，他说车夫是西西里人的模样，可这条线索就此中断。警方对周围发现的铁片和锡片进行了检查，咨询了制造商，浏览了销售记录。有块铁片被证明是保险箱上的按钮，由此确认了保险箱的出处。有位侦探追踪到了这只保险箱的历史，它在翻造出厂后几经转手，战争期间随军队远赴法国，最后回到霍博肯市，然后从这里失去了下落。每位目击证人的证言都经过检验和分析。对商人们收到的灾难警告已经进行了核查，但毫无价值。对可疑的激进分子的搜捕也没有结果。不过还是留下了蛛丝马迹，但不能肯定这份证据有多么重要。在爆炸发生的那一刻，有位邮递员在两三个街区外的邮箱里发现了五张纸，而这个邮箱在爆炸半个小时前才被清空。纸上歪歪扭扭地印着几行字，里面还有很多拼写错误：

要记住

我们不会忍耐太久

放了政治犯

要不然你们必死无疑

美国无政府主义者

战斗者

爆炸发生的时候，有位声名显赫的煤炭大亨坐在摩根公司的办公室里，他当时就宣称，这肯定是布尔什维克干的。经过数年徒劳无功的调查

后，试图揭开这个谜团的人们依然满心疑虑。从广义上来说，那位煤炭大亨或许是对的。

调查进行之初，吸引了全国民众的注意力。但是反对布尔什维克的暴乱没有显著增加。假如这场爆炸发生在118天前，可能会导致比爆炸本身更加严重的间接性后果。而此时美国人民完全恢复了理性，他们意识到除了少数狂热分子，没人会支持这么疯狂并具有灾难性后果的阴谋。

FROM GREAT
PROSPERITY
TO GREAT DEPRESSION

第四章 美国复兴

红色大恐慌慢慢地消失了。

是什么消灭了它？

人们首先意识到，美国根本没有充分的理由为这样的恐慌而乱成一团；其次，共产主义仅在欧洲传播：德国和其他欧洲国家并未淹没在布尔什维克的浪潮里，大西洋彼岸的美国更不可能被这股浪潮所吞噬。事实上，激进主义也在美国昙花一现。“好战的贵格会教徒”帕尔默审查产生了实际效果，无论别人怎么想，许多红色分子都吓得摇身一变成了右倾主义者。到了1921年，美国劳工联合会的领导人对政府俯首称臣，看起来像加里法官一样墨守成规；大学教授退订了自由派杂志，实在没胆量让这种刊物出现在自己桌上。一两年前的社会改革家厌倦了这场白费力气、毫无建树可言的斗争。人们失去了对政府搜捕红色分子行动的激情，对个人自由萌生了迟来的关切，对联邦探员生出了新的不信任感。有另一个更为重要的原因：战争过后的狂热最终被和平的心境所取代。如同一位劳累过度

的商人开始了悠闲假期，整个国家在经历了一段惶惶不可终日的动荡岁月后，终于对如何放松消遣产生了学习的兴趣。

幻想破灭的落寞感挥之不去，举国上下像猛然间解脱一般，觉得自己应该活在当下，生活是无聊的一地鸡毛，任何事情都可听之任之。而与此同时，人们尽可能地纵情享乐，收集娱乐大众的新鲜玩意儿，追求新的时尚潮流，品味有趣的奇闻怪谈和平凡生活的点点滴滴。到了1921年，新鲜玩意儿、时尚潮流、奇闻怪谈蜂拥而至，这个国家兴致盎然地把它一把攥在手里。

二

这所有新鲜事物的头一样就是收音机，而这样东西注定要和那十年中的任何发明一起，深深地改变美国人的日常生活习惯。

1920年11月2日，东匹兹堡成立了第一家广播电台，学生们都会记住这个日子，因为这也是哈定和考克斯参加总统大选的日期。这家电台就是西屋公司开设的KDKA商业广播电台。然而在一段时间里，这场通信和公共娱乐的新革命却进展缓慢，几乎没什么听众。业余无线电报务员反对播放音乐，大多数音乐唱片是西屋广播电台发行的，而这干扰了西屋的重要业务。等到唱片被真正的管弦乐团所代替时，却发现演奏厅的回音影响了演出效果。管弦乐团随后迁到户外的帐篷里，帐篷却被大风吹跑了，只得把帐篷固定在大厅的内部。此时人们才发现，悬挂的布幔可以充分地吸收声音，后来这成了广播电台录音间的标准配置。

然而，实验还在继续。其他广播电台陆续成立，市场报道出现在了节目里。匹兹堡的范埃顿（Van Etten）博士被允许通过广播进行圣公会教堂的礼拜，威斯康星大学播放了本校的音乐会，政治家对新奇的设备说

从大繁荣 到大萧条

得头头是道，想知道有没有人留神倾听。1921年7月，邓普希和卡彭铁尔展开了对决，三位解说员在拳击台旁用电话进行了现场解说，并向全国广播，收听率达到了80%。《纽约时报》在一个不起眼的角落报道了他们的奇思妙想，称之为“无线电话”的成就。当年11月，无名烈士安葬在阿灵顿国家公墓，人们纷纷涌进纽约的麦迪逊广场花园和旧金山的大礼堂，聆听着从大喇叭里传来的演讲声。在吵吵闹闹的人群中，几乎没人意识到，在不久后他们就能听到所有想听到的演讲，而不必坐在起居室的安乐椅上打发无聊的时间。而此时，那个彻悟的时刻还没有到来。

但是，这个时刻在1921年到1922年的冬天便匆匆来到了。不久，人们口中谈论的不再是无线电话，而是收音机。旧金山的一家报纸这样描述百万人手中的新奇发明：“在任何地方，每天晚上都能听到收音机里传出的音乐。任何人都能在家里通过收音机收听广播，每个孩子都能用一个小时拼凑出一部收音机。” 1922年2月，哈定总统在书房里配备了收音机的全套设备，迪克斯摩高尔夫俱乐部宣称，将安装一部电话让高尔夫会员听到教堂的礼拜。4月，拉克万纳列车上的乘客收听了收音机广播的音乐会，梅纳德（Maynard）中卫在飞机上用广播做了复活节的祷告，这是基督教向现代化迈进的新篇章的开始。新闻报刊开辟了收音机板块，刊登有关再生电路、钠离子管、格兰姆斯来复电路、晶体检波器和高频调谐放大器的相关文章，让对机械毫无兴趣的数以千计的读者感到迷惑不解。齐格菲“1922年的罪恶”中的歌曲《我的蔷薇》广为流传，吟唱的是有位男子希望所爱的人能够听他唱的情歌，因为她“正在听广播”。你在街上不管遇到什么人，他都会把你一把揪住，告诉你他熬到头天夜里两点钟，头上戴着耳机，居然听到了哈瓦那传来的声音！如果一个人面临如何架设环形天线这样要紧的问题，他怎么会去为红色的威胁费力劳神呢？

在1919年到1921年出版的《读者期刊文献指南》中，列出了三年里杂志上发表的所有文章，涉及激进分子和激进主义的文章占据两个专栏，提及收音机的文章仅占四分之一专栏。相比之下，在1922年到1924年的《读者期刊文献指南》，有关激进分子和激进主义的文章减少到半个专栏，介绍收音机的文章却猛增到十九个专栏。这些数据的变化是使一些事物成为远远大于期刊文学的里程碑。

三

体育运动也使美国人陷入了深深的痴迷之中。1921年，杰克·卡恩斯（Jacket Kearns）劝说特克斯·里卡德（Tex Rickard），把邓普希和状态不佳但仍具吸引力的乔治·卡彭铁尔（Georges Carpentier）联合起来，在新泽西州的泽西城外波伊尔三十英亩^①园展开对决。公众对这场比赛的反响在美国史无前例，此次比赛的门票收入高达150万美元，是邓普希和威拉德拳击赛收入的三倍。现场有7.5万观众眼睁睁地看着外表温和的法国拳击手在第四个回合就被打翻在地。都市报纸不满足于体育版现有的几个专栏描述这场比赛，而在第二天用了好几页篇幅来描述这场比赛的细枝末节。这是战后十年第一场赢得百万美元巨额收益的体育赛事。贝比·鲁斯将自己的本垒打纪录提高到59个，1921年的世界职业棒球大赛在门票收入和观众人数上双双打破纪录。那些对体育运动痴迷不已的人从没想过要参加大学招生考试，却纷纷涌进大学足球比赛的赛场上，观看耶鲁大学的马尔科姆·奥德里奇（Malcolm Aldrich）上尉和哈佛大学的乔治·欧文（George Owen）的比赛，津津有味地读着关于宾夕法尼亚州立大学、匹兹堡大学、艾奥瓦州立大学，以及中央学院的“祈祷的上校”的数以百计的预测比赛结果的八卦专栏。1920年，小说《风帆战舰》取得了

^①1英亩=4046.86平方米。

从大繁荣 到大萧条

空前的成功，使赛马运动从此获得了新生。网球俱乐部越来越多，成百上千的商人发现，四杆洞成了最适宜开会的地方。饮食时尚也像运动时尚一样流行开来：就像人们突然疯狂地迷上了巧克力脆皮雪糕，在三个月里，纽约市场的可可豆价格就上涨50%。

1921年夏天，一项美国新风尚吸引了公众的目光。7月初，在波多马克河畔的华盛顿海水浴场举行了一场时装美女秀，获胜者几乎没受到电影制片人马克·塞内特（Mack Sennett）监制的影片中泳装形象的影响，她们身着束腰泳装，长长的卷发上戴着帽子，穿着长筒袜。除了一个姑娘，她大胆地把长袜褪到了膝盖以下。9月初，亚特兰大市举行了首次选美比赛，这场性质类似的选秀也有着不同之处。有位目光短浅并心存偏见的记者震惊地描写道：“如今，针对露出膝盖和紧身泳装的禁令已经废除，成千上万的观众为这些姑娘大声叫好，都差点喘不上来气。”华盛顿小姐当选美国城市中最美丽动人的女孩，连体泳装一夜之间成了泳装美女的标准装扮（尽管在今后每年都要到来的一两个季节里，对真正去海边游泳的人来说，塔夫绸和锦缎依然非常有用），海边度假胜地的推销员已经开始策划新的选美比赛，画报和通俗小报的编辑迎来了充满期待的光明前景。实际上，通俗小报的火爆对社会也产生了影响。通俗小报出现后，激进主义就销声匿迹了，这个事实不仅仅是巧合。通俗小报没有把美国人的生活描绘成政治斗争和经济斗争双重压迫的情景，而是演绎成体育、爱情交织的热闹场面。迫于竞争压力，其他报纸也在不同程度上纷纷效仿。工人们神采飞扬地欣赏路边斯克兰顿（Scranton）小姐的海报，关心着斯蒂尔曼案件和阿克巴案件的进展情况，研究赛马莫维奇的小道消息，他们已经把阶级观念忘得一干二净。

文化层次更高的读者也能从日常的事物中得到消遣。尽管《亨利·亚

当斯的教育》让他们看得晕头转向，可他们仍然勇往直前，艰难跋涉，读完了《世界史纲》里的古生物学（大多数人刚看到介绍成吉思汗的章节，就陷入泥潭之中止步不前了）。他们彼此询问，美国是不是真的像辛克莱·刘易斯（Sinclair Lewis）在小说《大街》里描写得那么丑陋不堪，大溪地岛是不是真的像弗雷德里克·奥布莱恩（Frederick O'Brien）在《南海白影》里描绘的美景一样迷人；他们从《沙漠酋长》中了解炎热沙漠里的火热爱情，如饥似渴地读着阿斯奎斯（Asquith）夫人描写英国统治阶级的绯闻八卦，还为《假如冬天来临》的悲惨结局流下热泪。

更多的娱乐方式也即将出现。如果人们曾经怀疑在收音机的热潮席卷全美后，美国人民还会聚集在娱乐活动上面，那1922年和1923年发生的事会是对这种怀疑所作的最好解答。1922年9月16日发生了一起凶杀案：牧师爱德华·惠勒·霍尔（Edward Wheeler Hall）和教堂唱诗班的领唱詹姆斯·米尔斯（James Mills）夫人被人发现遭到枪杀，死于新泽西州新布伦兹维克附近的一个废弃农场里。霍尔—米尔斯凶杀案具备一切满足大众猎奇心理的元素，此案的轰动性超过了1920年6月份的埃尔韦尔案件。这起谋杀案阴森恐怖、引人关注（两具尸体并排放在一起，似乎象征某种被神明所不容的关系），牵涉到了富贵人家和上流人士，带着几分桃色事件的意味；偏偏又发生在紧邻美国新闻界的最大的都市中枢的地方。大字不识的美国人也熟知了德拉西小道、山楂树、骑着骡子的胖女人、威利·史蒂文斯（Willie Stevens）的精神状况和唱诗班里的香艳八卦。

四

当时，还有一种新游戏开始风靡美国。战后的一两年的时间里，标准石油公司驻苏州的代表约瑟夫·巴布考克（Joseph P. Babcock）对中

从大繁荣 到大萧条

国的麻将产生了兴趣，并根据美国人的需求对麻将的打法进行了简化。怀特两兄弟把麻将介绍到了上海的英语俱乐部，立刻在那里流行了起来。麻将将被带到了美国后，立刻赢得了人们的喜爱。旧金山的一位木材商人哈蒙德（W. A. Hammond）从中看到商机，大规模地进口麻将。截止到1922年9月，他所进口的麻将价值已达5万美元。美国出现了大量的广告宣传，加上免费的教程和展览，推广了这种游戏。不到一年，麻将就流行开来。中国制造的麻将越来越不能满足人们的需求，美国的麻将制造业开始兴旺起来。到了1923年，早已对收音机习以为常的人们在“砌长城”的时候，会把收音机打开，嘴里喊着“碰”或“吃”，一边码牌，一边熟练地谈着梅兰竹菊、春夏秋冬、南风红中。富贵人家会买一套价值500美元的麻将；几十家制造商纷纷投身到这一行业中来；随即成立了美国麻将联盟；人们就麻将打法、使用的积分规则、手牌上限的规矩展开了激烈的讨论；体面的宴会最后总是这样结束的——人人都坐在绿呢台桌旁忙着码放由象牙和竹子做成的麻将牌。

麻将的流行没有达到顶点以前，埃米尔·库埃（Emil Coue）就来到了美国。他人还没到，为他制造声势的活动就开始了，在1923年年初，这个来自法国南锡、矮小干瘦的男子，突然间成了全美国最具谈资的名人。库埃研究会相继成立，听众们争先恐后地去倾听大师的演讲。他本人一开口，人们就鸦雀无声，大师的名言被人们交相传颂着：“日复一日，我感到一切都越来越好。”几周后，发现法老图坦卡蒙墓的消息通过海底电缆从埃及传到了美国。这则报道让全国上下都兴奋不已，使对激进分子的审判和三K党丑闻的报道不再为人们所关注，服装制造商开始策划在下一季推出埃及风格的时装。最后，美国人发现了新的歌唱方式，来自意大利水果小贩口中的俚语，被漫画家塔德·多尔根（Tad Dorgan）当成笑料运

用了很久，后来改编成了歌词，配上从《哈利路亚合唱》《我梦见居住在大理石大厅》和《黛娜婶婶的编织聚会》等歌曲中选取的旋律，在长岛的公路旅馆试唱后，被带到了纽约，在那里它迅速取代了畅销曲《加拉格尔和肖恩》而深受好评。不久，连最偏僻地方的最偏远的农舍都能听到《没错，我们没有香蕉》这首流行歌曲。

尽管超级爱国者依然情绪激愤，联邦特工依然对机智的共产主义者紧追不放，公开承认的社会党成员依然受到人们的排斥，三K党依然不断壮大，但红色大恐慌却已经彻底消失了。人们还有太多其他的事情需要思考。

或许，红色威胁的消失还有其他的原因。另一种威胁正在危害这片土地，这种威胁无法归结于莫斯科的阴谋诡计。我们即将看见年青一代的喧闹行为。

五

在战后十年里，只有一起争论是将1919年和1920年全美自由主义和保守主义隔离开来的分界点。1920年4月，正值红色大恐慌达到高潮的时候，马萨诸塞州的南特里发生了一起凶杀案。这起案件实在无关紧要，第二天的《纽约时报》对此只字未提，此后也没有报道。全国任何地方都会发生这种案件。有家鞋厂的出纳和警卫带了两箱工资被两个持枪歹徒杀害。歹徒跳上停在路边的汽车，驶过铁轨逃跑了。两周后，两个意大利激进分子被当作凶手遭到了逮捕。一年后，韦伯斯特·塞耶（Webster Thayer）法官和陪审团判决这两名意大利人有罪。与此同时，华盛顿的泳装美女捋直了长筒袜让人拍照，戴维·萨尔诺夫（David Sarnoff）通过无线电现场报道了邓普希和卡彭铁尔的拳击赛。这场审判几乎没有引起

从大繁荣 到大萧条

太多人的关注。但在几个月后，从缅因州到加利福尼亚州，大家都在打着萨科—万泽蒂案件到底是怎么回事，因为此时发生了一件极不寻常的事情。

在波士顿一间简陋阴冷的办公室中，一位西班牙木匠、一位来自纽约的犹太青年和一名意大利记者奋笔疾书，把关于两名意大利人的报道发给法国、意大利、西班牙以及欧洲其他国家和中南美洲国家的激进分子和激进报刊。最终，赫里克（Herrick）大使在巴黎的宅邸遭到炸弹袭击。巴黎民众为萨科—万泽蒂事件举行了示威游行，在游行中有20人被炸身亡。群众恐吓驻罗马的美国大使馆。美国总领事位于里斯本的家险些被炸毁。乌拉圭首都蒙得维的亚爆发了大罢工，对美国商品进行抵制。阿尔及尔、波多黎各和墨西哥的激进报刊都对案件进行了讨论。在这种舆论形势下，这起案件在美国也必然引起轩然大波。

尽管炸弹爆炸和罢工抵制引起了人们对此事的关注，却没有让公众对萨科和万泽蒂两人产生恻隐之心。案件拖了一年又一年，他们二人的上诉再三遭到法庭驳回，公众倒是对两人的君子风度颇为同情。万泽蒂尤其引人注目，他是位品格高尚的饱学之士、有哲学思想的无政府主义者，看起来和凶杀案不可能有什么关联。新的证据使两人的罪名越发让人怀疑。1927年，在这起凶杀案发生七年后，塞耶法官固执己见，驳回了最后一次上诉，宣布判决两人死刑。而社会舆论迫使马萨诸塞州州长福勒对案件重审，考虑赦免萨科和万泽蒂。州长任命了顾问委员会对案件做进一步研究，委员会里有哈佛大学校长罗威尔（Lowell）、麻省理工学院院长斯特拉顿（Stratton）、罗伯特·格兰特（Robert Grant）法官，全都是极负威望的人士。几周后，顾问委员会宣布：他们认定萨科和万泽蒂有罪。1927年8月22日晚上，在全世界数百万民众满心期待和忧虑的目光下，两

个人被送上了电椅。

他们究竟有没有犯罪，也许永远都无法知晓；但如果有人读完了他们向法庭的陈述和信件，不免要对法律是否伸张了正义而产生怀疑。与此案有关材料长篇累牍，满眼全是专业词汇。双方的辩护者激烈交锋，公众对案情的看法两极分化：一派认为激进分子应该全都吊死，而另一派认为这是对文明国家中人们保护少数群体权利的谨慎态度的真正考验。战后十年初期的那种激情再次被点燃，罢工纠察队员在波士顿的州议会大厦前示威游行，呼吁州长释放萨科和万泽蒂。波士顿警察逮捕了纠察队员，把他们关了起来。而不到八年前，正是波士顿警察大罢工把卡尔文·柯立芝送上白宫的总统宝座。

如今，牛市已经处于上扬的态势，劳工运动日渐衰弱，国家富强仿佛给了激进主义致命一击，但这两位普通意大利人的不幸遭遇，却能让人回忆起切尔·帕尔默对红色分子的大搜捕，激荡起心中早已经平静的恐惧和仇恨。人们几乎已经忘记了自己究竟是保守派还是自由派，却再次被卷进了激烈的争论，对萨科帽子的鉴定和普罗科特（Proctor）上尉对致命子弹的证词破坏了和谐的关系。但这段时间非常短暂。萨科和万泽蒂遭到处决的头条新闻让读者心中为之一颤，他们或许暗自猜测，这个无可挽回的残酷结局究竟是两人应得的结果，还是可怕的错误？不久，人们的目光又投向了另一则新闻，寻找林德伯格今天飞到了哪里；再随手翻开财经版面——通用汽车公司都做了什么？

FROM GREAT
P R O S P E R I T Y
TO GREAT DEPRESSION

第五章 道德教化的革命

战后十年初期，美国上流社会率先反对旧式习俗，这种局面当然和列宁毫无关系。奋起反抗的叛逆者也不是外国的煽动者，而是本国那些对布尔什维克所知甚少，也毫不关心的富家子弟。他们的反抗的方式既不是在难以理解的激进主义报刊上发表文章，也不是站在肥皂箱上当面高声呼吁，而是在自家的餐桌上口无遮拦，让思想陈腐的父母听得心惊肉跳。人们依然被红色恐慌吓得战栗不已，此时他们猛然发现年青一代的问题同样可怕。他们意识到美国宪法并没有出现什么危机，国家的道德教化倒是岌岌可危。

至于年轻人当时的道德准则，大体上有如下一些：女性是道德的守护者，她们要心灵手巧、举止得体优雅。年轻女子应当天真乐观并毫无邪念（她们在性情上或许稍微需要接受一番指导），怀着浪漫的爱情的憧憬走向婚姻殿堂，从此过上幸福快乐的日子；在理想的夫君出现前，不准其他小伙子和自己亲吻。可以预料到有些男人会沉迷于色情的诱惑，但只限于

特殊阶层的放荡女人，名门世家出身的姑娘绝不能搔首弄姿。青年男女可以自由地共同工作和消遣，陪伴在自己身边的人日渐减少、仅有虚名，只是因为道德律令总体上起到了一定影响，荣誉感代替了长辈的监护。只要他们有良好的教养，就永远不会滥用这种自由，人们对于这种观念已经习以为常。尽管在不同的社会阶层和地区，人们对女孩子抽烟喝酒的态度截然不同，但大多数人仍然认为女孩子抽烟是失德的行为，酗酒的危害更是难以想象。

战争结束后不久，父母、教师 and 道德模范的警告已经呼声震天，刚刚脱离青春期的年轻男女把这套道德准则扯得破碎不堪。

此时，年轻女孩子和大多数年长女性的服饰打扮足够让人担心不已。1921年7月，有位时尚作家在《纽约时报》上写道，“美国女性的裙子远远超过了适宜的高度”。换句话说，裙子离地的高度已经超过了9英寸。人们自然而然地预计，到1920年至1921年的冬天裙子会再次加长。然而事实恰恰相反，裙子的长度竟然又缩短了几英寸。时髦女郎身穿单薄的短袖连衣裙，有些晚礼服甚至连袖子都没有；性情开放的姑娘把长筒袜挽到了膝盖以下，谦谦君子们瞥见她们的膝盖和小腿，不免震惊得目瞪口呆；许多女孩子看来都用上了化妆品。小说《黑暗中的舞者》的多萝西·斯皮尔（Dorothy Speare）神情严肃地解释道：“陶醉于胭脂口红，是很多少女心中的古典情怀，男人们却总是难以理解这点。”焦心忧虑的父母坚称上流社会的女子不该化妆，但也毫无束缚力，到头来大家闺秀都涂脂抹粉了，甚至在大庭广众面前修补妆容。此外，有些姑娘竟然扔掉了她们的紧身胸衣，正如她们所说，“你要是穿紧身衣的话就不会有男人和你跳舞”。

如今风行的舞蹈形式更让人惊惶失措。管弦乐团的领导者不再是浪

从大繁荣 到大萧条

漫的小提琴，而是粗犷豪放的萨克斯。在萨克斯低声吟唱、如泣如诉般的旋律中，跳狐步舞的人轻踱着舞步，霍巴特学院《先驱报》的编辑鄙夷地称之为“亲密无间的拥抱”。舞伴之间没有一丝缝隙，跳舞的时候紧贴在一起，相互搂抱着，脸贴着脸。辛辛那提的《天主教电讯报》故作姿态地写道：“音乐固然美妙动听，舞伴的搂抱却有伤风化。女舞伴竟然衣不蔽体。舞蹈的动作简直难以描述，没有半点规矩。值得注意的是，竟然还有专门为跳这种舞而开的舞厅——早就应该依法关闭这种地方。”

原来举止优雅的“好”姑娘明目张胆地抽着烟，她们抽烟的模样常常显得尴尬笨拙、自以为是。女孩子也开始喝酒，虽有几分半推半就，却也很快就喝多了。体面家庭的女儿喝得酒气冲天的，被朋友们戏称为“烂醉如泥”。她们在禁酒令实施的时代背景下喝得晕乎乎的，和男人在凌晨4点出去开车兜风。最糟糕的是，甚至在中规中矩的舞会上，她们也会躲到目光犀利的监护人眼神顾及不到的地方，在漆黑的房间里和停在那里的汽车上，做着抚摸亲吻这种鬼鬼祟祟的事情。

这时斯科特·菲茨杰拉德还在普林斯顿大学读书，而他应该了解那一代年轻人的行为举止。在1920年4月份，菲茨杰拉德出版了小说《人间天堂》（Petting Party），父母们这才完全注意到当时的状况，而这种情形已经持续了好几年了。早在1916年就出现的爱抚晚会，此时已经成了普遍流行的室内活动。“维多利亚一般举止保守的母亲——大多数母亲都是维多利亚式的——根本就从来没有想到自己的女儿举止如此轻浮，习惯于被人亲来亲去。”菲茨杰拉德在书中写道，“埃莫里看见这些女孩子做着难以理解的事：凌晨3点舞会过后去吃夜宵，此时根本不可能有饭店营业；谈到生活的各个方面，总是带着一半认真、一半嘲弄的口气。在埃莫里看来，这种下流的行径简直是名副其实的道德沦丧。等他经历了从纽约

到芝加哥那一座座城市的青年男女全都在偷鸡摸狗，才意识到道德沦丧竟然如此广泛。”这本小说让全美国都感到毛骨悚然、胆战心惊。菲茨杰拉德竟敢让书中有良好家教的女主角毫无教养地表示：“我已经亲了几十个男人，我觉得还要再亲上几十个。”另一位女主角竟然对一位小伙子说：“你瞧，50个男人里头只有1个对性还算有点了解。我对弗洛伊德什么的非常着迷，可这世上的每次真爱不过是99%的激情加上一点点忌妒心理，这可真不是啥好事。”

这简直让人不可思议，令人恶心。这一切意味着什么？难道良好的道德风尚都遭到了唾弃？母亲们读着这些放荡的言辞，不由得暗自思忖，自己是否想到过“女儿已经对亲吻习以为常”。不，这不是真的，肯定是对某个堕落阶层的不端行为的夸张描写。自律的姑娘绝不会这样做，更不会面不改色地公开谈论激情。但此后出版的几本书却证实了菲茨杰拉德的结论，比如说《黑暗中的舞者》《塑料年代》和《烈火青春》。杂志和报纸上的文章不断地将这些丑闻公之于众。当然，很多社区里的正经姑娘其实根本不会有那种轻佻的举动；甚至在关系复杂的城市中心，有很多女孩子也不会做出这样的事情。那些令人震惊的消息，使年青一代的问题成了全美各地虽然仍存希望但还是忧心忡忡的话题。

道德力量联合起来发起了反攻。基督徒奋进协会的创始人和会长弗朗西斯·克拉克（Francis E. Clark）博士声称，当今的“下流舞会是对女性贞操的冒犯，而女性的贞洁正是我们家庭和社会生活的源泉”。宗教期刊谴责这种新的舞蹈形式“动机不纯、污浊不堪、毫不入流、自甘堕落、毁灭灵魂”，美国国土上的母亲、姐妹、教会信徒被号召起来，劝诫和引导这些行为不检的年轻人，提高他们的道德水平。佛罗里达大学校长墨菲以南方人的真情大声疾呼：“低胸睡衣、卷起来的长筒袜和短裙都来源

从大繁荣 到大萧条

于魔鬼和堕落的天使，让我们和下一代陷入混乱之中，最终自取灭亡。”

纽约一群有钱又有名望的圣公会女教徒发出呼吁（其中有约翰·皮尔庞特·摩根夫人、博登·哈里曼（Borden Harriman）夫人、亨利·菲普斯（Henry Plipps）夫人、詹姆斯·罗斯福（James Roosevelt）夫人和爱德华·亨利·哈里曼夫人），倡议成立一个组织，以期劝阻种种“过分露”和“下流舞姿”的时尚行为。基督教女青年会在全国发动宣传舆论攻势，反对女高中生不成体统的装扮，向报纸散发以《职业妇女响应衣着得体的号召》和《法国不再流行高跟鞋》为题的印刷品。在费城，富有威望的公民组成了服饰改革委员会，向1 000多位牧师发放了调查问卷，询问他们对得体衣装的意见。尽管神职人员的意见两极分化、让人恼火，委员会还是设计出了“道德睡裙”，而且得到了15位教派领袖的一致赞成。这种道德睡裙的显著特点就是异常宽大，袖子刚刚盖过肘部，下摆仅离地面7.5英寸。

几个州的立法机构并不满足于树立标杆和加以谴责，它们纷纷提交议案，建议彻底对女性服饰进行改革。1921年，根据《纽约美国人》杂志报道，犹他州收到一项提案，对街上“裙边高于脚踝3英寸”以上的女性处以罚款和监禁。弗吉尼亚州立法会也收到了类似的提案，禁止女性穿着“脖颈露出3英寸以上”的衬衫和晚礼服。在俄亥俄州，立法会收到的提案是要将领口尺寸限制在2英寸，目的是防止售卖“过度暴露和强调女性曲线的服装”，并且禁止“任何超过14岁的女性穿着裙边不到脚面的裙子”。

与此同时，不计其数的家庭为子女抽烟酗酒和整夜开车兜风引发的争吵无比头疼。当父母的躺在床上无法安睡，他们反思自己的儿女们是否完全迷失了方向；做儿女的却对问题避而不谈，不是痛苦不堪地撒谎欺骗，就是粗暴无礼地顶嘴回击，说他们起码不算是有着肮脏思想的伪善者，起

码看到自己做的事并不是有害的，并打算一直这么活着。那些拥有思想的神父和老师们非常自豪自己能够赶上新潮流，都表示：这些年轻人至少比他们的父辈更为坦率；经历了这么多世事，他们难道觉察不出什么标准已经过时了，什么则代表了这个种族世代累积的道德品质？听到这番充满希望的话语，许多内心善良的人再次充满信心：也许这种青春激情的燃烧不过是偶然现象，也许过一两年之后，年轻男女就会恢复理性，一切都会如他们所愿。

然而，他们都错了。年青一代的反叛只不过是道德教化革命的开端，而这场革命已经开始影响全美各地的所有百姓。

二

各种力量联合到一起相互作用，使这场革命必然会席卷而来。

首先，战争及战争结束影响了人们的心态。整整一代人都被“岁月匆匆，需活在当下”的理念所感染，这种想法随着士兵开往战场传染给了训练营和前线。流行一时的不仅有匆忙草率的战争式结婚，还有有违道德的风流韵事。在法国，有200万男子置身于污浊不堪与毁灭的边缘，与美国的道德标准相差太多；皮肉生意紧随而至，娼妓人数众多；派往海外担任护士和战士的美国女孩受到欧洲大陆风俗习惯的影响，却没有受到像欧洲上流社会的小姐所享受到的那样严格的保护；越来越多的人自然而然地打破了传统的克制、沉默和种种禁忌的限制。直到战争结束后，这一代年轻人已经不可能恢复到一成不变的常态了。面对战争的压力，有些人接受了新的道德要求，这套规则在他们看来是可以理解的，数百万人受到了刺激而产生了反应，却难以平复心境。人们绷紧的神经渴望着速度、刺激和激情的安慰，外界却期望他们像什么都没发生一样，去适应平凡简单的美式

从大繁荣 到大萧条

生活，接受长辈遵循的道德信仰，而长辈们生活的那片玫瑰色理想的伊甸园已经在战争中逝去了。年青一代无法做到这一点，于是毫无顾虑地表露出自己的想法。

约翰·卡特（John F. Carter）在1920年9月的《大西洋月刊》上一针见血地表达了无数当代人的感受。他写道：“老一辈把这个世界弄得满目疮痍之后，才把它交到我们手里。他们留给我们的世界破碎不堪、千疮百孔，如同随时会被炸得粉碎的人间炼狱！他们竟然非常惊讶于我们没有像他们那样，用同样真诚高尚的热情来接受这个他们在19世纪80年代接受的世界。”

中年一代并没有马上被战争神经症所影响。1917年前，他们有充足的时间培养成一套不易破坏的行事规则。但随着1919年战争结束，社会局面让人失望，他们也苦恼不已、心存不满，对一切都产生了质疑，而这些事情原本在他们眼中是真实可贵、享有美誉的。他们曾经度过美好的时光，如今希望继续享受人生。他们看到自己的晚辈在性的禁地摸索前进，也有了亲自体验的想法。幻想破灭曾经打垮了伍德罗·威尔逊，引发了罢工骚乱，带来了红色大恐慌。如今，幻想破灭又催生出一一种文化，新生自由主义的萌芽在此土壤上茁壮成长。

美国女性的独立意识日渐增长，也加速了这场革命的发展。1920年，美国妇女获得了选举权。事实上，女性拥有选举权后似乎对此并没有什么兴趣。尽管女子俱乐部和美国妇女选民联盟努力弘扬女性肩负的公民权益，但那些妇女就算参加了投票，也和周围那些冥顽不灵的男人并没有什么差别。从政的女候选人屈指可数，得克萨斯州选出首位女州长米丽娅姆·弗格森（Miriam Ferguson），她曾承诺马上提高公共生活水准，但这样的人看来也不能代表乐观精神所带来的影响。几乎没有年轻女性对政

治有过哪怕一丁点兴趣，对她们来说，政治是一桩利欲熏心、白费力气的事，既无聊又绝望。然而，妇女赢得选举权还是对社会产生了影响，提高了女性相对平等的地位。

更为明显的影响是，妇女摆脱家务活的独立意识越来越强烈。家庭越小，照顾家人也就越容易。许多家庭搬到公寓中，从而减少了主妇做家务的时间和精力。女性开始学习如何更加轻松地准备饭菜。罐头食品的销量逐渐提高，在1910年到1920年的10年间，熟食店数量的增加是人口增长速度的3倍。从1914年到如今的1924年，面包店的产量增加了60%。许多家务劳动并不是完全依靠外界，而是通过机器变得方便快捷。比如说，从1914年到1924年，专业洗衣店的数量就增加了57%。洗衣机和电熨斗的出现，帮助了那些在家里洗衣服的人；美国小城市的电力公司经理预计，到1924年，城里近90%的家庭都会拥有电熨斗。家庭主妇学会了用电话从商场订购成衣，摆脱做衣服的琐碎工作；买了真空吸尘器，模仿着杂志广告里开心快乐的美丽女郎，只需挥动纤细的手指就能把灰尘打扫得干干净净。女性渐渐从日常琐事中解脱出来，“过上了属于自己的日子”。

而属于她们自己的生活究竟是什么样子？首先，她们能够获得工作。在此之前，希望有所作为的中产阶级女孩能够从事的工作，依然只限于学校教育、社会服务、护理、速记和商号行政事务。然而如今，从中学和大学毕业的女生涌入各种各样的新行业。她们纷纷进入了出版社和广告公司，担任休息室的管理人员，以至于食品供应商的数量比买鸡排和肉桂面包的顾客还多；姑娘们开始售卖古董、出售房产、开一家时尚小店，最终去了百货公司工作。1920年，在普通女大学生的心里，百货公司不过是资产阶级的商店，雇用的全是“楚楚可怜的女售货员”；到了20年代末，她们却在排着队等女性运动服装店的招聘，站在柜台后面卖货，心中满怀期

从大繁荣 到大萧条

待，盼望着幸运之神的垂青，让她们华丽转身为顾客或是时装设计师。曾经满足于在索克中心消磨时光的小镇姑娘，眼下也从父亲那里借了点钱，千里迢迢地去了纽约和芝加哥谋生，进入了百斯特百货、梅西百货和马歇尔-菲尔德百货公司。已婚妇女受到孩子的拖累而无法出去找工作，只好用这种想法来自我安慰：毕竟料理家务和养育孩子也算是正经的工作。美国从南到北的各个地方，餐桌上争论最热烈的话题就是，已婚妇女是否应该出去工作，做母亲的有没有权利这么做。而未婚女子再也不用对别人解释她为何要在商店或办公室上班，事到如今，该轮到无事可做的姑娘来为自己辩解的时候了。

随着工作和工作观念的到来，女性产生了相对的经济独立的思想。随着经济独立意识的出现，夫权与父母权威渐渐弱化。单身女性离开原生家庭的庇护，自己住进了配有厨房的公寓里。城市居民的家越来越不像宫殿，更像是宿舍，像一个从这里前往饭店、电影院和办公室的只为停留过夜的临时处所。不加装饰的机械化居所尽管让人满意，美国女性却没有对工作感到心满意足。女性为这场革命做好了准备，仍然能够释放能量和热情。

像所有革命一样，这场革命也深受国外宣传活动的鼓动。然而，这种鼓动不是来自莫斯科，而是来自维也纳。19世纪末，奥地利心理学家西格蒙德·弗洛伊德（Sigmund Freud）出版了第一本心理分析著作。早在1909年，弗洛伊德就和荣格（Jung）一起给美国心理学家讲过课，但直到战后，弗洛伊德的理论才在美国民众之中广泛传播开来。科学那伟大的知识力量，并没有因为战争的缘故而失去威望；受过教育的民众正在学习大量生物学和人类学的科普知识，这些知识给人留下了一种印象：无论男女都是结构复杂的生物，道德规则并不能成为普世价值观，常常以奇特的迷信为基础。美国为弗洛伊德学说的发育准备好了肥沃土壤。如今，你甚至

能从时髦女郎的口中听到科学教会我们有关性的新鲜事情，这简直令人如坐针毡。性俨然成了人类进步至关重要、普遍存在的力量。人类几乎所有的动机都归因于此：无论你是热爱国家还是喜欢小提琴，掌控你意识的都是性意识的升华，精神健康的第一要因就是自由的性生活。如果你想健康并快乐，就要遵从你的本能冲动。通过翻译、大众作家、忠实读者与听众的相继传播，弗洛伊德理论深深地扎根在了美国人的心里。鸡尾酒会和麻将桌上开始随意引用新鲜的词汇，比如说自卑情结、虐待狂、受虐狂和恋母情结。知识女性纷纷赶去欧洲接受精神分析；往来于美国各座城市从事这个新行当的分析师，认真负责地调节病人的情绪；仗义执言的批评家提醒那些宣扬自律美德的牧师，道德自律早已过时，而且非常具有危害性。

其他力量也加速了这场道德教化革命的变迁，这些地道的美国因素包括禁酒令、汽车、忏悔杂志、色情杂志和电影。

我们前而提到过，宪法第十八条修正案获得了批准，禁酒令似乎获得了举国上下的支持。然而，随即出现了钻法律空子的行为，尤其是在美国北部和东部的大城市里，强烈反对禁酒令的人立刻聚集起来。结果有了走私酒的商人、地下酒吧和反抗的斗志，在很多社区里喝酒竟然成了流行趋势。这些情势进一步火上浇油：由于酿造酒遭到禁止，蒸馏酒越来越受欢迎，人们用起了随身小酒瓶，开起了鸡尾酒会，饮酒从男性专有的特权成了男女共同的享受。旧时代的酒吧里几乎全是男人，如今的地下酒吧却照常招待男女客人。作家埃尔默·戴维斯（Elmer Davis）这样说道：“往日父亲和其他男人在卡西迪酒吧整晚消磨时光的日子已经逝去，也许不再重现。虽然卡西迪还在陈旧的吧台后面做着生意，父亲晚上还会去那里，可自从禁酒令颁布以来，母亲会和父亲一起到酒吧里喝酒。”在新法案的监管下，不仅酒水饮料相互掺杂，连喝酒也男女不分了。

从大繁荣 到大萧条

与此同时，汽车（尤其是轿车）的使用快速增长，人们得以获得新的自由。（1919年，美国制造的汽车中，仅有10%是四门轿车；到了1924年，这个例就猛增到43%，到1927年增长到了82.8%。）汽车能提供随时随地的便利，人们可以暂时摆脱父母和监护人的监管，可以对四邻八舍的意见听之任之。正如作家林德夫妇在小说《中心镇》里描写的那样，姑娘小伙子们如今不用经过任何人的同意，就会毫不犹豫地跳上汽车，立即发动汽车，赶往20英里外的小镇上去跳舞。他们在那里互不相认，享受着在社区里不可能得到的自由。此外，在小轿车里，人们还能躲风避雨，无论白天黑夜都能坐上汽车开往黑暗的乡间小路。在《中心镇》里，林德夫妇借用少年法庭法官的话称，汽车已经成为“轮子上的妓院”，每年有30位少女被带上法庭遭到性犯罪指控，所有的犯罪地点都被记录，而其中有19人正是在汽车上犯下了罪恶。

最后，随着革命帷幕的拉开，革命的力量催生了色情杂志、忏悔杂志和香艳电影，使读者和电影观众受到了影响。这些人从来没听说过弗洛伊德和性欲，今后也不会去听这些东西。色情杂志的出版商纷纷刊登名为“婚礼前夜对女儿的叮嘱”“慵懒的亲吻”“当心你的内衣”的文章，细心琢磨着高雅艺术的微妙之处，既能激发读者的兴趣，又不会引起审查机构的注意。忏悔杂志的出版社，一面指点本社的作家写出表达虔诚信仰的合乎道德要求的结局，一面大肆描写隐晦的“失足”情节。他们的许多小说都是雇用落魄文人照猫画虎，今天可以倾诉《歌舞女郎的自白》，明天又能用第一人称讲述导致出租车司机走上歧途的诱惑。这两种杂志的发行数量大得惊人，产生了轰动效应。博纳尔·麦克法登（Bernarr Macfadden）的《真实故事》推迟到1919年才出版，在1923年就拥有了30多万读者，1924年增加到84.8万，1925年超过了150万，到了1926年竟然

有200万读者，创下了杂志出版业史无前例的增长纪录。

除了色情杂志和忏悔杂志，书报亭里还摆满了电影画报，上面用这段文字描述了“七个银幕之吻”：“你还认得出你的小朋友梅·布什（Maë Busch）吗？她为电影献出了很多亲吻，却并没有感到厌倦。起码你会说，她把那些沉醉在亲吻之中的人模仿得淋漓尽致。”每天晚上，数以百万的观众被吸引到电影院，这里不断放映相同主题的影片，利润非常丰厚。一部电影的制片人刊登了这样的广告：“英俊潇洒的男主角、风华绝代的爵士宝贝、香槟浴、午夜狂欢、黎明时分的爱抚晚会，一切都在欢乐喧闹和令人窒息的高潮中结束。”另一部电影的发行方则保证，影片中会有“热吻拥抱、浓艳欲滴的红唇、欢乐放纵的女儿、激情四射的母亲……真情呈现、绝无保留、令人感动”。尽管广告词里誓言铮铮，可很少有影片能表现这么多情节，用一位16岁的少女的话就可以对其中的内容加以说明。爱丽丝·米勒·米歇尔（Alice Miller Mitchell）说道：“电影里男欢女爱的场景真是太多了，使坐在一块的青年男女们想起身离开，去别的地方转转。我曾经和一个男孩子在电影结束前离开影院，去开车兜风。可我的朋友却始终在那里，她得等着和男朋友一起走。”

战后十年的初期，电影制片人招致教会的强烈不满，曾经在哈定政府担任邮政总局局长的威尔·海斯（Will H. Hays）出任全美电影制片和发行人协会主席，对电影的道德意识和电影品位进行审查，海斯承诺一切都会好转。他在洛杉矶商会表示：“电影行业要像优秀的牧师和鼓舞青年的教师那样对神圣宗教、儿童思想、纯洁事物和无瑕记载给予关怀，整个行业都要富有责任感。”海斯的不懈努力换来这样的结果：电影像忏悔杂志一样，安排了符合道德要求的结局，色情场景用虔诚的说教加以伪装；许多精彩的小说和戏剧上了电影制作的黑名单，因为电影业一向广而告之，这些书可能经过

从大繁荣 到大萧条

非常巧妙的改编，令人对美国小镇的传统伦理产生怀疑。海斯本人算是个天才，设法对教会人士进行了牵制。每当稽查制度面临着邪恶的威胁时，他都会颁布一套新的道德法典，供电影制片人遵守。海斯法典的实际影响也许足以表明，上面这番话来自他独揽大权的时期。电影业对旧法典表面上遵守，积极宣传新准则，但私下里却毫无顾忌，我行我素。

战后的幻想破灭，女性的新地位、弗洛伊德理论、汽车、禁酒令、色情杂志、忏悔杂志和电影，多种事物的影响都在这场革命中起到了作用。没有一种因素能够单独使美国的风俗得到改变，这是各种因素互相影响产生的效果，它们加起来使这种改变成为势不可当的浪潮。

三

在这场革命里，女性服饰和外貌的巨大变化成为最明显的标志。

商界分析师本来是用图表计算汽车库存或股票指数的涨跌波动，而《时尚经济学》的作者保罗·H·尼斯托姆（Paul H. Nystrom）教授则运用此类图表巧妙地体现了战后十年间裙子长度的变化趋势。这份图表的绘制依据，是对《绘图者》杂志的时装图样进行的一系列测量。按月累计，统计学家处心积虑地计算出裙边离地高度和女性身高的关系，并将这些数据连成曲线。这份特别的图表显示：1919年，裙边离地高度平均占女性身高的10%，也就是说，为6~7英寸；1920年，这条曲线从10%增至20%；此后3年，这个比例再次降到10%，在1923年跌到了最低点；不过到了1924年，这一比例再次上升到了15%~20%；1925年超过了20%。此后这条曲线继续稳定上升，直到1927年超过了25%，换句话说，此时的裙边已经到了膝盖，这个高度一直持续到1929年年末。

尼斯托姆教授解释说，这份图表并没有准确反映真实情况，因为在任

何特定的年份和月份里，图表体现的并不是女性身上裙子的平均长度，而是时尚决策者受到服装厂商的影响，期望女性穿着的裙子长度。事实上，从1921年到1924年，裙边的下降幅度几乎很少。巴黎的时装设计师会估计长裙会再次流行起来，美国的时装设计师和服装厂商紧随其后，各家店铺纷纷采购长裙准备售卖，但是女顾客只肯买短裙。从1923年秋天到1924年春天，零售商对裙子太长的抱怨让服装制造商疲于奔命。到头来，裙子越来越短。女性想要的正是到膝盖的裙子。倒霉的服装商竭尽全力地改变流行时尚，尽管他们使出了浑身解数，及膝短裙依然作为标准装扮，延续到战后十年的后期。

随着短裙的流行，女性服装的重量、面料和长度都发生了惊人的变迁。每个女人都希望拥有少年般纤细苗条的身材，紧身胸衣早被扔到了一边。从1924年到1927年的短短3年里，在克利夫兰联邦储备区的各家百货商场里，紧身胸衣和胸罩的销量下滑了11%。丝袜或尼龙丝袜和内衣取代了棉织品，棉花加工商感到非常苦恼，尼龙制造商却兴高采烈。在1921年，美国各家企业的尼龙产量仅有800万磅^①，到了1925年竟高达5 300万磅。肉色丝袜和短裙一样，成为美国女性的标准装扮。

衬裙在美国风情中几乎退出舞台，事实上，女装正在一层又一层地减少，这种趋势是非常明显的。1928年的《商业日报》预测说，在未来几年里，女性全套服装（不包括长袜）的面料长度会从19.25码^②减少到7码。现在看来，全套女装会只剩下上衣（2码）、裙子（2.25码）、马甲或衬衣（0.75码）、内裤（2码），还有一双长袜，并且所有服饰的材质都将是丝绸或尼龙！

事实上，这句话有些夸大其词；但是在1926年，根据全国各家百货公司提供的数据，全美纺织品零售协会公布的调查结果显示，女士内衣仅有

①1磅=0.45千克。

②1码=0.91米。

从大繁荣 到大萧条

33%是棉织品，36%是尼龙制品，31%是丝织品。丝袜不再是富裕家境的标志，全家年收入只有1 638美元的工人妻子对《中心镇》的作者说：“女孩子都不愿意穿着棉袜去上高中，即使在冬天，我的孩子们也要穿丝袜和人造纤维的内衣。”

美国女性不满足于穿着短裙和性感服装，还要追求剪短发的自由。你也许会记得，在战后十年的初期，也就是1918年，纽约棕榈花园酒店的经理还把短发看成激进主义的标志。如今短发却在年轻女性中不断流行，其实这主要是考虑到便捷的因素。1922年5月份，《美国发型师》杂志预计，当时流行一时的波波头“可能会一直流行到夏天”。这款发型不但流行到了当年夏天，而且越来越受到欢迎。到了1924年，这份杂志重点推荐了波波发型，指导顾客们如何打理这款新式发型，同时报道了职业发型师和传统理发师在这个行业中所展开的激烈角逐。女式发型师自然站在反对女顾客去理发店的一方。另一方面，传统理发师计划推动美国各州的立法机构颁布禁令，专业发型师不准从事理发业务，除非他们和理发师一样获得执照。《美国发型师》杂志目中无人地写道：“促使女士去理发店剪头发，并不符合公众利益，理发店里经常弥漫着自由散漫的气氛，也与上流社会的美国女性格格不入。”但是，所有的美国妇女都坚持留短发。战后十年的后期，二十几岁的女孩子几乎都是齐耳短发，这种发型在三四十岁的中年妇女中非常普遍，在60岁的老太太中也不乏其人；有一段时间，女性不仅留着短发，还有的人剪了像男人一样紧贴头皮的平头。时髦女郎们普遍戴着小巧的钟形帽，将一头短发包裹起来，于是生产女帽面料也和生产发网、发卡、棉织品、毛织品和紧身胸衣一样，成为行情萧条的行业。

但是，战后十年却为另一个行业带来了不错的新利润增长点。化妆品厂商和美容院老板可没什么要埋怨的。1920年口红的风行曾经让年青一

代的父母惊慌失措，眼下在偏远的乡村也流行开去。在1920年，女性还认为化妆与伦理道德不符，不久便开始轻松自然地修饰容貌，堂堂正正地浓妆淡抹；大街小巷出现了美容院，包括做面部美容，给头发抹发蜡，用紧肤水除皱，提拉松弛的下颌，修眉描眉，让女性焕发年轻的光彩；还有一种名为“整容”的新奇的外科手术，如今已经开始普遍应用。据弗朗西斯·费舍·杜别克（Frances Fisher Dubuc）称，在1917年，美容行业仅有两个人缴纳个人所得税，而到了1927年，这个行业竟然有1.8万家个人和公司缴纳所得税款。美容师这个职业便顺应时代而生长起来。

战后十年结束时，关于美国女性在化妆品和美容方面的消费，我们不妨看一下保罗·尼斯托姆教授的保守估计。他在1930年粗略计算这笔惊人的支出高达7.5亿美元，其他人的预计则高达20亿美元。1929年，克里斯蒂娜·弗雷德里克（Christine Frederick）以图表的形式列出了另一组同样惊人的数据：一位美国成年女性每年购买的蜜粉重达1磅，使用的口红至少要8盒；市场上有2500种品牌的香水和1500种品牌的面霜；如果把美国每年售卖的口红头尾相连，竟然能从纽约到达内华达州的雷诺，把这座离婚城市当成终点还真是合乎逻辑。

只要把一份观念守旧的刊物在20年代初期与末期的广告相对比，就能看出公众对化妆品的态度所发生的变化。1919年6月，《妇女家庭杂志》里刊登四则口红广告，只有一则提到了口红的成分。那则广告词是这样说的：“难以察觉般的体验。”当时，在这本杂志的读者圈子里，涂口红的女性都希望掩饰化妆的痕迹。（1919年，爽身粉广告通常是这幅画面：母亲弯下腰，凝视着活泼的婴儿。）到了十年之后的1929年6月，这本杂志上的口红广告词写道：“极具诱惑的鲜红色泽，能持续数小时之久，让你感受舒适。”（顺便说一句，仔细观察这两本杂志，还有另一个鲜明的

从大繁荣 到大萧条

对比：1919年李施德林漱口水的广告简单直接：“马上使用李施德林漱口水，可以预防小毛病变成牙龈感染。”而到了1929年，广告词竟然是以伤感的诗句开头：“春天啊！为所有人而来，只有她……”）

时尚圈也在发生着一些变化——包括短袖、如少年般的身材、低腰修身长裙、堂而皇之地使用化妆品，都是美国女性理想形象有所转变的标志。（与此同时，也成了男性心目中理想的女性形象。）女性充分享受着工作与生活的自由，将她们身上的枷锁全都摆脱掉。到现在为止，她们都在过着一种毫无目标的日子。但是，她们追求的并不是从男人中脱离与从对男性的欲望中解脱的自由，这种自由让早期支持妇女参政的女性戴上硬草帽，穿上男式西装，脚上穿着低跟鞋。20世纪20年代的美国女性希望自己随时随地都能够吸引男人的注意，不论在高尔夫球场还是在办公室里。身材娇小的时尚女子留着短发，戴着容易收拾的小帽子，穿着灯笼裤度过一个美好的周末，随时随地都会穿着长筒丝袜和高跟鞋。战后女性的理想形象既不是丰满，也不是聪明，更不是优雅；恰恰相反，当时理想的女性要有纤瘦的身材、扁平的胸部，穿着时髦的短裙（穿上短裙看起来就像小女孩），孩子气的低腰装束。不论是不是有意而为之，这些迹象都表明，20年代美国女性所向往的不仅仅是青春，而且还有青春无邪。她们希望成为男性轻松舒服的陪伴者，男人们正好也有同样的想法。她们不想做只知道生孩子的肥胖母亲，而是要做不必承担责任的粉红佳人。她们拥有年轻的特性，但又有早熟的内在：她们仿效的是麻辣高冷的青春，心里考虑的不是浪漫爱情，而是性冲动；她们的魅力不是靠着婉转内敛得来的，而是靠坦率直接。实际上，在战后十年间，美国女性会提醒男性：“你感到疲惫不堪、梦想破灭，你不需一个家庭的关爱，也不需要成熟的伴侣，你只需要尽情享受刺激的游戏，处处留情，我会给你带来一切。”她接着

喃喃自语：“而我会得到自由。”

四

这场革命的一个标志是，女性在追求自由的过程中迅速地接纳了香烟这一事物。短短几年间，美国数百万各年龄段的女性，都效仿1920年的时髦女郎当起了烟民。当时的风俗依然不赞成女性在公共场所和办公室里吸烟，福音派教会主导的美国内陆还保留着以前的忌讳。无论是酒餐厅、舞厅还是剧院，到处都有人在怨声载道。让我们用广告变化的趋势来对公众舆论的走向做个判断。战后十年的初期，广告商非常明白描绘妇女吸烟的场景简直是自找没趣；但几年后，就有了美丽的女子央求男人吐个烟圈的招牌画；到了战后十年的最后一段时期，广告上公然出现了手里拿着香烟的摩登女郎，尽管乡村的读者纷纷提出抗议，有些杂志还是刊登了烟草商的宣言：“而今的女士可以像她们的丈夫兄弟一样享受香烟的一番美意。”从1918年到1928年的十年间，美国香烟总产量增加一倍以上。香烟产量的增加，一方面是因为美国男性曾经认为香烟没有男人味儿，而随着雪茄、烟丝和口嚼烟草的产量下降，这种偏见已经不见踪迹；另一方面是因为香烟非常方便，也会让男性烟民消费比过去吸雪茄和烟斗时所用的更多烟草。而如此之大的烟草产量的增长，也离不开如今的女性在餐桌旁轻弹烟灰。轻吐烟雾不再是男人独有的特权，百货公司不得不在女鞋柜台的椅子中间放上了精致的烟灰缸。男女之间的鸿沟已经被彻底填平。比如说，正式晚宴后依然按惯例将男女宾客分开，这套规矩如今毫无意义。主人家按常规为男客送上雪茄，却总是被人冷落；餐厅里的男士和客厅里的女士吸的正是同一个牌子的香烟。

然而，男女一起喝酒这件事则有着更大的社会意义。在有钱人家，

从大繁荣 到大萧条

宴会前供应鸡尾酒几乎已经成为社交规则。各方人士纷纷涌入低垂着帘幕的地下酒吧，随口说出具有神秘感的暗号，女孩子和男人一样站在吧台前面，一只脚跷在铜制的栏杆上。傍晚时分的鸡尾酒会显然成了美国社会的新风尚。酒店里举行的舞会，渐渐形成了一种非常丢脸的奇特习俗，那就是租个酒店的客房，偷偷摸摸地喝酒享受而已；男女宾客懒散地躺在床上，把杯中掺杂在一起的酒一饮而尽。随着住宅和公寓越来越小，乡村俱乐部成了小城市、郊区和避暑胜地的社交中心；一到周六晚上，刚在别人家里喝过一顿鸡尾酒的红男绿女，驱车赶往极具名气的俱乐部，参加每周一次的舞会。桌子上摆满了一瓶瓶伏特加和姜汁汽水，男士们从裤子后面的口袋拿出装着杜松子酒的小酒瓶（杜松子酒曾经遭到调酒师的鄙视和抵制，如今倒成了最受欢迎的酒水），女士们和男人一样痛饮几杯，在纷乱喧嚣中放松精神，如果几年前她们一想到自己会像如今这样被酒精深深地影响，不禁会颤抖一下。第二天就传出了流言蜚语，说某太太昨晚11点钟从宴会中消失，是因为喝了太多的鸡尾酒，跑到化妆间大吐了一顿；还有人砸坏了俱乐部的东西要赔偿损失；某夫人本不该喝得这么厉害，她刚喝了三杯鸡尾酒，就在桌子上扔起面包来。舞会上也闹出了不少丑闻，许多已婚男子绊倒服务生供自己开心，陶醉于隐秘约会的小伙子来到高尔夫球场，开着车从第十八洞的草坪上径直压了过去。

这些事情自然都是例外，许多社区里根本没有发生过这种事。虽说习惯喝酒的人不肯承认这种可能性，但禁酒令的确大大降低了全美饮酒的总人数，工业地区喝酒的工人人数更是明显减少。阅历丰富的大学管理人员多半认为，喝酒的男大学生比禁酒令颁布前少了不少，这一点倒是让有些学生烦躁不安；住校女学生的喝酒行为，起码还算不上难缠的问题。尽管如此，事实上，在制定全美社会行为准则的富裕阶层里，高度酒的流动比

以往更加自由。至少可以这样讲，此时人们的无拘无束，简直是到了史无前例的程度。

高度酒的灌溉也让男女之间变得更加开放。由于科学怀疑论的传播，尤其是弗洛伊德学说的流行，保守派道德家恪守的教义日渐衰落，以坦然面对性爱事实来实现救赎的信仰逐渐占了上风。价值观发生了非常大的变化，谦虚谨慎、寡言少语和英勇仗义都不再流行于世；女性既不想当“优雅的淑女”，也不指望她们的女儿“性格健全”；人们普遍认为，旧式淑女完全是种假象，性格健全的姑娘不过是压抑了肮脏的思想，肯定不会有好的结果。

“维多利亚式”和“清教徒”都成了一种羞耻：在时尚的人们的想象中，维多利亚式的女性都是套着裙撑、内心阴郁的老太太，清教徒恪守清规戒律、满腹怨气，专门败坏人的兴致。还是变得时尚些好，人人都想赶时髦，显得自己精于世故、绝顶聪明、打破常规、个性爽利。等你手里拿着鸡尾酒的时候，说起话来就痛快极了。

1927年，玛丽·艾格尼丝·汉密尔顿（Mary Agnes Hamilton）这样写道：“当你侧耳倾听一段现代的对话，会感到特别惊讶：首先，人们使用越来越贫乏的词汇；其次，有些词语出现的频率特别高，按照过去的说法，上流社会的女人是不会从口中说出这样的话的。”人们迷上了高度酒，也爱上了粗鄙的话语。每逢和同伴品尝美味的晚餐时，必然要做一番对比，从前说的“豪华”和“了不起”如今变成了“真是太讨厌了”。纽约舞台上出人意料地说出“该死”“见鬼”这样的粗话，观众们也不会因感到震惊而大笑着嘲讽他，因为这些已然成了人们的平常话。从前酒吧间里讲述的趣闻逸事，如今在富贵人家的桥牌桌上流行起来。大家既想表现得无动于衷，还想流露出一丝惊讶，因此人们对言论的大胆程度讨论了好

从大繁荣 到大萧条

一阵子，正如汉密尔顿夫人写的那样，上流社会的谈话就像是猩红华美的厅堂——浮夸不断、尖叫刺耳、无聊透顶。

随着人们开始口无遮拦，书籍和戏剧也越发大胆直白。比如说，战后十年纽约推出的几部名剧的主题：《光荣何价》讲述了海军士兵的凄美爱恋，他们的谈话夹杂着俚语，这在舞台上还是头一回出现；《罗马之路》有几分诙谐，剧中的罗马女子希望和迦太基人一起私奔；《奇妙的插曲》描写了妻子发现丈夫的家族患有精神病，却想给他生个孩子，于是和英俊潇洒的年轻医生约定好偷偷产下孩子，不想自己竟然爱上了这位医生；

《奇耻大辱》中，青春美丽的女主角过着没有忧愁的生活，让人奇怪的是她竟然与歌剧演员有了一夜情；《迷惑》这部戏让数以千计的无辜观众得知，世上居然还存在着同性恋。在战后十年之前的岁月里，即使纽约城里也不能接受这样的戏剧；可到了20年代，这些剧目不仅大受欢迎，还得到了聪明观众的真挚认可。下面这个故事，足以证明这些戏剧对观众产生的影响——有位慈祥稳重的老太太，在看了两次《光荣何价》后，竟然这样训斥自己的孙子：“该死的！乔尼，快坐好！”

战后十年出版的小说也是如此；无论是《尤尔根》、《暗笑》、迈克尔·阿伦的小说，还是《美国悲剧》《太阳照常升起》《孤独之井》和《针锋相对》，这些小说对于男女之情的处理，不是开放赤裸，就是放荡不羁，要么将伦理道德弃之如敝屣，这对英语国家来说非常新鲜。

清教徒、卫道士们则竭尽全力阻挡这股浪潮，但已无力回天。他们查禁了《尤尔根》，反而让这部小说成了畅销书，作者从此一炮走红。他们把玛丽·威尔·丹尼特（Mary Ware Dennett）推上法庭，因为她向孩子们分发解释两性奥秘的小册子，不料她获得了有着自由观念的法官的支持，得到了开明的公众舆论的认可。在波士顿，他们获得了顽固不化的清

教主义和罗马天主教会的双重支持，查禁了批发的书籍，禁止舞台上演出《奇妙的插曲》，宣判出售《查泰莱夫人的情人》的书商有罪，不曾想遭到了全国知识分子的讽刺，到头来被迫同意这些10年前本可以下令禁止的书籍可以出版。尽管他们使出了能用的一切手段，美国人依然迫切需要一种新读物。

早在战后十年的初期，有位颇有威望的评论家写了篇文章，认为怀孕生产过程对很多妇女来说是令人羞愧。她把这篇文章交给一本优秀杂志的编辑审查，结果两人都认为不应该出版：看看这篇文章的主题会让许多读者有反感情绪，会把他们吓得够呛。仅仅几年以后，到了1927年，这位编辑想起了这份手稿，于是询问能否再审一审。他看过之后非常不理解，当时为什么没有把这篇稿子刊登出来。文章的坦率笔法如今看来十分自然、恰到好处。这篇文章顺利刊出了，但并没有引起很大的反响。

倘若在1918年，知名杂志的编辑审阅稿件时，看到有个无赖对着另一个家伙说：“看在上帝的分上，乔，赶紧踩油门，埃迪被那几个狗娘养的杂种干掉了。”他会当即拿出蓝色铅笔，把对话进行如此修改：“看在迈克的面子上，乔，赶紧踩油门，那几个坏蛋把埃迪杀了。”到了1929年，最负盛名的杂志看到小说里有这种句子，也会原封不动地登出来。有些读者会提出抗议，但是人数屈指可数。随着时代的发展，即使是发行量很大的，在乡间卫理公会的大本营拥有大批信徒的畅销期刊，文章标准的变化也非常明显。20世纪20年代末，有位短篇小说家这样说道：“当我只想挣点钱而构思出能登大雅之堂的精彩小说，就寄给《星期六晚邮报》和《画报》，当我写出尖锐真实的故事，就寄给《哈泼斯杂志》和《斯克里布纳杂志》。如今我发现，我也可以把真实的故事卖给流行杂志。”

从大繁荣 到大萧条

五

随着礼节的变化，道德意识也必然发生变化。小小年纪的孩子们就对男女之事非常了解，通过下面事例作为证明：《中心镇》的作者询问了241名高中男生和315名女生，要求根据他们自己的看法来判断对错，面对“十分之九的高中学生都参加过爱抚晚会”这句话，几乎有一半学生认为是正确的。这些年轻人究竟有过多少亲热举动，当然不得而知，但是林赛法官讲了几个让人震惊的故事：有些姑娘的小手提包里随时装着安全套；有位名为凯瑟琳的女孩告诉法官，她认识的58个姑娘都有过一次以上的性经验，但是没有一个怀孕的，这恰好印证了很多市井流言。在那10年里，卖淫行为究竟是增加还是减少还不是很清楚；但可以肯定一点，娼妓头一次面对大量良家妇女的“行业”竞争。

至于已婚夫妻的婚外情数量，并没有可信的数据，而男女间的感情是否和谐，是统计学家也测算不出来的。不过，离婚率却在稳步增长：在1910年，每100对夫妻中有8.8对离婚；1920年为13.4对；到了1928年增加到16.5对，几乎每3对夫妻里便有1对选择了离婚。离婚所带来的羞耻感也相应减少。在城市社区，离婚男女已经被社会接纳，这一点毫无疑问；事实上，人们谈到离婚人士时，常常带着一丝不可思议的神态，认为他们行事大胆，终于实现了愿望。有个纽约女孩说道，她决定嫁给亨利，虽说自己并不喜欢他，就算两人相处不好，她也可以选择离婚，“就算做个离婚女人也比当老处女要有意思得多”。战后十年间，可能很多年轻姑娘都会这么想。

——在战后十年的前几年，爱抚晚会还只是十几岁到一二十几岁的青年男女的集会，不久也出现在中年男女中：在酒店客房里举行的舞会上，人们推杯换盏，在乡村俱乐部的周六晚宴上，乐手放下了手中的萨克斯，风流

浪荡的男子和已有子女的少妇此时开始品味着原始本能冲动。有人开始听说，聪明伶俐、出身良好的女孩子早在婚前就和男伴一起欢度周末，对她们未来的丈夫也坦然告之，而且获得了谅解，对方还表示没什么不好原谅的；这些男人觉得，有点经验对女孩子来说也不错。数百万人都接受了早年一位浪荡公子哥的说法，他认为，所谓道德的最佳状态“不过是一套标准而已，把标准降低就行了”。

当然，我们很容易把各种情况拿来做一番比较，到了战后十年的末期，依然有许多男女的行为，和基督教青年会领袖希望的相统一。有两位在报纸专栏上帮人解决感情矛盾的女士证实，从大量的读者信件来看，美国年轻人感到最困扰的问题，并不是向男朋友吐露私生子的难言之隐，而是下面这些问题：假如男朋友不请自来，在门廊前邀请他看电影是否合适；聚会上的蛋糕能不能用刀切开。在美国内陆地区，人们对男女之事依然有不少传统的感想，就像妇女联合会口号说的那样，“男性是上帝栽下的树，女性是树上开放的花”。有人处心积虑地用法律来阻止道德观念变化的趋势，1925年，阿肯色州诺菲尔特通过了一项法令，其中：

第一条从今以后在上文提及的城市范围内的任何地方，任何男女，无论男性或女性，发生性生行为都认定有罪，属于非法行为。

第二条本条例的第一条不适用于已婚男女之间，除非夫妻双方出现了极不合适和淫荡的举动的。

尽管如此，两性关系和家庭婚姻的伦理，却明显快速地偏离了美国往日的道德准则，这个国家出现了全新的理念：人们觉得过于看重贞操和忠诚的美德的崇高性，赞同伯兰特·罗素（Bertrand Russell）夫人提倡的“男女共同分享权利，自由体会性经历”的观点，无论是未婚女孩，还是已婚夫妻，都没必要将这种权利拒之门外。这种看法蔓延到各处，获得

从大繁荣 到大萧条

了公众的认可。1927年林赛法官提议，在合法的基础上建立“伙伴式婚姻”。他希望把计划生育合法化（尽管节育行为依然非法，但是除了愚昧无知的阶层，当时许多夫妻都普遍施行节育措施，对此深以为然）；倘若两个人没有孩子，经过夫妻双方的协商，可以随时选择离婚，结束这段合法婚姻。他的提议让公众大为诧异，招来了广泛的严厉批判；但是这件事引起的激烈争论表明，往日的道德准则已经受到了质疑。这场道德教化的革命正在势不可当地进行着。

六

然而，在这个革命的时代生存下去并不容易。打破旧的规则容易，树立新的准则却很困难，与此同时，人们注定要多少经历一些重担、泪水与天不遂人愿。他们对从小受的教诲倒背如流：女性吸烟喝酒不符合道德，在餐桌上讨论风流韵事简直是不要脸面，女孩子默许男人厚着脸皮地奉承更是不能想象。小时候受的教诲不可能在短短的一刹那间忘得一干二净。让人们的脑筋转过来，花的时间总比煮鸡蛋要长得多。有些倡导新自由的人，以为人们的思维习惯会在一夜间发生改变，倘若你让情爱的私密性暴露在光天化日下，人们就能为所欲为，社会就能进入原始状态，像南太平洋偏远小岛上的居民一样淳朴。可这是肯定做不到的。等你把情爱私密性公之于众，保守人家的儿女头一件做的事情，就是直勾勾地盯着你看，除了对你特别崇拜之外，把其他的事情都抛到了脑后。如果你让每个人都为所欲为，他也许会到处惹麻烦。战后十年间人们打破旧规则，过不了多久他就会发现，到处惹事终究不是幸福长久的关键。

这场革命最为明确的后果，就是人们普遍沉迷于性爱之中。留神倾听那些人家规规矩矩的儿女的谈话，你也许还记得，有位父亲说他的女儿经

常聊得话题很宽泛，事实上，她从来不谈其他的事情。当时公众对各种问题的态度都流露出这种倾向。举个简单的例子，在这个时期，人们反对女子学院的理由非常前卫，既与课程的设置无关，也与女毕业生的学术前途无关，而是和女同学一起上四年大学，女性的性生活可能会受到影响。美国公众的阅读品位也表现得淋漓尽致：且不说色情杂志和通俗小报，以及报纸上每天用整版刊登布朗宁老爹和桃子夫人这样鲜活生动的绯闻，仅从一点来说，在战后知识分子中获得高度评价的小说家，几乎都和审查机构意见大相径庭，普利策奖评审委员会甚至有段时间很难满足获奖标准的要求，因为评选获奖小说的标准是“表现美国生活的健全基调，体现美国道德素养和人性的最高标准”，最终评审委员会不得已修改了其中的词汇，把“健全”换成了“整体”，删去了“最高标准”这样的字眼。那些精彩绝伦的小说，几乎不能在体现“健康基调”的同时，还有进行了一番有回旋余地的说明，自认为思想前卫的读者压根不要阅读这种书。合乎他们心意的是英国作家阿道司·赫胥黎（Aldous Huxley）笔下荒淫无度的红男绿女，迈克尔·阿伦描写的堕落的荒唐经历，欧内斯特·海明威（Ernest Hemingway）书中那位纵欲而酗酒的女主角布莱特·阿什利，安妮塔·鲁斯（Anita Loos）写的那一幕两位情妇和绅士男友上演的喜剧，以及拉德克里夫·霍尔（Radclyffe Hall）所塑造的同性恋故事。几年前还站在激进主义经济原则和政治信念一边的青年男女，如今又来支持全新的道德观，这种话题比比皆是，在人们的心里不断萦绕。性成了世人所聚焦的那个靶标，老实人家的孩子也没办法移开自己的视线。

这场革命的另一结局是，人们的教养不仅与过去完全不同，在今后几年也毫无规矩可言。战后十年间发生的事情并不是单纯的巧合，甚至在小型宴会上，女主人也会发现，不必在告诉来宾们宴会开始和结束的时间

从大繁荣 到大萧条

这件事上费心；舞会上的不速之客已经得到公众的认同；成百上千的男女都声称，参加宴会的时候千万别提前半个小时到，免得让人家以为自己没见过世面；去乡间别墅参加宴会的时髦女郎和浪荡公子哥儿，随手就把点燃的香烟摁灭在桃花心木桌子上，随意将烟灰弹在地毯上，把门廊脚垫扔到小船里，任凭风吹日晒，到最后连一句道歉的话都不说；按照老话说，有些人出身高贵，自以为温文尔雅，不料几杯鸡尾酒下肚，就大吵大闹，把一场晚宴闹得不得安宁，根本没有意识到这般寻常的喧嚣与吵闹，不见得是回归希腊式的美好生活的标志。也许有一天，战后的这十年会被人贴切地称为“缺少教养的十年”。

人们把道德准则丢到九霄云外，用别的东西来代替，想要不带任何困惑和苦闷也并不容易。有人宣称，已婚夫妻应该按照自己的喜好，有寻找新奇刺激的性经历的自由，婚姻和这种随心所欲的行为没有什么关系；有些男女从小就心怀浪漫婚姻的理想，等到他们在现实生活中面对不忠行为的时候，就是另一回事了。林赛法官曾经讲过一个故事，有个女人打定主意让丈夫去爱他喜欢的人，她会表现得很开明，不会为此看不起他。但是等她见到那个丈夫所喜欢的女人时，竟然觉得非常恶心。她恍然大悟，自己的无动于衷不过是刻意为之的假象。在这场道德革命里，很多人都和她有同样的感受。在冷冰冰的离婚率数据背后有很多真实案例，夫妻双方都在体验着这种新式自由，却猛然发现其中暗藏危机，随时会破坏夫妻之间的信任和尊重，如果没有相互信任和尊重，即使是为了孩子的缘故，两人的婚姻也完全不能维持下去。

随着幻想破灭，新的道德准则应运而生，尽管新卫道士们不断地鼓吹，对进入一个新时代议论纷纷，但幻想破灭的阴影仍挥之不去。如果说这10年缺乏教养，人们过得也并不幸福。往日让生活丰富充实、富有意

义的那套价值观已经消逝，建立另一套价值观取而代之并不容易。如果失去了道德，该拿什么来替代呢？有些新时代的先知认为是“荣誉”：“你做什么都并不重要，只要你坦诚相告。”这种勇敢的理想并不能让人完全满意；这个词界限模糊又过于严格，很难实现。如果浪漫的爱情不复存在，该拿什么来代替它呢？难道是性吗？约瑟夫·伍德·克鲁奇（Joseph Wood Krutch）解释道：“如果爱情不再是罪过，那它也不再是至高无上的权利。”沃尔特·李普曼（Walter Lippmann）在《道德序论》里引用了克鲁奇的话，接着补充道：“倘若你从一开始就相信，爱情只是片刻的欢愉，当爱情给你带来短暂的欢乐时，你还会感到诧异吗？”单纯对性的追求不过是空虚徒劳，不幸的是，小说《太阳照常升起》中的布莱特·阿什利夫人和她的朋友注定要落得竹篮打水一场空的结局。

当然，在战后十年里，像布莱特·阿什利那样的美国人并不多。但有数百万的美国人同样感到希望破灭，因而无比痛苦。由于他们曾经形成的价值观已经遭到破坏，他们不能承受没有价值观的生活状态。一切看来都毫无意义，不足挂齿。至少人们能痛饮几杯，从感情发泄中获得乐趣，把这个坍塌的世界忘到脑后。随着萨克斯奏出轻柔的旋律，杜松子酒瓶在人们手里来回传递着，跳舞的人醉眼朦胧，转了一圈又一圈。外面的世界如此残酷，如此疯狂，暂且束之高阁吧！

建立新的社会规则还需要一段时间。等到战后十年快结束的时候，才显露出一些迹象，革命者再次学会如何舒服地生活在自己的世界里，摆脱了对性爱的沉迷，从感情上适应习惯和标准的改变。在这个新时代里，发现在旧日教条的废墟里，过着更加自由坦率的生活，也是一种长久的生活乐趣。

FROM GREAT
P R O S P E R I T Y
TO GREAT DEPRESSION

第六章 哈定总统与丑闻

在沃伦·甘梅利尔·哈定担任俄亥俄州参议员之前，以及其担任参议员期间，直至他去世为止，我一直担任他的私人律师。

在哈定当选总统前和去世后，我在数年时间里担任哈定夫人的私人律师。

我一直担任俄亥俄州华盛顿法院大厦米德兰国民银行，以及我弟弟马尔·多尔蒂的代理律师。

与此同时，在哈定担任总统期间，我一直担任美国司法部部长。

哈定总统去世后，我也曾在柯立芝政府中担任过一段时间的司法部部长。

作为具有上述律师、私人朋友和司法部部长等头衔的人，我和上述具有最重要身份的人有着更为隐秘以及专业性的关系。

我拒绝出庭做证和回答问题，理由如下：

我做出的回答和出庭后所提供的证词可能会认定我有罪。

——1926年3月31日，撒切尔法官要求哈里·多尔蒂为联邦大陪审团提供信息，他的书面回答全文如上（标点符号有改动）。

1921年3月4日早晨，这是个明亮的清晨，空气清新，朝雾迷离，华盛顿上空的国旗随风飘扬，病重体弱、佝偻着后背的伍德罗·威尔逊缓缓走出白宫大门，坐上了停在门口的汽车，沿着宾夕法尼亚大道驶往国会大厦。他旁边坐着的正是新当选的总统。而后威尔逊回到S大街那座远离尘嚣的私人宅邸。沃伦·甘梅利尔·哈定宣誓就职，成为美利坚合众国总统，正常化的统治时期从此开始。

1921年3月4日，这个冷冰冰的日子对你有什么意义？让我们回顾一下，看看那天我们的周围的情形。

战争已经结束两年多的时间了，由于参议院否决了《凡尔赛和约》的议案，伍德罗·威尔逊又坚持向宾夕法尼亚大道另一头国会山的上流人士毫不妥协，德国和美国依然互相仇视。到了1920年的年中，一直繁荣发展的商业慢慢萧条，导致物价水平下降，此前持续走高的生活成本曾经引发公众不满。虽然超级爱国者依然狂热，但红色大恐慌逐渐退去，而此时塞耶法官还没有对萨科和万泽蒂作出终审判决。三K党拥有了几十万成员。宪法第十八条修正案的实施进入了第二年，私酒贩子们变得雄心勃勃。时髦女郎的恶行将全国搅得鸡犬不宁，恰好在此时，费城设计出了“道德长袍”，《文学文摘》刊登了这样的专题：《年青一代是否快要垮掉？》。此时美国的第一家广播电台才成立四个月，收音机的风潮还没有到来。女性身上的裙子遮住了一半小腿，看上去还会越来越短。犯罪委员会正在对芝加哥的犯罪潮进行调查。兰迪斯法官获得了“棒球沙皇”的美誉。

邓普希和卡彭铁尔签订了协议，第二年夏天将在波伊尔三十英亩园展开对决。《大街》和《世界史纲》成了当时最畅销的书籍。

从大繁荣 到大萧条

整个国家在精神上疲惫不已。公众对于战争的喧嚣场景和红色大恐慌所造成的紧张局势产生了厌倦情绪，他们只希望平静下来、治愈伤口。威尔逊那套美国担负人类义务的说辞让他们的耳朵生茧，对政治理想不关心，只希望政府对自己的生活少加干涉，有机会处理私人事务，把公共事务抛到九霄云外。在字典里或许没有“正常”（normalcy）这个词，但是他们只想一切归于正常。

华盛顿的每一届新政府上任之初都充满期待与善意的气氛，此次笼罩在首都上空的气氛特别和谐。新任总统的笑容，像让人不快的寒冬过后所到来的春天一般温暖。在四年里，白宫紧锁大门，并命卫兵们守卫此处。哈定当上总统后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打开大门，允许成群结队的游客在白宫游览，任由他们把鼻子紧贴在总统办公室的玻璃窗上往办公室里面瞧，在白宫高大的北门廊底下照相；廉价汽车和卡车从宾夕法尼亚大道前驶进白宫车道，从总统官邸前门扬长而去。这一举措仿佛象征着美国政府再次回归人民。威尔逊曾经被指责为独裁者，目中无人地不肯发表自己的意见；哈定则谦逊地表示，还要靠优秀人才对他多加点拨。他宣誓就职的时候，引用了《圣经·旧约·弥迦书》里的名言：“他向你所要的是什么呢？只要你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威尔逊似乎一直很爱干预商业事务，并不信任大多数的商人；哈定使商人们尽量不受管制，让他们“回到正路”上来。最后，威尔逊是位情感冷漠的空想学者，哈定却与人们亲如一家：他有着与世无争的好品格，无论是会见记者，还是接见白宫的访客，他都施以热情的握手和亲切的问候；他在白宫养了一条叫作小伙子的小狗，更是打动了美国人民感性的心。在哈定总统上任后不久，爱德华·劳瑞这样写道：“时下华盛顿的氛围，犹如旧时老友相聚或大学同窗重逢。这种变化多么神奇啊。民众咧着嘴笑容满面。”看上去美好的新时

代已到来。

沃伦·哈定有两笔巨大的财富，这是非常明显的。首先，他的外貌具备美国总统应有的气质。哈定是位英俊潇洒的美男子，他的面容表情与言谈举止拥有华盛顿人的高贵和尊严，他的眼睛看起来慈祥和蔼。他非常上镜，登在报纸上的照片为他赢得了民众的拥戴和敬重。其次，他在美国历任总统中最为和善。他仿佛爱着每个人，想对所有人示好，让人们都满意。他的亲切感并不是冷酷的政客所伪装出来的假象，而是真挚透明、令人感动的。在战争期间，他首次会见赫伯特·胡佛时说道：“老兄，我能帮你做什么？”他的本意也确实如此。如今他当上了总统，自然想帮助那些来自马里恩和竞选总部的朋友邻居们，还有与之邻的美国民众。

起初，他的缺点并没有显现出来，然而不幸的是，这些缺点确实存在。正如威廉·艾伦·怀特所说，除了关于政治经验的有限范围以外，哈定几乎一无所知，简直令人难以置信。他的头脑不够清醒，思想浑噩无比。他发表公开演讲时磕磕巴巴，言辞夸张低级（“不介入”欧洲事务，“固守”条约），经常搞不清楚字尾——把常态（normality）说成“normalcy”，把婚约（betrothal）说成了“betrothment”。每当遇到政治问题时，这些缺陷更是一目了然，仅凭好脾气哪能应付得了这些问题？他对此总是显得无计可施。怀特说起哈定在任时的一个笑话：哈定认真聆听顾问争吵了一整天的税收问题，他回头走进秘书的办公室，放开嗓子叫嚷道：“约翰，这个该死的税收问题，我一点也听不懂。我听了这一方的意见，他们说的好像挺正确的。我的天！接着我跟另一方谈了谈，他们说的似乎也没错，我被忽悠了一圈又回到了原地。我心里明白，肯定有本书能让我知道真相，可是你瞧，我没办法读到那本书。我还知道，肯定有位经济学家知道真相，可我不知道该到哪儿去找他，就算我找到了他，

从大繁荣 到大萧条

我也没办法了解他、相信他。天啊！这叫什么工作！”他本人无法发现问题的本质，对其整体权衡，只好完全依赖头脑机灵的下属和好友。

倘若哈定在选择朋友和顾问方面慧眼独具的话，可能一切顺利。料他向来眼神不怎么好使。他安排查尔斯·埃文斯·休斯、赫伯特·胡佛和德鲁·梅隆（Andrew Mellon）进入内阁任职，只是因为他隐约感觉到，这人能让本届政府的政治家拥有足够的分量，不过他照猫画虎，相继任命了多尔蒂、福尔和福布斯等人。至于什么人能做得来什么样的工作，他根本无从知晓。哈定仿佛是慷慨的圣诞老人，像分发糖果一样，随意摊派政府官职。最先受益的就是马里恩的那帮兄弟。哈定让自己的姐夫担任监狱总长，挑了索亚（Sawyer）医生做自己的私人医生，这位马里恩索亚疗养院的名医竟然获得了白宫任命的准将军衔，还被委派研究政府卫生部门的协调工作。至于财政部货币监理署署长的位置，哈定委派来自马里恩的克瑞辛格（D. R. Crissiger）律师担任，这个人的银行管理经验实在有限，他只在马里恩当了几个月的国民城市银行信托公司总裁。

哈定似乎分不出正直与卑鄙有什么区别。他在唯利是图、追求实效的俄亥俄州政坛磨炼了多年。数年以来，在哈定那副一本正经的假面具后面，隐藏的是俄亥俄州的说客、毒贩和特权买办，他们言必称自己的“商业定律”，做着现成的“小生意”，这帮人和马里恩的哥们儿一样跟他来到了华盛顿。有些人占据了权倾一时的要职，另一些人对有权有势的职位垂涎不已。哈定熟悉这帮人的德性，偏爱这帮他旧时好友，急于让他们分享自己的好运，却稀里糊涂地忽略了这个问题。倘若他花上一分钟，等他想到清楚而公正地对待它时，却为时已晚。他喜欢偷偷溜出白宫赶往H大街的官邸，那里聚集着俄亥俄帮和熟人密友。大家觥筹交错，丝毫不理会禁酒令的约束。人们可以在牌桌上豪赌一番，把国家大事抛到脑后。如今

最轻松的做法并不是对这帮人到底做了什么，而是希望他们收敛一下自己的贪污行为，谨慎行事，不要捅什么篓子，让哈定下不来台。

哈定怎么会结交这样的朋友？事实上，在他风度翩翩的外表下，不过是个平凡无奇的小镇男人，一个“普通的血肉之躯”。他这种人最喜欢做的事，无外乎解开马甲的纽扣，嘴里叼着雪茄，手边放着足够多的啤酒冰块，和老朋友聚在小酒馆里，在周末晚上消磨时间。哈定的私生活里还有一段婚外情：哈定的情妇南·布里顿（Nan Britton）写了一本自传，宣称在哈定当选总统前一年为他生下私生女，而且哈定一直在抚养这个孩子。这桩不知廉耻的丑闻着实令人震惊：两人幽会的地点包括肮脏不堪的旅馆、参议院办公大楼（南·布里顿确信，两人就是在那里怀上了孩子），甚至还有白宫总统办公室的衣帽间。（人们对《总统的女儿》这个故事的真相持怀疑态度，但是想象出这么多龌龊的经历所组成的自传体小说，难道是件容易的事吗？）通过南·布里顿对哈定个性略有失当的描述，人们能清楚地看穿这个男人的平凡本质：他的口头禅是“哎，小宝贝”和“嗨，亲爱的”这样的俗话；他在火车上打牌竟然被赌棍骗走了100美元；他和南在百老汇一家旅馆幽会时，被闯进来的探员们抓个正着，他还自以为是地保证两人不会遭到逮捕，因为将一位“赶往华盛顿途中为人民服务的”参议员拘禁起来是违法的。沃伦·哈定的夫人心怀远虑，费尽心机把他塑造成体面可敬的人物，让他拥有大笔资产。即使成了白宫主人，哈定在本质上依然属于俄亥俄帮的那帮下流货色。他在人群中鹤立鸡群，衣冠楚楚地穿梭于达官显贵中间，可只有待在H大街烟雾缭绕的宅子里，他才感到轻松自在。

哈定来到白宫后不久，华盛顿再次出现了一帮麦金利—福拉克式的实用主义政客。华盛顿的旅馆里到处可见衣冠不整的体面人，嘴里时不

从大繁荣 到大萧条

时地叼着雪茄，口袋里塞着成卷的百元大钞。一时间风言风语四起，据传你只要和能干的人商量好，马上就可以和政府做生意。石油大亨对此朝思暮想；他们在芝加哥的会议上为提名哈定当上候选人卖力游说，哈定本人对这些胡言乱语自然不会当真，难道哈定政府的内政部长艾伯特·福尔还不肯施以青睐、放松条款，让他们开发国家资源吗？俄亥俄帮对着眼前的盛宴得意忘形：和联邦政府赋予他们的权势相比，他们在哥伦布市的贪污简直是不值一提。沃伦·哈定想帮忙做点什么，好啊，他肯定有帮忙的机会。

二

然而，普通民众却一无所知，对幕后发生的一切也毫不在意。他们的眼睛都盯在灯光璀璨的舞台上，哈定政府如今正在上演一幕开明卓越的好戏。

美国与德国迟迟未能实现两国和平，直到1921年3月2日总统才签署批准了一项决议。根据1921年通过的预算法案，美国自成立政府以来首次统一了财政预算。查尔斯·盖茨·道斯（Charles G. Dawes）担任预算办公室主任，他的言语十分生动，嘴里总是叼着烟斗，质问政府官员的办事效率时夸张地挥动着扫帚，凡此种种事迹让报纸读者看得入迷。由于实行配给制度，移民的数量受到了限制，工人们心满意足，那些觉得社会大熔炉小得让人失望的人也放松下来。国会提高了关税，表现出色的共和党国会就应该这样做。财政部长梅隆降低了对大笔收入征收的高额附加税，美国的金融巨头欢欣鼓舞；尽管国会中的农业集团和民主党人士联合起来，要求把最高附加税率维持在50%，但华尔街至少体会到了美国政府的一片好意。司法部部长多尔蒂向罢工的铁路工人颁布了禁令，这条禁令简直能和

前任部长米切尔·帕尔默的做法一较高低，使工会所有的敌人如愿以偿。

1923年1月，资助英国偿还美国战争债务的协定在华盛顿签订，随即得到参议院的批准。然而，限制军备的华盛顿会议毫无疑问地成为哈定政府取得的优异成绩，新闻界坚持把此次会议称为“军备会谈”。

自从开战以来，世界强国再次展开争夺霸权的军备竞赛。英国、美国和日本纷纷加快了建造军舰的步伐。由于太平洋的局势日趋紧张，各国之间的竞争对抗也不断加剧。在战争期间，日本抓住时机，乘势将自己的商业帝国进行扩张：日本的手已经占据了其他地区，日本就把中国作为自己的特殊势力范围，将中国当成自己的海外领土，在中国日本商界优先于其他国家拥有相应权利。通过和英国结盟，日本的势力越来越大。查尔斯·埃文斯·休斯担任国务卿后，开始维护美国在东方的权益，采取美国传统的门户开放政策，不久局面就显得相当麻烦。日本希望不受限制，美国表示强烈反对；如果两国爆发冲突，夹在中间的菲律宾显然会处于日本的掌控之中！英国、日本和美国如果能够在太平洋地区的争议问题上进行友好协商，用三方协议来取代日英同盟，限制各国舰队的扩张，三大强国都会从中捞到不少好处。波拉参议员提出召开国际会议，哈定和休斯听从了他的意见。于是，华盛顿会议在1921年11月12日召开，这一天恰好是美国无名英雄在阿灵顿公墓举行庄严葬礼的第二天，各国代表在华盛顿聚集在了一起。

会议召开的第一天，哈定总统的欢迎词热情洋溢，但略显拖沓。他严格地遵循了自己的“把棘手问题丢给富有才能的人去解决”这一原则，让国务卿休斯及其幕僚参与实际谈判。在这次会议上，他那套撒手不管的策略非常有效：休斯不仅聪明机智，还有一套明确的计划，能够巧妙地把握事关利害的复杂问题。哈定总统刚刚走出大陆会议纪念堂，身为会议主席

从大繁荣 到大萧条

的国务卿休斯就开始演讲。一开始大家以为不过是老套的欢迎词，然而接下来的事情让坐在会议长桌旁的代表们大为诧异，休斯当场就提出了一个具体详细的计划：实行长达十年的海军裁军期，在此期间，各国不能建造大型军舰；放弃一切无论是正在进行的还是准备实施的建造大型军舰的计划；英美日三国裁减建成和在建的军舰，这些舰艇的总吨位几乎达到200万吨；三国海军舰艇总吨位的比例为5:5:3，美国海军和英国海军比例相同，日本海军只有两者规模的五分之三。

代表们大气不敢喘一下，全场鸦雀无声。休斯国务卿总结上述发言：“如果各方接受这个计划，就可以摆脱为了实现海军军备竞赛需求而带来的负担。大量的资金将用于为文明进步提供帮助。与此同时，还能充分实现正当的国防需求，在十年的海军裁军期间，各国将有很多机会思考未来发展道路的方向。为防御性海战所做的准备应至此为止。”

这个直截了当而具体明确的计划产生了难以置信的影响。对于海军裁军期的提议，坐在记者中间的政治家威廉·詹宁斯·布莱恩（William Jennings Bryan）热烈欢呼起来，表达出他心中的热情。休斯的发言结束后，代表们报以长时间的掌声。全美国和全世界的新闻界都表达了相同的感受。休斯的计划想法大胆、符合实际又富有成效，激发了人们此次会议的必然成功的想象。

日本、英国和美国的代表经过三个月的谈判，签署了最终协议，基本上遵循了休斯计划的总体思路。美英法日签订的《四国条约》，规定各国互相尊重在太平洋区域内岛屿属地和岛屿领地的权利，所有争端应通过和解谈判来解决；为日本撤出山东半岛和西伯利亚铺平了道路；各方同意尊重中国的门户开放原则。各项条约如期得到了参议院的批准。条约消除了太平洋地区各种摩擦的直接根源。尽管批评人士会指出巡洋舰和潜艇的军

备竞赛并没有得到缓解，而战列舰已经不断被淘汰下去。但正如国务卿休斯所言，这份“海军条约”至少减轻了军备竞赛的负担，还开创了至关重要的先河。如今，国家的军备建设被看成是引起国际关注的事务，必须遵从国际协议。

表面上看来，沃伦·哈定似乎一帆风顺。他本人备受民众欢迎；他对商界的友好态度与美国保守派的想法完全相同。无论在什么地方，只要有两三位银行家、实业家聚在一起，就会称赞哈定政府的财政部长梅隆是“亚历山大·汉密尔顿（Alexander Hamilton）以来最伟大的财政部长”；商务部部长赫伯特·胡佛的贸易援助和他在比利时的救济工作一样极富成效；甚至连心灰意冷的理想主义者也得承认华盛顿会议所取得的巨大成果。尽管传出了风言风语，说有些政府部门贪污浪费、治理不严，退伍军人管理局局长名誉扫地，被迫辞职，还有人高声批评国会把油田租给了多赫尼和辛克莱两人，但这些事情并没有引来公众多大的兴趣。1923年的初夏，哈定前往阿拉斯加州，几乎没人注意到哈定政府的问题已经非常严重。他在返回华盛顿的路上病倒了，看起来是食物中毒，哈定到达旧金山时得了肺炎，全国民众急切地关注着每天的新闻头条。就在危险似乎已经度过去的时候，哈定于1923年8月2日突然离世。总统的医生认定他是中风发作，举国上下陷入了真诚深切的悲痛之中。

总统的遗体被安放在专列上，飞驰穿过美国大地，驶向华盛顿。在列车经过的路上，成千上万的男女老幼会聚在一起，目送火车快速通过。当火车经过西部山区时，牛仔们跳下马，摘掉帽子。途经一座座城市时，无数的哀悼者纷纷聚集在一起，导致火车不得不减慢速度，最后抵达华盛顿的时间比预定时间晚了几个小时。《纽约时报》的一个记者这样写道：“这是美国历史上对逝者极具拥护、尊重和崇敬最为显著的证明。”沃

从大繁荣 到大萧条

伦·哈定的遗体正式安放在华盛顿，此后运回马里恩安葬。继任总统宣布了公共哀悼日，商业机构停止营业。美国从南到北的各个地区举行了哀悼仪式，全国降半旗，高楼大厦都挂上了黑纱。

那一天，人们发表了难以统计的演讲，这不仅是流于程式的哀悼表达：大家都认为，这位充满活力的总统为了他们的利益呕心沥血，在为国效力的征途上像殉道者一样死去。民众把已故总统称为“如擎天巨石般屹立的伟人”，赞扬“他在精神上极具真知灼见”。纽约的曼宁（Manning）主教在圣约翰大教堂的哀悼仪式上发表讲话，给予那位逝去英雄应得的评价。他启齿欲语泪先流：“如果我能在他的纪念碑上写下一句话，那会是‘他教会我们亲如兄弟的力量有多么重要’。这是人们能给予我们最重要的教诲。这是基督教的精神所在。本着兄弟情谊和善良仁爱的精神，我们定能解决遇到的一切问题……愿上帝赐予我们的国家领袖忠诚、睿智和高尚的灵魂，像我们现在哀悼的这位总统一样。”

但事实上，至少对美国总统而言，有些问题不是单靠兄弟情谊和善良仁爱的精神就能解决的。比如说，你一直以兄弟相称的人，他们的所作所为会让你的政府陷入腐败的泥潭，你明知道这些丑闻掩盖不了多长时间，觉得毕生事业都要落个一败涂地的下场，你该怎么解决这些难题？这才是葬送了沃伦·哈定的根源。

直到作家塞缪尔·霍普金斯·亚当斯（Samuel Hopkins Adams）根据哈定政府背景创作的小说《狂欢》出版，总统服毒自杀的传闻才流传出来。司法部探员加斯顿·B·米恩斯（Gaston B. Means）是多尔蒂手下俄亥俄帮的成员，他在《哈定总统的离奇死亡》中描写得特别清楚：在索亚医生的纵容下，总统夫人把总统给毒死了。据米恩斯所说，谋杀的动机有两个：哈丁夫人发现了南·布里顿和那个私生女的事情，心里特别痛苦，

简直忌妒到歇斯底里的程度；她对哈定挚友的阴谋非常清楚，明白他们对哈定所施加的影响，觉得只有让他死去才能免受谩骂与侮辱。自杀的推测和米恩斯的说法都合乎情理。据说，总统是从阿拉斯加州返回的船上吃了螃蟹肉，导致了食物中毒。可是轮船食品间的供货单上根本没有螃蟹，参加总统宴会的人没有一个患病。此外，致命的“中风”发作的时候，总统的肺炎已经出现好转的趋势，显然当时只有哈定夫人陪在他旁边。医生们没有进行尸体解剖，就得到了这个结论，也不过是一面之词而已。不过，也没有必要让人们接受这段情节夸张的悲剧情景，承认哈定成为自身困境的牺牲品。他对政府里发生的所有事情都心知肚明，以至于无法面对未来。在前往阿拉斯加州的途中，哈定显然处于紧张恐慌的状态之中。根据威廉·艾伦·怀特的描述，他不停地问胡佛部长和身边颇为信任的记者，对待背叛自己的朋友，总统应该如何处置。无论是毒药还是心力衰竭，要害死他都很容易，因为他已经失去了求生的想法。

当然，全国民众当时对这一切都毫不知情。他们的挚友和总统不幸逝去，大家对他的去世深感悲痛，当哈定纪念协会提议为他建造一座雄伟的纪念碑时，人们拍手称赞。只是到了后来，真相才渐渐水落石出。

三

可怜巴巴的总统被安葬后不久，参议院公共土地委员会就开始深入调查茶壶山和埃尔克山的海军石油资源储备地的蹊跷内幕，真相慢慢浮出水面，这也许是哈定政府执政历史上最为严重、具有深远影响的丑闻。基本上来说，事情的真相大致是这样：

自1909年起，政府所拥有的三块含油土地被依法保留，以作为应对紧急情况下石油短缺的保障政策，用以满足美国海军未来的需要。这三块土

从大繁荣 到大萧条

地分别是：加利福尼亚州埃尔克山的1号海军储备地，加利福尼亚州布纳维斯塔的2号海军储备地，以及怀俄明州茶壶山的3号海军储备地。随着时间的流逝，这些储备地下面蕴藏的石油显然有被与之相邻的油井开采的危险：土地下面的石油是可以流动的，如果你钻一口油井，抽取上来的不仅有自己土地下面的原油，还有旁边土地的原油。至于这种特性造成的危害程度大小，各方意见并不统一。等到石油商在埃尔克山储备地附近钻探油井的时候，国会采取了行动。1920年，国会赋予海军部部长绝对的权力，满足他解决石油储备地保护问题的一切需要。他可以在石油储备地的边缘钻探邻井，抑制石油流失，也可以把石油储备地租给私营石油公司，条件是它们必须储备适量的原油或燃油，以满足未来的国防要求。海军部部长丹尼尔斯（Daniels）当时倾向于对邻井进行钻探。

然而，时任哈定政府内政部部长的艾伯特·福尔，他的决定与此截然相反。在1921年，也就是限制军备的华盛顿会议召开前夕，有些海军高官对美国和日本发生冲突的可能性顾虑重重，宣布海军必须马上建立燃油储备库，保障充足供应，以备珍珠港和其他战略要地使用。这个想法正如福尔的所愿。他作为石油巨头的盟友进入政府就职，是个毫无幻想的政客，眼下看到了为他们自己服务的机会。他要把三块海军石油储备地全部租借给私营石油公司，石油公司向政府支付原油开采费用，用这笔费用来购买燃油储存罐，往里面加注燃油，以满足海军的需要。当然，只有海军部部长才有权力租借海军石油储备地，福尔并不是海军部部长，但这也算不上什么难以克服的障碍。

哈定总统就职不到三个月，就签署了行政命令，把石油储备地的监管权从海军部部长那里移交到内政部部长的手上。1922年4月7日，福尔没有通过竞争式招标，便悄悄地把茶壶山的3号海军储备地租赁给哈里·辛

克莱（Harry F. Sinclair）的猛犸象石油公司。到了1922年11月11日，他不经竞争式招标，偷偷地把埃尔克山的1号海军储备地租赁给爱德华·F·多赫尼（Edward F. Doherty）的泛美石油公司。有人认为，如果合同能够生效，租赁石油储备地对美国政府来说没什么不好的，没有非法利益可言。也有人觉得，考虑到有必要对涉及军事部署之事保守机密，不进行竞争招标和对公众隐瞒也是具有充分理由的。不过后来人们才发现，福尔接受了辛克莱价值26万美元的自由债券，还从多赫尼那里“借”了10万美元的现金，可这笔借款既没有利息也没有任何担保。

战后十年余下的时光里，这起丑闻拖了数年之久。经过一系列长时间的参议院调查、政府诉讼和刑事审判，最高法院判决多赫尼的租赁权无效，合同“不合法，并有欺骗性”；同时判决辛克莱的租赁权无效，内政部长福尔收受辛克莱的贿赂的罪名成立，并被判监禁1年。海军部长邓比（Derby）由于草率同意把石油储备地的监管权移交给福尔，饱受公众批评，黯然辞职。荒唐的是，多赫尼和辛克莱两人都被无罪被释放。但是在1929年，辛克莱被判处双重罪名：首先，由于他拒绝回答公共土地委员会提出的问题，被判处蔑视参议院罪；其次，在第一次庭审期间，他雇用侦探伯恩斯贿赂陪审团，被判蔑视法庭罪。（一位陪审员宣称，有人向他提议说，如果他投票赞成的话，就能得到一辆“像这条街一样长”的汽车。）

以上就是石油租赁交易案的真相。可这只是交易内幕的一部分。1924年年初，在参议院公共土地委员会首次将重要情况披露后，柯立芝总统委派富有实力的欧文·罗伯茨（Owen Roberts）和撑门面的前参议员阿特利·波莫雷内（Atlee Pomerene）作为两党联合的政府公诉人，代表美国政府采取任何必要的法律行动。罗伯茨和波莫雷内两人发现，辛克莱转交

从大繁荣 到大萧条

给福尔的这批债券来自大陆贸易公司的账户，这是加拿大一家毫不起眼的企业。随着事情的真相渐渐清晰，大陆贸易公司的历史不仅达到了耸人听闻的程度，而且作为美国当代商业伦理的案例研究很有启示意义。事情是这样的：

1921年11月17日，在福尔和辛克莱签订合同的几个月前，有一伙人聚集在纽约范德比尔特酒店的客房里举行商务会议。这些人包括：拥有丰富石油储量的麦西亚油田所有人E·A·汉弗莱斯上校（E. A. Humphreys），中西石油公司的哈里·M·布莱克默（Harry M. Blackmer），普莱瑞石油公司的詹姆斯·奥尼尔（James E. O'Neil），印第安纳标准石油公司的董事长罗伯特·斯图尔特（Robert W. Stewart）上校，以及辛克莱石油公司的老板哈里·辛克莱。在会议上，汉弗莱斯上校同意以每桶1.50美元的价格出售自己油田里所开采的33 333 333桶原油。但是他发现，这些原油并不是他想象的那样，直接出售给当时在座的石油巨头，而是卖给了一家他未曾听说过的企业——刚刚成立的大陆贸易公司。这家神秘莫测的大陆贸易公司的法人代表是辛克莱和奥尼尔，对销售合同进行担保。随后，大陆贸易公司直接将这批原油转卖给辛克莱和奥尼尔旗下的公司，而此时的价格不再是每桶1.5美元，而是涨到了每桶1.75美元。大陆贸易公司从中赚取了每桶25美分的高额利润，要不然，这笔利润本应该属于其他参会总裁的公司。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笔利润慢慢积累，总金额应该超过800万美元。

实际上，这笔利润从来没有那么高。一年多以后，参议院开始对此彻查到底，有人认为最好让大陆贸易公司的事情就此结束，销毁了一切记录。但在此之前，在范德比尔特酒店完成的那笔交易的利润已经高达300万美元以上。

大陆贸易公司的总裁奥斯勒 (Osler) 是加拿大一位声名显赫的律师，他用所得到的数百万美元购买了自由债券。在扣除了属于自己那2%的部分之后，他将这笔债券分成了四份，交给了在范德比尔特酒店开会的四位先生，其分配的数额如下：

哈里·布莱克默，大约76.3万美元。

詹姆斯·奥尼尔，大约80万美元。

罗伯特·斯图尔特上校，大约75.9万美元。

哈里·辛克莱，大约75.7万美元。

这些石油大亨在收到债券后，马上通知董事们和股东们，把这些债券交给公司了吗？他们当然没有这么做。

根据布莱克默的律师后来提供的证词声称（那是很久以后的事了），布莱克默将他的债券放到了纽约公平信托公司的保险箱里，一直保存到1928年。

奥尼尔把他那份债券交给了公司，不过此时已经是1925年5月了。

斯图尔特把债券交给印第安纳标准石油公司的一位员工，委托他保管在公司的保险库里。但是除了告诉了公司的一位法律顾问以外，他没有将这件事告诉其他同事，也没有向董事们报告，直到1928年他把债券交给各位董事的时候才说出实话，而那份委托协议也是用铅笔草草签署的。

辛克莱本人的证言称，直到1928年，对公司的董事和员工他都不信任，于是便将债券放在自己家的保险柜里。但是，他保存债券的时间并不是很长，不然大陆贸易公司的凶猛历史永远都不会被曝光。我们已经知道，他把债券的一部分送给了福尔，把另一部分价值18.5万美元的债券“借给”了共和党全国委员会（还无偿捐献了7.5万美元），后来只收回了10万美元。这笔“借款”实际上是交给了威尔·海斯，他在1920年哈定

从大繁荣 到大萧条

和考克斯竞选总统时，担任共和党全国委员会主席，此后他被哈定总统任命为邮政总局局长，辞职后出任全美电影制片和发行人协会主席，对电影业的道德观进行审查。就在海斯当上“电影沙皇”的时候，他接受了辛克莱的债券。不过他本人良心未泯，一直努力偿还1920年总统大选期间共和党欠下的债务。为了这个目标，他打算以一种非常有意思的方式动用辛克莱的借款。海斯和他的助手前去拜访那些有可能为事业捐款的富豪，表示如果他们愿意捐款来填补赤字，就能获得到同等数额的辛克莱债券。他们能把债券保存多长时间不曾知晓，至少海斯在参议院公共土地委员会作证时没有提到这点。这种方法将数目庞大的辛克莱债券藏匿了起来，而身为电影界道德监督员的海斯却委婉地说，这是“为了填补赤字而利用债券努力筹集资金”。

四

我们从政府的行为和公司高管代表股东担负的诚信职责里，仅得到了这么一点儿教训。如今，让我们回过头来看看石油丑闻中较为平淡的一面，也就是那些没有牵涉进去的家伙觉得波澜不惊的一面。面对蒙大拿州参议员沃尔什不讲情面的连番质询，勉为其难的证人闪烁其词，这种情形透出一丝冷酷的幽默。要是没有这番随机应变的功力，真相可能永远不会浮出水面。参议院的调查慢慢拉开某些场景的帷幕，涉案当事人逃到国外，证人记不清细节，凡此种种除了充满了娱乐成分别无他效。让我们回顾这份漫长的调查记录，一项一项地对它们进行研究吧。

第一项 谁把钱借给了福尔？

1923年秋天，哈定总统令人惋惜地离世后不久，参议员沃尔什领导

的委员会得知内政部长福尔近期突然发财。不久之前，福尔还处于经济困境之中，有好几年连地方税都交不上。但是这一局面在猛然间发生了扭转，福尔在自己位于新墨西哥州的农场旁边新买下了一块土地，还在交易过程中拿了数量相当大的百元钞票。沃尔什的委员会立刻像猎犬一样闻风而动：百元大钞和拒绝做证或拒绝免除豁免权一样，让调查者感到兴奋不已。福尔从哪里得到这么多钱？福尔给委员会写了一封长信，坚决否认自己从多赫尼或辛克莱那里收受一分钱，以愤慨和无辜的口气解释道，是华盛顿的爱德华·B·麦克莱恩（Edward B. McLean）借给了他10万美元，这位新闻界的百万富翁经常乐于热情款待哈定和他的朋友。

麦克莱恩先生此时正在棕榈滩，不能来华盛顿为这笔借款做证。委员会本来可以让这件事就此止步，但是他们没有草率结案。人们找到了麦克莱恩，起初他显得很不愿接受调查。他和朋友们通过密码电报与华盛顿的助手频繁地保持通信联系，用下面这种暗语谈论事情的进展：
Haxpw sent over buy bonka and householder bonka sultry tkvouep
prozoics sepic bepelt goal hocusing this pouted proponent

最后，参议员沃尔什过于谦逊地亲自赶赴棕榈滩，听取麦克莱恩的证言。的确，麦克莱恩借过钱给福尔，不过这笔钱是三张支票。福尔的秘书不久后就把支票还给了他；他们甚至没有经过银行的中转，也没有留下任何交易记录。

很明显，这笔短暂而不寻常的金融交易并不能证明前内政部长的财产来源和手里的大额现金的清白。想自证清白还需要另一种解释。于是在1924年1月24日，1号海军储备地的承租人爱德华·L·多赫尼出庭做证。他也承认曾借给福尔10万美元，把这笔钱装在包里从纽约带到华盛顿——但是这笔借款和石油储备地的租借毫无关联，为他这位老朋友提供了善意

从大繁荣 到大萧条

的借款。这位上了年纪的石油大亨，为他和福尔之间的长时间的牢固友情描绘出一幅动人的场景。10万美元的现金算是一笔巨款吗？不，怎么会呢？这对他来说不过是“不足挂齿的小事”而已。他用“这种方法进行转账”是非常平常的。这笔借款有没有借据呢？当然有，多赫尼总能找得出来。后来，他的确“创造”出了借据，倒不如说是借据的碎片，上面的签名丢失了。多赫尼害怕自己过世后，冷酷无情的遗嘱执行人会过分强迫福尔还钱，就把借据撕成两半，把有签名的那一半交给多赫尼夫人，可她不知道放在哪儿了。这个解释听起来完美无缺——直到数年以后，最高法院才对此产生了怀疑。

第二项 6头到8头奶牛

就在慷慨大方的多赫尼站出来之前，有人向新闻界提供了足以轰动的头版故事。此人就是阿尔奇·罗斯福（Archie Roosevelt），他的父亲是伟大的西奥多·罗斯福总统，他的哥哥小西奥多·罗斯福曾在哈定政府担任海军部副部长，他找到沃尔什的委员会做一名自愿证人。阿尔奇·罗斯福是辛克莱旗下一家企业的管理人员，想要把心中的真实想法说出来，而他哥哥敦促他把这些事和盘托出。阿尔奇从辛克莱的机要秘书沃尔伯格（G. D. Walberg）那里听说，辛克莱向福尔农场的经理支付了6.8万美元。当时参议员沃尔什坚持追缉相关证据，这种情形让沃尔伯格感到负担沉重。此外，辛克莱已经乘船去了欧洲，并且走的时候悄然无声，他的名字甚至都没有出现在旅客名单里。委员会传唤了沃尔伯格。这位绅士来到委员会出庭做证时，比他告诉阿尔奇·罗斯福的时候还要忐忑不安，不过他对自己说过的话做了一番动人的解释。罗斯福肯定误会了他的意思，他从来没提过6.8万美元的事，他说的是辛克莱给福尔的农场送去了“6头到

8头奶牛”。（说起来这事倒是真的：辛克莱的确给福尔送过活的家畜，准确的数目并不是“6头到8头奶牛”，而是1匹马、6头猪、1头公牛和6头小母牛。）你知道这个误会是怎么来的吧？“6.8万块钱”（sixty-eight thous）听起来可不就像“6头到8头奶牛”（sixty or eight cows）吗？

公共土地委员会的人显然没明白过来，他们都皱起了眉头。所以不久后，沃尔伯格再次受到传唤。这次他的解释更让人哈哈大笑。他重新回忆了一遍，决定解释一下他原来谈话的本意，好像是辛克莱给了福尔农场的经理6.8万美元，其实是给了“马场”经理6.8万美元，他指的是辛克莱那座声名显赫的兰科克斯马场的驯马师。这笔6.8万美元的款项包括驯马师希尔德里斯的薪水，还有泽夫和辛克莱其他赛马应得奖金的份额。

“马场”——这个解释并不符合通常的用词，根本没有让委员们紧锁的眉头舒展开来。

第三项 斯图尔特上校和其他人保持沉默

参议员委员会对这条线索紧追不放，确切地说，是两条线索。不过此后，能够对追查线索提供莫大帮助的各位当事人，都惊人地保持沉默，等到他们愿意开口的时候，记忆却出了难以解释的毛病。内政部长福尔医生宣称他“身患重病”，不适合出庭做证。等他最终能够做证的时候，又对那些“可能认定他有罪”的问题保持沉默。正如阿尔奇·罗斯福告诉委员会的那样，辛克莱已经去了欧洲；等他回国后，也不肯说实话，由于拒绝回答提问，导致他被判有蔑视法庭罪。此后他遭到了更严重的指控——预谋欺诈美国政府。被判无罪获释后，他终于开口做证：他承认自己将债券交给了福尔，但是坚持说这笔钱是用来支付给福尔的农场和畜牧场三分之一的利息。

从大繁荣 到大萧条

布莱克默去了欧洲，没办法诱导他回来。奥尼尔去了欧洲，也不可能诱导他回来。大陆贸易公司的奥斯勒远走他乡。至于斯图尔特上校，经过小约翰·洛克菲特一再坚持下去的劝导，他才从古巴回来应对委员会的询问。而此时已是1928年年初，他的证言如下：“我本人没有收到过任何债券。我没有从这笔交易里得到一美元的好处。”不到两个月后，宣告辛克莱无罪缓解了他的紧张情绪，他这才承认曾经收到过价值超过75万美元的债券，数年以来从没有告诉过本公司的董事们。

第四项 海斯的证言

1924年，身为电影界道德监督员的威尔·海斯受到委员会传唤。他被问到辛克莱向共和党捐赠的金额，海斯回答为7.5万美元。

1928年，大陆贸易公司债券的历史变得逐渐明朗之后，海斯再次面对委员会的质询。他向委员会讲了全部实话，辛克莱除了捐款外，还借给了他18.5万美元。他之前为什么不说出来呢？海斯解释说，因为“没有问到关于债券的事情”。

第五项 梅隆保持沉默

在海斯第二次为辛克莱捐款的相关事情做证后几天，查尔斯—普拉特公司的出纳受到委员会传唤，要求他就价值5万美元的辛克莱—大陆贸易公司自由债券一事出庭做证，海斯在已故的约翰·普拉特（John T. Pratt）向共和党委员会捐款后，按照他那套煞费苦心的计划，把这笔相同数额的债券给了普拉特。这位出纳拿出了一张卡片，普拉特先生在上面标明了债券的配额和他那笔捐款的金额。在卡片的一角，用铅笔写了几行小字，内容如下：

5万美元

安迪 威克斯

杜邦

巴特勒

参议员沃尔什把这张卡片察看了一番。

参议员沃尔什：我能辨认得出“威克斯”，还有“杜邦”，也能辨认得出“巴特勒”，但是这个名字是什么？看起来像是“安迪”。

出纳（用了个放大镜）：是威克斯、杜邦、巴特勒，另一个名字应该是坎迪……不对，可能是安迪。

参议员奈伊：那么安迪是谁？

出纳：我不知道安迪是谁。我不记得有人叫作安迪。

会场的听众狂笑不止。人人都明白安迪是谁。参议员沃尔什派人给财政部部长安德鲁·梅隆送了一封便笺，问他能否解释一下这行字符。梅隆部长不敢拖延，态度亲切地照办不误。

梅隆解释道，在1923年年末，也就是参议院刚对茶壶山丑闻进行调查的时候，海斯送给了他一些债券。“过了不久，海斯打来电话告诉我，他是从辛克莱那里收到的债券，建议我保存这笔债券，并向基金会捐出同样数额的款项。但是我没有这样做。”

梅隆部长的确正直严谨，没有听从海斯的建议，把债券退了回去，直接捐赠了5万美元。他补充道，自己对“茶壶山租借案件的进展一无所知”。

然而，或许值得注意的一点是，这段证言出自1928年。在过去三年多的时间里，不仅是参议院委员会，还有柯立芝总统委派的政府公诉人欧文·罗伯茨和阿特利·波莫雷内，都在想尽办法查清大陆贸易公司债券的去向。在此期间，财政部部长早就清楚，1923年他接受的那笔自由债券

从大繁荣 到大萧条

来自辛克莱。可他却一言不发，一直等到这张用铅笔写着安迪（也许是坎迪）的小卡片被公示出来。也许这不过是桩小事，但是清楚地表明，当自己的证言会让本党募集资金方式蒙羞的时候，财政部长俨然成了保持缄默的典范。

在写作本书之际，茶壶山、埃尔克山和大陆贸易公司发人深省的故事也就此结束。1921年6月，哈定总统发布转让租借权的行政命令，拉开了这个故事的帷幕。当时哈定刚刚上任，斯蒂尔曼离婚案即将到来，邓普希和卡彭铁尔准备展开对决，年轻的飞行员查尔斯·林德伯格还没有开始首次飞行。等到辛克莱和斯图尔特讲完了自己的故事，海斯本人自证清白，财政部部长梅隆打破了沉默，林德伯格已经飞抵了欧洲，赫伯特·胡佛正在召集代表参加共和党大选。等到哈里·辛克莱结束了身为华盛顿监狱药剂师这段不甚愉快的经历，大牛市已经成了过眼云烟，战后十年落下了帷幕。福尔部长监管哈定政府国有资源的任期固然短暂，却造成了令人难受并深受其害的后果，也有深刻的教育意义。

对了，还要顺便添上一件事。那就是石油：海军部的爱国者曾经忧心忡忡，打算在太平洋发生冲突时立即启用石油储备，可拉开这一故事序幕的石油究竟怎么样了？大家对这笔债券和数十万美元的借款的事情过程兴奋不已，可每个人都看上去都忘掉了石油这回事。租借给辛克莱和多赫尼的油田已经停止了生产；你可能还记得，地下的原油有流向与之相邻油井的危险，这些油井正在一刻不停地开采着，据说其中有一部分，多半包括石油储备地的蕴藏，竟然卖给了日本政府！

五

在哈定政府的几件丑闻里，石油案算得上是有着贵族一派的丑闻，还

有些更有吸引力的、腥臭无比的丑闻。让我们将我们的鼻子捂住一会，把它们粗粗地打量一番。

例如，查尔斯·福布斯（Charles R. Forbes）领导的退伍军人管理局充斥着难以置信的挥霍、贪污腐败。哈定访问夏威夷时认识了这个嗜财如命的强盗（他曾经是军队的逃兵），并对他十分赏识，在1921年委派他担任退伍军人管理局局长。这个政府机构负责照顾身有残疾的战争英雄，每一位公众人士都对他的责任非常看重，为此留下了感激的泪水。可福布斯上任还不到两年的时间里，就挥霍浪费、臭名远扬，2亿多美元全都花个精光。最恶名远扬的是，福布斯用公费旅游周游全国，说是为医院选址，其实这些医院的地址早已经选好了。他的部门为退伍军人选择医院签订合同的时候，根本不考虑价格。比如，修建北安普顿医院的合同交给了一家开价3万美元的农场，远远超过最低竞标价。有人指控福布斯和几家医院的建筑商互相勾结，从中赚取了三分之一的利润。医院用品的采购更是荒唐可笑：退伍军人管理局购买了高达7万美元的地板蜡和地板清洁剂，估算一下，这些东西足够用100年了，而清洁剂的价格是每加仑^①98美分，事后专家们证实，除掉其中的水分，这种清洁剂的价钱绝不超过每加仑4美分。大量的战争剩余物资被压价出售：每条价值1.37美元的共计8.4万条崭新的床单，却以每条26~27美分的价格抛售出去，与此同时，退伍军人管理局还以每条1.03美元的价格，购买了2.5万条新床单。布鲁斯·布利文（Bruce Bliven）这样写道：“刚买回来的床单从（马里兰州佩里维尔）仓库的一头运了进来，而此时，卖出去的床单正从另一头搬出去。由于草率办事，有些床单刚运进来就从另一头搬出去了。”每条价值19美分的7.5万条毛巾，以每条3.375美分的价格抛售一空。这些例子足以说明，无比慷慨的福布斯，竟然把用来照顾国家保卫者的资金挥霍殆尽。1926

^①1加仑=3.79升。

从大繁荣 到大萧条

年，福布斯因欺诈罪被关进了莱文沃斯监狱。

在外侨资产管理局，贪污的现象也非常猖狂。加斯顿·B·米恩斯指出，律师们来到华盛顿要求归还战争期间被德国人接管的资产，却被告知要向一位名叫瑟斯顿（Thurston）的波士顿律师咨询。瑟斯顿从他们那里收了一大笔咨询费用后，索赔申请才能得到批准，而这笔咨询费由政府高官进行瓜分。即使如此，美国金属公司案件的证据也足以表明，这种交易得到了放行。

美国金属公司是一家国际企业，公司49%的股份属于德国人，所以在战争期间被外侨资产管理局接管。此后，这笔股份以600万美元出售出去。在1921年，有个名叫理查德·莫顿（Richard Merton）的人找到外侨资产管理局，声称这笔49%的股份不是属于德国人，而是属于瑞士人，他所代表的瑞士股东应该得到赔偿。这个要求得到了批准。此项批准实施之后，莫顿购买了44.1万美元的自由债券，送给了康涅狄格州共和党全国委员会委员约翰·金（John T. King），感谢他为自己铺路见到了外侨资产管理局局长米勒（T. W. Miller）上校，以及司法部部长多尔蒂的副手杰西·史密斯（Jess Smith）。在对米勒的审讯中查出，这笔44.1万美元的债券中，至少有20万美元给了杰西·史密斯，“因为他通过华盛顿的熟人给这笔赔偿行了方便”；司法部部长的弟弟马尔·多尔蒂（Mal S. Daugherty）至少卖出了价值4万美元的自由债券，没过多久就把49,165美元存到了他哥哥的账户上；米勒上校也获得了一笔钱。1927年，米勒被判罪名成立，在任期内图谋欺骗政府，被判处18个月的监禁。多尔蒂也接受了审判，却无罪释放。因为两个陪审团出现了意见分歧，不能判断他究竟是有罪还是无罪，于是便撤回了对他的起诉。不过就在事情露馅前的1925年，这位前美国司法部部长去了他弟弟在俄亥俄州华盛顿法院大

厦的银行，把分类账册拿出来全部焚烧。这些账目涉及他的账户、他弟弟的账户，还有个叫作“杰西·史密斯”的额外账户。

正是在美国金属公司案件的大陪审团调查过程中，哈定政府的前司法部部长写下了本章开头的那段声明。在审判期间，多尔蒂本人没有出庭做证，后来他的代理律师马克斯·施托伊尔（Max Steuer）提供了相关解释，这段话同样引起人们的关注：

“迫使他不能出庭做证的原因与此案无关……他担心巴克纳会就政治问题向他加以盘问，这些事与多尔蒂先生没有关系。他了解内情，但绝不会揭露出来——如果陪审团知道账目被销毁的真正原因，会对多尔蒂先生的举动加以赞扬，而不是谴责他，但他仍然保持着沉默。”

这番措辞严谨的表白，难道不是在暗示哈定的司法部部长之所以不能讲出真相，是因为担心诋毁已故总统的名声？你可以把多尔蒂的缄默不语看成是向已故总统尽忠的沉默，也可以把这段声明看作为已故总统尽力掩饰；无论如何，哈定政府都笼罩上了一层奇特的光彩。

1930年，加斯顿·米恩斯大胆地提出了一项更具破坏力的指控。他表示，自己身为俄亥俄帮的喽，曾经在纽约一家酒店里预订了两间相邻的客房，收受走私酒商的贿赂，这帮人由于违背了禁酒令，便愿意掏钱来换一把联邦政府的保护伞。他会事先在一间客房里的桌子上放一个大鱼缸，躲在旁边的房间里偷偷往里瞧；每个走私酒商在指定的时间前来，在鱼缸里留下1000美元或500美元的大额现金；走私酒商前脚刚走，米恩斯就会进来数钱，核对金额；他用这种手段收到的贿赂足足有700万美元，然后转手交给俄亥俄帮的会计总管杰西·史密斯，而杰西和司法部部长多尔蒂在华盛顿合住一套公寓里。

米恩斯进一步断定，通过各种方法搜刮来的赃款，每次都有数万美

从大繁荣 到大萧条

元，全藏在一个金属箱子里，埋在了他位于华盛顿第16街903号宅子的后院。他形容这套房子和院子都用很高的铁丝网保护了起来，装备了密码系统和其他机关，足够让小孩子们兴致勃勃地玩海盗游戏。

1923年，杰西·史密斯在他和多尔蒂合住的公寓里自杀身亡，起码官方给出了这个定论。米恩斯认为，杰西一直是个小心谨慎的人，此前跟随多尔蒂来到华盛顿，在司法部谋得了一个职位。他一想到自己的罪行和掌握的秘密就吓得寝食难安，于是动了投靠政府去指控俄亥俄帮的念头。就在这场悲剧发生前，俄亥俄帮发现史密斯掌握了所有他所经手的现金记录。据米恩斯说，俄亥俄帮决定必须解决掉史密斯。尽管史密斯害怕使用枪支，却难以置信地在去俄亥俄州的路上买了一把左轮手枪。不久，他就“自杀”了。米恩斯说得很清楚，像很多人已经出现的疑惑一样，他根本就不是自杀。

最后，米恩斯还提请人们注意，掌握俄亥俄帮秘密的那些当事人，死亡率竟然高得惊人。不仅有自杀身亡的史密斯，还有接受莫顿债券的约翰·金，司法部探员哈特利（C.F.Hately）、退伍军人管理局的律师克莱姆（C.F.Cramer）、代表各位客户向外侨资产管理局索赔的波士顿律师瑟斯顿、哈定团队的律师福尔德（T.B.Felder）、哈定总统、哈定夫人，还有索亚准将。他们在哈定政府下台后的几年里纷纷过世，多半是猝死身亡。

无论人们相不相信后来的指控和内涵，这些确凿证据足以证明，哈定政府在短短两年五个月的任期内，对贪污豪夺与流氓行径负有责任，而这些斑斑恶迹要比整个美国历史上任何一届政府都要多。

六

美国人民究竟对这些丑闻会做些什么呢？他们会拍案而起，惩治这帮

罪犯吗？

1924年年初，当石油丑闻首次占据报纸头版的时候，民众的反抗情绪高涨，足以迫使邓比和多尔蒂提出辞职，让新任总统卡尔文·柯立芝任命政府特别顾问来处理石油案。但是受到媒体和公众严厉斥责的，并不是欺骗政府的达官显贵，而是坚持揭露真相的人。参议员沃尔什负责调查石油丑闻，参议员惠勒（Wheeler）负责调查司法部，两人竟然被《纽约论坛报》称为“蒙大拿丑闻中间人”。《纽约晚邮报》把两位称作“垃圾炮手”。《纽约时报》尽管倾向于民主党的立场，也痛斥他们有“暗杀者的特质”。在全美各地的报纸上，你都能看到这样的描述，“民主党独裁者聚会”“毒舌党、纯粹的敌意、歇斯底里的唠叨”。两人对于当事人的质询被说成“言语粗俗、卑鄙之极、令人恶心”。

报纸读者对这些温和的观点感同身受。许多商人非常庄重地相互提醒，有可能是出了差池，对他们进行指责算得上是不爱国的表现，会让“政府失去威信力”，那些坚持彻查的人“简直就是布尔什维克”。超级爱国者的领袖，美国核心人物协会的弗雷德·马文（Fre. R. Marvin）宣称，整个石油丑闻不过是“国际大阴谋的产物，策划这场阴谋的是国际主义者，我们不如称其为社会主义者和共产主义者”。在这段日子里，每天往返于郊区到纽约之间的乘客会发现，在7点钟的火车上，人们还对丑闻怒气冲冲，而在8点钟的火车上，大家只是对丑闻败露怀恨在心，等到坐上了9点钟的火车，众人就已经对此事漠不关心了。几个月后，约翰·戴维斯（John W. Davis）作为民主党候选人参加总统大选，利用哈定总统的丑闻捞取政治资本，在大多数人看来，戴维斯的这番言辞卑鄙低劣，而他在民意调查中也铩羽而归。事实上，任何对丑闻的不屈不挠的调查，哪怕是细枝末节，也可能会干扰所维持的现状，而这是主导社会的商人阶级和

从大繁荣 到大萧条

普通民众最不想看到的事情。

他们曾经投票支持常态，如今依然对此深信不疑。他们对美国政府最高的要求，就是不要插手商界事务（除了偶尔通过优惠关税和其他手段来振兴经济），保持沉默。他们不指望华盛顿的政治家英勇无畏、远见卓识，他们认为总统应该具备政治家气度，采取无为而治政策，为工商业提供获取高额利润的机会，不要“破坏当前的局面”。他们意识到，推选哈定总统就是实现这个适度理念的错误开始。哈定本人过于亲和的性格让他交友甚广，却落得恶名缠身的下场，从而破坏了当前的局势。不过，基本准则依然合乎情理需要：整个国家如今需要一位个性谦和的总统，对待商界态度友善，为人正直、富有清誉，不愿意被人嘲弄；而此刻就正好有这么一位总统。上帝那神秘莫测的力量，在哈定去世空出的总统职位上，恰好安排了一位理想总统的完美化身。卡尔文·柯立芝向来谨言慎行；他绝不会指挥美国政府这艘巨轮驶往未知海域；此外，他诚实可信、思虑甚多，足以防止甲板上出现不合时宜的狂欢情景。这一切都和人们的设想严丝合缝。为什么还要纠结于过去不幸的插曲之中，打消公众对哈定所在政党的信心，减弱对哈定继任者的信任呢？最好的办法就让过去成为过去。

随着时间的推移，曝光的丑闻越来越多，牵涉的范围也越来越大，现在看来，1921年到1923年犯的“错误”，比那些当初对沃尔什参议员发火、支持常态的人所预想的要严重得多。这些断断续续浮现出来的证言，让人困惑不已，很难拼凑在一起。普通民众根本想不明白大陆贸易公司债券和多尔蒂银行账户这么复杂的内情。随着时光流逝，后来的调查如同一桩声名狼藉的陈年旧闻的大清洗。商业运转良好，柯立芝富有诚信。人们何必沉溺于过去？民众从对于丑闻的愤慨和对长舌鬼的怨恨，变成了深沉与冷漠。当大陆贸易公司交易案的故事流传开来，印第安纳标准石油公

司的大股东小约翰·洛克菲勒向斯图尔特上校发起挑战，准备把他赶下公司董事会主席的位子，可是整个商界似乎都找不出斯图尔特上校的任何问题。小约翰的呼吁成了旷野中无人回应的哭泣之声。

不过，已故总统的威望却日渐式微。数年以来，悲痛的美民众慷慨捐建的俄亥俄州马里恩市那座宏伟的纪念碑，却仍然没有揭幕。明显的缘由是，一位美国总统的纪念碑只能由另一位美国总统主持揭幕式。但是，哈定之后的几任总统，似乎都觉得去马里恩主持这个仪式有些不便。1930年年末，哈定去世7年之后，哈定纪念协会商量应该如何解决这个令人尴尬的问题。已故总统那位挺身而出的密友哈里·多尔蒂，由于曾经了解那些“绝不会披露出去”的内幕而拒绝出庭做证，如今发表了一番辞藻华丽的演讲，声称美国人民的立场从来没有被“流言蜚语和空穴来风的造谣”所动摇。他倡议把揭幕式无限期地拖延下去，而这个决议获得正式通过。不过后来，那些权贵们觉得，这件事不能总处在左右为难的尴尬境地，共和党人最好还是迅速了结此事。于是在1931年6月，胡佛总统和前总统柯立芝接受了邀请，参加了纪念碑的落成仪式，揭幕式也终于如期举行。不过，事情的发展还是受到一定的限制。毕竟对这位在1923年“教会我们兄弟之情力量”的好心人，到了1931年还要称颂他的公共美德，实在不是件容易的事情。

FROM GREAT
P R O S P E R I T Y
TO GREAT DEPRESSION

第七章 柯立芝繁荣

当沃伦·哈定去世的时候，美国经济慢慢繁荣起来。在佛蒙特州一家落后的农舍里，在老式煤油灯的昏黄光线之下，约翰·柯立芝上校为儿子卡尔文主持了美国总统的宣誓就职仪式。1921年毫无希望的萎靡不振已经过去，随后是1922年充满希望的经济转好，现在迎来了1923年急速发展的经济复苏。

当然，从普通股的价格上看，可以确信，人们的乐观情绪算不上过度荒唐。1923年8月2日，也就是哈定总统去世的那天，美国钢铁公司（派发5美元股息）股价为87美元，艾奇逊铁路公司（派发6美元股息）股价为95美元，纽约中央公司股价（派发7美元股息）为97美元，美国电话电报公司股价（派发9美元股息）为122美元；纽约证券交易所全天的交易量总计只有60多万的股。大牛市还遥不可及，经济繁荣的洪水却不断泛滥开来。

捡起一张统计学家们衡量战后十年经济波动的曲线图，你就会发现，经济活动曲线在1920年呈现锯齿状的增长峰值，从1920年年末到1921年急

剧下滑至低谷，1922年的攀升趋势并不明显，在1923年年中达到又一个高点，在1924年稍有下滑（但是跌幅不及1921年），在1925年再次攀升，一直弯弯曲曲地上扬到1929年经济繁荣的巅峰时期，此后陡然下滑，猛跌了1930年和1931年的深渊之中。

把这张图表放在面前不远的地方细细审视，你会发现，从1923年到1929年年末的经济曲线相当于略有起伏的高原，而1924年和1927年的经济裂痕仅仅是两个缺口而已。这块高原代表了将近七年时间里从未有过的经济繁荣；在这七年里，人们对政治、宗教和爱情的幻想破灭，却相信在彩虹的尽头藏着一坛美国工业和销售业创造的大量财宝；在这七年里，正如斯图亚特·蔡斯（Stuart Chase）说的那样，商人“作为我们命运的主宰者”，剥夺了“政客、牧师和哲学家作为道德伦理和行为举止的标准的权利”，成为“引领美国社会的最终权威”。在这七年里，经济繁荣的乐队花车沿着中央大街车轮滚滚驶向前方。

并不是每个人都能跳上这辆花车，只有极少数农民才能爬得上去。当然，有些奶牛场工人、果农和菜农也牢牢地抓住了它。由于公众发现了维生素的用处，丰富的食谱得到宣传，易腐食物的运输发明了更好的方法，美国公众的饮食习惯出现了异常巨大的变化。1919年到1926年，全美牛奶和奶制品的产量增加了三分之一，冰激凌陡然增加了45%。1919年到1928年，所有老百姓的家里都知道芹菜、菠菜和胡萝卜里含有维生素，渐渐习惯了一年到头摄取新鲜的蔬菜和水果，19个蔬菜种植区的面积几乎翻了一倍。那些种植小麦、玉米和棉花等主要农作物的农民却处境糟糕。由于来自其他国家的竞争，他们的海外市场逐渐变小。女性身上穿的棉织品越来越少。在汽车、收音机和电器的新兴产业中，农业原材料几乎无任何作用。贫穷的农民为了提高生产效率，要买更多的机械设备来增加产

从大繁荣 到大萧条

量，以此勉强糊口，却注定要笼罩在生产过剩的阴影之中。农产品价格指数从1920年的205一路下滑到1921年的116，用斯图亚特·蔡斯的话说，“这也许是美国农业史上最严重的价格下滑”，该指数到1927年才起死回生，上升到131。贫困农民大声呼吁，和参议员诺里斯（Norris）、布鲁克哈特（Brookharts）、希普斯特德（Shipsteads）、拉福莱特（La Follette）等人一起，为争取联邦政府的资助而奋斗，此时已有成千上万的农民离开农场，来到城市。

还有许多行业没有挤进胜利游行的队伍。煤矿业、纺织业、造船业、制鞋业和皮革业都步履艰难。在全美各个地区，都有一两种行业受到经济衰减的影响。棉花行业拖了美国南方的后腿，西北部农业地区的小麦农业在一片阴霾之中虚弱无力，新英格兰地区的纺织业和制鞋业陷入瘫痪之中。繁荣花车上并不缺少乘客，比起路边那些晦气十足的倒霉蛋们，他们的运气要好得多，叫唤得更欢。

二

花车的头等位子上坐着汽车制造商。属于他的主宰时代凶猛到来。此时，公路、修车行和加油站建得越来越多，开车的人可以随时出发，不必担心陷进泥坑、油量不够和火花塞故障而导致汽车半路熄火。谈到这一点，还得说一句，如今的汽车制造得非常精妙，开车的人不需要了解火花塞什么样，成千上万的车主甚至连发动机盖都没打开过，更不要提想看看发动机到底是什么模样了。现在，四门轿车开始大量投入生产，就算在1月份，司机也不用勇敢地冒着凛冽寒风前行。眼下，时髦的新车型极为吸引人的目光。在战后十年的初期，大多数汽车色调暗沉，不过随着硝基纤维抛光工艺的发明，在1925年到1926年，汽车的颜色逐渐变得亮丽多彩，

从佛罗伦萨奶油色到凡尔赛紫色应有尽有。车身渐渐变低，专业设计师追求汽车线条的新式和谐，充气轮胎顺势而生，最后连亨利·福特都开始注重汽车的样式和美感。

如果有什么标志能够体现汽车在普通美国人心中所占有的重要地位，那就是1927年12月生产的福特A型车。从那年春天开始，亨利·福特就关闭了福特公司巨大的工厂，将T型车淘汰掉，又将上千台生产T型车的机器全部废弃，宣布要将一款新车推向市场，举国上下沉浸在悬念之中。在巨大的低价车市场上，T型车的领先地位早已被雪佛兰所取代。此时的人们不再满足于外表丑陋、最高时速仅为40英里到45英里的汽车；也不再满意用左脚踩在低速踏板上，噪声巨大，爬坡缓慢的同时，旁边却有一辆湖绿色的雪佛兰汽车呼啸而过，把自己的车甩到后面。亨利·福特毫无疑问是这个时代的天才工程师，但是，他到底能做出什么样的奇迹呢？

各家报纸的头版上传闻不断。人们对这件事有着非常浓厚的兴趣，连一位布鲁克林汽车经销商的道听途说都能登上头条，而他不过是“从他的哥哥亨利的电报里听到新车的消息”。密歇根州布莱顿《阿尔戈斯周刊》的编辑偷拍到了新款福特车试车的照片，读者们争相翻看照片，如饥似渴地议论着车上的每一个细节。伟大的一天终于到来，这个时代的发明天才的最新杰作将展现在公众面前。福特汽车公司花费130万美元，在2 000家报纸上连续五天登载了整版广告，让每位读者都能看到。1927年12月2日，据《先驱论坛报》统计，当福特A型车展出的时候，有100万人想进到纽约的福特公司总部里，亲自看新车一眼。查尔斯·梅尔兹（Charles Merz）后来在对福特生平进行描写时写道：“在底特律，有10万人涌进福特公司的展厅；在克利夫兰，警察全副武装维持秩序；在堪萨斯城，人们把会议厅挤得密不透风，只好搭建一个平台，把新车放在高台上面，让

从大繁荣 到大萧条

所有人都能看得到。”在美国从南到北都是这幅场景。福特公司积压了上千份要求购买尼亚加拉蓝色双人敞篷跑车和阿拉伯浅黄色敞篷旅行车的订单。此后的几个月里，任何一辆新款福特汽车出现在大街上，都会引来路人驻足观看。对痴迷汽车的美国人而言，新款车型的首次亮相并不是意味着平常小事和单纯的商业利益。那是1927年的一件大事，虽然不像林德伯格的飞行历险那样惊险刺激，却和萨科和万泽蒂执行死刑、霍尔—米尔斯凶杀案、密西西比河洪水和邓普希与唐尼在芝加哥展开对决等事件相媲美，足以刺激着美国公众的神经。

1919年，在美国行驶的小汽车有677.1万辆；到了1929年，就多达2 312.1万辆。这可能是柯立芝繁荣时代最有说服力的统计数据。我用下面的例子来加以说明：早在1923年年底，典型的美国城市“中心镇”，每3户人家就拥有2辆汽车。林德夫妇和他们的调查员采访了中心镇里123个工人家庭，发现其中60户人家拥有汽车。在这60户家庭里，有26家都住着简陋的房子，调查员本来觉得他们家里会都有浴缸，结果发现在26户人家里有21户都没有浴缸。汽车甚至还比浴缸出现得早！

随着这一切的到来，改变了美国的面貌。有些村庄因为“邻近铁路”而热闹繁华，后来随着经济萧条失去了活力；如今，61号公路沿线的村庄开满了修车厂、加油站、热狗摊、炸鸡店、茶室、野营地和旅行者休息区，村庄富足兴旺。城市之间的有轨电车消失得无影无踪，要么被当成可悲的老古董保留下来。城际客车和卡车在六车道的高速公路上川流不息，它们带来的竞争压力使铁路收入日渐减少，铁路支线一条接一条地被废弃。全美各地被客车线路网所覆盖。战后十年的初期，在几千个美国小镇上，只需要一个交通警察站在中央大街的十字路口，就足够指挥来往车辆。到了战后十年的末期，却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出现了红绿灯、信号

灯、单行道、路边商店，停车规则变得越来越严格——可是每逢周六和周日的下午，大街上还会有一连串一直堵到几个街区以外的闪着灯的汽车。蒸汽时代正在缓慢而必然地被汽油时代所代替。

三

在繁荣的花车上，收音机制造商占据的位置不如汽车制造商那么显赫，却显得实力不俗，因为他是最年轻的乘客。你可能会记得，直到1920年秋天，无线电广播才在公众面前出现，可等到1922年春天，收音机已经广泛流行，引发了人们的热烈追捧，而到了1923年和1924年，大家同样对麻将和填字游戏热议不断。在1922年，收音机及其零件和配件的销售额达到了6 000万美元。如今，人们都在侧耳聆听斯克内克塔迪或艾奥瓦州达文波特的管弦乐团演奏《加拉格尔和肖恩》。大家暗自猜想，等到他们的新鲜感全都消失，还会出现什么场景呢？下面是往后几年里收音机的年销售总额，这几组冷冰冰的数字足以说明实际的情况：

1922年：0.6亿美元（我们刚才提到过）

1923年：1.36亿美元

1924年：3.58亿美元

1925年：4.30亿美元

1926年：5.06亿美元

1927年：4.256亿美元

1928年：6.505 5亿美元

1929年：8.425 48亿美元（竟然是1922年数额的1 400倍！）

别急着把这些数据漠然视之。好好地研究一下，每当国家经济曲线下滑的时候，几乎各种流行商品的销售额也会随之下跌。比如说，当1927年

从大繁荣 到大萧条

经济曲线有所下滑之时，你看到收音机销售额有什么变化吗？1924年美国经济出现了最严重的衰退，而收音机的销售额却在那一年创下战后十年最大增幅。这究竟是因为什么呢？一方面，就在那一年，四面受敌的民主党人在纽约麦迪逊广场花园召开全国代表大会，推选总统候选人，前财政部长麦卡杜（McAdoo）和纽约州州长阿尔·史密斯（Al Smith）的缠斗一天天地持续下去，数以百万的美国人通过扩音器倾听响亮的欢呼：“亚拉巴马州，安德伍德赢得24票！”人们发现，可以把这次政治大会当成精彩表演来收听，坐在收音机旁和买票去麦迪逊花园其实都一样。实际上，收音机的效果更好，你可以在任何时间拧开旋钮，倾听《巴尼古戈尔》和《再也不会下雨了》的欢快乐曲，打发时间。虽然只有短短三年半的历史，无线电广播却已经进入了成熟阶段。

在这组收音机销售数据的背后，展现了一幅战后十年的生活篇章：收音机走进了三分之一的美国家庭；巨大的广播电台遍布全国各地；普通公寓的屋顶上架设着密密麻麻的天线；古典气息的佛罗伦萨式收音机里传来了罗克西乐团、幸福男孩、AP吉卜赛节目、鲁迪·瓦利（Rudy Vallee）的动人旋律；播音员格拉汉姆·麦克纳米（Graham McNamee）的声音成了美国公众最熟悉的声音，他的呐喊声在你我的客厅里回响：“他成功了！不错，听众们，他做到了！很棒的触地得分！小伙子，我想告诉你，这是一场最精彩的比赛……”在1927年，美国政府终于宣称，要在竞争激烈的广播电台之间分配收音机波段；广告商花费大量钱财用于购买广告播放权，在电台介绍贝多芬的同时恰当地插入几句广告词，赞美一下他们的牙膏；交易者迈克尔·米汉（Michael Meehan）亲自操盘，把美国无线电公司普通股的股价从1928年85.25美元抬高到1929年549美元的新价位。

在繁荣花车上坐的还有其它乘客。人造纤维、香烟、冰箱、电话、化

学制品（尤其是化妆品）和名目繁多的电气设备，这些物品的需求不断增长。当自主经营的店主苦苦维持生计的时候，连锁店和百货公司的零售额却在快速增长。每笔在1919年价值100美元的交易，到了1927年在便利店达到260美元，在香烟连锁店达到153美元，在连锁药店达到224美元，在杂货连锁店达到了387美元。如今，史密斯太太已不再光顾邻近的商店，她会坐上价值2 000美元的小汽车，开到红色招牌的日用商品连锁店，她每天在那里买东西能够节省27美分。美国电影业蓬勃发展，把他们的电影胶片推广到世界各地，造就查理·卓别林、道格拉斯·范朋克（Douglas Fairbanks）、葛洛丽亚·斯旺森（Gloria Swanson）、鲁道夫·瓦伦蒂诺（Rudolph Valentino）和克拉拉·鲍（Clara Bow）新一代明星，连因纽特人、马来人和中国人都对他们知之甚详。在美国国内，单在1923年12月，中心镇各家电影院的上座人数竟然达到全镇人口的4.5倍。无论男女老少，富人还是穷人，中心城镇居民平均每周都要去看一次以上电影。

这就是柯立芝繁荣时代的真面目吗？农民们可不这么想。纺织品制造商也不会这么认为。企业利润、薪酬和收入的统计数据没有给人们留下多少怀疑的空间。比如说，看一下财富杠杆两端的标志性事件。在1922年到1927年，美国人的工资购买能力每年的增长速度超过2%。而在1924年到1927年的三年时间里，为每年超过百万年薪而付税的美国人就从75人增加到了283人。

四

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情况？让美国经济如此繁荣的原因到底是什么？

有些原因是非常明显的。战争让欧洲经济陷入困境，美国经济却丝

从大繁荣 到大萧条

毫未受到损伤；等到和平到来之时，美国人发现自己宛如全世界的经济领袖。这个年轻的国家拥有丰富的物质资源、充足的劳动力和巨大的国内市场，利用这个优势做了充分的准备。美国开始进行大规模生产，把机械效率和管理效率提到新的高度。福特公司在机械化劳动分工极细的基础上，遵循着高工资、低价格和标准化生产的信条。这套方法不仅在海兰德公园的工厂收到良好的效果，还在数千家工厂里发挥了作用。经理们一想起1921年订单积压的场面就心有余悸，从谨慎的零售里吸取教训；围绕在他们身边的专业技术顾问、研究人员、人事经理、统计学家和商业预测人士，比以往都要多，不是在进行风洞试验，就是在开会。对于战无不胜的盟友过分信任让他们信心大增。他们从汽车业的繁荣景象得到了所有的帮助。作为经济主体的一部分，汽车业的经济活动直接或间接地为400万人提供了工作岗位，带动了其他行业的新生。

经济繁荣还要通过两种刺激购买力的新因素，每一种因素都把未来的收入作为抵押注入工厂之中，使之保持高速的运转。第一种刺激因素是不断增加的分期付款购物方式。人们开始觉得，用收支平衡来限制购买力早已过时，最好的方法就是“使用自己的信用”。到了战后十年的后期，据经济学家估算，15%的零售额是通过分期付款完成的，有60亿美元的商业票据也是分期付款销售的。另一种刺激因素就是股市投机活动。在1928年和1929年，当股市一路高涨的时候，有几十万民众不断投入金钱购买股票，从本质上来说，这些钱代表把赌注压在20世纪30年代的商业利润上。这种局面能够持续实在有意思极了。

倘若这就是柯立芝繁荣时代的主要原因，那么推销员和广告商就是这个时代的代理人和传道士。美国商界此时猛然醒悟过来，最后消费者对他们来说才是最为重要的。只有诱导消费者大肆购买，那些六缸汽车、

超外差收音机、香烟雪茄、化妆品和电冰箱才能源源不断地被推销出去。推销员和广告商执掌着打开销路的钥匙。用委婉而明确的言语推荐货物，把商品摆在柜台上面，期盼着顾客能下定决心买下来，这些已经远远不够用了。广告商必须在全国精心策划宣传活动，虚心请教心理学家，借用诗般的华丽语句，用尽甜言蜜语、口吐莲花，连劝带吓唬地让消费者来购买商品，“打破消费者的抵触心理”。不但每家企业在自己的行业里争夺更大的份额，各行各业都在公众耳边轮番忽悠。美国烟草公司喊出了“抽根幸运烟，甜过蜜糖”的广告词，遭到嘲讽的糖果公司开始反击，后者在报纸上刊登了整版广告。《读者文摘》引用商业期刊的内容进行报道，家具制造商提醒人们树立“家装观念”，服装厂家就来提高人们的“礼服观念”。销售员必须充满热情、神采飞扬，想尽一切办法挤进别人家里，消灭他完成销售任务的一切阻力。正像经理们说的那样，“你不能只当接线员，你必须成为推销员”。通常来讲，公众会轻易相信广告商的推销手段，对推销员粗暴地侵犯自己的隐私听之任之；对民众而言，任何以商业的神圣名义犯下的罪过都可以被他们饶恕。

推销员从来没有承受这么大的压力来取得成绩。很多企业都实行了绩效制度，为每个销售代表制定了比去年高出20%~25%的销售目标。如果他完不成这个目标，就会失去老板的器重，也许还会丢掉自己的工作。为了激发销售员的动力，企业推出了各种各样的销售比赛，使出了多种多样的手段。芝加哥的达特奈尔公司向全美10 000多家商业机构提供许多促销计划，比如说，购买花样百出的新鲜玩意，每周给推销员寄去一种：上一周寄的是把小鸡毛掸子，上面挂着一个吊牌，督促他“打扫自己的领地”；下一周又寄一个大爆竹的模型，叮嘱他要“振聋发聩”，类似的计划还很多。美国切片机公司在圣诞节的时候，为每一位完成定额的推销员送去了

从大繁荣 到大萧条

一只火鸡。后来销售经理进行了一番解释：“我们请每个人挑选家里的一个孩子来扮演吉祥物，让他们都意识到只有卖力工作，才能让孩子们有一个快乐的圣诞节。这些小孩子对待这个计划的态度非常有趣，他们兴致勃勃，简直太可悲了。”另一家公司的销售经理津津乐道地说：“自己的一个妙招，就是用别人的良好业绩刺激另一个人，直到他非常痛苦地准备战斗。”据杰西·雷恩斯福德·斯普拉格说，还有家公司发明了一种推销员的激励方法，当时受到了一致赞誉，但这种手段残酷之极，可谓创下了柯立芝繁荣时代的一项纪录：在公司举行的盛大宴会上，为业绩最好的员工送上了牡蛎、烤火鸡和精美可口的冰激凌；为业绩第二的员工端上了除了没有牡蛎之外，其他一模一样的晚餐；而在业绩最差的员工面前只放一小碟煮熟的豆子和几片硬饼干。

如果说推销员有时都会面临这样的压力，那消费者能感受到压力也就稀松平常了。有两个足以表明商业手段的发展趋势的极端例子（引用自杰西·雷恩斯福德·斯普拉格的材料）：有一家药品批发企业在一张小桌子周围放上栏杆，桌子上放着展示的“特色产品”；这张桌子就径直放在顾客经过的路上，按照《墨迹》杂志的说法，“这些商品肯定会引起顾客的注意，他们或被绊倒，或是他们被撞上，或是他们的脚踝被碰到，总之顾客会接触到它们”。《销售新闻》曾把“销售技巧”的现金大奖颁发给了一个电动吸尘器推销员，他讲了下面这个体现着商业威力的故事。有一天，他在街上朝楼上张望，看见二楼窗口有位太太在拍打地毯。“通往楼上房间的大门正好敞开着。于是我没有敲门，就直接走上楼去，跟那位太太打了声招呼：‘您好，我来得刚好。您希望我从哪间房间开始打扫？’她非常讶异，说我肯定记错了门牌号码。我一边诚恳有礼地道歉，一边将吸尘器通上电就开始工作。最后等我走出来的时候，手里的吸尘器已经不

见了，换成了一份合同和分期付款的支票。”有个男人未经允许，擅自闯进一位太太的公寓里，就开始假模假式地操作吸尘器，《销售新闻》的读者显然会对这个故事产生浓厚的兴趣。因为如果你能在这种事情上侥幸成功，就会推动商业发展。良好的商业发展能较好地推动经济繁荣，而经济繁荣对这个国家大有益处。

五

面对新时代的竞争，广告商们想出了更好的创意策划方案，拍出了具有说服力的真实照片，投入了大量的精力。据弗朗西斯·斯森（Francis H. Sisson）的统计，1927年的广告费总金额超过了15亿美元。他们以坦率的新态度来面对竞争，向刻板严肃的杂志读者介绍除臭剂和高洁丝卫生棉的优点。此外，他们还在生产技术上做了细致的调节。

此时的编写广告词的写手较少关注产品的特性和优点，而是更注重研究顽固的大众心理。他们意识到大家希望自己富有活力、具有魅力、家境富足，期盼自己的家庭和模范家庭相媲美，让别人倾羡。广告商的制胜绝招就是将自己的产品和这些特质联系起来，无论是否符合情理，无论是真心实意还是连讽带刺，人们都能从夸张的场景中学到些什么。广告里虚构的男女用香皂改变了自己的命运，时髦人士就算把眼睛蒙上也能选择正确的香烟品牌，要么用镀着金的鉴定书来表明（通常是花钱买来的），使用这些广告中的产品的都是时尚名士、电影明星和飞行英雄。据说有位电影皇后从加利福尼亚的千里之外赶到纽约，度过了疲惫不堪的一天，为几十种化妆品拍推荐广告，在几十家商业新闻上出现背书。事实上，许多产品她大概根本没有认真看过，这些活动不过是为了帮她的新片做广告而已。实验室里脚踏实地的成果有什么价值？牙粉厂商难道没有引用医疗机构的

从大繁荣 到大萧条

数据来反驳夸张感人的牙膏广告？到头来这种反击还不是石沉大海？在战后十年的初期，广告被看成一项生意；在柯立芝繁荣时代的早期，口无遮拦的预言家把广告称为一种职业；等到了战后十年的末期，许多广告从业者发现，从通俗小报那里学来的手段能够收到很棒的效果，就在行内开始把广告称为发财的门道。

在20世纪20年代，精明人可能会说，他才不在乎谁制定国家的法律，只在乎谁能写出风靡全国的广告。因为广告里有时代传奇、浪漫爱情和苦涩悲剧，对普通民众而言，广告里刻画的人物比任何一本小说的主角都让人备感亲切。有个人还清楚地记得西雅图的阿狄森·西姆斯先生。这个故事的五个角色里，有四个人都没有使用弗汉姆牌牙膏，因而得了牙龈脓肿。令人欣慰的是，每个人都用白口罩遮住自己溃烂的口腔……有个倒霉蛋曾经是高尔夫球冠军，而今只能当个惆怅渴望的旁观者，轻手轻脚地跟在明星球员后面，他的糟糕健康都要归因于忽视对于牙齿的护理……有个可怜巴巴的人蜷缩在出租车的角落里，他的妻子责怪他整晚闷声不响（他本来可以引用《埃尔伯特·哈伯德人生剪贴簿》的文章，很容易让自己光彩夺目）。有一位先生的谈话震惊四座，身着晚礼服的旁观者满心羡慕，要是有人说“我想他引用了雪莱的诗句”，大家肯定会诧异地鸦雀无声……倘若人们对那位太太将心里的想法如实说出，她会马上除去身上的狐臭味……服务生对一个人说法语，使他遭到好友的取笑……有位姑娘竟然把菲力牛排当成了鱼肉……等到客人离开后，一对贫穷的夫妻相顾无言，感到羞愤交加，做妻子的依然紧紧抓住门把手，竭力忍住眼中的泪水，丈夫则满面惭愧地咬指甲（当你的客人离开后，你为邀请他们而感到后悔吗？让尴尬场面远离你！让著名的《礼仪手册》告诉你该如何优雅得体、用餐写信、穿衣打扮。）……那位头戴雏菊花环的少女，却不幸得

了脚气……广告图片里的男男女女，无论痛苦还是成败，都成为当时民间文学的一部分内容。

有时候，他们的功劳也令人惊叹。比如说，一位先生购买了尼尔森·道布尔戴（Nelson Doubleday）的著作《口袋里的大学》。有一天晚上他去参加聚会，席间有人提到了阿里巴巴：“你说阿里巴巴？我坐在椅子上向前探了探身子，我能给他们讲这个浪漫神奇的传奇人物的所有故事。”

“我不知道到底发生了什么，可他们都围坐在了我旁边。我向他们描述了那条渡过七海的金色大船，阿里巴巴和他那头驴子在不熟悉的道路上游荡，还有我们那位残酷野蛮的祖先。我讲到了他们闻所未闻的埃及女王克利奥帕特拉、古怪的希腊哲学家第欧根尼、罗穆卢斯和罗马城的建立。我告诉他们雷利爵士的不幸惨死、可怜的安妮·波琳的悲惨结局。他们说：‘你肯定环游了世界，才知道这么多奇妙的故事。’”

怀疑主义者会一笑而过，庆幸自己没有和那些人度过这个漫长难熬的夜晚；但是这则广告却使人们留下了深刻印象。对那些头脑简单的人来说，为自己打开了美好而前景光明的大门。他们只要填好支票，就能让晚宴上的客人為自己倾倒不已。

到现在为止，战后十年那些吸引目光的广告里，最著名的是一个系列长篇广告，通过描述一连串的不幸遭遇，来体现口臭的可怕后果，而这些事连亲密的朋友都不会知晓。“埃德娜总是当伴娘，从来也没当过新娘，她的遭遇真是太可怜了。”“她为什么要离他而去呢？”“这肯定就是你失败的根本原因。”这样一系列广告里的悲剧故事增添了人们惶恐不安的情绪，巧妙地体现了所宣扬的产品的优势。接下来就会是这幅图画——有个姑娘看着李施德林漱口水的广告自言自语道：“这种事绝不能

从大繁荣 到大萧条

发生在我身上！”尽管美国医学会坚持认为李施德林漱口水“并不是真正的除臭剂”，而只是用一种气味掩盖了臭味，但是那是白费口舌。生命延续研究所发现，“每20个人中只有1个患有牙龈脓肿，远远低于弗汉姆牌牙膏所宣传的五分之四的概率”（再次引用斯图亚特·蔡斯的数据），然而同样也白费口舌。口臭的背后有巨大的广告力量，而李施德林漱口水利用公众的担忧心理赚取的利润越来越多。

六

随着经济越来越繁荣，财富的新一轮扩散已经产生了效果。战争结束后，高等教育事业立刻显示出了繁荣兴旺景象，尽管此后发展速度有所放缓，这种增长势头却一直持续着，让大学理事们手忙脚乱：他们不免觉得奇怪，怎么能为这些猛然增长的申请人安排地方。那些发了横财的人想马上变得知书达理，在社交场上举止端庄，知识读本和礼仪手册应运而生。韦尔斯的《世界史纲》成了1921年和1922年非小说类的畅销书，紧随其后的是房龙（Van Loon）的《人类的故事》和英国科普作家约翰·阿瑟·汤姆生（J. Arthur Thomson）的《科学大纲》（1922年的两本畅销书）、双日出版社邮购的《礼仪手册》和艾米丽·波斯特（Emily Post）的《礼仪手册》（1923年排名领先的非小说类畅销书）、《为什么我们的行为像人一样》（1926年的大热门），还有《哲学的故事》——这本书在1927年的非小说类畅销书榜上独领风骚。

此时还掀起了普通民众出国的热潮。美国商务部提供的数据显示，仅在1928年，就有43.7万人离开美国乘船前往国外，此外还有1.4万人经由铁路进入加拿大和墨西哥，有300多万辆汽车开往加拿大，在那里停留一天以上。这些老实人一掷千金，实际上，他们在国外消费的资金暂时解决

了国际金融的困境：在不允许外国商品大量通过高关税壁垒进入国内的情况下，美国如何继续获得外债利润、吸引国外在本国的投资呢？

美国成了全世界的银行家和金融领袖。当德国和盟国之间需要弄清楚彼此间的金融关系时，查尔斯·盖茨·道斯将军和欧文·D·杨（Owen D. Young）担任了盟军赔款委员会的负责人，不仅是因为他们的判断明智，在欧洲各国间保持中立，还因为美国已经处在了一呼百应的地位。美国人被一个又一个国家请去重组本国的金融体系。美国人在海外的投资飞速增长。在百老汇大街和华尔街的交会处，坐落着一座坚固的石墙大厦，墙上还残留着1920年爆炸案的弹片痕迹，而此时这里已经成为无可非议的全球金融中心。美国政府偶尔会使用武力手段干预其他国家的事务。美国海军占领了海地，恢复了尼加拉瓜的社会秩序。不过一般来说，美国扩张其帝国势力的方式不仅是军事占领和政治干预，还有金融渗透。

在美国国内，经济繁荣导致的最明显的成效就是，城市品位、城市服饰打扮和城市生活方式征服了整个国家。乡巴佬已经消失不见。新罕布什尔州和怀俄明州的乡下姑娘身上穿着短裙，嘴唇上抹着口红，和纽约城里的女孩子没什么区别。无产阶级渐渐丧失了自己的阶级观念；美国劳工联合会的会员和影响力都不断减少；如今，工人们拥有了自己的二手别克车，为纽约市市长吉米·沃克（Jimmy Walker）高声叫好，看起来毫不反感他的光鲜衣着、所雇的男佣，还有他频繁光顾百万富翁聚集的棕榈滩。梅隆、胡佛和莫罗等人发现他们的资产成了财富，而不是担任公职的负担；亨利·福特参加1924年的总统大选，得到民众的广泛推崇。这些情形都不是偶然出现的。拥有百万财富是成功的标志，而成功则受到全国的崇拜。

从大繁荣 到大萧条

七

商业重新赢得了新的尊重。人们曾经觉得，商业不如那些学问高深的职业受人敬重，不过现在，如果人们把一位牧师称作成功的商人，那就是给予其很高的赞誉了。在年会上，大学校友为银行理事的话拍手称快，因为理事们把教育称作美国最出色的行业，把大学校长、教务主任和商业高管等而视之。许多大学开设了商业课程，如果攻读文理学科的学生报名参加了广告文案、市场营销、基础速记和药店实务的学习，学校会兴高采烈地把这些课程计入他们的学分之中。哥伦比亚大学甚至用上了冰箱厂商惯用的随访函，派出推销员登门拜访那些稍感兴趣的人士，吸引他们攻读本校的函授课程；连芝加哥大学这样的名校都使出了安德烈·西格夫利德（Andre Siegfried）的“成功手段”，该校函授课程的广告开头是这样苦心劝导的：“只要研究、坚持、收获，你的能力在家就能大大地提升。”哈佛商学院设立了一年一度的广告大奖，为妙语连珠的商品销售广告词颁发学术荣誉。对教会而言，这股商业热情的潮流实在难以抗拒。据《美国信使》杂志报道，纽约的瑞典以马内利公理会教堂，向所有为教堂建设基金捐款100美元的人授予了“天堂投资优先股的书面证明”，承认了商业需要比灵魂恳求更有优越性。纽约市住宅区一座教堂的公告牌上呈现出了同样有说服力的口吻，“进入教堂吧，基督教礼拜会提高你的效率。——基督徒克里斯蒂安·莱斯纳牧师”。

在每一座美国城镇，服务俱乐部里中产阶级的精英人士会聚一堂，他们每周举行一次气氛融洽、欢快热烈的午餐会。这些俱乐部发展迅速，创立于1905年的扶轮社，就是其中最负盛名的俱乐部。到了1930年，扶轮社已经有15万名会员；作为国际影响力的标志，该社无比自豪地宣布在44个国家拥有了3 000多家分社。国际同济会的数量从1920年的205家增

加到1 800家。狮子会于1917年才成立，到了战后十年的末期，就达到了1 200家。这些俱乐部并不满足于唱歌游玩和参加社会服务活动，它们表达了美国开国功勋们的民族信仰，那就是“重振商业的影响力，使其获得新生”。演说家在他们面前描绘了一幅美景，商人是立志做出惊天动地事业的栋梁之材，也是希望创造伟大事业、寻求为人类服务的新道路的梦想家。这种表达方式很受欢迎，在数以百计的经理办公室里，在数以百计的会议桌前，柯立芝繁荣时代的美国商人自以为高瞻远瞩，坚定地展望着未来。在战后十年的末期，《纽约客》杂志刊登了一幅漫画，对商界的自我吹捧进行了一番精彩的讽刺，漫画中的经理在会议上对一群肥头大耳的同事们说：“我们有个好主意。咱们可以和风车大干一场，就像七个唐璜做的那种事。”互助俱乐部尤其擅长用这种神秘口气说话，在艾奥瓦州滑铁卢的扶轮社会员面前，有位演说家引用了《美国信使》的报道，声称：“扶轮社难道不是神圣的象征吗？”

确实，商业与宗教的结盟是这个时代最典型现象。全美信用调查员协会在纽约召开年会的时候，圣约翰大教堂为3 000名代表举行了特殊的祷告仪式，五天的祷告分别由新教牧师、罗马天主教神父和犹太教拉比主持；S·帕克·卡德曼（S.Parkes Cadman）博士做了被称为“商界的宗教”的布道，让信用调查员们深受鼓舞。同样，当广告联合会在费城开会时，大家聆听了卡德曼博士关于“想象力与广告”的主题讲座，而在教会广告部的会议上，讨论的话题包括“广告的精神原则”和“通过新闻广播为天国做宣传”等。其实在开会期间，每天晚上11点半到凌晨2点，与会者们都在观看酒店精彩的歌舞节目，大西洋城选美大赛也在此举行，这不过表明了那些具有崇高信仰的人士也必须有他们的享乐待遇。

人们时常引用《圣经》的典故来论述商业观点，也经常用商业观点

从大繁荣 到大萧条

来解读《圣经》，有时甚至很难说清楚，究竟是哪一方从这种关联之中收获更多。纽约建筑商、房地产商弗雷德·弗兰奇（Fred F. French）这样对手下的推销员说：“世上没有不成功的理由，我们能在《马太福音》第七章第七节中找到这套理论的真实证据，这位伟大的人性论者说道：‘叩门，就给你们开门。’”弗兰奇接着引用了“其中最重要的训示——‘又要爱邻如己’，对推销员们说，要培养这种高尚的情操，不断地丰富自己的人格，充分提高自己的能力，那么在这一年里，你就能为我们的股东提供更低廉的佣金率，自己就能比1925年赚更多的钱”。在这种场合，《圣经》显然满足于被作为商业标准，为自己谋取经济利润。而在另一些场合，商业难免被当成衡量准绳，为《圣经》做出达到商业水准的赞扬。

证据，比如，让我们看看大都会财产保险公司发行的手册《摩西，人类的说服者》（推荐本书的正是那位诲人不倦的卡德曼教授），手册里面宣称：“摩西是到现在为止最伟大的推销员和房地产销售代表，他是一位统治世界、勇敢无畏的成功人士，参与了有史以来最宏伟壮阔的推销活动。”最后，再来看看布鲁斯·巴顿（Bruce Barton）在《一个无人知晓的人》里宣扬的不俗理念。这本书是1925年和1926年的非小说类畅销书，连续两年打动了美国人的内心。巴顿通过展现基督教和商业的相似之处，向公众推广基督教。这本书教导我们，耶稣不仅是“耶路撒冷宴会上最受欢迎的宾客”，还是“户外活动家”，是“一位伟大的经理人”。“他从商业底层中选出了12个人，并把他们集成成整体，从而征服了世界……世上再也没有这种能把这个组织整合起来的成功经理人的崇高的典范。”巴顿把耶稣比作“历史上最有影响力的广告，如果在今天，他会成为举国闻名的广告商”。事实上，耶稣是“现代商业的创造者”。你或许会问为什么，因为他是为理想而服务的第一人。

布鲁斯·巴顿对福音书的阐释满足了大众的需求。在柯立芝繁荣时代的仁慈的影响下，商业成了美国的民族宗教。数百万人都希望得到这种宗教正确而合理的保证，法律和预言家为赚大钱的方法制定了一系列规则。

在巴顿信条势如破竹般地四处推广的那些年里，销售和广告活动变得越来越浮于表面。对于茶壶山丑闻曝光和大陆贸易公司的卑劣历史，美国商界表现得置身事外，你不觉得奇怪吗？就算并不奇怪，不过你必须记得一点，所有的宗教都会存在信仰和现实的差距。商人头顶的光环并不切合实际，可他还是得意忘形地将这个光环戴在头上。

八

繁华富丽的花车鸣着汽笛，将油门一踩到底向前驶去。可是，那个坐在司机座位上的人，也就是为这个繁荣时代命名的人，究竟长什么模样呢？

他没有突出的下巴，没有强大的个人能力，也没有雄辩口才。如果你来自偏僻角落，从商会的一群支持者中看到他的身姿，绝不会认为他就是这群人的守护者。他从不曾涉足商界，却被忙碌生产的工厂主和高度紧张的推销员视为圣徒，这种悖论多么崇高啊，不过也很有道理。因为卡尔文·柯立芝本人就是柯立芝繁荣时代最不凡的标志。

他来自佛蒙特州，身体瘦弱，面部棱角突出，浅黄色头发，紧闭着嘴唇。谈及他脸上的表情，就像威廉·艾伦·怀特所形容的那样：“清高孤傲，看起来像是在搜寻对他无礼的鼠辈。”他面容苍白，难以亲近。私下他非常健谈，但是在公众面前冷若冰霜般谨言慎行。他对待波士顿警察大罢工的态度异常坚定，引起了全国民众的关注，也将他送上了华盛顿的副总统位置，可是连哈定政府的温暖也没有融化他。副总统必须出席很多正

从大繁荣 到大萧条

式宴会，柯立芝按惯例赴宴，却依然沉默寡言。华盛顿宴会的女主人们非常失望，疑窦丛生。爱德华·劳瑞这样写道：“他们觉得，阿尔卑斯山的那边就是意大利，但是从来没有人爬到山顶，所以他们不知道是否值得为那边的风景去攀登高峰。”柯立芝当上了总统，却依然冷漠清高。

沉默少语的外表却没有掩盖他宽广的胸怀。柯立芝对美国历史了如指掌，但不管是他本人还是他的意识从没有草率涉足海外事务。读完他的演讲和自视超凡的《自传》，你会发现其中最特别的地方，就是从头到尾都缺乏新意。卡尔文·柯立芝依然非常相信老套的美国格言，而大家要么把这些统统忘掉，要么对此产生怀疑。这些信条无非是：“各行各业要通过投入的勤奋努力来精确衡量才能取得的成功”；“我只能相信一种形式的政治方略，那就是尽力做有益于人民的事，也许就能够获得成功”；“倘若社会缺乏学识和美德，必将沉沦下去”；“拥有最伟大道德力量的国家必将胜利”。这套努力工作、节俭生活和虔诚方能成功的哲学，大概是从佛蒙特州的阁楼里已经积满了灰尘《麦加菲读本》中翻出来的。不过正因为它年代古老，才显得老而弥坚。事实正是如此，无法计算得出有多少美国人曾经坐在母亲的腿上聆听这番教导，如今它们又不经意间触动了他们保留在心底的勇气。柯立芝用新鲜而简洁的语言对这套哲学进行了重新阐述，赢得了民众的充分信任。有人暗自猜测，假如总统说句两点之间的最短距离是直线，报纸社论会不会对他的判断简明扼要大加称赞。

他并不是胆大妄为的领袖，也不愿成为这样的人。他既不好冲动也不善攻击。虽然他当白宫的主人共计五年七个月，但他的总统表现实在不怎么显眼，简直令人瞠目结舌。不过这正是他希望得到的结果。

在外交政策方面，柯立芝政府没有费尽力气劝导美国人民：他们并不是幸福自在地与世隔绝。银行家会参与决定德国战争赔款的数目，民间

观察家会出席欧洲谈判，但是柯立芝政府对伍德罗·威尔逊的失败印象深刻，精心维持着事不关己的态度。像前任哈定总统一样，柯立芝提议美国应该加入国际法庭，但是他的态度非常暧昧，最终参议院有保留地批准了这个提议，而这些保留条款却是其他成员国不能接受的，总统卸任之时还未能实现自己的这个目标，不过没有人认为他因此失去信任。1927年，第二次海军会议在日内瓦举行，却失败了。尼加拉瓜爆发骚乱和政变后，美国海军出兵尼加拉瓜，亨利·刘易斯·史汀生（Henry L. Stimson）提出了在美国监督下重新选举政府的计划，最终将尼加拉瓜的革命压制了下去。在美国所属油田合法权益与地位的问题上，美国和墨西哥发生严重冲突，柯立芝任命阿默斯特学院的同学德怀特·莫罗（Dwight W. Morrow）担任美国驻墨西哥大使，此人机智勇敢，从中巧妙地周旋，最终将此事圆满解决。然而，柯立芝政府在外交事务方面最显著的成就是，在签署《凯洛格—白里安公约》中所体现的主导作用，该条约宣布放弃将战争作为国家政策手段的权利，各国都愿意这样做，但是公约对国际关系的实质几乎没有明显效果。除了在解决尼加拉瓜的问题上拖拖拉拉，解决与墨西哥的争执，拥护这个可有可无的公约，柯立芝政府的政策就是筹集奖金（不顾民众的极度反感），密切关注美国金融帝国的扩张，不然就是听之任之、自我满足。

在国内政务方面，柯立芝政府的记录更是不值得一提。他本人极其谨小慎微。当哈定丑闻曝光后，柯立芝采取了必要的措施，对此案提起公诉，使出巧妙的计谋把臭名昭著的多尔蒂内阁驱逐了出去，此后他一直表现得极为冷静，并具有公信力。当无烟煤矿罢工时，他并没有急于干涉，而是委派宾夕法尼亚州州长吉福德·平肖（Gifford Pinchot）处理此事。面对当时棘手的政治问题——禁酒令时，他并没有明确表态，只是

从大繁荣 到大萧条

说应当依法执行。面对轰轰烈烈的禁酒运动，卡尔文·柯立芝依然置身事外，对此漠不关心。

他为了使商界的利益保持现状，两次否决了麦克纳里—豪根农田救济法案，原因是这项法案在经济上并不合理划算，工业界和银行界对他的做法非常满意，他最强有力的支持者正是这些人。他还以经费问题为由对士兵奖金提案进行否决，不过这次否决遭到了驳回。他最为自豪的是，通过紧缩政府系统的经费，减少了政府开支和公共债务，四次降低联邦税费，不仅使收入微薄的人从中受益，更让家财豪富的人获得了更多的好处。与此同时，商务部部长赫伯特·胡佛通过帮助商界，让自己巧妙地从中受益；在政府的各项任命里，尽可能把那些看不惯当代商业惯例的家伙替换掉，让对商界宽容相待的人士代替他们的职位；人们对商界广为赞誉，以确保经济繁荣已经站稳了脚跟。

难道你不觉得这种政策极为平凡又缺少胆略？可现实就是这样。卡尔文·柯立芝一心一意地认为，只要自己尽量不参与其中，减轻富人的赋税，就能对整个国家都有好处，也许他的确是这样做的。这种政策又完全符合当时极为平凡又缺乏胆略的政治氛围。因为繁荣时期贪婪的商人已经成为国家舆论的主导者，他们没有把政府看作是让国家离期望更近的、维护人权、修正谬误的政治机构。繁荣的花车载着他们飞速向前，驶向他们心中的梦想，而政治可能会成为拦住他们去路的绊脚石。他们不想让一位实干家坐在总统的位置上；他们希望政府的作为越少越好，成本越小越好。开着这辆繁荣花车的人，正是来自新英格兰地区的柯立芝，他沉闷呆板，对国家放任自流，体现了他们对作为至高无上的治国之才的看法。

卡尔文·柯立芝的确体现了某种治国之才。柯立芝繁荣时代有不容置疑的优点，在深知如何刺激经济繁荣，同时让自己脱离困境上面，总统本

人很是精明。他在《自传》里流露出的唯我独尊可能会得到人们的宽恕。柯立芝冥思苦想地接受了必然趋势，那份谨慎稳重，说起来也许有些冷酷无情；即使条件允许，他也根本不会表现得勇敢与大度。伟大的商业圣徒在这片土地上无人能及，卡尔文·柯立芝非常幸运，在神坛面前处事谨慎、谦恭之至，几乎成了半神半人的英雄。

FROM GREAT
P R O S P E R I T Y
TO GREAT DEPRESSION

第八章 大吹大擂的日子

所有国家，无论在哪个历史时期，都会一次次地被卷入狂热的浪潮，为时尚和戏剧化的公共事件感到兴奋至极。这些浪潮的波幅与波频各不相同，这些牵扯在其中的事件的本质也有着很大的区别。柯立芝繁荣时代最鲜明的特点就是，数百万男男女女以不可思议的速度，把他们的目光、言语和感情、兴趣全都对准了一连串庞大的琐事，比如重量级拳击比赛、一项谋杀案审判、一个新款车型，以及一次横跨大西洋的飞行。

从历史学家的传统观点来看，那些在全国上下闹得尽人皆知的事件，大多都并不重要。无论是霍尔—米尔斯凶杀案里胖女人的证言，还是在肯塔基州岩洞里对弗洛伊德·柯林斯（Floyd Collins）的营救，都几乎没有对人们未来的命运造成什么影响。然而，这些事情能让不计其数的人感到希望和恐惧，因此不能说并不重要。当一个国家厌倦了关注“国家大事”，柯立芝时代的人们才会对这种琐碎小事关切不已。不回顾这些事件的奇特经过，不将非同一般的社会环境考虑进去，对柯立芝时代的描写就

不够全面。这个时代的英雄并不是伟大的公仆、改革家、勇士，而是一位横跨大西洋飞行并得到奖金的特技飞行员。

卡尔文·柯立芝执掌白宫的时候，战后十年初期的紧张气氛已经得到缓解。尽管伍德罗·威尔逊还在S大街那座洒满阳光的宅邸苟延残喘，但国际联盟已经走到了尽头，只有那些不肯认输的理想主义者还在幻想这件事有复苏的可能性。自从红色大恐慌出现以来，激进分子备受打击，劳工运动失去了生命力和声望，在一夜暴富的有利影响下，资本主义如今把权力牢牢地握在自己手里。三K党的成员扩充至数百万人，但是当初在几千座山上点起火把的天真的激情却渐渐消失殆尽；三K党变得越来越不像改革运动，反倒像一场政治敲诈。真正让普通民众深有触动的公众事件，实在屈指可数。当然了，还有禁酒运动，每个人都感到兴奋；但因为不同党派对禁酒的意见各不相同，各位美国政治家差不多如此，都尽量把这个问题掩饰起来避而不谈。西北部和中西部的农业地区强烈要求实行农场补助，却只引发了人们零碎分散的勉勉强强的兴趣，因为全国其他地区都逐渐趋于城市化。高层几乎没有什么公德心，对于国际法庭、石油丑闻、尼加拉瓜局势、美国民生都不肯尽心关切。他们把精力投放在成功赢利的生意中，其他时间就在节日气氛里浮浮沉沉。他们也许会说：“没有历史的国度才叫幸福呢，有这么多的精彩节目值得去看呢。”他们已经准备好了，期待着精彩节目呈现在自己的眼前。

而今，比起其他国家和其他历史阶段，在美国有更多的民众可以同时欣赏一场极其精彩的表演。不仅汽车可以批量生产，新闻和思想也可以如法炮制。长久以来，便捷的全国通信体系让美国的有学之士与拥有财富之人越来越广泛地蔓延开去，越来越凝聚在一起，也越来越比以前起到更为重要的作用。

从大繁荣 到大萧条

首先，报纸的数量越来越少，发行量越来越大，通过增加报业协会的新闻素材和报业集团的专题报道，报纸的标准化达到了史无前例的高度。正如赛拉斯·本特（Silas Bent）所说，在1914年到1926年，全国的日报数量从2 580家减少到2 001家，周日报纸的数量从571家减少到541家，每份报纸的总发行量却从2 800多万份增加至3 600万份。克利夫兰市25年前有3家晨报，现在只剩下1家；明尼苏达州的底特律和圣路易斯也只剩1家晨报；芝加哥在人口增长1倍的时期，晨报从7家减少到2家。在集中化的趋势下，全美各地的报纸纷纷合并成连锁集团，到了1927年，赫斯特报业体系和克里普斯—霍华德体系的转型成功和削减管理成本的愿望，促使55家连锁集团成立，他们掌控了230家日报，每家报纸总发行量超过1 300万份。

地方报纸的编辑再也不像以前那样，依靠本地的作家和漫画家，用融合着地方色彩的内容来填充报纸版面；纽约的连锁公司和报业集团的总部能够为他供应各种内容，包括社论、健康讲座、连环画、知心姐姐专栏、家居小妙招、体坛八卦和周日特刊，这些内容足以迎合全国读者的口味，保证让普通民众享受精神大餐。从缅因州到俄勒冈州，漫画人物安迪·甘普（Andy Gump）和记者多萝西·迪克斯（Dorothy Dix）拥有数百万的粉丝。一个记者到杰克·邓普希训练营采访后字斟句酌写出的报道，可以让佛罗里达的房地产商和西雅图的铆工同时看得回味无穷。

与此同时，发行量巨大的全国性杂志越来越多，全国性广告的数目也日渐增多。一群广告代理商掌握了推销秘诀，那就是把他们的产品和当前公众关心的话题联系起来。他们最终发现，无线广播是个值得重视的新现象：广播把不计其数的家庭联结在一起，人们会同时收听世界职业棒球锦标赛，欢迎林德伯格的归来。国民思想成了操控在少数人手里的新式工

具。赛拉斯·本特也指出，这些人慢慢学着依靠新方式去利用国民思想，让人们每次只将全部精力消耗在一件事情上。

他们并没有凑在一起有意识地商量这件事。社会大环境和利己主义让他们必然做出如此选择。他们在不经意间发现，每一次公众只会为一件事情感到兴奋，这正是通俗小报每天教给他们的成功之道。报社老板和主编对此深有体会，无论是发生在代顿小镇的审判案，还是“维斯特里斯”号轮船沉没，只要他们费尽心机地派出明星记者，刊登头版新闻，使用大量篇幅进行报道，就能卖出更多的报纸。他们充分利用了这一新发现：据赛拉斯·本特搜集的资料显示，不值得一提的格雷—斯奈德谋杀案在媒体上受到的关注，比对“泰坦尼克”号沉没的关注度还要大；林德伯格的飞行冒险在报纸上占据的篇幅，比报道停战协定和德意志帝国灭亡的篇幅还要多。报业集团的高管和撰稿人、广告商、新闻宣传员和电台播音员都非常清楚：获得公众兴趣的关键，就是提及当天所发生的重要事件，不管内容是怎样的不重要。结果就是，每当发生可能引起公众思考的事，你就会发现这件事被作为头条新闻登载，在多个版面的联合讨论里出现，从收音机的广播里传开去，被公众热切关注的演说家和传教士不断提及，在周日报纸和电影里被人们看到。除非你是个性偏强的个人主义者，你一定会被同时让广大公众为之兴奋而感到强烈震撼。

这个国家已经吃上了面包，却还想看看杂技表演，如今呈现给他们的就是数以万计的精彩表演。

二

在1923年到1924年的冬天，麻将仍然受到广泛欢迎，卡尔文·柯立芝渐渐习惯了在白宫的生活，博克和平奖获奖者已经公布，石油丑闻昭然

从大繁荣 到大萧条

若揭，伍德罗·威尔逊黯然离开人世，道斯将军出国主持战争赔款会议，《如此巨大》创下小说的最高销量纪录，人们厌倦了《没错，我们没有香蕉》的陈词滥调，考古学家将卢克索的法老图坦卡蒙石棺打开了，让报纸编辑兴奋异常。麻将虽然流行于各地，却已失去了之前的新鲜感。

就在那年冬天，确切地说是1924年1月2日，纽约有位年轻人去看望他的姑妈。这位姑妈的亲戚对《纽约世界》杂志增刊每周日刊登的填字游戏非常着迷。她就问这个年轻人，有没有这种填字游戏的书，可以当作非常不错的礼物送给亲戚。虽说早在1913年填字游戏就已问世，在《纽约世界》上也登了数年，但是这个年轻人到处去问，却发现根本没有这种书卖。但是巧事就是这么发生了，这个名叫理查德·西蒙（Richard Simon）的小伙子恰好正在和朋友舒斯特做图书出版生意，和另一个姑娘一起组成了一个出版工作室。西蒙想到了一个好主意，第二天就和舒斯特商量起来，他们要自己出版一本填字游戏书。两个年轻人请来了《纽约世界》的谜题编辑普罗斯佩·布兰纳利（Prosper Buranelli）、格里高利·哈茨维克（F.Gregory Hartswick）和玛格丽特·皮瑟布里吉（Margaret Petherbridge）编写书的内容。尽管那些书商的态度有些冷漠，对他们说公众“肯定不会对字谜书感兴趣”，两人还是在4月中旬将这本书正式发行。

他们的促销活动别出心裁，后来证实此举非常有先见之明，从一开始两个人就为这本书打出了下面这则广告：

1921年：库埃

1922年：麻将——

1923年：香蕉

1924年：填字游戏书来了！

填字游戏书来了！

还不到一个月，这本封面设计怪异、顺带赠送一支铅笔的小册子就成了畅销书。到了第二年冬天，本书销量达到几十万本之多，其他出版商开始纷纷出版这类书籍，想在这股热潮中分得一杯羹。一份报纸要是每天没有刊登填字游戏，就显得索然无趣。字典的销量也不断增长，对职业作家帮助极大的旧版《罗杰特同义词词典》，也有了新的需要。有个纽约人为了猜出一个字谜，在饭店里待了四个小时，最后由于不肯离开而被抓进了监狱。芝加哥的玛丽·扎巴（Mary Zaba）太太因为她的丈夫一直沉浸在填字游戏里，没有时间照顾她的生活，而被新闻称为“字谜寡妇”。报纸上说，有位匹兹堡牧师把自己的布道文章编成了字谜。在巴尔的摩到俄亥俄的铁路上，所有的火车都提供字典。一位从纽约到波士顿的旅客说，火车上60%的乘客都忙着玩填字游戏，餐车的五个列车员在冥思苦想：到底是哪五个字母组成的单词；有“让人闻之色变”的意思。你在街上不管遇到什么人，他都能说出埃及太阳神的名字，或是告诉你两个字母的单词，是印刷单位。

填字游戏的潮流在1925年平静下去。此后，问答一类的图书小范围地流行开来。曾经有一段时间，记性欠佳的绅士、贵妇免不了常在晚宴后丢脸，因为他们不认得宗教领袖约翰·胡斯（John Huss），也不知道欧姆是什么。等到了1926年，合约桥牌传到了美国，他们才松了一口气。尽管填字游戏日渐衰落，不过在战后十余下的岁月里，它依然出现在各大报纸每天的版面上。1930年，西蒙和舒斯特出版了第16本填字游戏书。从1924年年初到现在，这一系列图书总计销售了近75万本，如果将英国和加拿大的销量都包括在内，总数足可达200万本。

从大繁荣 到大萧条

三

像麻将潮一样，这股填字游戏的热潮是美国人民对于流行一时的事物异常敏感的新风向标，但从真正意义上来说，这并不是报纸宣传方式的新产物。报界等到这种流行事物日趋成熟时才开始加以利用，此时的媒体还没有能让数百万民众为一点琐事就兴奋的强大能力。

当然，在1924年到1925年年初，就是大家都在玩填字游戏的时候，还有很多让报纸的普通读者感兴趣的事情。当时正值总统大选，民主党人在纽约麦迪逊广场花园召开热烈的全国代表大会，前财政部部长威廉·吉布斯·麦卡杜和纽约州州长阿尔·史密斯两派展开势均力敌的持久战，最终以代表们对约翰·威廉·戴维斯勉勉强强的支持落下帷幕，多少有点不太雅观。西部人对坦慕尼派天主教徒恨得咬牙切齿，坦慕尼协会的支持者却哼唱着《漫步在纽约》，刺激着人们的对立情绪。民主党再不能恢复元气，冷静而沉稳的卡尔文·柯立芝平静地坚守着经济发展和减税政策，把握住了让自己成为繁荣时代标志的窍门，获得了大多数人的支持，登上了总统的位置。在芝加哥，杀害了少年鲍比·弗兰克斯（Bobby Franks）的利奥波德和洛布接受了审判。威尔士亲王访问纽约长岛，在此期间，他经常跳舞、打马球、坐摩托艇，还被人看见翻阅了《沃尔特·海因斯·佩吉的人生与文学》。（顺便说一句，正是在1924年，还从英国引进了其他东西，比如说，具有光明前景的美国青年，第一次穿上了被称为“牛津布袋”的灰色法兰绒长裤）。值得称道的一件事是，法兰西的贵族典范和好莱坞的当红明星喜结连理：法莱斯·德拉古德雷（Falaise de la Coudray）侯爵迎娶了葛洛丽亚·斯旺森。1925年那次辉煌的日全食，仿佛是天特意为东海岸城市准备的人间美景。芬兰飞人帕沃·鲁米（Paavo Nurmi）上演了一段惊世传奇：他手里握着秒表奔跑在跑道上，

将扬扬得意的出租车司机乔伊·雷甩在身后，最后竟然用了不到9分钟的时间跑完了2英里，取得了不可思议的成绩。还有一件轰动的事情，阿拉斯加州诺姆小城白喉大爆发，伦纳德·萨帕拉（Leonard Seppalla）和贡纳·卡森（Gunnar Kasson）依靠雪橇犬巴尔将血清托运而来，因此控制了疫情，他们后来都成了民族英雄。此外，还有弗洛伊德·柯林斯掉进洞穴的新闻。

也许，正是这个弗洛伊德·柯林斯的悲剧故事可以最为清楚地表明，在那个空前统一的年代，哪怕是一件微不足道的小事，只要描述的情节跌宕起伏，也能让美国民众异常关切。

弗洛伊德·柯林斯是一位名不见经传的肯塔基青年，一直在距猛玛洞穴5英里的地下岩洞里探险。他并不想当什么英雄，只想找到几处能够吸引游客的景点赚些钱。在距离出口125英尺的地下，他不幸地掉进深坑里，双脚卡在了巨石下面无法动弹。岩洞里面狭窄陡峭，那些试图救他的人不得不在腰间系上绳子，过冰冷的稀泥和流水，拿着锤子和喷枪把岩石敲碎，再用手一点点地把泥土和石块运出来。倘若不是《路易斯维尔信使日报》的记者米勒（W.B. Miller）如此充满斗志、勇敢、能干，就不会有几个人听到柯林斯身陷困境的消息。米勒慢慢爬进湿滑崎岖的通道，采访柯林斯，竭尽全力地营救这个小伙子，用文笔生动的报道描述了当时的处境。让他感到惊讶的是，整个国家都将目光聚集在这场营救行动上面。柯林斯的困境充满奇妙悬念、个人与命运的抗争，这些元素足以组成一篇精彩的新闻报道，各个城市的编辑每天都用头版刊登他的遭遇。米勒刚到这个岩洞的时候，只看到三个人守在洞口，他们围坐在火堆旁取暖，看起来非常冷静。他不由得心里暗自猜想，自己的朋友要什么时候才能从困境中摆脱出来。可是两周后，那里就搭建了100多项帐篷，人们大声叫喊着，

从大繁荣 到大萧条

要靠铁丝网路障和端着刺刀的州民团才能控制局面。1925年2月17日，就连《纽约时报》也登出了三行头版头条消息，公布这件事情的最终结局：弗洛伊德·柯林斯被困18天后死于洞穴；至少达24小时无生命迹象；必须切除双脚才能把尸体运出。

查尔斯·梅尔茨后来提醒《新共和》的读者，这件事发生不到一个月后，北卡罗来纳州的煤矿发生了坍塌，共计71名矿工被困井下，其中53人丧生。但是这起事故丝毫没有引起人们的关注，大家心不在焉地说道：“那只不过是场矿难罢了。”然而，在两周多的时间里，一个寻找景点的普通探险者身陷困境，却让肯塔基州的岩洞受到全国人民的关注。这场演出看起来精彩纷呈，新闻媒体渐渐懂得每次只把聚光灯对准一场表演就足够了。

不过，和几个月后的那场表演比起来，柯林斯遇险实在算不了什么。那是在田纳西州的代顿小镇上，当地中心高中的教师约翰·托马斯·斯科普斯（John Thomas Scopes）由于传授进化论而遭受审判。斯科普斯案件具有真正的重要意义，它用夸张的方式表现了这个时代最为重要的斗争，那就是宗教与科学的冲突。这场审判虽然经过媒体的精心炒作，显得吸人眼球又争议不断，却不免有几分类似于杂耍的表演。

四

如果说宗教在战后十年走向衰落，那么最可信的教会统计数据却显露出一丝这样的迹象。当然，统计数据表明，还在使用的教堂数量增长非常缓慢。不过一方面是由于大量人口涌向城市，现有教堂为了巩固自身地位，致使民众前去规模更大的几间教堂做礼拜；另一方面，教堂会众人数的增长速度和人口增速基本持平，但教堂财富和花费的增长速度则更快。

实际上，参加礼拜仪式的人数没有可靠的数据。不过人们普遍认为，越来越多的虔诚教徒发现，星期天早晨还有其他事要做。统计数据表明，在美国人生活中教会显然依然维持着一定的地位。

不过，人们很难对这样一个结论视若无睹，教会的地位得以维持，也许从某种程度上来说，主要是由于以下原因：人们格外关心自己应得的东西；各地渐渐对布鲁斯·巴顿那套改头换面的福音以平常心待之；越来越竭尽全力吸收信徒和筹款活动（比如说，曼宁主教在纽约发起了“为所有人祈祷的教堂”的募捐活动，但是最终却建了一座新教圣公会教堂）；教会的戏剧演出、公开辩论、篮球比赛、游泳和体育奖学金，这些世俗活动对年轻人极具诱惑力。但是，某些人对自己踏上救赎之路的坚定信念的精神力量已经从教会之中离开。宗教引发了热烈的讨论，关于宗教问题的书籍大行其道，宗教领袖经常为流行杂志写文章。不过，这些都无非是证明，对数百万民众而言，宗教成了深入讨论的话题，而不再是人们理应接受的社会习俗。

正如沃尔特·李普曼所言，如果认为教堂会众的人数在减少，也许是因为人们不再确信他们去教堂就是去见上帝。如果说牧师的威望下滑，多半是因为牧师不再像以前那样坚信自己具有明确权威与使命。查尔斯·施特勒茨（Charles Stelzle）牧师敏锐地观察到了宗教的形势，他在《世界工作》杂志上毫不掩饰地写道：教会的衰落主要是因为“那些认同教会的人并不是真的信仰宗教”。施特勒茨牧师曾经问过一群牧师，假如他们是局外人，那么在他们的教堂里有什么活动能让人们称赞说“太棒了，就算排队等待也值得”。他没有得到明确直接的答复，连回答问题的人也对自己的答案不满意。在教会信徒中，尤其是那些青年男女，对教会的虔诚日渐冷淡，对教会给予他们的启示认知不清，这些都是难以否认的

从大繁荣 到大萧条

事实，比如说，许多大学在取消礼拜仪式后，人们说话的口气就足以证明这一点。

丧失精神力量的原因多种多样：战争结束后道德感下滑；经济繁荣的景象鼓励人们追求舒适度，只要得到一辆凯迪拉克轿车，受到《美国杂志》文章的赞扬，就能带来名利；周日开始流行高尔夫球和驾车出游；人们不赞同教会组织的那些政治游说活动，反感许多牧师和三K党一样持有同样的偏见；比这些原因更重要的是，科学原理和科学思考方式对教会起到了一定的影响。

科学的威望是异常大的。无论是街头行人还是厨房主妇，大家都在使用实验室里研制出来的新型机器和新款设施，他们相信科学几乎能完成所有的事情。丰富的科学信息和理论令人眼花缭乱。报纸开辟出大量版面向读者报道最新的发明成果（也难免传达错误信息），阿尔伯特·爱因斯坦（Albert Einstein）的最新名言成了当时的头版新闻，可惜实际上没人能搞懂其中的含义。媒体上的知识理论层出不穷，向读者介绍小行星的假说和原子构成理论，讲述原始人日常生活中难以证实的细节，让他们对电子、内分泌、激素、维生素、反射和精神病有一定的了解。在知识较浅的认知层面上，数百万人平生第一次发现，还有进化论这样让人肃然起敬的理论。那些早年吸收这种理论的人，从韦尔斯、汤姆森、伊斯特（East）、韦更（Wiggam）、多尔西（Dorsey）及科普作家和翻译那里，接受了一套新鲜又不安的思想：我们居住在一颗渺小的行星上，太阳不过是位于银河系中的一颗普通的恒星，像银河系这样的星系在浩瀚宇宙中不计其数；我们的行为主要依赖染色体和内分泌腺；霍屯督人接受的神经刺激和浸信会牧师受到的刺激相差无几，即使前者遵守了浸信会的教义礼节，也能更好地适应霍屯督人的生活环境；性是生活中非常重要的因

素，人无法忍受性压抑，罪孽成了过时的说法，大多数不良行为都是人类童年的复杂情绪所导致的，男性和女性都不过是行为模式的综合产物。即使有些科学原理和伪科学理论在人们心里相互冲突，看起来也并不重要：他们既崇尚伊斯特和韦更在遗传学方面的权威，也崇尚沃特森在环境学方面的威望。

在所有的科学领域里，一门最年轻也最不科学的学科征服了普通大众，对宗教信仰造成了打击，导致了分崩离析的后果，这就是至高无上的心理学。心理学家弗洛伊德、阿德勒、荣格和沃特森拥有千万信众；智商测试人员走进学校来测验学生的智商；精神疾病医生进入企业，为招聘员工、解雇员工，以及制定广告策略提供相关咨询；心理学掌握了固执、离婚和犯罪问题的要害部分。

科学这个词似乎成了准则。在声明前面加上一句“科学告诉我们”，就足以平息一场争议。无论是销售经理要将促销计划推迟，还是牧师推广慈善活动，他们都会脱口而出，这是科学的做法。

将科学前置对神职人员也产生了影响，宗教领袖哈里·爱默生·福斯迪克（Harry Emerson Fosdick）博士在战后十年的末期对此做了一番总结：“牧师为了自己的职位，可能会宣扬古代传统、实际用处和精神需求，可是只要一句疑问就能戳破所有的泡沫：这个科学吗？这个问题在宗教中搜寻违禁品，宗教古老的迷信外衣被脱去，迫使宗教改变自身的思想体系和研究方法，一般来说，这个问题让宗教感到害怕。许多思想现代的信众听到关于宗教的呓语，就会不由自主地归皈。假如有一位著名的科学家坚定地赞同宗教，那么所有的教堂都会感谢上帝，鼓起勇气像爱丁顿（Eddington）一样说本人信仰上帝，仿佛是对上帝最为崇高的赞美。科学成了这一代人思想的操纵者，甚至把先知和预言家称作科学都成了对它

从大繁荣 到大萧条

们无以复加的赞扬。”

科学思想的力量如此强大，人们对科学习惯的依赖如此之深，导致美国新教教会分裂成两个敌对的阵营，此时美国每8个教会会员中就有5个是新教徒。有些教徒坚信《圣经》的原义，不肯接受任何与其矛盾的思想，甚至是科学思想，从1921年开始，他们把自己称为原教旨主义者。另外，现代主义者（自由主义者）把自己的信仰和科学思想协调起来：抛弃已经过时的内容，保留精华和值得尊重的知识，在基督教和那个时代的质疑精神之间进行调和。

原教旨主义者的立场似乎绝望透顶。他们仿佛和理性时代中的理性思考的思潮南辕北辙。但是他们人数很多，至少都非常确信自己的想法。尤其是在美国南方，他们控制了大量新教教派，而且顽强斗争。他们迫使自由派的福斯迪克博士从长老教会的讲坛上离开，重新成为浸信会信徒，甚至迫害他，让其因异端邪说遭受审判（尽管他是美国最有影响力的牧师）。他们向美国一半的州议会提交了法案，旨在禁止传授进化论学说。在得克萨斯州、路易斯安那州、阿肯色州和南卡罗来纳州，他们的法案刚在议会的参众两院之一通过，接着又在另一院被否决；而在田纳西州、俄克拉荷马州和密西西比州，他们实际上成功地把自己早已经过时的愿望写进了法律。

现代主义者拥有时代精神的力量，但是他们没有联合到一起。他们对上帝的解释不尽相同：或是造物主，或是绝对能量，或是理想现实，或是创造中的正义之士，或是为之奋斗的理想和目标的最崇高最优秀的人。新英格兰的一位牧师说道，当他想到上帝的时候，就会想起“某种长方形的模糊不清的产物”。现代主义者抛弃了许多教义，而大多数美国新教徒从小便毫不怀疑这些教义（比如说，童贞女生子，基督的复活和救赎），在

很多人看来，现代主义者除了模糊的信仰，泛泛的仁慈以及保证他们和别人一样虔诚的愿望之外，没有留下什么宗教内容。正如沃尔特·李普曼所说，他们丢掉的是“对外部现实坚定不移、难以自控、必然存在的信仰，这种信仰对所有人来说是宗教的精髓，只有极少数人例外，他们能够生活在自己神秘的世界里，或是依靠自己的觉悟来生活”。此外，现代主义者不仅和原教旨主义者进行斗争，还有另一个对手，那就是汲取了科学知识的怀疑论者。不止一位现代主义者领袖的布道给人留下这样的印象，现代主义者并不打算借助于权威的论据和怀疑论者展开争论，最终被迫违背自己的意愿，自己的教义也在此中被削弱，几乎被置于死地。

在战后十年里，这三派的冲突愈演愈烈。到了1925年夏天，斯科普斯案让这场冲突达到了高潮。

原教旨主义者控制的田纳西州议会通过了一项法案，宣称“本州全部或部分接受公立教育基金的任何大学、师范院校和其他各级公立教育机构的教师，教授任何否定《圣经》里神创造人的故事，以及灌输人是从低等动物进化而来的理论，均属于违法行为”。

这项法案载入史册不久，在田纳西州宁静的代顿小镇，有一帮人决定尝试一下这类违法的事情。事情是这样的，采矿工程师乔治·拉普利亚在罗宾逊杂货店喝着柠檬汽水，旁边坐着约翰·托马斯·斯科普斯——这个24岁的小伙子很讨人喜欢，是当地中心高中的生物教师，店里还坐着两三个人。拉普利亚提议，让斯科普斯给天真无知的小孩讲授进化论，然后被人当场逮住，而斯科普斯则半当真半开玩笑地答应了，他们显然各有目的。[按照和蔼可亲的阿瑟·加菲尔德·海斯(Arthur Garfield Hays)的说法，这就是那个时代的特征。]拉普利亚宣称，他们的做法会让代顿小镇一举成名。不久他们干了这桩不法的“勾当”，斯科普斯遭到逮捕。

从大繁荣 到大萧条

威廉·詹宁斯·布莱恩自愿担任本案的检察官。拉普利亚致电纽约的美国公民自由联盟，请求律师克拉伦斯·达罗（Clarence Darrow）、达德利·菲尔德·马龙（Dudley Field Malone）和阿瑟·加菲尔德·海斯（Arthur Garfield Hays）为斯科普斯提供法律援助。这起案件准备在1925年7月开庭审理，代顿小镇在一夜之间名扬天下。

我们要对此事做一番解释，人们有权利对靠他们的税金维持的公立学校决定该教什么课程，即使他们做出的决定荒唐可笑。不过如广大的报纸读者看到的那样，斯科普斯案件的问题，不在于纳税人权利和学术自由的深刻矛盾。在公众看来，这次审判就是原教旨主义和20世纪怀疑主义（还有现代主义的协助）两派的殊死搏斗。双方的领军人物都是社会名士。布莱恩曾经三次被提名竞选美国总统，担任过国务卿，是声名显赫的演说家；他完美地体现了传统的美国理想主义，温和亲切、天真淳朴、思想保守。达罗则思想激进，与受压迫者关联紧密，是不可知论者，近来由于为利奥波德和洛布谋杀案进行辩护而声名鹊起。两人为这样一起富有感情色彩的案件针锋相对，连特克斯·里卡德都不能与他们一决高下。

这是一场奇特的审判。人们成群结队地涌进平静祥和的代顿小镇，瘦弱疲惫的田纳西农民带着家人坐着骡车，或者开着破烂老旧的福特车来到这里。这群安静的虔诚信徒穿着工装裤、格子布的或黑色的外套，准备捍卫自己的信仰，对抗那些“老外”，他们心里非常好奇，想知道这套新奇的进化论到底是什么内容。各种复兴运动的支持者也纷至沓来，在灯火闪烁的小镇郊区召开会议，在法院四周的树上张贴宣传标语，上面写着“每周读一次《圣经》”和“你的罪恶终于原形毕露”。法院大门上的标语是这样写的：“天国耶稣基督的仁爱 and 天堂街道就在你的身边。你想成为可爱的天使吗？40天的祈祷即可让你实现愿望。道出你的罪孽和邪恶，祈求

永生吧。如果你走向自洁自爱，将听到上帝对你的教诲。”

代顿小镇上不仅充斥着乡村风味的虔诚气息。卖热狗和柠檬水的小贩沿街叫卖，好像镇上来了表演的马戏团。书商们沿街兜售生物书籍。100多名记者纷纷来到这里。西部联盟电报公司派来了22位电报员，待在一家杂货店里。随着审判时间的临近，法庭里面挤满了记者和摄影师，旁边就是板着脸孔的田纳西农民；法庭里传来高声喧哗的人声，乱七八糟的脚步声，电报机嘀嘀嗒嗒的响声，法庭里充斥着紧张的气氛，像剧院里头一晚新戏登场那么热闹。法官、被告和律师都很随意地穿着衬衫，布莱恩身穿茧绸衬衣，领子掖在里面，达罗挂着淡紫色的吊带，劳尔斯顿（Raulston）法官的吊带还有一点法庭的严肃气息，可也不是完全看不到时尚的蛛丝马迹。大家通过以当地发往全国各地的电报为原稿的新闻报道上了解到，法官的女儿们跟他进入法庭的时候，和都市时髦女郎一样穿着卷边长筒袜。牧师进行虔诚的祷告后，审判就开始了。电影摄影师爬到桌子椅子上站着，从各个角度拍摄这场审判的各位主人公。证据涉及各个方面，年仅14岁的霍华德·摩根坦承，斯科普斯向他讲授了进化论，据一位动物学家推算，生命起源于大约6亿年前（这个推断让旁听席上的乡下人吓了一跳，哧哧地笑起来），但没有对他造成什么伤害。与此同时，从代顿小镇源源不断地发出了200万字的电报，《芝加哥论坛报》的WGN电台对这场审判进行了现场直播，科尼岛的梦幻岛马戏团为斯科普斯“半人猿”的辩论呐喊助威，电报公司宣布跨大西洋的电报费用大幅提高，伦敦的新闻社被来自瑞士、意大利、德国、苏联、中国和日本增发新闻的请求弄得手忙脚乱。代顿小镇深陷被大肆宣扬的状态之中。

这是一场痛苦的审判。田纳西州总检察长斯图尔特（Stewart）哭诉这种阴险的学说“毒害田纳西州儿童的信仰，剥夺了他们获得永生的机

从大繁荣 到大萧条

会”。布莱恩指控达罗只有一个缘由，那就是“诋毁了《圣经》”。达罗进行反击，指责布莱恩在“拿宗教开玩笑”。而法庭上出现了一幕又一幕闹剧。到了7月20日下午，激烈的争辩和吵闹的高潮终于到来，海斯脱口而出，请求法庭让布莱恩作为《圣经》研究的权威来回答问题，布莱恩欣然同意。

当天下午，法庭里拥挤不堪。法官决定把审讯转移到户外进行，在法院对面的枫树下搭建了一个平台，平台前放了几排长椅。记者们或是坐在长椅上，或是席地而坐，或是随便找个可以坐的地方坐下，快速潦草地写着通讯。在坐着的观众外面，熙熙攘攘的人群站在太阳底下，灿烂的阳光从树叶之间洒落下来。身穿衬衣的克拉伦斯·达罗坐在台子上，膝盖上摆着一本《圣经》，对那位原教旨主义者的领袖进行了一番法庭上有史以来最稀奇的质询。

达罗向布莱恩询问了约拿和鲸鱼、约书亚和太阳、该隐娶妻的地点、大洪水发生的时间和巴别塔的意义。布莱恩重申了他的观点，相信世界创造于公元前4004年，大洪水发生在公元前2348年左右，夏娃确实是用亚当的肋骨做成的，巴别塔是世界上语言多样性的根源，而且确实有“一条大鱼”把约拿吞掉了。达罗询问布莱恩，他是否发现了该隐娶妻的地方，布莱恩答道：“还没有，先生，我把寻找它的问题留给不可知论者。”达罗追问道：“你的意思是不是，你并不相信5 000年前地球上出现了文明？”布莱恩斩钉截铁地说：“我还没有看到让我满意的证据。”紧张的气氛和炎热的天气让两人都疲惫不堪。达罗声称，他盘问布莱恩的目的就是“揭露原教旨主义者的真面目……免得让偏执狂和无知愚蠢之人操纵美国的教育体系”，布莱恩听了这话跳了起来，气得脸色铁青，放开嗓子喊道：“保护天主的圣言，不能让美国最可怕的无神论者和不可知论者去玷

污它！”

对前国务卿而言，这场残酷的对峙是一场悲剧。他在捍卫自己最宝贵的信仰，此时他还不知道，这是他在伟大的美国公众面前最后一次露面，他在一周后黯然离世，而正是公众赋予了他荣耀的声望。他所代表的那种没有见证的宗教信仰，无法经受理性的审判。

在7月21日上午，劳尔斯顿法官有些不忍心了，他不再让布莱恩继续忍受折磨，将前一天下午的证词删掉了。斯科普斯的辩护律师在陪审团面前也拿不出科学的依据，他们认为照原计划辩护的唯一机会是放弃此案，并向田纳西州高等法院提出上诉。斯科普斯立即被判有罪，罚款100美元。田纳西州高等法院此后支持反进化论的这条法律，但是依据专门事由将斯科普斯释放了，以避免他进一步上诉。

从理论上说，原教旨主义者大获全胜，因为法律继续有效。但是，原教旨主义者实际上惨败无疑。立法机构也许会继续通过反对进化论的法律，偏远地区的虔诚教徒也许会恪守宗教信仰，禁止科学思想侵占他们的头脑。但是各地思想开明的人却满心惊奇地、兴趣盎然地看待代顿小镇审判案一事，人们渐渐抛弃了原教旨主义者的固化理念。

记者、摄影师、报业集团撰稿人、电报员头也不回地离开了代顿小镇。这起猴子诉讼案一直是报纸头版的精彩表演，不过此案的意义有点不太务实。接下来该谁上场了……来一场和生物学无关的热闹比赛怎么样？

五

1925年慢慢地走向了年终。巨大的“谢南多亚”号海军飞艇不幸坠毁，几天以来全国上下都人心惶惶。佛罗里达州房地产热潮达到了令人眼花缭乱顶点。此后的橄榄球赛季明确显示出，“炒作”这种宣传手段能

从大繁荣 到大萧条

对橄榄球明星产生何等影响。人们不用学习生物学，就能欣赏瑞德·葛朗奇（Red Grange）的风采。

战后十年是一个辉煌的体育时代。打高尔夫球的人比以前任何时候都多，他们穿着宽松的灯笼裤，短裤边镶着流苏，腿上穿着格子长袜。全美国的高尔夫球场增至5 000多家，据说有200万名会员，预计每年用在高尔夫运动上的花费为5亿美元。打高尔夫球成了胸怀壮志的商界高管必备的技能。在上百个社区里，乡村俱乐部成了社会生活的中心。不过，与其说这是一个参与体育竞技的伟大时代，还不如说是观看体育竞技的伟大时代。公众对体育活动充满狂热，他们愿意相信那个时代的知名运动员都是不一般的超人，推销商、商会会员、报业巨头、体育记者、新闻广告员、电台播音员发现了其中的商机。炒作宣传的夺目光芒第一次照在了橄榄球场、棒球场和拳击台上。

有些人到了20世纪20年代才分得清2号球杆和9号铁杆的区别，眼下也在看高端杂志上关于鲍比·琼斯的新闻，对他用实打实的推杆打败《野姑娘杰恩》（*Calamity Jane*）津津乐道。成功的职业高尔夫球手都价值不菲：沃尔特·哈根（Walter Hagen）几年来的收入在4万美元到8万美元，因为借用自己的名誉支持佛罗里达房产商并出席活动，还获得每年3万美元的赞助费和一套房子。世界职业棒球大赛的观众人数创下了有史以来的新高。橄榄球赛让人们异常兴奋；举行大型比赛时，赛场里挤得水泄不通，门票收入达到4万到8万美元，连最后一排都坐满了观众，还有成千上万的人坐在温暖舒适的客厅里，通过收音机里收听比赛的现场报道，而格拉汉姆·麦克纳米在广播里说，露天球场上边的座位真是异常寒冷。据说耶鲁大学体育协会统计，单单一个赛季的门票收入就超过了100万美元。各所大学的球队每次要花上几周时间进行巡回比赛，不是在扬基球场和芝

加哥之间奔波，就是从得克萨斯州赶到帕萨迪纳市去参加玫瑰碗比赛，运动员们大概都是在卧铺车厢里完成学业的。不少美国人都认得纽特·罗克尼（Knut Rockne）是圣母大学橄榄球队的教练，却不能说出美国参议院议长的尊姓大名。当然，与高尔夫球选手鲍比·琼斯、棒球投手鲁斯和网球名将蒂尔登等人相比，橄榄球明星的名声只不过是浮云几片。奥德里奇（Aldrich）、欧文（Owen）、波·麦克米林（Bo McMillin）、厄尼·内弗斯（Ernie Nevers）、葛朗奇、四骑士、本尼·弗里德曼（Benny Friedman）、卡德维尔（Caldwell）、卡格尔（Cagle）和阿比·布斯（Albie Booth）等人名噪一时的时候并不长。不过瑞德·葛朗奇的事迹可以说明，在卡尔文·柯立芝统治时期，当人们口袋不差钱，当宣传的手法足够生动新鲜时，体育界的英雄能够享有怎样的崇高声望。

在发给新闻界的宣传资料里，著名的伊利诺伊州大学这样赞美该校最为出色的学生：“瑞德·爱德华·葛朗奇，于1903年6月13日出生在宾夕法尼亚州苏利文县的福克斯维尔。他的父亲莱尔·葛朗奇年轻时曾是宾夕法尼亚山区优秀的伐木工，以富有力量、艺高人胆大而闻名。他的母亲是位善良可爱的女性，在瑞德年仅5岁的时候不幸去世。正是由于这个变故，他的父亲从宾夕法尼亚州搬至伊利诺伊州惠顿。此后他终身未娶，现担任惠顿的副警长。”

不过，这份宣传材料（里面还有好多叙事诗一样的段落）也许写得过于心不在焉。寥寥数语就足以概括瑞德·葛朗奇本人：他的绰号叫作“惠顿冰人”，在伊利诺伊州大学打了4年橄榄球，表现非常出色；到了1925年赛季结束的时候（他读大学四年级的那一年），他决定不再执着于学业，而是专注于收获名望带来的丰硕成果。就让我们用下面的一系列新闻稿讲述他的故事：

从大繁荣 到大萧条

11月2日：葛朗奇被学生们抬着走了2英里。

11月3日：葛朗奇的球衣被伊利诺伊州大学装框珍藏。

11月11日：球迷们散发请愿书，提名不到年龄的葛朗奇进入国会。他对纽约巨人队开出三场比赛4万美元的价格一言不发。

11月17日：地产商向他开出了每年12万美元的赞助价格。

11月21日：葛朗奇代表伊利诺伊州大学进行最后一场比赛，转而成为职业球员。

11月22日：葛朗奇与芝加哥熊队签约。

11月26日：葛朗奇代表芝加哥熊队参加第一场职业比赛，收入1.2万美元。

12月6日：葛朗奇在纽约进行第一场比赛，收入3万美元。

12月7日：葛朗奇与电影公司签订30万美元的拍摄合约，可能在6月份收入10万美元。

12月8日：葛朗奇受到了柯立芝总统接见。

然而公众却是会喜新厌旧的。短短数月后，格特鲁德·爱德勒（Gertrude Ederle）成为第一位横渡英吉利海峡的女性。她在纽约受到热烈欢迎，人们向她致以雷鸣般的喝彩声。此时，邓普希和唐尼准备在费城展开对决，瑞德·葛朗奇被聚光灯抛弃。五年后，有报道称他在好莱坞的一家夜总会工作。而另一位橄榄球明星——耶鲁大学的场上后卫卡德维尔在纽黑文开了一家餐厅。他们的光环就这样消失得无影无踪。

在邓普希和唐尼的拳击比赛中，公众参与体育运动的狂热达到了高潮。1926年9月，两人的第一次对决在费城举行，而第二次比赛定于一年后在芝加哥进行。曾经被视为违法行为的职业拳击比赛，如今被美国人极为推崇。上流人士纷纷涌进拳击场，长岛的一位牧师不得不将教区委员的

会议推迟，好让他们收听拳击大赛。比赛开始的几周前，报纸上就用大量篇幅报道训练营里的道听途说和各种预测；这样的报道策略引起公众兴趣。报业集团大量刊载署名文章，双方选手互相指责（有一次，双方的一系列文章都是同一个写手拼凑出来的）。一直以来对于体育报道持谨慎态度的《纽约时报》甚至在头版上用三排大标题报道了比赛结果。在费城，唐尼在13万名观众目光注视下把筋疲力尽的邓普希击倒在地，主办方从中获利近200万美元；在芝加哥，14.5万人观看了这场对决，这场比赛的门票收入竟然达到了260万美元。1919年邓普希打败威拉德的收入仅有45.2万美元，相比之下，你就可以利用这种对比衡量几年来发生的变化。芝加哥的拳击场面积巨大，以至于到比赛结束时，外围座椅上的三分之二的观众都不知道谁是胜利者的。不仅有芝加哥现场拥挤的观众在关注比赛，据电台方面报道，有4 000万人通过收音机收听了这场令人屏息静气的比赛的详细报道。比赛打到第七个回合时，唐尼被打倒在地，裁判等到邓普希退回角落才开始数秒，足足给了唐尼13秒钟让他爬起来。在此期间，收音机旁有5个美国人因心力衰竭而猝死，另有5人由于听到了比赛结果而兴奋致死。

这两场精彩比赛的结果同样引人关注。在战后十年之初，邓普希还是著名拳击手，10年之后，他却已经退役。唐尼的境遇与前者大相径庭。他从名利的顶峰缓缓进入了文雅时尚的上流社会，顶着重量级拳王的光环，成为非常受欢迎的新贵。唐尼凭着高超的拳击技术，在3年里得到了1 742 282美元的收入。此后他和桑顿·怀尔德（当年畅销书《圣路易斯雷伊桥》的作者）一同游历欧洲，娶了康涅狄格州格林尼治的一位名门之后为妻，周游海外后带着新娘回到了美国。他刚刚回国，就在耶鲁大学菲尔普斯教授的课堂上发表了一番精心准备的演说，而这篇演讲词就算没有莎士比亚和怀

从大繁荣 到大萧条

尔德的风格，至少也能看出他花了不少心思：

“随着我们的轮船驶入纽约湾海峡，真是难以想象，自从我们乘坐‘毛里塔尼亚’号起程远洋以来，已经有十五个月的时间。在这十五个月里，我和唐尼夫人访问了世界各国，结识了许多很有意思的人士。我们在旅行中心情非常高兴，但是我们认为，最开心的事情就是回到祖国，与美国人民和亲朋好友久别重逢。”

“国内有传言说，我考虑重返拳击场，捍卫重量级拳王的地位，这话我在意大利时也有所耳闻。这种传言并不是符合现实情况，因为本人永远结束了公众事业。目前，我最重要的工作就是享受平静简单的生活，这种生活方式给我带来了极大的幸福。”

体育记者们对唐尼结束拳击生涯后的生活并不关注。他不过是运用了古往今来的民主特权，利用自身的优势脱颖而出。热热闹闹的炒作把他吹捧到了天上，他就瞄准机会，借此摆脱了拳击界你死我活的气氛，去呼吸更有益于健康的空气。

六

1925年渐行渐远，1926年悄然而至，公众的注意力已经从瑞德·葛朗奇身上转到了别的地方。作曲家欧文·柏林（Irving Berlin）和艾琳·麦凯（Ellin Mackay）的婚姻成了关注的焦点，显示出数百万公众出于对个人隐私毫无顾忌的好奇心理。“罗斯福总统”号的弗雷德船长在海上英勇无畏地救了“安提诺”号轮船的乘客。政府以品行败坏为由，禁止维拉·卡斯卡特公爵夫人进入美国国境。伯德（Byrd）勇敢地飞往北极探险。1926年夏天来到了，人们的目光转向了一桩海滩浴场的失踪案。失踪的艾米·森普尔·麦克弗森（Aimee Semple McPherson）是加利福尼亚

州四方福音会的创始人。这起案件成了一系列滑稽歌舞剧的第一幕，此后数年间麦克弗森太太的安吉勒斯教堂吸引着满心好奇的游客，人们成群结队地参观此地。

1926年的夏天过去了。然而就在这一年夏天，英吉利海峡里处处是游泳的人们；在数千幢小屋里的桌子上，都放着褐色封面的《特洛伊的海伦之私生活》；姑娘们穿着齐膝短裙和条纹毛衣，学跳查尔斯顿舞；虽说邓普希和唐尼对战带来了巨额收入，但纪念美国建国150周年的活动却使费城深陷赤字之中。到了夏末的时候，美国发生的一件大事充分证明，精心策划的新闻炒作足以引起全国上下的轰动。有位名叫鲁道夫·阿方索·拉斐尔·皮埃尔·菲利伯特·古列尔米·迪·瓦伦蒂诺·德安东古奥拉的青年在纽约去世，年仅31岁。这位早早离世的电影明星更愿意被人称为鲁道夫·瓦伦蒂诺。他在银幕上的情史让无数影迷为之心跳加速；凭借英俊容貌和多情气质，他在《酋长》的表演为男性魅力树立了标杆。不过，如果不是他的经纪人巧妙地安排了生离死别的场景，倘若不是殡仪馆的宣传员哈里·克莱姆弗斯向各家报社提供了他们想要的新闻——比如提前发放照片，照片上不仅有放置遗体的灵堂，还有送葬的队伍——也不会引来这么多人到百老汇大街殡仪馆一睹他的遗容。（按照赛拉斯·本特的说法，在葬礼开始前，街边出售的报纸上就登载了送葬行列的照片。）由于这些富有实效的帮助，加上媒体对此尽心尽力的报道，影迷们在殡仪馆发生了骚乱，导致数十人受伤。对宣传工具的利用卓有成效：瓦伦蒂诺生前债台高筑，然而据他的经纪人后来证实，他死后发行的电影不仅将他的债务还清了，还为他带来了60万美元的资产。很多品格高尚的公民为查尔斯·威廉·埃利奥特的去世深表遗憾，虽然他与瓦伦蒂诺同时离世，却没有这么隆重感人的悼念场景。毕竟，哈佛大学的荣誉校长不具备为自己举办场面

从大繁荣 到大萧条

壮观的葬礼这样的专业才能。

唐尼出拳打败了邓普希。飓风给了佛罗里达的繁荣经济致命一击。罗马尼亚的玛丽女王在远方察觉了大肆宣扬的好处，对美国进行了正式访问。从1926年到1927年的这个冬天，美国人民有几个月都痴迷于丑闻和犯罪新闻。

四年之前，牧师爱德华·惠勒·霍尔和教堂唱诗班领唱埃莉诺·詹姆斯·米尔斯夫人被人枪杀，死在新泽西州新布伦兹维克附近德拉西小道的山楂树旁。在1922年，大陪审团没有接到任何指控。但是到了1926年，一家通俗小报为了提高发行量，声称找到了非常关键的新证据，导致这起案件重新审理。霍尔夫人在夜里被逮捕，这个时间实在不巧，只有这家小报的记者和摄影师抢到了独家新闻。霍尔夫人与两个兄弟亨利·史蒂文斯和威利·史蒂文斯受到审判，不仅刺激了这家报纸的读者，还让全美各家报纸的读者无比兴奋。

在这起战后十年最为轰动的审判中，最令人震惊的一幕就是“胖女人”简·吉布森（Jane Gibson）的出庭做证，据说她已经苟延残喘，被人用担架从医院里抬到法庭上，放在陪审团对面的床上进行做证。吉布森夫人讲述了一个离奇的故事：那时似乎总有人来偷玉米，让她心神不宁，就在凶杀案发生的那天晚上，她听到了马车走过的响声，以为里面坐着偷玉米的家伙，就给骡子詹尼套上缰绳，沿着德拉西小道追了过去，“不断地偷偷盯着”那辆马车。她在路上看到了一辆汽车，里面坐着两个人，她认出来是霍尔太太和威利·史蒂文斯。她把詹尼拴在一棵雪松上，听见了争吵的声音。有个声音说：“解释一下这些信的事。”借着手电筒的昏暗灯光，她看到了亨利·史蒂文斯和威利·史蒂文斯的身影，然后便听见了枪响，于是她吓得慌不择路地跑回家，却发现丢了一只软拖鞋。尽管心里

又惊又怕，她还是沿着这条路回去找拖鞋，不想却听到一阵尖叫。她本以为是猫头鹰的叫声，却发现是一个女人在号啕大哭，“一个白发女人用手扒着什么，一边哭喊着”。她指认这个女人就是霍尔太太。这些证词都是胖女人在病床上断断续续说出来的，训练有素的护士站在床边测量着她的脉搏。然后，她对着被告大声嚷道：“我说的都是实话！愿上帝保佑我！上帝知道我说的都是实话！”接着她就被抬出了法庭。

胖女人的证言没有因为这段曲折复杂的经历而受到支持；如果陪审员们此时知道，面前这位“垂死的证人”，在法庭上演技如此精彩，却还有四年好活，他们的印象肯定会更糟糕。霍尔太太和两个兄弟坚贞不屈，经受住了严峻的考验，尤其是笨头笨脑的威利·史蒂文斯，虽说辛普森参议员威逼恐吓，打算把他吓乱了阵脚，他却顽强抵抗，让数百万凶杀案的支持者看得不亦乐乎。那家通俗小报挖掘出来的新证据，包括一张据说有威利·史蒂文斯指纹的名片，也没给陪审团留下多少印象。

尽管这起诉讼案就此告终，但史蒂文斯家族的名誉被彻底败坏了，成了报纸读者津津乐道的头等笑话。在审理此案的十一天里，从新泽西州的萨默维尔发出了500万字的新闻报道。来此地进行采访的新闻记者人数是当时代顿小镇审判案的两倍，其中包括小说家玛丽·罗伯茨·莱因哈特（Mary Roberts Rinehart），宗教复兴运动领袖比利·桑德（Billy Sunday），被杀害的米尔斯夫人的丈夫詹姆斯·米尔斯，还有牧师约翰·洛奇·斯特拉顿（John Roach Straton）。斯特拉顿曾经声称布莱恩披着原教旨主义领袖的外衣，而此时他自己每天写一篇社论，借这起案件进行道德评论。在全世界最大的电报交换机上，插着不计其数的电线，把情欲和罪恶的新闻传播到美国的各个角落，公众对此照单全收，并且渴望出现更多的犯罪新闻。

从大繁荣 到大萧条

公众持之以恒的要求等到了他们想要结果，短短几个月后，一位名为阿尔伯特·斯奈德（Albert Snyder）的艺术编辑遇害，凶手是死者的妻子和她的情人——一个叫裘德·格雷（Judd Gray）的内衣推销员，炒作宣传的力量又见缝插针。在这起案件里，既没有变幻莫测的情节，也没有身价不菲的受害者；斯奈德-格雷谋杀案出现在报纸头版的唯一理由是，此案涉及三角恋爱关系。斯奈德夫妇不过是生活在纽约郊区的普通人，这样的人物才容易让普通读者产生情感认同。随着对这种类型案件的需求量越来越大，西部联合电报公司的大型交换机得到了有效利用。一大批富有声望的职业作家纷纷构思描写淫乱无比的奇案（其中涉及大卫·沃克·格里菲斯（David Wark Griffith）、佩吉·乔伊斯（Peggy Joyce）和威尔·杜兰特（Will Durant），还有莱因哈特（Rinehart）夫人、比利·桑德和斯特拉顿博士等名士），美国人民再次闻到了血腥的味道。

在霍尔-米尔斯凶杀案和斯奈德-格雷谋杀案发生的空当，大家还有机会对一宗淫乱的丑闻议论纷纷。以“桃子夫人”而声名远扬的弗朗西斯·希南·布朗宁（Frances Heenan Browning）提出诉讼，要求和丈夫爱德华·布朗宁（Edward W. Browning）离婚。爱德华是纽约的一位房地产商人，喜欢追求妙龄女郎，给她们带来灰姑娘般的快乐。各家态度严肃、声名在外的报纸纷纷转载布朗宁老爹逸事里不光彩的细节；通俗小报《纽约画报》刊登了一张剪画，画面上披着睡衣的布朗宁对着半裸的妻子咆哮：“汪！汪！别傻了！”按照图下面的解释，这是因为她“不肯赤裸体地去游行”。过去对丑闻来者不拒的《每日新闻》也深表担忧，如果长此下去，公众就会“沉浸在荒淫放纵的环境中”。

很多人对《每日新闻》有着同样的感受，看到公众品位堕落到如此地步，不免感到非常失望。他们认为必须有所改变，不能任由商业化堕落的

狂欢发展下去。

变化出现在一瞬间。

七

早在1919年，纽约布雷沃特和拉法叶酒店的老板雷蒙德·奥泰格（Raymond Orteig）提供了2.5万美元的奖金，准备发给第一个从纽约直接飞到巴黎的人。就在斯奈德-格雷案审判结束的几天后，为了赢得这笔奖金，有3架飞机从纽约郊外的罗斯福机场正在等待合适的天气起飞。这3架飞机分别是：“哥伦比亚”号，飞行员是克拉伦斯·钱伯林和劳埃德·贝特奥德；“美洲”号，飞行员是曾经飞抵北极的海军少校伯德；还有刚刚从太平洋海岸飞到这里的“圣路易斯精神”号，飞行员是一位名叫查尔斯·奥古斯特·林德伯格（Charles A. Lindbergh）的小伙子。现在还不知道哪架飞机最先起飞，不过很明显公众青睐的是那位来自西部的小伙子林德伯格。他为人谦和，飞行技术极为熟练，特别是他决定独自一人进行这次危险的飞行，更显得勇气可嘉，并且这位年轻人还有着摄影记者从未见过的英俊外貌。记者们把林德伯格称为“幸运的林德”和“飞行白痴”，这让他感到很尴尬。宣传的聚光灯照在了他身上，然而此时，他还没有成为英雄。

1927年5月19日晚上，尽管长岛下着绵绵细雨，但是天气预报说会出现利于飞行的好天气，林德伯格便决定做好准备。第二天凌晨他没有休息，花了几个小时进行飞行之前的准备工作，赶到了柯蒂斯机场，收听最新的天气预报。然后他将飞机运到罗斯福机场，加满汽油，此时已经是5月20日的早晨。在将近8点的时候，林德伯格登上了飞机，起飞前往巴黎。

从大繁荣 到大萧条

随后发生了不可思议的事情。

林德伯格起飞的消息刚刚通过电波传出后不久，全体国民就不约而同地感到兴奋不已。无论男女老少、穷人富人，无论是农民还是股票经纪人，原教旨主义者还是怀疑论者，精英人士还是普通百姓，大家一致将希望寄托在驾驶“圣路易斯精神”号的这位年轻人身上。让我们举个例子来表明人们团结一心的氛围：5月20日晚上，在纽约的扬基体育场，两位重量级拳王马洛尼和夏基展开对战，当播音员建议大家为林德伯格祈祷时，在场的40万名拳击迷全体起立，全场脱帽肃立，这种场面的确令人难忘。第二天，不断传来林德伯格成功的消息：他到达了爱尔兰海岸，他飞越了英格兰，他飞过了英吉利海峡，他降落在了巴黎的布尔歇机场，顿时被众多热情的法国人团团围住。美国人民感到兴奋至极，如愿以偿。当新闻报道称，林德伯格在巴黎停留的几天，表现得谦虚得体、风度翩翩，他马上就获得了数百万美国同胞的衷心爱戴，成为他们记忆中最崇高的英雄。

在接下来的几个星期里，人们流露出的激动和热情，创下了喧嚣时代的各种历史纪录。对报纸和报纸读者来说，除了林德伯格和关于他的报道，其他新闻都不太重要。就在林德伯格完成飞行的当天，《华盛顿星报》多卖出了1.6万份，《圣路易斯邮讯报》多卖出了4万份，《纽约世界晚报》则多卖出了11.4万份。从缅因州到俄勒冈州，各地的报纸每天都刊登着醒目的标题，描述林德伯格的成功航程。《纽约世界晚报》赞扬林德伯格“仅凭一人之力便创造了人类速度史上最伟大的壮举”。公众对这种明显夸张的说法深感佩服。在他返回美国的时候，一家报纸在周日版上用了足足几十个专栏，刊登他的文章和图片。柯立芝总统派出一艘美国海军巡洋舰前往法国接这位年轻的公民和他的飞机回国，根本没有人质疑总统的决定是否妥当。华盛顿为欢迎他的归来，举行了盛大的露天集会。

按照查尔斯·梅尔茨的说法，柯立芝总统在集会上所做的发言，“是他在国会发表年度报告以来，篇幅最长、最为瞩目的讲话”。西部联合电报公司为了迎接林德伯格的归来，提供了标准格式的祝贺电报。林德伯格一共收到了5.5万份电报，都装到一辆卡车上。在他后面跟着游行队伍，浩浩荡荡地穿过华盛顿。有一份发自明尼阿波里斯市的电报竟然有17 500人的签名，*总共有520英尺长，要用10个信差才拖得动。纽约的公众欢迎仪式结束后，街道清洁部门清扫了共计1 800吨碎纸屑，都是欢迎仪式中从四周办公楼上飘落下来的；而在1918年11月7日那天提前庆祝停战的狂欢过后，清理出的碎纸片也就155吨！

林德伯格荣获了上校军衔，接受了十字飞行荣誉勋章、国会荣誉勋章，还有各种名头的外国勋章和荣誉资格，要把这些名头统统重复一遍，简直是一桩让人厌倦的工作。他收到了250万美元的环球航行合约、70万美元的电影片酬，他的签名卖到了1 600美元，得克萨斯州以他的名字命名了一个小镇，有人提议在芝加哥城建造一座1 300英尺高的林德伯格纪念塔，人们为他举行了“现代历史上欢迎个人规模最为隆重的宴会”，不计其数的街道、学校、餐馆和企业都想分享他的名誉带来的光彩。

在纷乱喧闹中，没有任何人提出反对意见。人们可能对别的事情意见不一，但是却众口一词地对林德伯格大加赞扬。

为了体会人们这种普遍的敬仰与拥戴之情——说到拥戴也并不过分，我必须提醒人们注意以下几个事实。

林德伯格的飞行并不是人类首次驾机成功飞越大西洋。早在1919年，英国的阿尔科克和布朗就从纽芬兰直接飞到了爱尔兰。同样在1919年，美国海军的NC-4水上飞机搭载5名乘客，经停亚速尔群岛成功飞越了大西洋，而载有31名乘客的英国的R-34号飞艇从苏格兰飞到了长岛，此后返回

从大繁荣 到大萧条

英国。1924年，德国的ZR-3号飞艇（此后更名为“洛杉矶”号）搭载32名乘客，从德国弗里德里希港飞抵美国新泽西州的莱克赫斯特。

同样在1924年，两架环游世界的美国飞机经停冰岛、格陵兰岛和纽芬兰飞越了北大西洋。林德伯格飞行的首创之处在于，他一路从纽约直接飞到了巴黎，并没有在纽芬兰停留，而且还是只身一人完成了这次壮举。

此外，他的飞行冒险没有带来多少现实利益。当然，此举引发了飞行热潮，但那不是正常的飞行热潮，而是导致许多飞行员纷纷仿效林德伯格，盲目地飞向外国海岸，然而多数不幸坠落于中途。历经数年后再次回顾此事，把情感的本质抛开不谈，这只不过是一次勇敢的特技飞行，创下了当时最长的飞行旅程，完成这次飞行的人只是将自己称作特技飞行员。那么，人们为何对林德伯格如此狂热地崇拜呢？

原因其实很简单。一个幻想破灭的国家沉浸于如空中楼阁般的豪言壮语之中，又深受丑闻与刑事案件的影响，极为反感人性的堕落，为自己曾沉迷于此深感厌恶。多年来，美国人民渴望得到精神上的寄托。他们绝望地看着自己最初的理想、幻想和希望相继破灭，受到一系列事件和观念的腐蚀：战后的局面令人失望；科学学说和心理学理论摧毁了他们的宗教信仰，嘲讽了他们的情感信念；政坛腐败和街头犯罪一样相继而出；近来的报纸偏好于淫秽内容和犯罪凶杀的相关报道；浪漫爱情、骑士精神和奉献自我遭到否定；古往今来的英雄不经意间暴露本相，载入史册的圣徒不过是行为古怪的普通人。尽管还有商业之神可以崇拜，但是仍无法避开人们心中的怀疑：这尊神像莫不是拿黄铜做的？热点炒作让公众对当代英雄视若神明，可这些英雄却从电影片约和由他人代笔的文章里获利丰厚，让人无法心服口服。如果人们希望安稳度日，与世人友善相处，必然需要某种他们生活里缺少的特质。霎时间，林德伯格带来了一切。浪漫爱情、骑

士精神和自我奉献，全部体现在这个现代的格拉哈德（Galahad）身上，而这一代人已经完全摒弃了格拉哈德。林德伯格没有接受送上门的电影合约，没有兜售自己的推荐书，没有自我标榜，也没有让自己陷入丑闻之中，他的品位无懈可击，他样貌英俊，性格果敢。炒作宣传的机器准备把他推到一个举世瞩目的高度。公众从宗教广泛复兴的角度认可了他，这有什么好奇怪的？

林德伯格没有把崇拜者冷落在一边。他成功地进行了一系列表演飞行和慈善飞行，表现得平静而洒脱。他娶了美国驻墨西哥大使德怀特·莫罗的女儿，让全国民众兴奋不已，同时扭转了炒作宣传的局面。他带着新娘乘坐摩托艇悄然离开，数日都没有抛头露面，让几百名追踪他蜜月旅行的新闻记者空等一场。不管他走到哪儿，民众都涌上前去与他接近，在他身上挂满奖章，给他各种各样的赠品，他的行踪成了新闻。他积攒的大量财产主要是靠在航空公司担任顾问而得，不过很少有人对他怀有忌妒之心。令人难以置信的是，他始终保持清醒的头脑，具有独树一帜的本能。

而他一直都是人们心目中的民族英雄。

在林德伯格飞越大西洋三四年后，每逢周末，都有崇拜者开着汽车来到他的新泽西农场周围，马路上拥挤不堪，希望一睹他的风采。据说他甚至无法把衬衣送到洗衣店，因为这些衣服根本拿不回来，被人们当作收藏的珍贵纪念品。在数百所学校的墙上、在数千间房子里，都挂着他的照片。没有一位在世的美国人能够得到这样自始至终的崇拜，有人会说，也许除了亚伯拉罕·林肯以外，甚至没有一位过世的美国人能获得这种殊荣。你可以批评柯立芝、胡佛、福特、爱迪生、鲍比·琼斯和其他报纸头条上的英雄，但是倘若你敢对林德伯格的行为加以指责，就会伤害到你的听众。因为，林德伯格就是上帝的化身。

从大繁荣 到大萧条

有人会暗自思忖，对一位特级飞行员来说，这情形真是不错。容我补充一句，这情形对美国人民而言也相当不错。在1927年5月20日以前，没有人敢保证，他们对英雄人物的品位能达到如此高度。

八

林德伯格的飞行，证明英雄主义可以获得如此张扬的名利。一大群追求金钱和荣誉的冒险家纷纷效仿，他们似乎没有意识到，崇拜者对林德伯格的爱戴，是因为他毫不关心唾手可得的金钱美誉。这套窍门很简单。你拥有一架飞机、一部分资金支持、一位新闻宣传员，从一个地方直接飞到另一个地方（世上还有许多人们没有驻足的地方）。你在飞行前安排好所有事。如果你成功了，就把亲身经历卖给报业集团。倘若有求的话，你不花钱就能得到很多装备，只要你愿意向燃油、飞行服和5英尺隔板的供应商证明，你发现这些东西多么必要。当你抵达目的地时，就已经在报道的头版位置了。你要立即出售你的传记和推荐书目，出现在综艺秀场、电影或是其他需要你的地方。如果你不知道怎么开飞机，那你可以作为一位乘客；实际上，女乘客比男飞行员的消息更有价值。如果飞行过于惊险刺激，不符合你的个人品位，你还可以让他人赢取你拿出来的一笔飞行奖金，可以获得有价值的宣传效果。

当钱伯林效仿林德伯格飞越大西洋的时候，这架飞机的主人查尔斯·莱文（Charles A. Levine）就是一位充满兴致的乘客。他在纽约受到官方欢迎。说来好巧，人人都能在纽约受到官方欢迎。衣着光鲜的警察局长格罗夫·华伦不断引用阿尔瓦·约翰斯顿（Alva Johnston）所谓的“伟大发现”，任何人只要在中午乘车到达百老汇大街，旁边有一列摩托车护卫队，你就会发现有上千人聚在那里等着享用盛大午餐。英国高尔夫

公开赛冠军、横渡英吉利海峡的游泳运动员、意大利足球队，与波斯财政部部长和莱比锡市市长一样，受到了华伦警察局长热烈而恭敬的欢迎，这对市民们来说真是有趣极了，他们总算有借口把白色纸条和布朗克斯电话号码本的碎纸片从窗口抛撒下去了。

钱伯林和莱文飞行的几个星期之后，伯德和同伴从罗斯福机场起飞，却在途中坠入了大海。由于他们落水的地方离法国海岸很近，于是他们便水上了岸。布洛克和施利不仅飞越了大西洋，还继续进行了一系列飞行，最终到达日本。后来，佛罗里达州莱克兰有个名叫鲁斯·埃尔德（Ruth Elder）的姑娘，是位长得漂亮的牙医助手，曾经到乔治·哈德曼（George Haldeman）那里上了几堂飞行课。她得到了柑橘种植商和地产商的赞助，坐着哈德曼驾驶的飞机起程，最终成为第一位飞越大西洋的女乘客。不凑巧的是，她掉进了远离岸边的大海里面，没办法水上岸，可这有什么关系呢？幸运的她和哈德曼被一艘油轮救了起来。她的经纪人早已经帮她设计好了，她受到了热烈欢迎。尽管纽约市只为招待她花了333.90美元，相比之下，招待莱文花了1 000美元，接待爱尔兰自由邦总统花了1.2万美元，接待伯德花了2.6万美元，而对林德伯格的盛情款待则花了7.1万美元。

在鲁斯·埃尔德之后还有多次无论是成功还是失败的飞行，次数多得几乎记不下来。他们都登上了头版新闻。但是与新款福特车亮相（1927年12月）和“维斯特里斯”号轮船沉没（1928年年末）相比，激动人心的程度要相差甚远。媒体对“维斯特里斯”号沉没的报道称得上疯狂至极，可以让人以为这是历史上最为严重的海难事故。但是再也没能出现过如林德伯格一样的英雄人物。

体育界英雄辈出。鲍比·琼斯赢得了一场又一场的胜利，等到没有人

从大繁荣 到大萧条

怀疑他是有史以来最伟大的高尔夫球手才停手。贝比·鲁斯依然是本垒打之王。卡格尔和布斯让橄榄球记者有机会找到他们梦寐以求的浪漫英雄。蒂尔登的状态逐渐下滑，不过他除了输给一个法国人之外，仍然击败了其他任何一个对手。然而，职业拳击赛渐渐走向颓势，公众对体育比赛感到了几分厌倦。人们努力搜寻着新奇事物，以激起宣传大师的兴趣，这种情形实在有些反常：马拉松舞者疲惫不堪地相互依偎跳上几个小时、几天乃至几星期；派尔（C.C.Pyle）组织了穿越美国大陆的“邦宁德比”竞走赛，到头来既让可怜的选手走得两脚发麻，又散尽了派尔的家财。阿尔文·西普雷克·凯利（Alvin Shipwreck Kelly）坐在旗杆顶上，下面站着的上千人看傻了眼。打破纪录依然是有利可图，哪怕你的成就是在巴尔的摩的旗杆顶上坐了23天7小时，有人把食物放在小桶里给你送上去；要是你每次打盹的时间超过了20分钟，还会有雇来的人将你弄醒。不过，好像没有人觉得凯利做了什么壮举。坐旗杆和马拉松舞蹈不过是打发时光的无聊闹剧罢了。

也许是热闹炒作的大好时机已经悄然逝去，宣传手段显得越来越赤裸直接。也许是林德伯格让公众无法接受比他逊色的英雄人物。也许是1927年萨秘和万漫蒂被残酷执行死刑和1928年的总统大选，提醒衣食无忧的民众，毕竟世上还有社会公共事件这回事。不过，就是在新款福特汽车推出几个月后，离林德伯格成功飞行还不满一年的时候，发生了一件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的事——1928年3月大牛市进入了最轰动的阶段。这一天之中，美国广播公司的普通股股价上涨了10%，人们从中获得的直接利益远远高于世界上所有的直航飞行员和重量级拳王的收入。

FROM GREAT
PROSPERITY
TO GREAT DEPRESSION

第九章 精英们的反抗

“这是崭新的一代……当他们长大成人后，发现所有的神都已逝去，所有的战争都已结束，人类所有的信仰都已动摇。”

——司各特·菲茨杰拉德《天堂的这一边》

对德战争结束的时候，社会的强制性力量已经成为全国性的习惯。一个典型的思想守旧的美国人对于少数民族的权利没有多少热情；他在一个开拓者的传统之中孕育生长，惯于使用现有的方式维持社会秩序的稳定，比如说节约法令、保安委员会，必要时也会使用霰弹枪。历史书里的《独立宣言》和《权利法案》纵然写得不错，可等到自己处理事情的时候，通常持有这样的想法：自由不过是特许的代名词，《权利法案》是对待恶棍们的终极手段。在战争期间，美国人发现，宣传成了立法后轻而易举地逼迫邻居接受自己看来顺理成章的行为；和平之后，他还可以利用同样的方法，让他们继续不敢违背。

从大繁荣 到大萧条

他把精力从自由债券运动——每个人都要购买一定数额的债券，稍有迟疑就会受到威胁——转向各种活动，如社区福利基金活动、大学捐款基金活动、教会会员活动、推动城镇建设活动，还有其他数不胜数的公共活动。各家委员会及其分会被组织起来，新闻广告员派发大量新闻，演说家振臂高呼，要是有人把自己的钱包紧紧捂住，就会在公众舆论的压力之下感到忐忑不安。正如我们亲眼见到的，过去对敌国侨民和亲德分子的高压政策，与后来对激进分子和布尔什维克的残酷镇压之间不过咫尺之遥；战争时代的稽查制度，与和平时代对报纸书籍和公共演讲的稽查制度也不过咫尺之遥；战争时代的禁酒令，与战后永远写入宪法的禁酒令，以及载入法律之中的公众道德规范也只有咫尺之遥。当然，曾经在1917年和1918年饱受束缚的商界，已经挣脱了大多数的束缚，因为当今的普通美国人把自身利益与商业利益相等同。不过在商界以外，他自以为深知人们应该如何行事，不理睬所有的胡言乱语。

红色大恐慌时代的初期过后，美国中产阶级大多数主张采取严厉手段打击激进主义，对商业坚定奉行几乎不会遇到任何妨碍的自由政策。而工人们不是遭到警察的威胁，就是受到拥有股权的诱惑，有了自己成为有钱人的欲望。受过教育的自由主义者，在几年前还在为冲破最低工资法案、平等选举权和集体谈判权的障碍而时刻准备献出生命，如今却感到痛苦与绝望。他们坚定地判断：政治不过是一场粗俗肮脏的闹剧；世上的愚人总要比精英人士多很多，这些笨蛋被选区里吐着烟圈的政党领袖牢牢攥在手里，投票权简直就是个笑话。福利事业同样是竹篮打水而已。统统无聊透顶、感情用事、狂妄至极。在1915年，年轻而聪明的大学毕业生为了参加社会主义游行，不惜与父亲恩断义绝；到了1925年，他们却把社会主义称为老古董，对此毫不在意，完全不在乎钢铁公司员工的报酬是高是低。

社会思潮已经发生了变化：如今思想叛逆的年轻人会反对一夫一妻制，对上帝毫不恭敬，把自己的父亲气得火冒三丈。

然而，当大多数中产阶级从迫害政治激进分子转而约束个人行为时，他们遭到了激烈对抗，其中不仅有年轻聪明的大学生，还有一个具有阶级意识的新生群体，这就是美国的精英阶层。他们被《美国信使》杂志称为“少数的有教养的人”，这些人开始高声疾呼，奋起反抗。

这些严阵以待的精英阶层，从来都不是组织有序的群体；精英们的思想完全不统一，就算大家意见一致，作为个人主义者，他们对建立组织的想法也会非常排斥。他们分散在全国各地，纽约是他们的主要聚集点，不过在很多城市中心也能看到他们的身影。精英阶层中主要包括艺术家、作家、职业人士、大学城里思想活跃的学者；在受过大学教育的商人阶层里，能够看懂比《星期六晚邮报》和《麦考尔杂志》更复杂的文学作品的人；还有追逐时尚的普通人士，虽然不属于这个阶层，却希望接受最新的思想。所谓的精英们大概是这么一群人：无论男女，他们都多少听说过詹姆斯·乔伊斯（James Joyce）、普鲁斯特（Proust）、塞尚（Cézanne）、荣格（Jung）、伯特兰·罗素（Bertrand Russell）、约翰·杜威（John Dewey）、佩特罗尼乌斯（Petronius）、尤金·奥尼尔（Eugene O'Neill）和爱丁顿（Eddington）；他们鄙视电影界，却把查理·卓别林称为伟大的艺术家；他们哪怕对相对论一无所知，也能高谈阔论一番；他们听说过几个主要复杂理论的名字，喜好收藏美国老家具，对进步主义教育有着独到的见解，对亨利·福特和卡尔文·柯立芝的权威存有质疑。他们人数不多，却对任何事都能侃侃而谈。他们不仅统治了美国文学，还潜移默化地影响了整个国家的思想。

当从欧洲战场归来的英雄还在围观的群众之中胜利大游行时，这些精

从大繁荣 到大萧条

英已经对《凡尔赛和约》不抱有任何幻想。在他们愤世嫉俗的眼睛里，是对残酷的战争和唯利是图的协议的阴暗刻画，这些书包括菲利普·吉布斯爵士（Sir Philip Gibbs）的《现在可以说了》，约翰·多斯·帕索斯（John Dos Passos）的《三个士兵》、卡明斯（E. E. Cummings）的《大房间》，以及约翰·梅纳德·凯恩斯（John Maynard Keynes）的《和平的经济后果》。他们是富有时代朝气的新心理学的早期信徒；实际上，年轻的精英们是在按照弗洛伊德的理论打情骂俏而已，而他们那些学识粗鄙的同龄人爱抚亲热，只是因为能够快乐地自我享受罢了。早在原教旨主义这一名词出现，以及爱因斯坦理论进入研究实验室以前，很多精英就感到，新奇的科学知识会让他们迷失方向。多年以来，他们一直反感徒有其名的社会地位和美国文学庄重保守的风格；自从战争爆发以来，西奥多·德莱塞（Theodore Dreiser）、薇拉·凯瑟（Willa Cather）、卡尔·桑德堡（Carl Sandburg）、埃德加·李·马斯特斯（Edgar Lee Masters）、罗伯特·弗罗斯特（Robert Frost）、维切尔·林塞（Vachel Lindsay）、艾米·洛威尔（Amy Lowell），意象派作家和自由诗的代表诗人，都已经开辟了文学新领域。20位精英人士合著了《美国文明》[1922年由哈罗德·斯特恩斯（Harold Stearns）编辑出版]。他们在书中对这个阶层数千人的意见做了概括，一致认为“如今美国的社会生活中最悲哀却又可笑的事实，就是情感匮乏和审美力的缺失”。但是，如果没有辛克莱·刘易斯在1920年10月所著成的《大街》，和两年之后出版的《巴比特》，精英们对情感匮乏和审美力缺失的反感，对于“热衷种种规则的束缚”的反抗，可能不会凝聚成如此惊人的力量。

这两本著作产生的影响势如破竹。通过直接赤裸的描写和尖酸刻薄的讽刺，刘易斯在书中揭露了美国小镇的丑陋面目：小镇生活的文化贫乏，

大众偏见的残酷与蛮横无理，以及其支持者的鼠目寸光和心胸狭窄。有些东西并没有在他的书里得到体现，比如美国西部大草原和全盛时期的友善与慷慨，不过正因为这种片面的描写，才让刘易斯的两本著作受到了广泛的好评。到1922年年底为止，《大街》的销量已经达到39万册。精英阶层只有读了刘易斯的作品才会意识到，他们最鄙视、最恐惧的美国生活的特质，已经被刘易斯放在显微镜下，做了一番毫不留情的审视。乔治·巴比特就是有教养的人的死敌，“大街”式的思想状态阻碍了美国文明的前进道路。

继《巴比特》出版后，涌现出大量作品，反映了精英阶层对商人控制美国政权的不满情绪，以及他们逐渐破灭的幻想。这波反抗潮流的定调者、敲响战鼓的领袖人物，就是亨利·路易斯·门肯（H. L. Mencken）。

二

门肯多年以来一直在《巴尔的摩太阳报》编辑部工作，曾经和乔治·简·内森（George jean Nathan）共同担任《时尚人物》的编辑。

《时尚人物》当时境况不佳，杂志的名字和过去“不三不四”的名声阻碍了杂志的发展。正当这本杂志日渐衰落的时候，图书出版商阿尔弗雷德·科诺夫（Alfred A. Knopf）聘请门肯和内森创办一本新的月刊，主要的读者群是美国左翼精英。在1923年年末，第1期《美国信使》杂志出版了。这个日期——如果你已经不记得了的话——就是伍德罗·威尔逊总统去世几周前，当时参议员沃尔什正在设法搜索到底是谁把钱给了内政部长福尔，理查德·西蒙将要产生出版填字游戏书的想法，博克和平奖大概会颁发给查尔斯·莱弗莫尔（Charles H. Levermore）。

《美国信使》的绿色封面和版式，就如门肯在巴尔的摩的石墙宅邸一

从大繁荣 到大萧条

样大气庄重，但里面却刊登着极具轰动性的内容。这本杂志承袭了《时尚人物》的固定专栏，像门肯的文学评论、内森的戏剧批评、一系列社论随笔——当时称为“重振兴业”，如今成了“诊断记录”，以及收集美国各种奇谈怪论的“美国文献”专栏。每个月，门肯都会用上几页篇幅批判大多数的普通百姓及其所作所为。这本杂志极为推崇德莱塞（Dreiser）、卡贝尔（Cabell）、舍伍德·安德森（Sherwood Anderson）、薇拉·凯瑟（Willa Cather）和辛克莱·刘易斯（Sinclair Lewis）这些公然反抗美国艺术和文学学会代表的传统道德习俗的作家，他们对文学作品中日常生活的极度感性化、逃避现实和浮夸的学术氛围的现象极尽挖苦之能事，严厉斥责巴比特式的庸碌之人、扶轮社会员、卫理公会教徒、改革家，对柯立芝繁荣时代的信仰不屑一顾——门肯将其称为“理想主义的无聊想法”，总的说来，这本杂志带着刺耳的嘲笑，对美式风情细细审视了一番。

《美国信使》立即引起了轰动。这本杂志内容新奇，不落俗套，让读者看得极为痴迷，把千万人的顾虑都变成了现实。不久，在大学校园里，反传统的年轻大学生纷纷把绿色封面的《美国信使》拿在手中看得入迷。安宁的小镇的经理人偶然间看到这本杂志，会感到大惊失色、不知所措；他们确信，门肯这个人倘若不是魔鬼派来的使者，也必定是个放荡到不知羞耻为何物的流氓。当门肯去代顿小镇采访斯科普斯审判案时，他把小镇居民叫作乡下人、乡巴佬和种地者，斯特里布林牧师反唇相讥，把门肯称为“卖弄文采、胡诌八扯的势利眼”。对于这次口舌之战，大量愤怒不已的公众舆论只能高喊“阿门”，暗自祷告。此后数年，《美国信使》的这位主编备受指责，他为了讨好自己的崇拜者，出版了一本《粗话大全》，这本书里全是诋毁他的粗俗之语。与此同时，门肯的杂志发行量不断攀

升，到了1927年已经超过7.7万册；就在同一年，沃尔特·李普曼称赞他是“整整一代精英中最具有个人影响力的人”，这种赞扬一点夸大的成分都没有。

在很多读者看来，门肯似乎对一切都看不顺眼。这并不是事实，但是可以肯定，反叛精神就是他的生命动力。按照他自己的话说，他“反对所有的神学家、教授、社论作者、右翼思想家和改革家”。他“反对爱国主义，因为这种主义要求人们接受那些愚蠢之极的主张，比如说，一个美国长老会教徒可以和法国作家阿纳托尔·法朗士（Anatole France）、德国作曲家勃拉姆斯（Brahms）或者鲁登道夫（Ludendorff）等而视之”。他不相信“在民主的统治下会有文明的生活”。他把社会主义者和无政府主义者都叫作白痴。他反对禁酒运动、稽查制度和所有干涉个人自由的法令。他对道德规范和基督教徒的婚姻鄙视之至。在他这些令人震惊的偏见里，显然存在矛盾。有些批评者质疑，他所推崇的精英统治怎么会允许存在他所坚持的自由？除非统治阶层都是由门肯主义者组成的，而这是几乎不可能出现的假设。然而，这种前后矛盾丝毫没有让门肯感到不安，一开始也没有让他的追随者苦恼万分。面对门肯畅快之极的散文风格，人们很难做到冷静地分析。

他对那些老百姓大肆抨击，讽刺他们的语言简直前无古人。他嘲讽对手的话非常刻薄，如江湖游医、下三烂的骗子、撒谎大王、傻瓜、下贱货色、恶魔、蠢材和糊涂蛋；他提到多愁善感的人，就说他们到处洒玫瑰花露；提到布莱恩，就说他“生性狂躁，只会玩低劣的鬼把戏”；提到他不喜欢的书，就说那些都是一堆垃圾；对于田纳西州的朴实农民，他称为“打着哈欠的猴崽子”和“下等的类人猿”。有时，门肯也会写下精确得体的英语，如他的学术著作《美国语言》，但是每当他热血沸腾，就会拿

从大繁荣 到大萧条

起夸张讽刺和含沙射影的比喻武器。只要他一出现，空气里就充满批判的话语；第一次读到他的文章，如果你没有冒出一股无名怒火，就能体会到一种发自内心的强烈快意，犹如在游乐园里用棒球把陶瓷瓦罐砸得稀烂。

门肯把一个个偶像打得支离破碎，引起了人们广泛的关注。不过不要忘了，这可是大家对繁荣时代极为推崇的时候，此时布鲁斯·巴顿为了称颂高潮的推销手段，修正了基督教的教义，原教旨主义者对进化论横加指责。卫理公会禁酒协会、禁酒运动和社会公德都在设法把这个国家改造成严肃而清醒的整体。直到此时，精英们还一直保持防守的态度。不过现在，门肯激进的言论给了他们底气，让他们改变了自己表达的口吻。尽管声音没有那么发聋振聩，但其他杂志也加入了宣扬不满的行列：《哈泼斯杂志》在1925年更换为橙色封面，以一种果断抨击的全新姿态来审视美国人的生活，从而使发行量增加了一倍；《论坛》杂志对小说《大街》认为无可辩驳的话题展开争论；《大西洋月刊》刊登了历史学家詹姆斯·特拉斯洛·亚当斯（James Truslow Adams）的批判性文章；到了战后十年的末期，《斯克里布纳杂志》甚至被禁止在波士顿的书报摊售卖，因为杂志上连载了海明威的小说。新闻界不断推出反映少数精英对美国和美国生活看法的著作。反叛与争议性的书籍越来越多，到了1926年和1927年，如果一户人家的墙上挂着毕加索（Picasso）和玛丽·洛朗森（Marie Laurencin）画作的复制品，书架上立着《太阳照常升起》和《民主笔记》，家里还有人说扶轮社或布莱恩的好话，那他肯定会被当作一个不可救药的蠢货。

三

在这段反抗的岁月里，这些精英们的信条究竟是什么？以下就是一份

简要的叙述，但是没有几个人会全部认可；不过，也许可以表明他们总体意见的大概倾向。

第一，他们崇尚性自由观念，认为这方面应该比美国严格的道德准则所允许的范围更开放。至于对性的讨论，他们不仅认为可以直言不讳，还觉得这个话题应该继续探讨下去。他们就是道德教化革命的开拓者，这场革命在第五章里有详细介绍。从战后十年之初开始，他们就沉醉于菲茨杰拉德（F. Scott Fitzgerald）小说里年轻思想家的你依我依之中，为埃德娜·圣·文森特·米莱（Edna St. Vincent Millay）的大胆表白兴奋不已，因为米莱声称自己身心疲惫，无法在那漫漫长夜中苦苦煎熬。到了最近，他们又对同性恋文学作品兴致盎然，有数千人前去观看尤金·奥尼尔那部长达五个小时的精神病理学戏剧《奇妙的插曲》。他们阅读的文章是性、谈论的话题是性、心里的想法全都是性，他们对那些表示反对的人漠然置之。

第二，他们尤其蔑视通过立法来推行礼节规范，对由此产生的影响极度反感。他们憎恶卫理公会派的游说者约翰·萨姆纳（John S. Sumner）和所有支持稽查制度的人；他们把清教徒，甚至是殖民地时期的清教徒，都描绘成黑着脸、嗓音粗哑的伪君子；在他们眼里，维多利亚时代的风格既粗俗又可笑；在他们看来，萨克雷（Thackeray）、丁尼生（Tennyson）、朗费罗（Longfellow）以及19世纪波士顿文人的声望已经下滑到了有史以来的最低点。他们坚持认为，短裙和文艺上的戏谑时代是新的启蒙运动的开始，年轻的精英嘲笑《生活》杂志里描绘的19世纪90年代的“欢乐时光”，和托马斯·比尔（Thomas Beer）一起，高高在上地把“紫红色十年”（Mauve Decade）的蓬松衣裙和闪烁其词的小说打量一番。实际上，有些精英似乎认为，除了古希腊文明时代、卡萨诺瓦时期

从大繁荣 到大萧条

的意大利、交际花风行时期的法兰西和18世纪的英格兰，现代社会以前的所有历史时期都显得荒唐至极。

第三，大部分精英对禁酒运动强烈反对，对稽查制度深恶痛绝，对政治重建和社会复兴持有疑虑，进而怀疑所有的改革运动，不对所有的改革家持有信任感。他们绝对不认可自己是同胞兄弟的保护者，一个人不将宽容看作无以复加的美德，就会让他们忍无可忍。如果有人在进步思想家的晚宴上听到有人说“法律制度太多了”，应该让人民自由地生活，那么他就会在140场宴会上听到这句话。在1915年，改革家通常被当成赞扬的字眼儿；而在1925年，这个词——起码在精英们中间——已经成了带有讽刺意味的称呼。

第四，他们大多数人都都是宗教怀疑论者。如果说20世纪20年代振臂高呼的不可知论者和无神论者要比19世纪90年代少，一方面是因为怀疑宗教不再被看作危言耸听的想法，另一方面是因为反对宗教的精英们认为，福音派教会没有急迫地按照他们的形象改造别人，于是他们感到非常满意，便平静地走出了教堂。人们不禁猜想，19世纪90年代以前的美国大学生，是否会像20世纪20年代的大学生一样，在讨论普遍取消大学礼拜仪式的时候，一脸平静地说，“聪明人是不会再信仰上帝了”。不断思考的公众从来没有看到这么多书籍，而这些书从一开始就认定他们的读者抛弃了古老的宗教体系。

第五，对于大多数中产阶级，他们几乎同时都有着一种不以为然的态度，因为这些人正是禁酒运动、稽查制度、原教旨主义和其他压制行为的根基。他们纷纷效仿门肯，憎恶巴比特式的庸碌之人、扶轮社会员、三K党成员、微笑服务、啦啦队和超级推销员。居住在城市中心的精英们深感自豪，自以为比愚昧偏远城镇的居民处境优越，然而正是这些地方造就了

巴比特式的庸人。比如说，1925年创办《纽约客》的时候，杂志上所写的箴言就是“不是给迪比克的老太太看的”。他们特别看不起那些成群结队涌向欧洲的美国游客；如果有人坐在甲板躺椅上，而他旁边的乘客在膝盖上放了一本阿道司·赫胥黎的新小说，他就免不了要高谈阔论一番，说法国某些地方优雅别致的小餐馆，还没有“被美国人给毁了”。

第六，他们尤其以颠覆大多数人心目中的偶像为人生一大乐事；威廉·伍德沃德在1923年出版的小说里发明了“揭露真相”这个词，成了精英们流行的做法。林顿·斯特雷奇（Lytton Strachey）写的《维多利亚女王传》成了1922年美国的畅销书，随后有一大批揭露真相的传记纷纷出版。鲁伯特·休斯（Rupert Hughes）剥去了乔治·华盛顿（George Washington）的华丽外衣，他在演讲中宣称：“华盛顿是牌术高超的专家，酿造威士忌的行家，诅咒骂人的高手，他和手下人的太太跳上三个钟头的舞都不用休息。”因此引发了一场骚乱。传记作家纷纷描写其他美国名流的缺点，把历史上声名狼藉的恶人挖掘出来，塑造成形象生动、极富魅力的人物。结果有一段时间，人们自然而然地认为，如果一位传记作家想获得成功，就得把白的说成黑的、黑的说成白的。

第七，他们担忧批量生产和机械化对自己和美国文化产生影响，在这个被福特主义和连锁店式思想高度垄断的国家，他们把自己看成争取文明权利的最后一道防线。他们对于受到严格管制感到无比痛恨，这种情绪推动了思想进步的学校运动，催生了高等教育的创新举措，如安提阿（Antioch）、罗林斯（Rollins）和米克尔约翰（Meiklejohn）在威斯康星州建立实验学院、斯沃斯莫尔学院和其他大学的荣誉计划。这种情绪同样推动了小剧院运动的开展，使之在全国各地取得了非常不错的成就，尤其是在学校里。当代小说的主人公都被刻画成这种形象：家乡的气氛让

从大繁荣 到大萧条

他感到压抑至极，为了逃离这种精神状态，他来到了曼哈顿，最后来到蒙帕纳斯或里维埃拉。在巴黎任何一家咖啡馆里，你都能找到一个美国浪子，庆幸自己的不错运气，终于摆脱了标准化的生活模式，但他们却忘记了这个事实：遍布路边咖啡馆的法国与深陷汽车和收音机之中的美国一样规规矩矩。精英们欣然接受外国演说家对美国文化的批评，而这种批评的数量从没有如今之多，优秀杂志上刊登着以《我们美国干的蠢事》和《幼稚的美国人》为题的文章，月复一月呈现在他们眼前，他们却没有对此心存不满。他们期望听到这样的说法：美国渐渐堕落到野蛮状态，对于有教养的人而言，这是个根本不可能活下去的地方。詹姆斯·特拉斯洛·亚当斯在《大西洋月刊》上哀叹道：“我在考虑一个实际的个人问题，那就是一个略有资产的普通人，生活简单，乐趣单纯，而且习惯思考，怎么样能在本国找到一个能够生活下去的地方。”

我要提醒一句，在20世纪20年代的美国精英们里，很少有人会接受以上所有的信条；但如果有人一条也不相信，那他就不是开明人士，不能算是真正有教养的人，也不能算是现代人。繁荣的花车滚滚向前，而站在路旁的精英们露出一丝嘲笑和失望，提高嗓门自说自话。

四

门肯虽然愤世嫉俗，却非常享受他的战斗。他继续和带着武器的敌人正面交锋。在号角声中，他说着：“呵哈！”美国文明的各个方面都会出现问题，起码为他手中的短枪提供了称心如意的靶子。他在《偏见集》的第五本里自问自答：“如果你发现美国有这么多不值得尊重的事物，你为什么还要住在这里？”然后他自己回答道：“人们为什么要去动物园呢？”从来没有人像门肯那样，在美国动物园里尽情享乐，大声取笑着田

纳西州的类人猿。

然而，对精英们阵营里的大多数同行来说，情况并不是这样。在这段历史时期中经常提及“幻想破灭”，但这种感受（除了商业和商业带来的实质改善）正是20世纪20年代的基调。大多数美国人也许对此毫无认识。战争结束后，他们有种奇怪的失落感，觉得生活并没有给他们带来希望得到的东西，他们深知有些价值观念曾经特别重要，如今已经成为过眼云烟，但是他们依然兴致盎然、满心欢喜，完全注意不到自己思想发生的变化。然而，美国和其他地方的大多数精英再清楚不过：他们的幻想已经破灭了。不幸的是，很少有人像门肯那样对人性的期望如此之低的成熟思想。如果你一直认为这里是有教养的人的乐园，你就不能享受动物园里的快乐。

精英们信奉更开放的性自由观念，当他们通过亲身体验，或是从书本和戏剧中得到体会而获取了这种自由之后，却有很多人感到很失望。他们发现，爱情转变成了克鲁奇所说的，剥夺了诗情画意和富有意义的生活中最可爱动人的一幕成为“细化分类的精神错乱”。正如克鲁奇所说的那样，“感情只有首先得到尊重，才会有尊严”；而爱情来得太容易，过于强调生理需求，变得不再令人尊重。埃尔默·戴维斯在一篇散文中提到，有本战后小说的女主角“沉溺于259段恋情，如果我记得不错的话，她没有和其中任何一个男人产生一段刻骨铭心的爱情；而维多利亚时代小说里的淑女，只要一次得体的邂逅，就能萌生爱意”。这位忙碌的女主角在文学作品里都能找到许多同类型的人，毫无疑问，现实生活里也有不少；他们能够清楚地感受到一点，罗曼蒂克是不能大量复制的，一旦爱情变得轻而易举，也就成了平凡的东西。即使他们没有同龄人那么不检点，可是当浪漫的爱情变得不值钱时，也会感到无聊之极。

从大繁荣 到大萧条

作为标准化和压制的强劲对手，精英们信奉自由，可自由到底是什么呢？虽然遭到禁酒运动的侵扰，受到各家商会的控制，人们会感到不自在；但是从长远来看，拥有自由却不知道怎么办，只会更让人觉得如坐针毡。在整个20世纪20年代，最令人失望的场景莫过于里奇蒙德·巴雷特（Richmond Barrett）在《哈泼斯杂志》上刊登的小说《森林里的孩子》里所描述的：有位美国年轻人草率地跑到巴黎去逍遥一会，干一些布法罗和艾奥瓦市不允许做的事情，他不管遇到谁都极为无礼。他品味了几段短暂而无味的情爱之事，每天泡在杜松子酒里，最终赤身裸体地昏倒在小咖啡馆的桌子底下。当然了，巴雷特只是描写了年青一代精英中的极端主义者；但是在20世纪20年代，谁能看不出来，这就是斯科特·菲茨杰拉德在《所有悲哀的年轻人》里所塑造出来的那种人呢？沃尔特·李普曼这样写道：“自从战争结束、理想主义濒临崩溃以来，这一代人走向成熟最显著的标志，不是他们对宗教的反叛，不是对父母道德律令的反抗，而是他们对自己反叛行为的幻想破灭。年轻男女的叛逆非常普遍，但是他们的反抗非常悲哀又缺乏信念。而今他们既不信奉新自由，也不相信旧规则，这可算是新奇之处。”还可以补充一句，那些比他们年长而明智的人，尽管思考方式不同，却想到了这个问题无法解答的地方：得到自由之后，下一步会怎么样？

这些精英也相信科学真理和科学方法。科学不仅完全带走了他们的上帝，或是把上帝理解为世上的秩序规则，为了满足精神需要在头脑里凭空出现的幻想；正如克鲁奇在《现代精神》中指出的那样，科学也把人理解成其对于是非观念没有先验性的权威生物。人们再也不可能自信地判断，这是对的，那是错的；威斯康星州认为正确的行为可能（据人类学家说）在婆罗洲就是错误的，甚至威斯康星州的判断是非者，看来也不过是容易

犯错的人。完全可信的事情远离了人们的生活。更糟的是，它也远离了科学本身。从前，那些否认神圣秩序的人依然能够依靠安稳的自然法则生活，但是现在连这种法则也岌岌可危。爱因斯坦和量子论带来了新的变数和新的疑惑。没有什么事情是确定无疑的；生活的目标无法被明示，人们更无法了解生活的目的。在一片迷雾里，没有什么实实在在的东西让人们依靠，能让人说这是真的，这可以继续下去。

五

不过对于这个国家的精英们而言，所有这些不确定因素都蕴含着新的希望。随着原有价值观的崩溃，艺术界那套历史悠久而毫无漏洞的评判标准也随之瓦解，为崭新独立的艺术作品打开了获得认可的大门。更让人欣慰的是，这种思想处在了优势地位：新颖独立的艺术作品可以真正来自本国之中，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可以让自己的文化彻底摆脱欧洲的控制，这个时代已经来到了。

要说服鉴赏家们认可这些出自美国本土的一流的绘画和音乐作品依然非常困难。艺术品收藏家怀着鄙视的态度把美国精英们的优秀作品拒之门外，用真挚的感情称颂法国现代派及其模仿者的画作，从艺术角度来看，美国几乎变成了法国的殖民地。美国的管弦乐团依然是外国指挥家的天下，演奏的几乎都是外国音乐作品，本土作曲家很少有机会做出惊人之举。但是，即便在美术和音乐方面，也出现了改变的迹象。艺术家们开始瞪着双眼，考虑描绘摩天大楼和生产机器的景象，收藏家暗暗等待着乔治·贝洛斯（George Bellows）离世的新闻，好把他那些表现美国职业拳击赛的粗糙油画和石版画以高价卖出。音乐迷们终于体验到了黑人灵魂乐的魅力，他们觉得乔治·格什温（George Gershwin）会缩

从大繁荣 到大萧条

小流行爵士乐和活力音乐的差距，让泰利（Talley）和劳伦斯·蒂贝特（Lawrence Tibbett）这样的歌手成为都市明星，而且满足地聆听迪姆斯·泰勒（Deems Taylor）作曲的美国歌剧（当然了，歌剧情节并不是美国题材）。

在建筑领域，本土风格的建筑受到了更热烈的欢迎。尽管美国普通的乡间房屋依然是乔治国王风格的庄园宅邸、法式的农庄，或者是西班牙式的别墅，里面配备了浴室和可停放两辆车的车库，但就算在森林湖，人们也还想体验房地产中介商所谓的“旧世界魅力”；尽管美国银行还是古典圣殿式建筑，依然有建筑师打算为美国现代的大学生活建造一座中世纪哥特风格的建筑；不过，已经有越来越多的人认可路易斯·芒福德（Lewis Mumford）的观点，新材料和新用途要求建筑师采用新的设计方法，不再顾虑艺术价值。在战后十年之初《芝加哥论坛报》举办的比赛中，赢得二等奖的沙里宁（Saarinen）的设计风格尤其令人惊讶，为摩天大楼的建造开启了新的可能，而建筑师路易斯·沙利文（Louis Sullivan）、弗兰克·劳埃德·赖特（Frank Lloyd Wright）和卡斯·吉尔伯特（Cass Gilbert）设计的伍尔沃斯大厦，已经暗示了这种存在的可能性。摩天大楼具有独特的美国风格，为什么不能用新颖的美国方式，来实现钢结构建筑的问题？美国建筑业逐渐开始发展。古德休（Goodhue）设计的洛杉矶公共图书馆和内布拉斯加州议会大厦，阿瑟·卢米斯·哈蒙（Arthur Loomis Harmon）设计的纽约希尔顿酒店和巴克莱—维西电话大楼[麦肯锡、维尔西和格梅林建筑师事务所、拉尔夫·托马斯·洛马斯（Ralph Thomas Loamas）还共同建造了其他设计精美的建筑]，至少可以线条分明、精美大方地体现美国人的建筑需求，为日后的发展铺平了道路。

最后，美国的文学领域几乎完全摆脱了外国的羁绊。尽管精英们购

买的外国书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多，他们成千上万地移居蒙帕纳斯和昂蒂布，但是他们仍希望能写出美国特色的文学作品，对美国文学正确评价。他们的写作和评价受到了多方面的支持，门肯对毫不退让的本土文学作品称赞有加，优秀的评论期刊纷纷创立（如《星期六文学评论》），人们对美国历史人文背景进行研究，挖掘了很多富有潜力的本土文学素材，如伐木巨人保罗·班扬（Paul Bunyan）的民间传说，以及边疆地区的亡命之徒和河上漂泊的演出船，人们出现了崭新的活跃思想，到头来观众们不再相信美国文学会永远低人一等、缺少新意。的确，在这十年间，诞生了辛克莱·刘易斯的《阿萝史密斯》、德莱赛的《美国悲剧》、海明威的《永别了，武器》、薇拉·凯瑟的小说、班奈特谱写的歌曲《约翰·布朗的遗体》、尤金·奥尼尔的几部戏剧、林·拉德纳（Ring Lardner）的《金色蜜月》等短篇小说。仅仅提到这些作品就足以让人心生艳羡，这十年可以说比光明的前景还要灿烂。

六

随着反叛的热乎劲儿烟消云散，对巴比特式愚人的批判逐渐消失。《美国信使》的发行量在1927年达到了顶峰后一路下跌。《纽约客》杂志把迪比克的老太太扔到一边，不再用愤恨的眼光看待世人，形成了随意风趣的写作风格；城市精英们喜爱的其他杂志，也对用警惕的态度来看待美国风情产生了厌倦情绪。色情小说似乎少了赤裸大胆的色彩，揭露名人真相的潮流也到了终点。各个方面都开始出现类似的迹象，表明精英们的精神抑郁症差不多已经度过了最糟糕的时候。

1929年这一年，克鲁奇出版了《现代精神》，全面描写了当时令人沮丧的思想幻灭，沃尔特·李普曼打算为信仰和伦理道德的新体系奠定基

从大繁荣 到大萧条

础，来满足那些幻想破灭的人。《道德序论》的发行成功表明，许多人对陷入精神混乱的状态产生了厌倦。就在同一年，精英们中出现了要求实现人道主义的响亮呼声。这种人道主义的风潮不免带有滑稽的意味，那些对此争议不断的人，几乎搞不清楚在三四种人道主义里，哪一种才是他们自己心中的人道主义。保罗·艾尔默·摩尔（Paul Elmer More）和欧文·巴比特（Irving Babbitt）这样不闻世事的学者，不可能成为组织各种群众运动的领袖；但是也进一步证明，怀疑论者的倾向是沿着一条新的防线探索困惑，然后直面这个困惑。人们正在不遗余力地通过哲学家怀特海（Whitehead）、爱丁顿和牛仔裤的科学哲理，寻找人生信念的基础，让生命活得有价值。

也许，战后十年间消失的价值观已经一去不复返，但至少人们还在寻觅新的价值观，来填补它们消失后空出来的位置。

如果这种价值观存在的话，那来得正是时候。在战争时期，乐观主义者和演说家们已经高声地预言，人们会走向一个新时代。但新的一天还没有到来，黑夜却已经降临，许多人在黑暗里不知道何去何从。他们可以反对愚蠢和平庸，可以充满怜悯地把自己看成“迷惘的一代”，从中自得其乐，但他们依然得不到心灵的安宁。

FROM GREAT
P R O S P E R I T Y
TO GREAT DEPRESSION

第十章 酒与阿尔·卡彭

1919年，国际联盟还在被人放在天平上不断衡量，伍德罗·威尔逊仍然为国际联盟唱着颂歌，在美国四处笼罩着布尔什维克主义的阴影，做父母的开始为年青一代操心不已。如果你在这时告诉一位普通的美国公民，禁酒运动肯定会成为一个在20世纪20年代引起激烈争论的公共问题，他可能会对你说，你简直是疯了。如果你为他描绘出此后的真实情景，这位天真的公民一定会吓得瞠目结舌：装满朗姆酒的船漂浮在12英里界线以外的海面；在夜色中人们把船上的威士忌搬到运送走私品的快艇上；运输啤酒的卡车在城际公路上遭到手持汤普森冲锋枪的匪徒劫持；私自酿造的烈酒装满了货车；时尚晚宴开始前按惯例送上走私的鸡尾酒；绅士淑女到地下酒吧去开怀畅饮，在帘幕低垂的铁栅前接受安检；阿尔·卡彭成了芝加哥私酒贩子里的千万级别的富翁，坐着配备防弹玻璃的装甲汽车招摇过市。美国宪法第十八条修正案已经通过，将于1920年1月16日开始生效；他得到了政府的承诺，自己也开始坚信，第十八条修正案已经解决了禁酒的问题。

从大繁荣 到大萧条

题。不管你是否愿意，国家将开始全面禁酒。

从20世纪30年代追溯过去，我们会发现近代美国历史上最不平常的场景，就是经过几代人的激烈斗争，禁酒运动轻而易举地达到了目标，禁酒令终于被载入了法典。整个国家不仅无怨无悔地接受这部法案，而且显得毫不在乎。宪法第十八条修正案在1917年提交参议院，仅仅经过十三个小时的讨论，就获得一致通过，其中部分内容是按照十分钟原则批准的。几个月后，该修正案递交众议院，关于提案的讨论也只用了一天的时间。随后，各州立法机构纷纷签字通过；到了1919年1月，也就是停战两个月后，轻而易举达到了在所有州中需要其中四分之三通过才可以立法的标准，该修正案成为美国宪法的一部分（除康涅狄格和罗得岛州外，其余各州都批准了该法案）。因为执行第十八条修正案非常关键，根据反酒吧联盟模式起草的《沃尔斯特法案》顺利通过。伍德罗·威尔逊总统否决了该法案，让美国人大为惊讶。不过美国国会不顾他的反对，立即再次通过该法案。此举引发了零星的抗议，纽约召开了群众集会，巴尔的摩举行了游行，美国劳工联合会通过一项决议要求修改法案，不让政府剥夺工人喝啤酒的权利，华盛顿国会大厦前举行了声势浩大的示威，但是反对的力量有气无力、白费口舌，整个国家都自然而然地认为，禁酒运动的出现是顺势而为，无论是新闻界的评论，还是餐桌上的闲聊，都很少提到法律能否得到执行的问题；最难办的问题是，一个真正禁酒的国家会是什么样？强制性地全国禁酒将会对工业、社会秩序和下一代人产生怎样的影响？

这是怎么发生的？这个势不可当、草率通过的法案为什么有如此举足轻重的意义？

在那本描写禁酒运动最初十年的书里，查尔斯·梅尔茨清楚地表明，支持修正案的各种力量经过严密组织；而反对修正案的各种力量根本一盘

散沙。直到美国参战前，全国禁酒运动还看似毫无实现的可能，鼓动缺少想象力的公众去反对无凭无据的威胁，一直都是个难题。此外，反对禁酒的领导阶层毫无信誉可言，因为支持他们的酒商已于夫所指，即使面对日益高涨的戒酒要求，也坚决反对清理门户。

美国参战给禁酒运动领导人带来了绝佳机会。战争转移了那些可能会抵制禁酒运动的民众的注意力：随着国家危难到了最重要的关头，酒类未来的地位似乎毫不重要。战争让国家习惯了严格的立法，赋予了联邦政府全新的、宽泛的权力。战争使人们必须节衣缩食，将禁酒运动作为节约粮食的措施向爱国者进行推广。战争让公众舆论对德国的一切进行抵制，而许多大酿酒企业正是来自德国。战争也带来了斯巴达式的理想主义，第十八条修正案就是这种思想的自然而然的体现。为了效率、生产和健康，人们可以牺牲一切。如果清醒的士兵是极富战斗力的士兵，如果清醒的工人是有生产力的工人，那么开展禁酒运动的理由就无懈可击。此时，美国人民看到了乌托邦式的虚幻美景：在他们看来，这场战争有可能是所有的战乱的终结，此战的胜利将会带来光明的世界新秩序，美国可能会进入一个永远清醒而极有效率的时期，这幅场景并不难想象！最终，战争让他们渴望得到立竿见影的效果。在1917年和1918年，凡是值得做的事，就值得马上去做，人们毫不顾忌体面与礼节、反对意见和舒适程度。各种力量结合起来简直势如破竹。这个国家一腔热血、毫不犹豫地走上了通向禁酒乌托邦的大道。

即使在战争结束后，似乎也没有人想到修正案会难以实施。当然，第一任禁酒管理局局长约翰·克莱默（John F. Kramer）没有表示出一丝怀疑。他用庄严的口吻说道：“这项法案将在各地的城市和乡村实施，在不服从法律的地区将被强制执行。这项法案规定作为饮料的酒类将不再生产。我们将禁止在美国领土、地下和领空内生产、销售、运送或输入酒类。”据反酒吧联

从大繁荣 到大萧条

盟预计，国会每年拨款500万美元就可以确保这项法案的顺利实施（大概包括预防“地下”偷运私酒的费用）。国会投票表决的内容仅此而已，议员们终于解决了这件闹心不已的麻烦事。他们长舒了一口长气，转而对付其他更重要的问题。1920年1月16日的清晨来临了，从此开启了一个充满希望的禁酒时代。禁酒运动领导人、国会和公众后来终于慢慢意识到这个问题，他们曾经如此轻松草率地处理了一个意义重大的难题。

二

很明显的一点是，实施禁酒令最可行的方法就是从源头切断对酒类的供应，但是你要明白这将意味着什么。美国有18 700英里的海岸线和陆地边境线，为走私酒商提供了方便。成千上万的药剂师可以按照医生处方出售酒精，而如果没有严密并持续的监督，这种销售根本无法得到控制。法律允许出售淡啤酒，而生产淡啤酒的唯一方法是酿造出纯啤酒，然后从中分离出酒精，而在整个生产过程中又很容易出现分离失败的情况。只有通过严格而有效的监管，才能防止为私酒运输打开方便之门的工业酒精的生产。但在酒精离开工厂之后，不可能追踪经销商之间经手的路线；同时根本无法保证那些按照政府法令在酒精里添加的不能饮用的原料，不会被有能力的化学家提纯出来。任何地方几乎都可以进行非法酿酒，甚至是在房子的地下室里；建起一套商业蒸馏设备仅需要500美元，每天能生产50 100加仑私酒，从而获取大量的收益，而只要花六七美元就能买到1加仑的轻型蒸馏器。

为了对付这些可能违反《沃尔斯特法案》的威胁，美国政府在1920年拨款组建了1 520人的禁酒专员队伍，而到了1930年这个队伍里也仅有2 836人；禁酒力量如此薄弱，有时还需要对此并不热衷的海岸警卫队、

海关和移民局提供帮助。查尔斯·梅尔茨描写了这样一幅生动形象的场景：在1920年，如果把所有的禁酒专员调集到海岸线和边界线上，暂且不管医用酒精、啤酒厂、工业酒精和非法酿酒等领域，每个人就要巡视12英里的沙滩、港口、海角和河岸。1920年，禁酒专员的收入普遍在1 200美元到2 000美元；到了1930年，他们的工资大幅提升到2 300美元到2 800美元。人们相信这些每星期拿着35美元、40美元甚至50美元的人拥有专业技术，勤奋地工作，严格监督工业酒精厂家复杂的化学生产流程，用聪明才智战胜狡猾的私酒贩子，他们拥有坚定的人格魅力，任凭口袋里塞满了钱的家伙怎样收买也不为所动；他们还相信世上有圣诞老人、永动机和小精灵。

然而，面对艰巨而又复杂的任务和巨大的金钱诱惑，这支禁酒专员的队伍显得那么不堪一击，他们的薪水如此微薄；如果得到公众舆论的全力支持，也许还能切断酒精的供应，但是公众舆论已经调转了方向。战争宣告结束，到了1920年，一切都恢复常态。禁酒运动遭遇到了情绪抵触，这种情绪曾经使伍德罗·威尔逊一败涂地，加速了道德教化革命的爆发。斯巴达式的理想主义轰然倒下。人们厌倦了为了崇高的事业节衣缩食，厌倦了把美国变成英雄人物生活的土地。他们想身心得到放松，不受束缚地生活。人们对禁酒运动态度的变化之快，简直令人迷惑不已。短短几个月内，《沃尔斯特法案》就陷入了进退两难的境地。禁酒令已经载入了法典之中，禁酒管理局忙于对付私酿酒的汹涌暗潮，街角的酒馆变成了人们的回忆；但是禁酒的黄金时代永远都不会到来了。

三

此后几年发生了一系列相互矛盾的事件，引起了民主政府的旁观者的

从大繁荣 到大萧条

极大兴趣。显而易见，在美国大部分地区，禁酒令并没有得到彻底执行。旁观者会一针见血地提议，摆脱困境的直接方式是把执法力度增加一倍、两倍甚至三倍，或是修订法律。但是人们压根不会这么做。禁酒运动领导人不愿意承认美国全面禁酒的任务比他们设想的要艰巨很多，也不愿意呼吁国会大幅增加禁酒执法的拨款；对他们而言，更简单的做法是把禁酒令的反对者污蔑为布尔什维克党和文明的破坏者，希望强大的舆论能扭转局面。国会没有勇气承担责任，尽管参众两院里支持禁酒的议员占大多数，不过支持禁酒是一回事，而不惜一切代价哪怕给自己的选民带来不便也要坚持执行，就是另一回事了。行政官员把禁酒问题当作炸药包一样小心提防；哈定政府和柯立芝政府对这个问题的最大贡献——除了协商条约将3英里界线扩大至12英里，努力提高执法效率，却没有呼吁国会增加财政拨款——其实这也无非是宣扬遵守法律的美德这种表面文章。各州政府本应协助禁酒管理局，但是截止到1927年，各州对这项事业的财政支出，仅占本州执行打鱼狩猎法律费用的八分之一。有些州立法机构完全取消了拨款，甚至支持禁酒的各州，也希望在执行《沃尔斯特法案》时让联邦政府首当其冲。地方政府本应打击地下酒吧，却对此漠不关心，除非当地舆论一再坚持。原本就反对禁酒的各州，更不会推行任何实际有效的计划。无论是废除还是更改修正案，看来都毫无指望，他们此时只要大声呼吁、义愤填膺、深感遗憾，就觉得自己尽力而为了。禁酒令没有按照预设轨道前行，但是人们不愿意，也无法采取一切措施来积极应对这种状况。

装满朗姆酒的船从比米尼群岛、伯利兹和圣皮埃尔起航，经过精心伪装进入了美国港口，把货物转移到摩托快艇上，再运到安全的海湾。装有加拿大上等威士忌的汽艇飞驰在底特律河上。一箱箱走私的杜松子酒混在其他完全合法、标示准确的货物中间，放置在货船上。藏着烈酒的货车从

加拿大边界那边开到美国本土；整车的威士忌有时通过精巧篡改封条走私到美国。各式各样的走私行为大获成功，到了1925年，负责执行禁酒令的财政部副部长林肯·安德鲁（Lincoln C. Andrews）将军大胆推测，他的下属只查获了走私到美国的酒类的5%；根据商务部估计，仅1924年一年，流入美国的酒类价值就高达400万美元！啤酒从酿酒厂偷偷流失了出去；禁酒专员并不熟悉的酿酒作坊财源不断，生意火爆。在20年代中期，每年非法流失的工业酒精数量估计有1 300万加仑到1 500万加仑；即使到了1930年，政府已经加强了应对特殊供应来源的手段（通过严格控制许可制度和其他措施），禁酒官员也承认，每年流失的酒精依然达到900万加仑，其他人估计的数字则高达1 500万加仑（你要知道，1加仑的工业酒精经过稀释，加入香精调味，足够制成3加仑假酒。这些假酒装瓶后贴上苏格兰威士忌的精制标签，就可以被私酒贩子拿到上层人士的门前，吹成“刚从船上弄下来的”货色）。

随着时间的流逝，私酿酒成了酒类供应最广泛的来源。到了1930年，根据禁酒专家多兰（Doran）博士的证言，私酿酒的数量大概是提取工业酒精数的七八倍。如果有什么事实能证明私酿酒在美国泛滥成灾，那就是玉米糖的产量数据。在1919年到1929年，这种大宗商品的产量增加了六倍；正如《维克夏姆报告》所指出的那样，这种情形表明玉米糖的合法用途“特别少见而且不易查找出来”。毋庸置疑的是，玉米酿造的威士忌是玉米糖产量大幅增加的主要原因。

非法饮酒的浪潮来势汹汹，美国风俗画里出现了一系列鲜明生动、毫无体统的场景：在橄榄球大赛的赛场上，男男女女拿起小酒瓶喝个痛快；地下酒吧里放着常见的老式吧台，供应杜松子酒调制成的鸡尾酒，这也许是西西里黑帮私酿的（主顾们要花75美分，警察免费）；出身高贵的年轻

从大繁荣 到大萧条

小姐跷一只脚搭在铜栏杆上，一口喝掉手中的马蒂尼；因为加油站派来的小伙子会定期审查，年轻夫妻只能把成桶的葡萄汁放在卧室壁橱里慢慢加热；出门参加商务会议的企业高管会在包里放两瓶杜松子酒；销售经理大方地给来访的客人端上酒水，就像以前大方地递上香烟一样；旅馆服务员匆匆赶往417房间，送上加冰块的姜汁啤酒，按照对于管理规定极具讽刺意味的理解，他们不会供应“含酒精的饮料”；联邦检察官关闭了夜总会和地下酒吧，却会发现它们不久之后便会换了地址和名字重新开业；禁酒专员伊兹·爱因斯坦（Izzy Einstein）和莫伊·史密斯（Moe Smith）表现不俗，经过一系列可笑的伪装，出乎意料地逮捕了大量私酒贩子；美国海军的斯梅德利·巴特勒（Smedley Butler）将军在费城严厉打击走私酒行为，升了官，经过几个月的艰苦斗争，他承认用行政手段无法让这个城市全面禁酒，在一片混乱中黯然下台；政府下令在工业酒精里添加甲醇和其他有毒物质，防止酒精流失，反禁酒人士由此指责政府图谋杀人；政府官员由于无法用得当的方式防止酒类流入境内而大为恼火；在加拿大注册的“孤独”号轮船，被美国缉私船追了两天半，在距美国海岸215英里的地方沉入了海底，使加拿大政府感到忧虑；联邦法庭里禁酒案件积攒成堆，反对禁酒地区的陪审员不肯判处私酒贩子有罪，各个部门的公务员都在审查贪腐案件。

无论禁酒令对人们戒酒起到了什么作用，至少将饮酒过度的宣传和反宣传活动传播了出去。支持禁酒的人会告诉你，禁酒运动成为美国经济繁荣的基石，银行的储蓄存款金额日益增加，大工厂里的工人周一上班时眼神清透、双手平稳，足以证实这一点。可以说，禁酒运动使酗酒死亡人数减少，监狱里空空荡荡，工人可以用积蓄去买汽车、收音机和住房。不过，反对禁酒的人会告诉你，禁酒运动和经济繁荣一点关系也没有，反而

引起了犯罪率激增、婚外情和离婚率上升，人们公然无视法律，进而对自由政府的基础造成了危害。反对禁酒的人表示，禁酒支持者狂热地支持那些必然要遭到轻视的法律，就等于煽动布尔什维克主义；支持禁酒的人认为，禁酒反对者毫无顾忌地违反法律，就是煽动布尔什维克主义。只要你阅读报刊、收听广播，就能从凭空想象出来的事实里闻出来火药味儿：大街上再也看不到一个酒鬼；大街上的酒鬼比以前更多。大学里的饮酒问题不复存在；大学里的饮酒问题非常严重。在宾夕法尼亚的矿区，饮酒已经成为历史画面；在宾夕法尼亚的矿区，每两户人家就有一个蒸馏瓶。酗酒致贫的例子只不过是之前的一个零头；贫民窟里酗酒的恶习是实施《沃尔斯特法案》之前的三倍。A主教、B医生和C州长受到目前形势的鼓舞；X主教、Y医生和Z州长对此种局面惊恐万分。两派交锋日益激烈，毫不停歇，吵吵嚷嚷，互相攻击。

支持禁酒和反对禁酒的专业人士将大量统计数据呈现在公众面前，我们不必在这上面花费时间。许多数据并不可信，一位逻辑学讲师完全可以引用这些数字，作为事后归因谬误理论的完美范例。这也足以体现出一个简单的反常现象，随着第十八条修正案和《沃尔斯特法案》的实施，在整个20世纪20年代，关于美国饮酒人数比战前更多还是更少的问题，人们其实一直都在持续不断地高声争论不休。据推测，除了有钱人家之外，饮酒的人数比战前大幅减少；但是实际的情形已经非常清楚了，那就是禁酒令并没有实现在1919年人们所设想达到的目标。

四

到了1928年，关于禁酒的争论已经达到了极为激烈的程度，连总统竞选都被牵连其中。纽约州州长史密斯被提名为民主党总统候选人，尽管

从大繁荣 到大萧条

他坚决反对禁酒，还是在竞选中兴致勃勃地提出两点修订意见：第一点，修正《沃尔斯特法案》，对于“酒精饮料的酒精含量级别做出科学解释”（这对科学界来说是个艰巨的任务），在不超过国会所规定标准的条件下，允许各州自行制定标准；第二点，“修改第十八条修正案，在全体公民投票表决后，允许各州在本周内进口、生产、制造和出售酒精饮料，仅限于在本州内销售，不得在公共场所饮酒”。作为回应，共和党总统候选人毅然决然地站在了禁酒运动这一边。当然，赫伯特·胡佛的禁酒宣言对许多内容避而不谈；他称赞禁酒运动“是伟大的社会实践和经济实践，具有崇高的动机和极具价值的目标”，不过把禁酒的高尚结果刻意省略。然而，选民并没有留意到这些省略的内容，而是把对禁酒动机的肯定当作对成绩的认可。

共和党总统候选人在大选中大获全胜，禁酒支持者兴奋异常。尽管各州公民投票和民意调查的结果有着很大的差距，禁酒支持者还是声称他们在全国和国会都得到了大多数人的支持，现在他们对此更是深信不疑。然而，选举的结果为无法解决的疑惑留下了处理的空间。谁能说明白纽约东区的那位幸福勇士败得一塌糊涂，到底因为他反对禁酒，还是因为他是天主教徒？不然，是他被看作柯立芝繁荣时代延续下去的威胁？要么因为他是民主党人？

不过，赫伯特·胡佛所做的不仅是对禁酒运动的动机的认可。他承诺成立一个行政机构来调查法案的实施问题。胡佛入主白宫后两个半月后，任命了全国守法及执法委员会，委员会有11名成员，由纽约的乔治·维克夏姆（George W. Wickersham）担任主席，开始了这项艰巨的任务。

此后维克夏姆委员会一直埋头研究，等到他们从众多事实、理论和争议里解脱出来，向总统提交报告的时候，战后十年已成为过去。在1931年

1月，也就是维克夏姆接受任命十九个月后，他把11位调查员写出的厚重报告放在总统办公桌上。关于20世纪20年代至关重要的禁酒问题，几位聪明又公正的调查员的研究成果都体现在这份调查报告里，具有很高的观赏价值。

这是一份模棱两可的报告。首先，报告全文整体清楚表明，对执法人员无法实施全国性禁酒表示遗憾。其次，11位调查员每人提交了一份阐述本人观点的私人报告，仅有5人（不到半数）赞成进一步执行禁酒令，不必进行实质性改变；另有4人赞成对第十八条修正案进行修订；2人赞成彻底废除修正案。但是委员会全体投票赞成进一步执行禁酒令案，自以为是地提出建议，如果时间证明禁酒实验失败，便可以做出一定修正。这份报告的结论令人困惑不已，《纽约世界报》的专栏作家弗拉库斯对此事进行讽刺，写了一首小诗：

禁酒令糟糕之极，完全失败。
我们喜欢它。
它应该阻止却又阻止不了。
我们喜欢它。
留下一串贪污受贿的泥巴印，
我们的国土到处充满着缺德与罪恶；
它禁止的东西不值一文，
这一点我们都认可。

如果说维克夏姆报告令人困惑，这也是非常恰当的；当时他们面临的情况正是如此。在公正的旁观者看来，有一点非常清楚：从1917年到1920

从大繁荣 到大萧条

年，这个国家立法时完全不考虑化学常识，而选择了错误的方法，因为稍有常识的人会知道酒精的生产是那样的容易；也没有考虑心理学常识，因为普通人的内心冲动不容易受到禁令的压制。然而人们并不明白，这个国家如何从当初如此容易就陷入进去的困境里摆脱出来。按照修改法案的建议，怎样才能使喝惯杜松子酒的人满足于低度酒和啤酒？很多人已经懂得如何违反法律而不会受到惩罚，怎么能通过缓和的政府管理体系和酒精的销售途径，不让犯罪与腐败的情形持续下去？如果完全废除禁酒法案，让私酒贩子们失去赖以生存的手段，他们还会从事什么罪恶勾当？国家的酒类新政策将如何实施，让想改变法律的人展开了激烈的争执：酒精到底是罪恶之本，还是可适量饮用的饮品？是私人事情，还是公共事务？就算大多数头脑清醒的美国民众，能够如愿找到脱离困境的最佳途径，但还有13个州支持禁酒令，不肯对修正案作出任何改变，他们有什么机会来实施这些计划呢？近期没有什么困难比这个更让美国陷入踟蹰不前的境地了。

五

1920年禁酒令刚刚颁布的时候，芝加哥的约翰尼·托里奥（Johnny Torrio）突然萌发了一个灵感。托里奥是芝加哥黑社会中难以对付的人物，他发现刚刚被宣布不合法的酒类生意蕴藏着巨大钱财，于是灵机一动，希望把芝加哥全城的酒水供应控制起来。当时的竞争特别厉害，要是有一帮手脚利索、枪法一流的手下，就能够将局面控制住，他们可以吓唬那些私酒贩子，对地下酒吧的老板威逼利诱，如果他们不从约翰尼·托里奥那里买酒，那生活就不会安宁。托里奥现在只需要一个组织突击队的小头目。

约翰尼·托里奥曾经混迹于纽约声名狼藉的五街顶黑帮，是左撇子路

易（Lefty Louie）和血手吉普（Gyp the Blood）等帮派头目的手下（吉普本人曾涉嫌在贝克尔案件中杀害赫尔曼·罗森塔爾），托里奥当然会在自己的老巢里找个帮手。托里奥从五街顶黑帮挑选了一个24岁的那不勒斯小流氓做这桩买卖，答应他如果愿意来芝加哥解决争端，不仅会有丰厚的收入，还能分到私酒生意一半的利润。这个小流氓就这样来到了这个城市，在托里奥的四魔赌场里落下了脚，成立了一家貌似清白的公司。公司的资产包括一本家族《圣经》，还有一叠名片。名片上印着：

阿尔·卡彭

二手家具经销商 南瓦巴什大街2220号

托里奥又猜对了，实际上，他已经猜对了三次。芝加哥的私酒生意利润的确非常巨大，留下了充足的法律空白以消减法律的力量。竞争也的确异常激烈，托里奥时常会发现他的竞争对手收买地下酒吧的老板，劝他们买自己的啤酒，不从托里奥和卡彭手里进货，一旦遭到对方的拒绝，他们就会把酒吧老板打得失去知觉，把店面砸得乱七八糟。但是阿尔·卡彭是托里奥帮派头目最好的人选，他在学着如何对付这些突发情况。

听说不到三年，这个出身五街顶黑帮的小子手下就有700号人听他调遣，其中许多人擅长用短筒霰弹枪和汤姆逊冲锋枪。随着啤酒和煮酒（蒸馏酒）生意的利润滚滚而来，年轻的阿尔·卡彭学会了灵活的策略，尤其是使政界和政治家任其摆布的手段。到了1925年，他已经完全控制了西塞罗市郊，安插自己的人当上了市长，把手下指派到了完全开放的赌场和161家酒吧，在霍索恩酒店成立了自己的总部，手头的钱足有几百万美元。托里奥渐渐退隐到了幕后，卡彭成了黑帮老大。但是由于阿尔·卡彭执掌了大权，难免引发了流血事件。死对头奥巴尼恩帮、吉纳斯帮和埃罗斯帮纷纷阻挠他不断扩大势力范围，芝加哥到处都是杀人的场景，从来没

从大繁荣 到大萧条

有一座文明的现代城市承受过这样的苦难，大规模屠杀的新手段由此时衍生出来。

在这场帮派争斗中，解决对手的常用手段就是：用偷来的汽车跟踪对方的车辆，车上坐着全是手持短筒霰弹枪和冲锋枪的杀手；追踪的人紧跟不放，逼迫他停下车，快速向其开枪，随后消失在流动的车辆中，然后把这辆车扔到安全的地方。还有一种他们常用的手法，叫作带着受害人“出去兜风”，换句话说就是：把他诱骗到熟人的车上，不慌不忙地将其击毙，把车开到荒凉的城区，无声无息地扔掉尸体。还有一种方法是在仇家的住所对面租一处公寓或一间房子，安排几个雇来的杀手守在窗口。一个阳光明媚的下午，等到受害人刚刚走出房子，就有几十发机关枪子弹从低垂的窗帘后面向他扫射。不过，还有更多精妙的杀人手段。

比如说，曾经有一段时间里，卡彭在占据芝加哥的进程中最大的威胁是黑帮老大迪安·奥巴尼恩，而暗杀奥巴尼恩的准备过程，不免让人想到犹太出卖耶稣的死亡之吻。奥巴尼恩在夜里是私酒贩子和黑帮成员，到了白天就摇身一变成了花店老板：此人行为古怪、性情多变，既是赏兰的行家，也是枪杀的高手。有天早晨，一辆汽车停在了奥巴尼恩的花店外面，上面下来三个人，另一个人留在车上。这三个人显然想到了赢得奥巴尼恩信任的办法。虽然奥巴尼恩总是带着三把手枪，不过在走出鲜花店向客人打招呼的片刻之间，他放松了警惕。三人中为首的那个家伙，和奥巴尼恩热情地握手致意。他紧紧地握住奥巴尼恩的手不松开，两个同伙趁机掏出手枪向其开火，六发子弹打中了他。三个杀手径直走出花店，上车后扬长而去。他们没有受到审判，也没有报道说他们有人怀着忏悔的心情上吊身亡。奥巴尼恩的葬礼非常隆重，颇有黑帮派头：价值1 000美元的灵柩，满满26卡车鲜花，其中有一个花篮上书写着令人感伤的签名——“阿尔敬献”。

1926年，只剩下乌合之众的奥巴尼恩帮依然不甘于此，为帮派之争增添了新的方法。大白天里，西塞罗市的大街上车来车往，奥巴尼恩帮开着8辆旅行车用机关枪袭击了卡彭的总部。这些车辆沿着霍索恩酒店外热闹的大街缓缓驶来，第一辆车先打了几发空弹，驱散无辜的群众，把卡彭的手下吸引到了门口和窗前。此时后面的车辆依次排开，密集的子弹纷纷射进酒店和周围的建筑，有个枪手下了车，冲到霍索恩酒店门前，在人行道上单膝跪地，向大厅里连射了100多发子弹，就像拿着水管冲洗花园一样利落。此次袭击的伤亡人数少得令人诧异，但难免引发了公众的关切。就算在这个用装甲车运金条的时代，把郊区的街道变成枪林弹雨的战场，看起来也有点与众不同。

硝烟还未散去，一个接着一个帮派在子弹横飞之中扑倒在地；到了1929年的情人节，帮派之争在一场屠杀中达到了高潮，出现了有史以来最具新意、残酷血腥的杀戮。

1929年2月14日10点半，在北克拉克街SMC货运公司的车库里，坐着奥巴尼恩帮的七个手下，在等待一批约好的劫持的私酒到来卸货。只见驶来一辆凯迪拉克巡逻车，车上先跳下三位身穿警服的警察，后面又下来两个穿着便衣的人。三位警察冲了进来，拿走了七个人的枪，命令他们面对着墙站成一排。这些人毫无反抗地遵从了命令，他们已经习惯了警方突袭，对此毫不在意，以为能够轻易摆脱麻烦。就在七个人举起双手、面向墙壁的时候，那两个穿便服的人从走廊上冲过来，抽出两把冲锋枪，镇定地对着他们一阵疯狂射击。这段小插曲就这样结束了，三个警察模样的人一脸严肃地押着两个便衣杀手，穿过人行道走向等在路边的警车。五个人上车后，警车很快地开走了。那些站在寒冬街头的路人深感宽慰，以法律之名逮捕罪犯是一幅多么完美的戏剧化场面啊！

从大繁荣 到大萧条

这些杀戮案件和杰克·林格（Jake Lingle）枪杀案一样，成了战后十年间芝加哥最为轰动的事件。林格过着双重身份的生活，既是《芝加哥论坛报》的记者，还是黑帮同伙，1930年，他在伊利诺伊州中央火车站拥挤的地下道里被枪杀。十年之间总共发生了500多起黑帮杀人案。但是杀人凶手很少遭到逮捕：精心策划，金钱诱惑，运用影响力，恫吓证人，涉案的歹徒拒绝对同伙进行指证，不管凶手有多么残忍，情况有多么危险。芝加哥城给全美国，甚至是全世界，提供了暴力和纵容犯罪的令人震惊的案例。怎么会发生这种事？这到底是为什么？

如果说禁酒令，或者说是公众拒绝遵守禁酒令，导致黑帮泛滥、目无法纪，这个解释可能过于简单。毕竟还有其他原因：被抢劫的银行工作人员发现，汽车可以让匪徒轻松地逃脱；军火商向和平时期转型，产生了轻便的新式致命武器；黑手党从西西里黑帮那里学来了谋杀的传统；反对禁酒的地区对黑帮经营啤酒和杜松子酒的副产品置若罔闻；现代都市社区规模庞大，反应迟缓，公众舆论不会注意到任何与普通公民利益没有直接关系的抢劫；当然，还有那个时代毫不介意、冷漠的政治氛围。然而，黑帮崛起的最为直接的机遇就是禁酒运动，准确地说，是私运啤酒（啤酒的体积比威士忌大，要在啤酒生意中赢利，必须使用卡车运输，因为需要贿赂禁酒专员和警察以寻求保护伞，携带枪支用于防止土匪抢劫）。啤酒的生产、运输和销售环节都有巨大的利润。根据阿尔·卡彭传记的作者弗雷德·帕斯利（Fred D. Parley）记述，联邦探员估计，卡彭帮派在1927年控制的酒类走私收入达到了6 000万美元，其中大部分都来自啤酒生意。把一个人的口袋里塞满钞票，让他有机会赚到巨大的利润，让他参与非法的生意，即使他受到袭击，也断了运用法律工具的后路，而且你还给了他行贿和开枪杀人的有力手段。美国人生活里从来少不了黑帮和匪徒的参

与，毫无疑问，今后也会如此；市政官员从来少不了贪污腐败的行为，毫无疑问，今后仍然会这样；更具有讽刺意味的是，20世纪20年代芝加哥涌现贪污犯罪浪潮的根本原因，还是人们想在美国国土上消灭酒精的诱惑。

从1920年起，这个来自纽约五街顶黑帮的小混混开始走上巅峰。到了1930年，他已经是远近闻名的人物，和查尔斯·埃文斯·休斯、基尼·唐尼平起平坐。他成了美国社会特有的产物。他不仅控制了芝加哥1万多家地下酒吧的酒水销售，听说还控制了加拿大和佛罗里达海岸的进货源头。他积攒藏匿了一大笔财富，具体数额根本无人知晓，据联邦探员称，总计有2 000万美元。他除了曾经因私藏武器在费城被捕入狱，而其他时候则逍遥于法律之外。他坐着那辆防弹车从芝加哥街头开过时全部戒严，前面有汽车开道，后面还有一辆车坐满了荷枪实弹的手下；他去剧院看戏时，旁边有18个穿着西装的保镖随行。他们按照黑帮的惯例，多半在西装下面藏着手枪；他姐姐结婚时，教堂外的雪地上有几千人流川不息。他送给新娘一个高达9英尺的结婚蛋糕和一辆特制的蜜月轿车；他在迈阿密有一处豪宅，有时在那里举行宴会，可以同时款待75位宾客；身居高位的政治家，听说还有法官都对他唯命是从，接听他从芝加哥市中心酒店总部打来的电话。此时他只有32岁。拿破仑32岁的时候又能做到什么呢？

与此同时，黑帮势力和帮派暴力迅速蔓延到美国其他城市。托莱多受到了影响，接着是底特律、纽约，还有其他很多城市。芝加哥并不孤独，不过是处在领先地位而已。

六

到了战后十年的中期，黑帮的势力范围显然在不断扩大。帕斯利对卡彭帮派在1927年的总收入做了一番分析，据联邦探员估计，有600万美

从大繁荣 到大萧条

元来自啤酒和其他酒类的收入，其中包括私酿酒生意，有250万美元来自赌场和赛狗场，有100万美元来自妓院、舞厅、旅馆和其他途径，还有勒索诈骗得来的1 000万美元。经营私酒的黑帮渐渐涉足新的领域和新的生意。

通常来说，勒索是个容易来钱的行当，历史由来已久，五十年前纽约的坦慕尼协会就用了这种手段。不过直到20世纪20年代中期，这种违法的手段才开始蔓延开来，到了1927年，也就是萨科和万泽蒂被判死刑、林德伯格飞越大西洋、卡尔文·柯立芝崭露头角的那一年，由此衍生出的“敲诈勒索”（racketeering）进入了美国人的词汇之中。这个名词是战后十年的产物，这种违法行为也是如此。

就像贩酒黑帮的谋杀行动一样，敲诈勒索的出现也有错综复杂的原因。其中之一就是劳工同盟动用暴力。自从莫利马奎尔社成立之日起，工会成员就在用指节铜环和炸弹来维护自身的权益。在红色大恐慌时期，工会失去了公众舆论的支持。柯立芝繁荣让数以千计的工会成员懂得，工会证并不是通往财富的通行证，他们的处境会变得更加艰难。因此，奋勇抗争的工会领袖再三运用炸弹袭击，保住自己的工作和权力。1919年满街热情的激进主义成为明日黄花，工会领袖发现自己不过是个普通人，在别人瓜分成果的时候，希望得到自己应得的一份。他想抓烂工贼的脸，炸碎那些反对工会的工厂屋顶，让人们看看自己言出必行。在许多情形下，工会领袖向雇来的流氓寻求帮助，用行贿和政治影响来逃脱法律的制裁；他和那些玩弄手腕来保护自己、赚取利润的生意人狼狈为奸。非法贩酒的生意让黑社会发了横财，信心十足，动不动就开枪杀人，许多政客和商人对行贿和阴谋视若平常，彼此更容易达成互捞好处的勾当。黑帮分子和那些狡猾的骗子识破了工会领袖的伎俩，为了自己的利益开始敲诈勒索。到了

1927年，诞生了阿尔·卡彭的这个城市养活了稀奇古怪的各色人物。有些人曾经是工会成员，走上了犯罪的歧途；有些人仅仅是冒充工会成员来进行诈骗；其他人则打着同业工会的旗号来敲诈勒索，或是以多种方式相结合。但是手段基本一致：敲诈勒索，也就是从生意人那里收取一定费用，保护他们免受损失。这个行当日渐兴旺。因为受害人很快会明白，如果他不肯出钱，他的店铺会被炸得粉碎，他的货车会被撞得稀烂，他本人会遭到枪杀，倒在血泊之中，连向政府求救的机会都没有，因为政府官员要么遭到威胁，要么被拉下了水。

他们对干洗店和染坊进行敲诈，从大大小小的干洗店老板那里索要大量钱财。曾经有一段时间，芝加哥的洗衣行业完全遭到操控，洗衣价格很快上涨，普通公民洗一套衣服的价钱从1.25美元涨到了1.75美元。如果干洗店和染坊胆敢拒绝敲诈，店铺会被炸毁，送货车会被泼上汽油烧掉，老板还会遭到狠毒的报复，把易爆化学品缝进裤子的缝线里，并送到他的店里去洗。他们还对修车厂进行敲诈，绰号“斜眼马利根”的大卫·埃布林灵机一动，想到了一个主意：如果修车厂的厂主不肯加入中西部修车协会，按照这个行会所赋予的权力，他的修车厂会被炸弹袭击，手下的修车工会遭到殴打，流氓们会在半夜闯进来打碎挡风玻璃，或者用铁锤砸烂停放的汽车，或者巧妙地用冰锥扎破轮胎。他们连擦窗户的也不放过，马克斯·维尔纳一直在克利夫兰包揽擦窗户的业务，他搬到芝加哥打算在这里做生意，有人告诉他要是不交钱收买别的承包商，他就做不成生意，但他没有答应。最后他没有遭到殴打，也没有收到炸弹恐吓，而是直接被人开枪打死。把敲诈勒索的案件列出一份清单，足足要写上几页纸。

据总检察长办公室的统计，1929年芝加哥发生了91起敲诈案，其中75起正在审判，根据雇主协会的数据显示，每年给公民造成的损失总计

从大繁荣 到大萧条

1.36亿美元。贩酒黑帮最偏爱的武器是机关枪，而敲诈者最偏爱的武器是炸弹。

雇主只要花费100美元，便可找个杀手用黑火药炸弹完成一项普通任务。不过要用烈性炸药执行危险的任务，雇主就得花费1 000美元。从1927年10月11日到1929年1月15日的十五个月里，芝加哥地区安放或爆炸的炸弹超过157枚，据戈登·贺斯泰德（Gordon L. Hostetter）和托马斯·奎恩·比斯利（Thomas Quinn Beesley）在《这是敲诈！》一书中对这些暴行的详细描写，没有证据表明有任何一名罪犯受到了惩罚。

在敲诈者看来，这个行当逍遥自在，相当安全。确实，在1930年以前，敲诈勒索已经在芝加哥取得了辉煌的成就，商人们在绝望中纷纷寻求阿尔·卡彭的保护；卡彭的手下悄悄参加工会会议，确保一切都按照黑帮老大的要求行事。据说在工会组织的委员会里，没有几个人的权势能与这个私酒贩子中的头号人物相媲美。敲诈勒索和帮派斗争一样，也迅速地蔓延到美国其他城市。纽约曾经嘲笑芝加哥的为所欲为，可是如今呢？纽约也有了大量的敲诈案，敲诈的对象包括洗衣店、游戏机、鱼市、花店、菜场，还有无数不胜数的行业。在每个大都市社区里，敲诈者都是潜在的威胁。短短几年间，这种勾当成了全国性的惯例。

七

随着战后十年退出历史舞台，禁酒运动、黑帮猖獗、敲诈抢劫等问题仍然没有得到解决，这对20世纪20年代的政治家来说是个挑战。装满朗姆酒的船静静地驶过河面；私藏的酿酒设备源源不断地酿造出烈酒；私自贩酒的黑帮头子把对手“当场枪决”；芝加哥的街头传来“嗒嗒嗒”的机枪响声；铺满玫瑰花瓣的汽车和匪徒一起毁灭；长着粗脖子、眼神迷离的

绅士来拜访商贩，建议他和黑帮合作，不然将对以后发生的事情不负任何责任；炸弹把小商店炸得一片狼藉；通俗小报的读者心无旁骛地读着黑帮杀人的报道，从中寻找惊险、壮烈、浪漫的情节。

FROM GREAT
P R O S P E R I T Y
TO GREAT DEPRESSION

第十一章 佛罗里达，甜蜜的家

到佛罗里达去——
那里的企业家是无冕之王——
坐看黄昏中摇曳的棕榈，
还有那天边渐渐消逝的金色光芒。
日暮中，那月亮、太阳与星辰，
在苍穹之上的闪耀无比辉煌。
从加勒比海吹来的清风拂过耳际，
好像妈妈吟唱着摇篮曲的梦幻乐章。
银色的月亮是挂在天空的垂饰，
月晕之环是那光芒四射的项链之王。

这首热情洋溢、无拘无束的诗写于1925年秋天，此时斯科普斯审判案已经被人们渐渐遗忘，圣巴巴拉市在地震过后恢复安宁，瑞德·葛朗奇一举成名，曼宁大主教为所有人祈祷的教堂即将奠基，斯梅德利·巴特

勒将军希望自己从来没有对费城的禁酒行动承担责任，《无人知晓之人》

(*The Man Nobody Knows*) 已经卖出了1万本，佛罗里达的房地产热达到了顶点。你可能会以为，这首诗出自一位喜不自禁的女学生的诗集，然而它却出自一位银行副总裁的笔下，是他为《迈阿密人》杂志所撰写的文章尾声。这首小诗暗含着人们的心路历程。始于19世纪90年代的房地产热浪潮席卷整个美国，而那些自以为心坚如铁的男女正投身于这滚滚热浪之中。

1925年的夏天和秋天是值得回忆的一段岁月，热带城市迈阿密没有一丝悠闲懒散的气息。整座城市已经成了疯狂的房地产交易所。据说有2 000多家房地产公司和2.5万名房地产经纪人在从事房地产销售。在佛罗里达大力宣传的炎炎烈日之下，人们只穿着衬衫疲于奔命，他们谈论的全是地产契约、房屋户型、水景房和上百万美元的利润；政府高层不得不颁布法令，禁止在街道上出售房产、张贴地图，预防严重的交通堵塞的发生。在四季如春的空气里，传来铆钉枪叮当作响的声音，摩天大楼的钢筋骨架四处林立，使迈阿密的天边呈现出大都市的风采。公共汽车从弗拉格勒街来回穿梭，免费载着未来的客户参观挖泥机和蒸汽铲车如何把偏远的红树林沼泽和比斯坎湾的沙滩，变成威尼斯风格的奢华都市，用以满足美国家庭主妇和享乐主义者未来的需求。迪克西公路上挤满了来自全国各地的汽车；有位旅行者因为交通堵塞无法前行，而在排成长龙的小轿车和廉价车里数出来18个州的车牌。各家旅馆全部满员。不管是在车站候车室还是在汽车上，人们随便找到一个地方席地而眠。铁路被迫禁运耐用货物，以免出现饥荒；建筑材料如今通过水路和遍布着船只的港口运输进来。新鲜蔬菜已经供不应求，为了满足电力、煤气和电话成倍增长的需求，城市公共设施已经疲于应付，甚至连冰块都时常供应不上。

迈阿密的发展速度多么快啊！在1920年，全城的人口只有3万人。根

从大繁荣 到大萧条

据该州人口普查的统计，1925年全城人口已经增长到7.5万人。此时从北方搬到佛罗里达州的人创下了有史以来最大的人口迁移纪录，其中有一部分人到了迈阿密，如果再算上此后几个月里涌入的人口，这个数字会接近15万。有人说，这仅仅是个开始。海滨航空铁路公司的总裁沃菲尔德（S. Davies Warfield）不是预言迈阿密的人口将会在今后十年达到100万吗？受人敬重的佛罗里达州州长约翰·马丁（John W. Martin）不是断言“佛罗里达近来取得成就的传奇故事让人叹为观止，但这也不过是黎明前的曙光”吗？

每个人都在土地买卖上赚钱，地价一路上涨，达到了不可理喻的高价位，原先对此毫不上心的人也开始进行投机交易。

迈阿密的繁荣景象并非特例。棕榈滩以南的沿海地区都在建设着美国的里维埃拉。60多英里的海岸被迅速划分成50英尺左右的地块。这股房地产热随后蔓延到坦帕、萨拉索塔、圣彼得斯堡和其他西海岸的城镇。人们争先恐后地在奥基乔比湖畔、桑福德市郊和整个佛罗里达州购买土地，甚至在佛罗里达北部的杰克逊维尔，也有“杰克逊维尔的信徒”正在策划着宣传活动，要为他们的城市带来发展和财富。

二

这股令人震惊的房地产热历经数年的积累，1924年到了近乎失控的地步，其中的原因多种多样，让我们逐条列举出来。

首要的原因当然是气候宜人，这是佛罗里达州毋庸置疑的先天条件。

通往人口密集的东北部城市的交通便利，这也是南加利福尼亚州不容否认的优势。

汽车迅速把美国变成了一个流动的国家，各行各业的人们都能在本国

自由通行，就连小农场主、暑期宿舍的管理员和修车工都能带着全家人坐着廉价的汽车，经过不断的汽车露宿，一路向南，度过一个阳光明媚的冬天。

柯立芝繁荣带来的自信膨胀，让年收入4 000美元的推销员想象自己将来会以一种神奇的方式，买得起漂亮的房子和世上一切好东西。

人们普遍存在一种矛盾心态，却不太愿意承认，那就是厌恶美国的过度城镇化和工业化，厌恶社会对工作的过度重视，厌恶按部就班的生活、烟雾弥漫整座城市、交通堵塞，还有20世纪标准的生活模式，而这些正是柯立芝繁荣的基础。这些东西会给美国商人带来了财富，但他们却渴望花钱从这些束缚中摆脱出来，寻找记忆里乡村的明媚阳光、旧时欧洲的美好生活和美丽繁华，寻找将美国式运动和舒适与拉丁风情融为一体的梦幻岛，这就是配备了浴缸和电冰箱的威尼斯，拥有18洞高尔夫球场的塞维利亚。

南加利福尼亚州是个很好的例子，该州曾经通过对温暖气候和适宜空气的大肆宣传，构建了经济繁荣的景象。佛罗里达州的居民会说，佛罗里达为什么不这样做呢？

最后，柯立芝繁荣时代的另一个成就是：像约翰·琼斯（John Jones）这样的普通人也在期盼着，自己不久后能买得起波卡拉顿的房子，在假日里钓鱼、打马球，而他对企业家风险投资、一夜暴富的故事无比向往，相信狂热的房地产开发也许是一座金矿，将会为他创造奇迹。

狂热的房地产开发？他们真的疯了吗？到1925年，在旁人看来，房地产开发商已经不再极度狂热。那些在1923年看上去难以置信的工程，曾经是他们狂妄无比的证据，如今却赚取了几百万美元：现实证明他们没有失去理智，就像广告说的那样，他们是灵光一闪的梦想家。珊瑚阁小镇、

从大繁荣 到大萧条

海滨好莱坞、迈阿密海滩、戴维斯岛在此屹立着，这些地方不再是一纸蓝图，而是由一砖一瓦建造而成的真实存在的城镇；当然，这些地方还没有完工，但仍以惊人的速度发展着。购房者们排着长队来购买房产，他们脚下每平方英尺土地的价格都在快速上涨。

很多年前，有位公理会的退休牧师梅里克在迈阿密城外以便宜的价格买了块土地，用珊瑚石建了一座山墙耸立的房子，取名为“珊瑚阁”。如今，他的儿子乔治·埃德加·梅里克（George Edgar Merrick）买下了它周围的土地，他在广告中宣称，自己在打造“美国风景最美丽的郊区”。这个计划很有吸引力，梅里克很有先见之明，坚持统一的建筑风格，他称之为“改善版”地中海风格。截至1926年，他已经建造了一座珊瑚阁小镇，包括2 000多栋已建成或在建的房屋，包括“热闹的商业中心、学校、银行、酒店、公寓和俱乐部”，还有林荫大道、湖泊和码头。梅里克做广告的手法大胆新奇：有一次他请来了威廉姆·詹宁斯·布莱恩，让他坐在湖面的木筏上，头上撑着太阳伞，朝岸边的人们发表演讲（报酬非常可观）。布莱恩赞扬的并不是耶稣，也不是金黄色的十字架，而是佛罗里达的舒适气候。布莱恩大加赞扬当地的灿烂阳光，随后还有舞蹈明星吉尔德·格雷（Gilda Gray）的表演。梅里克知道如何恰到好处地营造浪漫气息：他抽干了低洼地带的水，将其改造了一番，挖掘了运河，从威尼斯引进了真正的贡多拉小船，并聘请了船夫。在珊瑚阁小镇修建的迈阿密巴尔的摩大酒店高达26层，乡村俱乐部拥有18洞的高尔夫球场。梅里克还有下一步更为宏大的计划：建造大型赌场、游艇俱乐部和迈阿密大学。作家雷克斯·比奇（Rex Beach）在珊瑚阁的宣传册里写道：“十年的艰辛工作，100万美元的财富，这就是乔治·梅里克要在余生完成的计划。谁能想象得到，十年时间能给庞塞·德莱昂发现的仙境带来这么大的

变化？你没有想到，我也没有想到，连极具远见的梅里克先生自己也没想到。”（他的远见还真是可悲，这十年带来的变化还有《纽约时报》上刊登的公告，提醒着珊瑚阁小镇九个系列债券的持有人，小镇“自1930年7月1日起，未能支付以上大部分债券的本金和利息”。）

除了梅里克，还有其他创造奇迹的人。迈阿密海滩原本是一片红树林沼泽，后来卡尔·费希尔（Carl G. Fisher）将树林砍掉，在沙下面打了5英尺的木桩，改造了环礁湖和小岛，修建了别墅和酒店，据说将这里打造成价值4 000万美元的地块。约瑟夫·扬（Joseph W. Young）建造了同样庞大规模的海滨好莱坞，火车禁运中断了建筑材料的供应，他就自己买下远洋船队，把建筑材料运到他那座不断扩张的“城市”。在佛罗里达西海岸，戴维斯（D. P. Davis）买下了坦帕湾的两个小岛——“两片面积很小的红树林沼泽地，涨潮的时候几乎全部被海水淹没”——他通过清理淤泥、填充沙土抬高了小岛的平面高度，在上面铺设了街道，建造了酒店和住宅。在戴维斯公开出售地块的头一天，尽管当时据说还没有一台挖泥机开始铲泥沙，就卖出了300万美元的高价！

不管如何，大家都在买地。到了1925年，只要这块地位于佛罗里达，不管什么地方的地皮都有人购买。一个开发商只要宣布有新的开发计划，不管是真是假，不管是在大西洋沿岸还是在内陆沙漠，都会吸引人们争相购买可以盖房子的地皮。广告商声称“曼哈顿庄园”距离“日益繁华的内蒂城仅有0.75英里”；实际上根本就没有内蒂城，这只是一个废弃荒芜的松脂采集营地，不过还是有人买下了这块地。“墨尔本花园”索赔案的调查员想尽办法找到了这个地方，结果发现自己要开车沿着一条小路，“穿过杂乱的垃圾堆，经过几棵大树和几小簇蒲葵”，在距离目的地3英里的地方，绝望地陷入了泥潭之中。不过，全国各地的人还在盲目而自信地购

从大繁荣 到大萧条

买地块，其中有佛罗里达州本地人、来佛罗里达的游客，还有俄亥俄州、马萨诸塞州和威斯康星州的良民。他们从来没有来过佛罗里达州，但是也会掏钱来购买那些据说是“另一个珊瑚阁”“紧邻新火车站右侧”和“价值2 000万美元的城市”的建房地块。对他们来说，那些在佛罗里达州买卖土地赚取暴利的故事足够诱人。迈阿密海岸的中心商业区有一处地块，在开发初期只卖800美元，到了1924年再次转手的时候已经卖到了15万美元。出现房地产热的八九年前，有位纽约律师花了24万美元在棕榈滩买了一块狭长的土地，在1923年，他终于把这块地以80万美元的价格卖了出去；到了第二年，这里被划分成几块住宅用地，总价达到了150万美元；而在1925年，有人声称这块地的价值升到了400万美元。1896年，有位穷困的妇女花了25美元在迈阿密附近买了一块地，到了1925年以150万美元的价格卖了出去。这种传奇之事难以胜数，每个到黄金海岸的游客都能听说很多；许多故事相当真实，但这些利润还停留在账面上。有一则趣闻足以说明佛罗里达州房地产热的情况，有个当地人问游客，“你想在这儿买地吗？”游客马上回答道，“我早就把地给卖了。”投机说来是容易的，不过行动一定要快。千万别在调查研究和登记地契上耽误时间，将这些繁杂的手续搁置一旁。至于普遍的销售方法，亚特兰大零售信贷公司的沃尔特·希尔（Walter C. Hill）在调查报告中是这样描写的：

“地块还在图纸上就已经卖了，这种方式比较好。在迈阿密周围，除了面积特别大的土地，住宅用地通常在第一天就全部售光。楼盘广告上描述了地块的位置、面积、特点和大致价格。也可以接受预定，只要买家支付地块价格10%的支票。销售的第一天，买家会按照提前安排好的顺序走进城里开发商的办公室，一张测绘精美的图纸上清楚地标出了地块、面积和价格，买家可以挑选一块或几块地，得到一张临时契约形式的收据，并

极其兴奋地看到，他那块地在图纸上的位置盖上了‘售出’的印章，而这些地块通常是佛罗里达州50英尺宽、100英尺长的土地或沼泽地。这些第一天卖出的地会升值到几百万美元。价格高得令人震惊！里面的地块价格在8 000美元到2万美元。靠近水边的地块在1.5万到2.5万美元。海边的地块在2万美元到7.5万美元。这些地块并不在迈阿密城里，而是离城区几英里、10英里、15英里，甚至30英里以外。”

当然，签订临时契约不算是交易的最终完成，但很少有人对将要支付的款项忧心忡忡。在买地的时候，买家大多数只有一个想法，就是转手卖出去，希望在30天的付款期限到来前，将把地契转手出售给别人，从中赚得纯利润。而地产契约的买卖数量巨大，利润丰厚。

就在1925年炎热的夏天与秋天，人们还在酝酿着大规模开发房地产的新计划。很明显的是，其中很多房子是打算卖给这些人——迈阿密海滩的广告商称其为“美国最有钱的运动员，以及那些游艇和其他昂贵运动项目的爱好者”，波卡拉顿的广告商称之为“主宰金融界和企业界、引导时尚、掌控时局、出身高贵、喜爱休闲娱乐的那些跨国财阀们”。在这股抢购土地的狂热大潮中，好像没人想过有没有那么多爱好游艇和喜爱休闲、四处旅行的潮男潮女这个问题。

到处都是气势恢宏的新建酒店、公寓和赌场。就在建房热的鼎盛时期，有位来西棕榈滩的游客注意到，一大片空地上放的全是浴缸。外面的板条箱被风吹日晒，它们显然已经放了一段时间了。这位游客被告知，这块地将会建成“南方最豪华的公寓大楼”，但是货物禁运将承包商的建筑材料运输中断，所以运来的竟然只有这些浴缸！在整个佛罗里达州，充满强烈自信的宣传口号和夸张修辞响彻云霄。广告栏里全都是这种宣传。在1925年夏季的一天之中，《迈阿密每日新闻报》刊登了整整504页的房

从大繁荣 到大萧条

地产广告，创下了报纸发行历史的最高纪录；《迈阿密先驱报》在1925年所刊登的广告超过了其他任何一家报社全年的广告总量。在这些广告上，迈阿密不仅是“传奇之城”，还是“金发碧眼的都市女神”“世界乐土”“无敌之城”，劳德代尔堡成了“热带仙境”，奥兰多化身为“美丽都市”，桑福德则是“富饶之城”。

每天都有难以计数的标榜之词为佛罗里达增添光彩。也许夸赞吹捧的顶峰时期，就是迈阿密市市长和迈阿密海滩、海厄利亚、珊瑚阁的创始人发表联合宣言的时候（这些人谦虚地把自己的城镇称为“世上最为富饶美丽的社区，坐落在物产最为丰富的国度，拥有高尚品格的居民”），他们倡议将1925年的最后一天和1926年的前两天定为“美国热带地区节日”，“在欢庆的节日里，关爱、友谊、欢乐和健康运动在整个地区普及开来”。他们保证会有舞蹈演出，“不论是林荫大道、美丽的广场和舞厅，还是庭院、俱乐部和酒店，都会有歌舞表演，活力四射的歌舞女神和满心欢喜的追随者将带动着优雅的脚步，翩翩起舞”。他们的承诺还有不少，要是将这华丽辞藻全写下来，足足需要一页纸那么多；不过他们特地强调：“我们的所有的街道将到处是盛大的庆典，繁华热闹的场面，繁花似锦的美景；上天赐给我们温暖的阳光、温和的细雨，还有舒适的热带海风。”

有这么多热情洋溢的追随者和繁华热闹的场景，节日庆典大多是马到功成的。但是到了1926年的新年，四处欢闹的人们不禁开始担忧，土地的新买家不再如1925年9月份和10月份那么多，许多拿到地契的人迫不及待地要把他们在富饶美丽社区的股份转手，毕竟温暖的阳光和温和的细雨，不能帮他们缴清买地的款项。在冬季涌入佛罗里达州的游客感到，现实难以达到他们的期望值。也许，房地产热到了“健康呼吸的时间”。

三

事实上，即将来临的事情不会止步于此，在1926年春天和夏天，房地产市场开始全线崩溃。地契没能转手出售的人四处拖欠房款。有个人在1925年年初以每英亩12美元的价格卖出了一块地，等到这块地卖出每英亩17美元的价格时，他连声抱怨自己糊涂极了，后来土地的价格涨到了30美元，最终达到了60美元。过了一两年后这个人却发现，一系列的买卖都没有交款，别人欠他的钱是要不回来了，唯一的挽回损失的办法就是把这块地收回来。还有些交易中，不仅土地只能物归原主，随之而来的还有税收和评估费用，这些花费加起来远远超过了卖地所得的收入；人们还会发现，自己的土地开发只能中止，而此处已经被毁得无法复原。

正当房地产价格势不可当地全面下跌的时候，两场飓风席卷了佛罗里达，让人们见识到了来自西印度洋那“轻柔的热带海风”的威力。

第二场飓风是佛罗里达有史以来最为剧烈的一场风暴，上天特意带给人类的惨痛教训，让人闻之色变，而这也是自然界的一次最为精准的报复了。这次飓风袭击的中心正是房地产热中最为狂热的地方——迈阿密地区。1926年9月18日清晨，飓风在黄金海岸登陆，导致比斯坎湾的海水倒灌，海水冲进威尼斯建筑风格的小镇，把五根桅杆的铁皮帆船卷起来，抛到了珊瑚阁的街头，将汽艇砸到了迈阿密的大街上，把树木、木料、水管、瓦片、碎石，甚至是小汽车从地面上掀起来，又一股脑地砸在了房子上，吹跑了成千上万座质量大打折扣的房屋别墅的屋顶，差点将奥基乔比湖畔的穆尔港扫荡一空。这场飓风造成大约400人丧生，6 300多人受伤，5万多人无家可归。佛罗里达人却不屈不挠，坚信这些损失没有达到无法挽回的程度；这种勇气实在值得称道，以至于人们引述美国红十字会的负

从大繁荣 到大萧条

责人约翰·巴顿·佩恩（John Barton Payne）的话，指责佛罗里达州政府官员“实际上阻止了”红十字会对无家可归者的救援行动。迈阿密市长罗姆夫宣称，看不出有什么理由“让这座城市不能像过去那样，今后继续招待冬季游客”。但是轻柔的热带海风已经完成了它的报复，将佛罗里达房地产热的痕迹打扫得干干净净。

到1927年，根据霍默·范德布鲁（Homer B. Vanderblue）的记述，位于迈阿密弗拉格勒街的装修豪华的房地产公司不是关门停业，就是人去楼空；戴维斯岛工程“尚未完工就宣告破产”，已经被斯通—韦伯斯特公司组建的财团并购；佛罗里达州的许多城市，包括迈阿密在内，连政府税收都变得非常艰难。在1928年，亨利·维拉德（Henry S. Villard）在《民族》杂志里这样描述他驱车前往迈阿密时看到的情景：“高速公路两旁是废弃的住宅小区，大门上粉刷的豪宅名字已经斑驳脱落。铺设了几英里的水泥人行道旁，孤零零地立着光秃秃的路灯，原先要建房屋的土地上杂草丛生、遍地蒲葵……偏远的住宅小区里全是空无一人的房屋。当我加速驶过这些地方时，仿佛在穿越一座受到死亡威胁的城市。”1928年，佛罗里达州共有31家银行倒闭；1929年，倒闭的银行增至57家；几年间倒闭银行的负债数额超过了美国任何一个州的记录。1929年，地中海果蝇对佛罗里达州的柑橘林造成了严重的危害，当地的经济状况更加不堪一击。对迈阿密的银行清算显示，1925年该州的银行资产攀升到了10亿美元以上，令人极为振奋；如今这个数字一路下降，又让人哀号不已：

1925年：1 066 528 000美元

1926年：632 867 000美元

1927年：260 039 000美元

1928年：143 364 000美元

1929年：142 316 000美元

而正是在这几年，全美各地都相信繁荣就是胜利！到了1930年年中，美国开始呈现经济全面萧条的态势，佛罗里达州已经有26座城市拖欠债券的本金和利息，违约情况最为严重的有西棕榈滩、迈阿密、桑福德和沃斯湖；迈阿密市有一笔数额不大的债券在1930年8月份到期，该市坦承已经无法赎回这笔债券，恳请债券持有人多给一些时间。

当时联合开发房地产项目是以构建城镇的方式进行的，政府通过“免税市政债券”资助各种设施改造计划；房地产开发企业同时发行地产债券，用繁华地段的新建筑做担保。这些方法曾经令人备感轻松，不过缺陷渐渐暴露出来，而这是1925年灵光一闪的梦想家根本没有料到的。几百万美元的账面利润多数化为泡影，投入地产开发的几百万美元多半如泥牛入海，一去不返。贷款的巨型倒金字塔轰然倒塌，人们从中得到的教训是，以宏伟的计划、荒唐的期望和华而不实的吹嘘为基础的土地价值，在长期通货紧缩的打击下，不过是场可笑的经济骗局而已。

令人宽慰的是，还有少量的现实优势可以依靠。佛罗里达依然气候宜人，资源丰富。佛罗里达吸取了教训。在繁荣时期来到佛罗里达的北方人，并没有在低迷时期弃之而去。现实远不止这样，根据1930年的人口普查，佛罗里达州的实际人口比1920年增加了50%以上，增长幅度超过其他各州，仅次于加利福尼亚；与此同时，迈阿密的人口增长了近400%。佛罗里达还有美好的前景，这一点和延期付款所带来的烦恼一样可信。至于1925年疯狂的地产热，也不应该只责备佛罗里达的民众。他们曾经聒噪一时，但是佛罗里达州疯狂状态不过是全美国陷入疯狂的一个集中缩影而

从大繁荣 到大萧条

已，那些盼望着轻松赚得盆满钵满的外地人纷至沓来，更是对这种形势推波助澜。

四

在战后十年，美国出现了一系列土地热和建筑热，每一次都对国家经济和国民生活起到了重大的影响，佛罗里达州房地产热不过是其中之一，毫无疑问，也是最狂热壮观的一次。

在战争期间和战争结束后，小麦和其他谷物的价格上涨，导致战后十年之初的农业土地市场异常火热。农业用地快速升值，按照有所夸大的价格，出现了成千上万宗抵押和贷款。到了1920年和1921年，农业土地市场跌到谷底，农民们卖了粮食也不够偿还到期的银行利息，无法承担对上涨后的土地价格征收的税金。这样的情况加重了农民的艰难处境，案例难以统计。数千家乡村银行无法承担抵押和贷款违约的重负，最终宣告破产。在一个主要农业州，从1924年到1929年美国普遍繁荣的时期，该州所有的国家银行和州立银行的平均收入增长不足1.5%；在全国的七个州中，1920年以前成立的各家银行，竟然有40%~50%在1929年之前已经黯然倒闭。当然，很难断言有多少家银行的倒闭与房地产价格的不切实际上涨和断然下跌有直接关系；但是有一点毋庸置疑，如果没有出现农业土地热，许多乡村银行不会受到重创，宣告破产。

在这十年间，尤其是佛罗里达房地产热期间，开发商及其支持者打造了野心十足的计划，要让房地产热向美国不同的城市、乡镇和度假胜地蔓延开去。各家商会投入巨额成本做宣传、发传单、打广告，把这些地方描绘成“不断崛起的工业帝国中心”和“美国财富的新乐园”。有些商业投机成功了，比如加利福尼亚，此前数年就开始使用宣传手段，打造诗

意一般的美景，宣传活动引进了诸多产业，吸引了冬季与夏季的游客，为商人和旅馆老板带来了丰厚利润。估计每年有100万人前往加利福尼亚，“只是为了观赏游玩”，当然了，他们还要花钱消费。然而，不是所有的商业投机都会成功，遗憾的是，工厂和有钱的游客的数量终究是有限的。一座座城市都希望把产业吸引到本地来，口吐莲花般地推荐本地的优点，尽一切手段“让人体会到本地的特色”，强调“本地对美国人民的建设性意义”。支持者们终于醒悟过来，吸引产业就像拆东墙补西墙。这些产业如果听信了宣传，很可能会发现自己陷入了进退两难的境地。佛罗里达热带仙境的开发商有这样一种体验，想把房子卖给上流人士的土地投机商的人数要比上流社会的买家还要多，为北卡罗来纳州等地的富人修建乐园的开发商到头来终于清醒过来，这些有钱人不可能同时去各地游玩。他们美好的愿望成了竹篮打水一场空，引发了金融业的剧烈动荡。开发商宣告破产，导致了一家又一家银行倒闭。

在这十年间，尤其是20世纪20年代中期，美国各座城市的郊区也出现了土地热。随着440万绝望的美国农民离开农场，美国城市居民的比例从51.4%增加到57.6%，城市的规模越来越大，越来越喧嚣不堪，城市交通越来越拥挤，新建的高楼大厦阻挡住了城市居民的视线和空气，许多家庭从城里搬到了城乡结合部。在美国人的生活条件方面，汽车再次发挥了作用，它使人们能够轻松地到达郊区火车站和大城市，还有那绵延不断的茂密森林、青翠田野——这些地方在几年前看起来好像由于交通不便而无法企及。——风景如画的市郊以惊人的速度发展起来，各式住宅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出来：全新的殖民地式庄园（带有车库），都铎王朝风格的别墅（历史悠久的三角屋顶，屋脊的两端镶嵌着楔形的砖木），西班牙式的白泥灰宅邸（里面安了无线电）。房地产开发商再次遇到了难得一遇的机

从大繁荣 到大萧条

会。——旁边有果园和雏菊花田的老式杰克逊农庄划成了建筑地块，被蒸汽铲车夷为平地，建起了詹姆斯一世风格的山庄、殖民地式的平台、阿布拉罕宫殿式的美丽花园，铺设了马路，既有20世纪的舒适便捷，还有旧时代的魅力风采，而这些地都是以分期付款的形式购买的。

在纽约、芝加哥、洛杉矶和底特律等大城市的近郊，大片土地很少建成豪宅的样式。纽约市东河对岸皇后区的发展速度很快，这种情形不禁令人忧虑不已：皇后区的人口在过去十年里增加了一倍以上，总数超过100万人。底特律郊外的大片土地被划分成不计其数的地块，被穷人们买下来，搭建起只有一个房间的临时窝棚，在里面住上数年都无法建造起真正的房子。开发商的竞争如此激烈，仅仅在一年之内，芝加哥地区划分的土地就足够容纳城市发展二十年所增长的人口（此前芝加哥就是以这样的速度发展起来的）。到了战后十年末期，帕乔格、长岛和纽约城中开发的土地足够为一个600万人口的大都市提供住房。

佛罗里达的房地产热一时间对城市郊区的开发起到了独特的影响。比如，离纽约长岛34英里的地方有座美国式的威尼斯城，这里兴建的第一座桥“仿造了威尼斯著名的稻草桥”。据开发商所说，那个场景“让人回想起拥有总督宫的名城威尼斯，不过风景会更加迷人、更加惬意”。地产广告里承诺购房者将免受股票经纪人和保险推销员打扰，对此地的美景夸口不已：“住在这座美国的威尼斯城，犹如畅饮生命的美酒”。蔚蓝色的天空下是碧绿的礁湖，贡多拉小船悠悠地漂荡着，多么美丽的一座意大利花园！大南湾的海水轻轻冲刷着沙滩，洁白细腻的海沙如婴儿皮肤般柔滑。”还有位于长岛的毕尔特摩海岸，由电影制片人威廉·福克斯（William Fox）和服装商雅各布·弗兰克（Jacob Frankel）共同开发，1926年的广告里宣称，这座“运河与水道交错纵横的艺术乐园即将完

工”。

在郊区房地产热潮中，威尼斯式的风格好景不长：1926年后，每当说起环礁湖，就会在买房人的心里引起痛苦的回忆。但是郊区房地产热直到1928年和1929年才渐渐消退。当时很多郊区由于过度开发，已经不堪重负：当你沿着高速公路驱车前行，就会看到两边的房屋长期无人居住，商店的橱窗里空空荡荡，许多住宅区荒凉无比，很多工程才建了一半，便放弃了修建计划；你会听说因为取消了抵押房屋的赎回权，郊区公寓大楼几经转手，没有完工的住宅小区的业主抱怨连天，哪能想到还有税金和评估费用的压力。即便如此，情况依然鲜明的，像佛罗里达一样，城市郊区仍然有着美好的未来。人们需要空间和自由，还有居住中心的便利交通，这些还没有走到死胡同里。

19世纪到20世纪房地产热的最后阶段集中在城市中。要描述这些年美国城市轮廓的变化，只要把任何一座大城市在1920年和1930年的航拍照片比较一下就行了。在1930年，每座城市的中心几乎都有次第而立的摩天大厦。高楼的建设热潮在纽约已经达到了顶峰，特别是在纽约中心城区，大都市的高楼简直是隐形的广告。该地区的高楼大厦占据了很大的比例，在1928年达到了顶峰。新的摩天大厦高耸入云，高达40层、50层，甚至更高；在1918年到1930年，这个地区大型现代建筑的办公空间大约增长了十倍。有一张拍摄于1931年年初的照片显示出，从旁边的东河眺望纽约中心区，其中二十座最引人注目的建筑都是在战后十年修建的。当然，其中两座最高的大楼直到1929年经济危机后才完工。当宏伟壮观的帝国大厦拆去脚手架，矗立在曼哈顿的时候，路旁卖苹果的小贩吓得双腿发颤。还有什么比帝国大厦更像那个信心高涨时代的丰碑呢？

城市的摩天大楼过度建设体现着人们的这种自信过度膨胀。在1931年

从大繁荣 到大萧条

的春天，纽约中心区有17%的办公大楼、临近广场区有4.0%的办公楼，都没有带来什么回报；新盖的摩天大楼的持有人通过免去一段时间的租金或者和其他大厦达成租赁协议的方式，吸引企业关注空置的楼层；金融家对纽约不动产投资的困境忧心不已。这座大都市也有美好的未来，但是投机热情让这座城市发展得有些过快了。

五

佛罗里达风暴过后，大多数普通民众对房地产投机已经没有什么兴趣。除了房屋业主和投机商人，很少有人关注郊区的开发建设和40层高的现代建筑。投机热在1925年把人们的资金和目光吸引到了佛罗里达州的黄金海岸，而今这股热浪并没有冷却下来，只不过遇到了阻碍。佛罗里达的房地产开发将赌注压错了地方？那么，仍然在柯立芝繁荣时代的灿烂未来之中沉醉不已的公众不禁要问：我们还能把手中的赌注压在哪儿呢？这次将不在房地产行业，而是在完全不同的领域。投机的焦点从迈阿密的弗拉格勒街移到了纽约的百老汇大街和华尔街。大牛市即将来临。

FROM GREAT
PROSPERITY
TO GREAT DEPRESSION

第十二章 大牛市！

1928年2月的一天，有个投资者向一位精明的银行家咨询购买普通股的门道。银行家摇了摇头说道：“在我看来，眼下的股价岌岌可危。这次牛市已经持续了很长时间，虽然股价近来略有下跌，不过很有可能仍会有很大的跌幅。商业形势不太好。当然，如果你买对了股票，它会在很长时间内上扬，可能赚上一笔钱。不过我要是你的话，我会等待片刻，看看发展趋势。”

按照保守的财务标准来看，这位银行家说得是正确的。柯立芝繁荣使人们充满了信心，让商人成为美国生活的榜样，促使无数的男男女女拿出全部积蓄投资佛罗里达的房地产，推动普通股价格从1924年起持续上扬，直到许多冷静的金融家认为，股价已经碰触到了警戒线。整个1927年，股市投机活动日渐增多。在这一年，用于开设交易者保证金账户的股票经纪人贷款总额从28.185 61亿美元增加到35.583 55亿美元，数额大幅上涨。在1927年11月3日那一周之中，股票换手量创下纽约证券交易所历史上单

从大繁荣 到大萧条

周最高水平。不管是在纽约和旧金山，还是在平原上最贫贱的村庄，在晚餐后的闲聊中，你不用听太长时间就会懂得，各种行业的人士，哪怕不久之前还把股票价格收报机看作神秘的外星物体，而今手里已经持有几百股斯图贝克汽车公司或休斯敦石油公司的股票，谈论着GL、X和ITT等神奇符号的重要意义，或者匆匆打开下午刚到的报纸，看看13：30华尔街的股市行情。

1927年8月，美联储宣布把银行再贴现率从4%降到5%，允许在公开市场上购买国债，此项举措进一步刺激了投机热。这些举措的初衷值得称赞：欧洲各国在稳定货币方面遇到困难；欧洲股市表现疲软，在美联储官员看来，放松美元利率会防止黄金进一步流入美国，帮助欧洲经济复苏，有利于对外贸易。此外，美国经济开始失去增长态势，降低利率会刺激经济的增长。但是降低利率也会刺激股市上涨。柯立芝总统和财政部部长梅隆不同于平常的关注，还进一步推动了华尔街牛市。每当出现股市信心降低的迹象，他们都会恰到好处地发表令人宽慰的声明，随后股价就会再次上扬。1928年1月，总统采取了从来不曾实施的举措，公开宣称股票经纪人贷款不算很高，显然表明美国政府大力支持极端通货膨胀，而头脑清醒的金融界人士正为此焦虑不安。

尽管股价一路上涨，但不可否认的是，经济活动日益衰退。1927年下半年，美国经济出现了明显的衰退，到1928年2月份，纽约慈善组织协会的负责人表示，自战争结束以来，失业的情况比任何时候都严重。在1928年1月至2月，股市秩序混乱、极度失衡。这并不奇怪，股价依然接近历史最高水平，未来的经济发展趋势让人忧心忡忡，综合起来不难预测，灾难来临的时刻就要到来了。

经济分析师和预测家的看法绝不是危言耸听，这个群体近年来人数众

多，他们轻启微唇的话语颇有分量。1928年1月5日，穆迪投资服务公司表示，目前的股票价格“远远高于预期股价”，不知道“需要多大程度的重新调整才能让股市恢复良好势态”。到了3月1日，穆迪投资服务公司依然感到忧虑不安，宣称“公众可能不会改变看跌股市的心态，除非等到货币流通过剩，银行对信贷增长持鼓励态度”。两天后，哈佛经济学会从统计图表中得出了冷酷的结论：“2月份的股市动态表明，经济正在进入一个暂时调整的阶段。”哈佛预言家最乐观的结论不过是：“股市下跌的趋势，不会像预期的那样演变成经济萧条。”国民城市银行预计经济情况将逐渐改善；标准统计公司表示股市转折点已经到来，但是该公司还郑重其事地预言，股市在此后几个月的走势将“几乎完全依赖资金状况”。《纽约时报》的财经编辑认为商业代理机构当时的表现“迟疑不定”。投资机构刊登的报纸广告证实了华尔街忧虑不安的气氛，到处都是“你还徘徊在牛市之中吗？”“难道通货紧缩已经来到了？”这样谈之色变的新闻标题。空气中笼罩着不安的浓雾。

倘若有人选择在此刻预言，股市位于疯狂上涨的边缘，此前的种种迹象都微不足道，那么他不是发疯，就是熟知大众心理的天才。那位建议谨慎行事的银行家说得很对，预言家们也讲得没错。不过他们都没有顾及美国人民无止境的投资热情。1928年3月3日，就是哈佛预言家谈论股市下跌，《纽约时报》编辑评论“迟疑不定”的那天，股市已经进入了耸人听闻的阶段之中。

二

让我们先来看看第二天早晨的报纸，1928年3月4日正好是星期天，这天的新闻可读的太多了，足以让你的胳膊举酸。好几个月前，柯立芝总

从大繁荣 到大萧条

统郑重其事地宣布，“决定不参加1928年的总统选举”。他那特有的简洁言辞，难免让公众怀疑他另有企图；柯立芝政府的商务部部长胡佛担任这一职务已有八年之久，一直为自己“业余政治家”的头衔苦恼不已，现在他正召集各行各业的精英人士，迎接即将到来的共和党代表大会。尽管亨利·福特推出A型车已经有三个月了，但是每当新款福特汽车出现在大街上，还是会让人们驻足观望。当初满心欢喜地预订了阿拉伯浅黄色旅行车的人，如今私下考虑，是否要等到九月份买一辆银灰色的汽车。陆军上校林德伯格过去九个月里一直是民族英雄，此时还是位单身男人：在1928年3月4日周日报纸的第21版上，林德伯格表示不赞成国会提出的一项要把他在明尼苏达州小像布城的住宅变成博物馆的法案。海军少校伯德即将宣布飞往南极进行探险。正如百货公司的广告上所画的那样，女性的裙子已经短到不能再短的地步，勉强能遮住膝盖。体育版刊登了派尔（C.C. Pyle）组织的“邦宁德比”竞走赛的消息，将有274名选手从洛杉矶出发。在报纸的另一页上，威廉·杰伊（William Jay）太太、罗伯特·洛·培根（Robert LowBacon）太太和查尔斯·加里·拉姆齐（Charles Cary Rumsey）太太奉行上流社会肩负重任的传统，成为席梦思床垫的代言人。广告上声称《圣路易斯雷大桥》在90天内就卖出了10万本。报纸的书评版面上推荐了范·达因（S.S. Van Dine）的《格林老宅谋杀案》，此时人们还不知道他的真名叫作威廉·亨廷顿·莱特（Willard Huntington Wright），还有薇拉·凯瑟的《大主教之死》和路德维希·卢因森（Ludwig Lewisohn）的《内岛》。戏剧版面的报道说，《玛丽·杜根审判案》已经在纽约演了七个月，剧作家高尔斯华绥（Galsworthy）的《逃亡》则演了五个月。纽约的戏迷还可以在《奇怪的插曲》《演出船》《巴黎的束缚》《波吉》和《鬼脸》中做一番选择。有声电影刚开始和无声电

影进行竞争；广告上说，艾尔·琼森（Al Jolson）宣布出演电影《爵士歌手》，这部影片中使用了维太风进行录制，福克斯公司的两部电影都成功地使用了交响乐伴奏。至于股市的行情，都不用翻到财经版面就知道了，因为头版上刊登了预告性质的简讯。

通用汽车前一交易日的开盘价是139.75美元，短短两小时内就飞升到144.25美元，自周五收盘以来上涨超过了5美元。当天的股票交易量并没有超过120万股，但是有近三分之一都是通用汽车的股票。1928年春天的投机热开始进入人们的生活之中。

读者可能感兴趣的几家主要公司股票在3月3日那天和此后几天的开盘价列表如下，括号内包含普通股股息：

美国制罐公司（2美元股息），77美元

美国电话电报公司（9美元股息），179.5美元

阿纳康达铜业公司（3美元股息），54.5美元

通用电气公司（5美元股息，包含其他项目），128.75美元

通用汽车公司（5美元股息），139.75美元

蒙哥马利—沃德公司（5美元股息，包含其他项目），132.75美元

纽约中央铁路公司（8美元股息），160.5美元

美国无线电公司（没有股息），94.5美元

联合碳化物公司（6美元股息），145美元

美国钢铁公司（7美元股息），138.125美元

西屋电器公司（4美元股息），91.625美元

沃尔沃斯公司（5美元股息），180.75美元

通用汽车股价周一上涨2.25美元，周二上涨3.5美元；当股价突破150美元大关的时候，人们顿时感到兴奋异常。股价上涨势头日渐蔓延，开始

从大繁荣 到大萧条

影响其他个股，股市行情随即“刊登在报纸头版上面”：美国钢铁公司、美国无线电公司和蒙哥马利—沃德公司的股价也一路飙升。通用汽车股价在周三和周四涨停后，周五再度上涨9.25美元，通用汽车公司同时宣布，所属的证券管理公司在公开市场为经理人买入20万股，股价大约在150美元。到了周六，美国无线电公司股价上涨12.75美元，收于120.5美元，涨幅位居前列，把通用汽车完全甩在身后。这到底是怎么了？如今不是经济萎靡、信贷扩张、股价高得令人震惊吗？股市难道疯了吗？倘若那些高价买进股票的人同时抛售怎么办？持谨慎态度的投资者看到无线电公司股价快速上扬的消息，难免和几天前穆迪投资服务公司的预测人士有着同样的感受：他们认为现实问题是，这种“高价卖出股票的情形能够持续多长时间”。

当时的实际情形是，有些资金雄厚的投机者纷纷把财富投入汽车行业、粮食市场和早期的牛市，比如杜兰特（W. C. Durant）、阿瑟·卡顿（Athur Cutten）、费雪兄弟利约翰·拉斯科布，这些人买入股票的数量简直多到无以复加的地步。他们觉得经济即将走出低迷的境况。他们知道，随着福特汽车生产的滞后，通用汽车公司可能会迎来非常关键的一年。他们还获知，美国无线电公司已经立得很稳，准备获得比以前更多的利润；科学发现不断公布出来；无线电公司可能扩大规模的前景令人振奋；汽车和收音机是战后十年大规模生产中两种各具特色的产品，是柯立芝繁荣时代两朵绚丽之花，对投机者有着贴合预期的吸引力。大牛市的操纵者也心知肚明，如果预测股市出现崩盘，成千上万卖空的投机者会继续抛售股票，等到价格回升的时候再买入。他们对美国公众的心理了如指掌。普通民众根本无法抵挡住股市暴涨的吸引力，人们普遍存在着快速致富的欲望，他们坚信美国经济会有光明的前景。不管预言家怎么断言，也

不管经济前景多么暗淡，只要股市开始走高，民众就会买进股票。他们想得太对了，大家果然都在买股票。

3月12日恰逢周一，股市再次登上了报纸头版，美国无线电公司开盘后股价为120.5美元，收于138.5美元。其他个股也有惊人涨幅，当日交易量总计387.591万股，超过了此前所有纪录。股票价格收报机的显示滞后股市六分钟，参观过纽约证券交易所大厅的游客说，有个美国无线电公司的交易者是个满头红发的家伙，叫作迈克尔·米汉，他成了交易大厅里长达五个小时的混乱交易的中心。有个旁观者回忆道：“那场景看起来就像街头群殴。”

3月13日是周二，足以让人体会到股市的冰火两重天。美国无线电公司开盘后股价达到160美元，足足比前一交易日的收盘价高出21.5美元，涨幅令人咂舌。此后纽约证交所官方宣布，开始调查股市是否有操纵现象，美国无线电公司股价随即回落到140美元，当天再次上涨到155美元，收盘时为146美元，高于周一收盘价7.5美元。有传言说一位短线操盘的大买家已经血本无归。这次股票价格收报机的显示足足慢了12分钟。

一天天地，一周周地，股市依然不断波动。到了3月16日，股票价格收报机已经慢了33分钟，有人开始听到股市交易量可能会达到500万股，这太难以置信了。3月20日，美国无线电公司股价上涨18美元，通用汽车公司股价上涨5美元。3月26日，这个新纪录仅仅持续了24个小时，之后股市总交易量再次被刷新。到了27日，这一天真是令人胆战心惊，一场莫名其妙的抛售浪潮向股市袭来，通用汽车公司股价急速下跌，只有大量买入股价才能止跌回升，当天交易量达到479万股。这股投机热潮蔓延到全国，一夜暴富的故事流传开去。一位金融评论员报道说，他的医生发现病人们谈论的全是股市行情，把其他所有事情都抛在一边；而他的理发师一

从大繁荣 到大萧条

边拿着热毛巾，一边关注着蒙哥马利—沃德公司的发展趋势。妻子追问自己的丈夫行动怎么如此缓慢，为什么没有投身股市，却听到丈夫回答道，当天早上已经买入了100股美国亚麻籽公司的股票。人们挤在股票经纪人的办公室里，聚精会神地盯着股票价格收报机上不断传出来的纸带。3月27日，通用汽车公司的行情消息突然中断，再次恢复之后，不管人们手上有没有股票，都对眼前的一长串数字感到大为惊讶：

通用汽车公司：50.85。（表示交易量为5 000股，股价185美元）
20.80.50.82.14.83.30.85.20.86.25.87.40.88.30.87……

几周后，投资者们又开始热衷于购进另一些备受关注的股票。蒙哥马利—沃德公司股价持续攀升，航空个股接连走高；仅在5月的一周内，莱特航空公司的股价就上涨了34.75美元，达到190美元；柯蒂斯公司股价上涨了35.5美元，达到142美元。在1928年的春天，纽约证券交易所不得不多次在周六停盘，以便让股票经纪人的助理来处理空前的交易规模带来的难以负重的文字工作。当然，经纪人贷款的数额越来越多，美国的信贷扩张也越来越严重。

美联储官员困扰深重，于是在2月份把再贴现率从3.5%升至4%。如果说1927年下调利率是鼓励市场的投机行为，那么他们希望通过此次上调利率会对投机形成一定程度上的打击，不料却眼睁睁地看着普通股疯狂上涨，这种现象显然违背了一切逻辑和经济学原理。到了5月份，美联储把再贴现率上调到4.5%，但是股市经历短暂波动后仍然继续走高。美联储随即抛售了1927年累计买进的国债，此举的主要结果是国债市场陷入低迷。谁能想到，事情会发展到无法控制的状态呢？

1928年5月下旬，牛市的步伐开始减慢，股价下跌，随后回升，然后再次下跌。显而易见，灾难的时刻到来了。

到了6月，股价接连下跌了几天。贾尼尼控股的公司一直受到太平洋沿岸投机者的追捧，但是这几家公司股价猛然间下跌，造成了巨大损失。6月11日这一天，在旧金山证券交易所，意大利银行股价下跌100美元，班克塔利公司股价下跌86美元，美国银行股价下跌120美元，联邦证券公司下跌80美元。就在同一天，纽约场外证券交易所，班克塔利公司股价从200美元暴跌至110美元，拖垮了一群小投机商，尽管贾尼尼（A. P. Giannini）本人曾经发出紧急警示，说股票价格被过高估值，投机商还是天真地相信股价“会达到1 000美元”。

第二天，也就是6月12日，这股来自西部的龙卷风席卷了华尔街。随着卖出股票的订单大量出现，纽约证券交易所总有一天会达到500万股单日交易量的预言变成了现实。交易大厅的股价创下新高，股票价格收报机的报价已经滞后两个小时。美国无线电公司股价曾经在5月份突破200美元大关，当天下跌了23.5美元。实际上，按照此后的标准来衡量，当天股价下跌的幅度并不算很大。《纽约时报》报道，50只领先个股的平均跌幅仅为3美元。但是在此后几天股价连续下跌，在很多观察家看来，似乎世界末日终于到来了。有家向来最为保守的纽约报纸破例在头版报道中赤裸裸地写下了这样的评论：“华尔街牛市昨日崩盘，惊天巨雷震动全球”。

（倘若商务部部长有迷信的习惯，他可能会觉得那天如恐慌一般的场景是灾难的来临的预告；因为就在同一个版面，堂而皇之地印着这样的标题“共和党召开代表大会，胡佛在首轮必定胜出”。）

大牛市当真崩盘了吗？在6月13日，股市似乎恢复了平衡。在6月14日，也就是胡佛被提名为总统候选人的那一天，股市沿承了复苏态势。灾难的预言只实现了一半。股价依然远远高于2月份的水平。几千名交易者的立场开始动摇，几笔巨额财富凭空蒸发，许多账面利润化为乌有；但是

从大繁荣 到大萧条

大牛市依然热力不减。

三

共和党人对于提名胡佛为总统候选人不太上心，几周后，深陷于众多矛盾之中的民主党才达成一致，提名纽约州州长阿尔弗雷德·史密斯（Alfred E. Smith）为总统候选人。史密斯是纽约东区的温和人士，很有管理政府的才能，喜欢戴棕色圆顶礼帽，这算得上是个较出色的选择。他是坦慕尼协会的得力会员，反对禁酒运动；更重要的是，阿尔弗雷德·史密斯是罗马天主教徒，这让他遭到美国南方和西部大多数州的反对。尽管三K党近来宣布要摘下面具，改名为“大森林骑士”，但人们还会用可怕的方式来宣泄对天主教的反感情绪。民主党人棋走险着，在第一轮选举中提名史密斯，足以证明此人开朗热情，他的能力赢得广泛尊重。民主党人坚信会获得南方各州的支持，而一位反对禁酒的移民后代会赢得共和党在北方工业区和城市的选票，自然也是因为没有其他合适的候选人。

1928年的总统大选就这样拉开了序幕。

此次大选光怪陆离。有件大事让两位候选人分庭抗礼。正如第十章写到的那样，一方面，阿尔弗雷德·史密斯毫不掩饰自己对禁酒运动的反感；另一方面，胡佛却称赞禁酒运动“是伟大的社会实践和经济实践，具有崇高的动机和意义深远的目标，必须得到积极的执行”。尽管在美国东部的城市里，共和党演说家声称，胡佛的本意是“积极地从困境中解脱出来”；而在南方和西部的乡村里，民主党演说家解释道，史密斯反对禁酒仅仅是个人选择，不会强加给他的党派。两位候选人的分歧依然互不妥协：禁酒问题最终成为总统大选的重要筹码。尽管还有农场救济这样的表面问题，可是两个政党在这方面没有实质上的分歧；竞争的焦点集中在哪

位候选人更能敞开胸怀承诺，为不景气的西北部提供经济援助。史密斯满怀希望的水电项目，却没有点燃选民持久的热情，多半是因为那些位高权重之人对于电力债券股票和城市服务公司的前景怀有美好的憧憬。当然了，还有许多不便公开的内幕：几百万民众投票支持胡佛，是因为担心史密斯会让白宫听从梵蒂冈的指挥；还有几百万民众投票支持史密斯，是因为希望史密斯能打击宗教偏见。反对胡佛的人把他看作顽固不化的教条主义者，反对史密斯的人纯粹是看不惯他的圆顶礼帽和史密斯夫人的珠宝首饰。此次大选中最为有意思的地方，就在于反映出美国人民对牛市繁荣的痴迷。

1928年的总统大选和1924年大选截然不同，没有难以对付的第三党候选人参选。扩散谣言的激进分子，早就被新经济时代的预言哄得神魂颠倒。社会党提名诺曼·托马斯（Norman Thomas）为总统候选人，不曾想他早早退出了竞选。显示股票行情的纸带让美国民众和华尔街紧密相联。实际上，民主党人察觉到自己的艰难处境。在很多年里，民主党人对银行界和工业界的商业巨头态度并不重视，如今的局面却皆然不同。倘若他们敢批评坐在繁荣花车头等位子上的上流人士，或是委婉地指出繁荣花车的目的地并不是理想乐园，而必然是自断后路。他们更不能断然否认共和党政府创造了经济繁荣的时代。他们能做的不过是用自己的言行宣扬美国人能得到股息、股票价格会持续上涨的保证而已。

至于民主党全国委员会主席的职位，阿尔弗雷德·史密斯没有挑选对什么事都看不顺眼的国会议员，而是选择了百万富翁约翰·拉斯科布，他是通用汽车公司副总裁和财务委员会主席，通用汽车金融公司副总裁，杜邦公司副总裁和财务委员会成员，银行家信托公司、美国担保公司和纽约城市信托公司的董事，还是通用汽车公司股价上涨的幕后策划人。拉斯

从大繁荣 到大萧条

科布在政界还是新人，《名人录》不仅给他戴上了“资本家”的高帽，还把他归为共和党人，可这有什么关系？许多民主党人认为，在选举的关键时刻获得他的支持，可以让阿尔弗雷德·史密斯获得更多信任。随着约翰·拉斯科布加入民主党的阵营，谁能断言民主党获胜会阻碍普通股获得20倍的收益呢？

拉斯科布把民主党总部搬到了纽约的通用汽车公司大楼，还有什么地方比这里更加霸气十足？他得意扬扬地声称，“标准石油公司的金融家”哈克尼斯（Harkness），“银行家和糖业大亨”斯普雷克尔斯（Spreckels），“投资涵盖铁路、证券公司、房地产和销售领域的纽约金融家”詹姆斯（James），这些商界富豪都认为，他们的商业利益不会因为“史密斯当选总统而受到丝毫损害”。（可曾记得上千位民主党演说家曾经大加称赞新自由主义，严厉抨击标准石油公司大亨和纽约金融家！）拉斯科布先生和史密斯州长都对民主党传统的低关税政策采取消极态度，他们此时还不知道，用不了两年的光景，许多反对者就巴望着共和党的高额关税政治纲领性条款毫无踪迹地完全废止。

至于共和党人，他们自然会宣扬经济繁荣是共和党的特有产物，这种说法算不上完美，还需要最后加工。赫伯特·胡佛本人在接受总统候选人提名的演讲中为他们定下了发言的基调。

这位共和党候选人说道：“人类最古老也是最崇高的追求，就是消灭贫困。我们生活在当今的美国，比任何一个国家的历史时期，都更接近战胜贫困的最终胜利。贫民窟在我们眼前渐渐消失。我们还没有完成目标，假如有机会来执行过去八年来贯彻的政策，如果上帝保佑的话，我们不久就会看到这个国家完全消除贫困的那一天。消除贫困并不能保证每个人都有工作，而这是我们倡导政策的主要方向。”

胡佛在提名演讲中流露出令人振奋的信心，他过不了多久就会为此懊悔不已。好在这次演讲为他后来的解脱留了一条后路：按照约定，上帝必须保佑共和党政府。

然而，我们很难对胡佛的乐观主义进行指责。难道1925年夏天的经济形势不比前一年冬天好很多吗？大牛市在6月份震荡后不是又继续上涨了吗？这样的气氛让人得意忘形。毕竟，总统候选人的首要职责是让自己获胜当选。身为工程师和经济学家的胡佛面对一系列商业周期图表，似乎并没有消除贫困的把握；可是当身为政治家的胡佛面对麦克风时，情况就完全变了一个样子。对1928年的共和党人而言，经济繁荣是确定无疑的事实。

阿尔弗雷德·史密斯勇敢地回击，在一座又一座城市卖命奔走，在棕色圆顶礼帽上签名留念，公然抨击禁酒运动，对顽固偏见大加谴责，向农场主保证提供新的救助；但这些都徒劳无功，形势发展对他非常不利。总统大选的那天，胡佛在全国占有绝对优势。胡佛获得了2 150万张选票，史密斯只有1 500万张选票；胡佛的选举人票是444张，史密斯的选举人票仅有87张；胡佛不仅赢得了史密斯的大本营——纽约州的选举人票，还获得了举棋不定的俄克拉荷马州、田纳西州和肯塔基州的支持，打破了牢固的南方阵营，赢得了佛罗里达州、得克萨斯州、北卡罗来纳州，甚至还有弗吉尼亚州的拥戴。

这场胜利扬名于世，股价在大选中不断创造佳绩。股市在庆祝竞选胜利时又掀起了新一轮的狂潮——大牛市还诞生了新的名头，那就是“另一个繁荣的四年”。

从大繁荣 到大萧条

四

在1928年11月的“胡佛牛市”期间，当年早期的股市纪录已经被冲击得破碎不堪。股票经纪人不是非常严肃地说过，交易量总有一天会达到500万股吗？如今，交易量500万股的日子正以日复一日单调的规律出现；到了11月23日，当天交易量几乎达到了700万股。他们不是对证交所交易席位的价格持续上扬感到惊讶吗？在11月份，证交所的交易席位创下了58万美元的高价。他们不是为美国无线电公司股票卖出150美元的过高价格深感焦虑吗？到了11月末，无线电公司股价就达到了400美元。10美元的涨幅和股价新高已经是再正常不过的事了。那年春天，蒙哥马利-沃德公司股价已经升至200美元，到了11月30日已经达到439.125美元。铜业公司股价飞涨；帕卡德公司股价涨至145美元；莱特航空公司股价达到263美元。经纪人的贷款数额当然比以往更高，但是有人会自信十足地说，这标志着经济繁荣，标志着美国人民正以分期付款的方式购买商品，推动国家的未来进步。此时的金融利率大概在8%~9%；也许有点高，不过股市行情是被看涨的，假如人们愿意接受高利率贷款，那有什么不好？商界没有受到高利率的影响，经济形势比此前任何时候都好。新的时代已经到来，消灭贫困的时刻就在眼下。

12月份，股市再次下挫，下跌幅度大于6月份。12月7日是星期六，在这个可怕的日子，股票价格收报机已经不堪重负，远远滞后于大厅的交易行情，报出了无线电公司股价下跌72美元的消息。在经纪人办公室看行情的人们吓破了胆，看着无线电的开盘价直发愣，从361美元小幅上涨到363美元，然后猛然下挫，一路下跌了2%，此刻的无线电股票似乎是低价抛售。（在1928年前九个月里，无线电公司的收益约合每股7.54美元，按照历史悠久的“十倍收益”标准来衡量，合理的股价应该略高于100美元；

可是人们早已把股价的“十倍收益”标准抛到脑后。正如马克斯·温科勒说的那样，这次股市暴跌不仅此前不曾有，而且未来也不会再出现。）就在那个令人恐慌的星期六早晨，蒙哥马利—沃德公司股价下跌29美元，国际收割机公司股价从368.5美元跌至307美元。不过就像6月份的情形一样，股市在即将陷入低迷之前又恢复了稳定。股价经历了几周的波动后，再次出现上涨的态势。

美联储官员发现自己陷入了两难的境地。显然，投机活动正在吸入越来越多的国家剩余资金，信用膨胀变得越来越危险。在这样的紧要关头，联邦储备银行的平常做法是提高再贴现率，从而提高用于投机目的的贷款利率，导致投机活动减少吸引力，清偿投机贷款，减少未清偿贷款的总额。尽管联邦储备银行已经在7月份把再贴现率提高到5%，但是投机活动只是暂时受到影响。现在看来，只要股价持续上涨，不管贷款利率有多高，投机者都愿意买入。美联储当局耐心地等待投机热潮自己消退下去，不料这股热潮越来越厉害。事到如今，如果美联储进一步提高利率，就会面临股市崩盘的可怕风险，显然这种做法是想出来的放纵行为，迫使股市承担极高的贷款利率，严重妨碍经济发展。此外，他们还担心黄金进一步流入美国，可能会对世界贸易造成影响。美国财政部尤其关注利率问题，因为财政部本身也需要融资，财政部部长梅隆自然不会热衷于强迫政府为现有贷款支付高额利息。这样看来，除了发生自然灾害，似乎没有实施通货紧缩的办法。

美联储最终想出了一个巧妙的新方案，来解决当前面临的困境。他们打算在不提高再贴现率的情况下，防止联邦储备银行再贷款给股票经纪人。

1929年2月2日，美联储函告各联邦储备银行如下：“以联邦储备委员会之见，《联邦储备法案》不会考虑动用联邦储备银行资金，用于发放

从大繁荣 到大萧条

投机性贷款或延长投机性贷款的期限，会员银行出于提供投机性贷款或维持投机性贷款的目的而向其隶属的联邦储备银行借款，这种做法超出了合理的再贴现融资规定。”不到两周后，美联储再次致函联邦储备银行，要求各家银行“尽可能防止动用联邦储备银行资金，用于提供证券贷款的目的”。与此同时，联邦储备银行大幅减少在公开市场上出售自身所持有的债券。但是，再贴现率一直没有上调。从2月份开始，纽约联邦储备银行的行长再三请求华盛顿，批准提高纽约地区的再贴现率，但是提议每次均遭到拒绝。美联储更愿意依赖它的新政策。

1929年2月2日美联储公告的直接结果就是，股票价格在短短两夜之间全线下挫。由于联邦储备银行对所属的会员银行施加压力，只能出于合法的商业目的提供贷款，后续结果自然是资金拆借利率进一步提高。到了3月末，赫伯特·胡佛已经做了白宫的主人，繁荣时代的前任守护者柯立芝退隐，回到北安普顿沉浸在撰写自传的乐趣之中，资金短缺的情况骤然间达到高潮，不禁令人惊恐万分。股价持续下跌，到了3月26日，短期拆借利率从12%升至15%，此后升至17%，最后达到20%，创下1921年经济萧条以来的最高水平。股价再次暴跌，证券交易所周转量打破了11月份的纪录，达到824.674万股。成千上万封催缴保证金的信件再次投递进了投机者的邮箱。投身于国家繁荣前景的数以万计的参与者，在卖空股票后已经倾家荡产。大牛市再次走到了崩溃的边缘。

就在当天下午，纽约的几家银行决定出手拯救股市。无论他们对美联储的新政策怎样评价，都看到了股市的恐慌情绪正在蔓延，他们认为此时的恐慌比任何情况都可怕。第二天，国民城市银行总裁查尔斯·米切尔（Charles E. Mitchell）宣布，该银行准备向短期拆借市场投放2 000万美元，先以15%的拆借利率投放500万美元，再以16%的拆借利率投放500万美

元，其余资金的拆借利率最高为20%。虽然参议员卡特·格拉斯（Carter Glass）表示，米切尔的举措无疑是向美联储脸上扇了一巴掌——但是此举把短期拆借利率稳定在15%，避免了一场危机四伏的灾难。

股市不仅终止了急速下滑的势头，而且令人欣喜地恢复了活力！

这个教训是非常显而易见的：除非大难临头，公众绝对不会动摇对股市的信心。

在此后的一两个月里，股市波动不定。到了5月份下跌了一段时间之后，经纪人贷款的数额略有减少，但是没有得到清偿。尽管美联储设置了障碍，但是越来越多的资金开始设法应用于投机之事上。企业可以不必通过美联储的会员银行，很容易找到许多途径，以8%~9%的拆借利率贷出盈余的现金；它们急于把资金用于利润丰厚的投资，替其他人贷款的情况越来越明显；美联储的会员银行意识到了这种局面，表现出抵制的迹象。到了6月份，股价再次上涨，似乎什么事都没有发生过。美联储官员的举措彻底宣告失败。

五

到了1929年夏天，股价大幅上扬，远远超过前一年冬天暴风雨般的水平，飞上万里无云的碧蓝天空。人们全然不顾过去用来衡量普通股价有增值潜力的标志；如果价值100美元的股票能够涨到300美元，还有什么条件能阻拦它上涨到400美元呢？怎么不任由股票上涨50或100美元，通过捷径走到这场人生旅途的终点呢？

按照逻辑规则来看，当时的情况比以往更摇摇欲坠。如果说1927年的通货膨胀非常严重，那么1929年的通货膨胀更加危机四伏，股票经纪人贷款的总额高达60亿美元（在1927年年底只有35亿美元）。如果说1927年

从大繁荣 到大萧条

的股价已经过高，那么如今的股价简直是高得不切实际；不可否认，经济学和物理学一样，遵循着古老的原理：登得越高，跌得必然越重。不过投机者的记忆并不好。当人们在1929年夏天回首过去时，会感到一丝欣喜：过去几年每次股市下跌后都会回升，每次股价回升后又会推动股价创下新高。走两步，退一步，再走两步，股市就是这样发展的。如果你把股票卖出，只有等到下次股市价格下挫（几个月后这个时机就会到来），才能再次买进。实际上，根本就没有理由全部抛售一空：如果你手里的股票表现稳定，你一定会成为最后的赢家。显然，“买入股票后一直持有”才是真正明智的人。

经济学家和预言家再三叫嚷“狼来了，狼来了”，可狼转了一圈就转身离去了。对于通货膨胀的危害，美联储再三表示担忧，可通货膨胀根本没有导致市场萧条。经济形势难道危机重重吗？怎么会呢，简直是一派胡言！

工厂正在扩大生产规模，统计指数表明工业情况良好。谁说有生产过剩的危险？又是胡说八道！企业难道不是现买现卖，大宗商品价格难道没有保持在合理水平？经济分析师通常当成风暴信号的沉重货架、积压库存又在哪里？好好看看那些位居前列的股票吧！前几个月价格飞涨的股票里，许多都是实力雄厚、管理保守的企业，比如美国钢铁公司、通用电气公司和美国电话电报公司，这些公司正是严谨的投资者长远考虑的最佳选择。股价上涨仅仅标志着这些股票具有稀缺价值。戴尔—哈德逊公司的乔治·戴尔将军（General George R. Dyer）向《波士顿新闻报》表示：“任何购买本公司最高级别的铁路和工业股票的人，包括钢铁、铜和公用事业股票，只要他们一直持有，就能赚取丰厚利润，因为这些证券将逐渐在市场上消失。”牛市操纵者长期以来所宣称的内容最终是真实可信的。这是一个新时代。经济繁荣进入了全盛的阶段。

不过，还是有人顾虑重重。可是反驳他们的理由如此令人信服，让许多头脑冷静的美国金融领袖也未免有些动摇。他们承认通货膨胀最终可能会造成威胁，不过前一年冬天困扰他们的麻烦已经退散。这波牛市数次在可怕的震荡中安然度过，也许注定要继续这样下去。

人们到处都能听到智慧之士的至理名言：“经济繁荣快完了？怎么会呢，老兄，咱们这才刚开始！”“美国股市牛气冲天。”“千万别低估了美国股票。”“我跟你说过，过不了两年，这些股票的价格就看起来低得离谱。”“瞧瞧这只股票，都快达到500美元了。”“那家公司前途不可限量。”“千万别放弃你手里的绩优股。”每个人都听说了这样的故事，倘若有人在1919年买进100股通用汽车公司的股票一直持有，就能获得几百万美元的利润。每个人都时不时被人提醒，金融家乔治·贝克（George F. Baker）从来都不肯卖任何东西。至于投机的威胁，新泽西州前州长斯托克斯（Stokes）发表了慷慨激昂的演讲，宣称哥伦布、华盛顿、富兰克林和爱迪生都曾经是投机商，人们大可高枕无忧。约翰·拉斯科布在《妇女家庭杂志》发表了一篇标题非常醒目的文章——“每个人都能成为富人”，他这样写道：“致富之道就是置身于这个国家财富生产的利润终端。”拉斯科布同时还指出，如果一个人每月能节省15美元，用在走势良好的普通股的投资上面，不断累计股息和股权，那么二十年以后就能拥有8 000美元的财富，每月能从投资中获得400美元的收入。一切看起来多么简单，通向财富的大门就此向人们敞开了。

与此同时，人们也听说美国工业可以运用清晰的现代原则来得到保障。正如瓦迪尔·卡钦斯（Waddill Catchings）和威廉·福斯特（William T. Foster）指出的那样，增加消费才是经济繁荣之道。只有我们的慷慨支出越来越多，工厂的烟囱才能冒出滚滚浓烟，股票的股息才会

从大繁荣 到大萧条

一路攀升。旧经济秩序已经消失，被新经济秩序所取代。俄亥俄州立大学的管理学教授查尔斯·阿莫斯·戴斯博士（Charles Amos Dice）在其著作《股市的新高度》（*New Levels in the Stock Market*）中写道：“工业、贸易和金融发生了天翻地覆的革命，股市不过记录下了革命进程中惊人的变化而已。”

戴斯教授提到了金融界的变化，他说的倒也不错。公众不再需要陈旧的又不赚钱的债券，而是需要利润丰厚的股票证券。一家又一家企业使出精明的手段，利用这种新的需求，纷纷回收债券，用新发行的股票取而代之。如果公司发行了新债券，当下流行的做法是转换成股票，或者作为认股权证，可以在前景乐观时购买股票，这种方式赋予了债券投机色彩，让投资者感到如愿以偿。公众似乎宁愿以每股50美元的价格买进100股股票，也不愿以每股250美元的价格买进20股，大量买进卖出会让人们感到自己更加有钱！因此越来越多的公司开始分拆普通股，使其对各种各样的买家都具有吸引力，而不顾及股息是否在短期内增值。许多企业长期以来习惯于向股东承诺，购买新股时会在股价上做出让步，从而保证募集新资金，这种做法非常流行。公司合并和银行兼并比此前更加频繁，这样做不仅是希望能够减少管理费用，避免残酷的竞争，而且还是出于企业狂热的膨胀。每次传出企业合并、拆分股票、发行新股的传言，都会成为推动股价上涨的信号。这种诱惑简直令人难以抗拒，许多公司的经理人们纷纷安排企业并购、拆分股票、发行新股，而没有用谨慎的眼光来看待自身获得利润的投机手段。

多年以来，彼此竞争的资本主义利益集团效仿西德尼·米切尔（Sidney Z. Mitchell）的高明手段，设法控股地方电灯、电力、煤气和自来水企业，把这些企业联合成整体；公用事业的未来趋势让投机商产生

了兴趣，这些利益集团的激烈竞争，导致公用事业控股公司的扩张速度非常惊人。到了1929年夏天，竞争体系已经变得相当复杂，企业之间的关系变幻多端，人们很难理出头绪，一点也不知道这些企业不断上涨的股票的真正价值。即使是金融资产的职业分析师也会感到不可思议，因为他发现A公司持有B公司20%的股权，B公司持有C公司的股权，C公司反而投资了A公司，而D公司持有其他三家公司的股权。然而，投资者似乎不大在意股票的真正价值。公用事业前景良好，股价一路上涨，这就足够了。

与此同时，投资信托公司像蝗虫一样大量涌现出来。当时据说美国有500多家信托公司，实际利用资本总计30亿美元，持有20亿股股票，大多数股票都是在高价位买入的。这些投资信托公司形式多样，既有诚信经营、管理得当的公司，也有愚昧无知、唯利是图的发起人建立的投机企业。据说，有些信托公司善于资本化运作，不必拿出持有股票的收入来支付优先股股息，完全依靠利润经营。应当承认，其他投资信托公司的确提供了便利，吸收了银行家们控股企业的证券，而这些证券很难在公开市场上出售。你能说，这种行为不应该受到谴责吗？这是理所应当的，可是投机活动就是这么容易！只要股价上涨，人们就可以理直气壮地从事任何可疑的金融活动。大牛市掩盖了无数的罪恶行径。这是信托投资发起人的黄金时代，这些人的名字多得数不胜数。

巨大的资本金字塔日益上升。汽车、收音机和上百种小玩意儿的超级推销员向最终消费者送去崭新闪亮的商品，证券股票的超级推销员向客户兜售信托投资公司的股份，信托公司持有控股公司的股份，控股公司持有银行的股份，银行反过来控制了控股公司，周而复始，无穷无尽。尽管制造商、批发商和零售商的货架连积压货物的影子都没瞧见，但是最终消费者和股票经销商已经不堪重负。一场危机正在酝酿，尽管和1921年袭击美

从大繁荣 到大萧条

国的经济萧条完全不同，但是依然危机四伏。不过，当时出现在夏日晴空的那片乌云看起来比手掌大不了多少。

我们似乎很难估算，在1929年那个不可思议的夏天，究竟有多少美国人从股票中赢利，但是我们可以断定超过了100万。乔治·巴肯·罗宾逊（George Buchan Robinson）预计有300万股股票获得收益。当然，估计还有更多的人，手里持有普通股，每天关注股市行情，全神贯注的程度和交易者不相上下。当你在当地时间下午5点27分走到前廊，或是在有轨电车上找个位子坐下来，就会发现人们大多数都看股市行情的版面。华尔街大企业的分公司遍布每一座城市和不计其数的乡镇。在1919年，有500家这样的分公司；到了1928年10月，有1 192家；而在1929年，分公司的数量还在持续增长。人们对股票经纪人充满好奇，刮目相看。普通人并不像经纪人那样洞察华尔街的奥秘，因此对经纪人言听计从。假如有位经纪人透出口风，说通用工业协会可能会拆股，那么等到第二天早上，他的四邻八舍就会匆匆忙忙地买进这只股票。

富有人家的司机一边开车，一边竖起耳朵打探着消息，关注着伯利恒钢铁公司的动向，他手里握着50股伯利恒钢铁的股票，眼下已经有20美元的利润。在经纪人办公室里擦窗户的工人，时不时停下来看看股票价格收报机的行情，心里盘算着把辛苦攒下的积蓄拿去买席梦思公司的股票。作家埃德温·拉斐尔（Edwin Lefevre）讲过这样的故事：有位经纪人的男仆在股市上赚了将近25万美元，一位训练有素的护士按照对其无比感激的病人提供的诀窍，获得了3万美元的收益；怀俄明州的一个牧场主，住的地方离最近的火车站还有30英里，每天却能买卖上千股的股票；他通过收音机判断股市收益，打电话到最近的大城市下单，然后通过电报传到纽约。纽约有位退隐幕后的女演员，把帕克大街的公寓装修成办公室，

身边到处都堆着图表、曲线图和财务报告，通过电话买进卖出，在股市中进行投资。人们在餐桌上总能听到一夜暴富的传奇故事：有位年轻的银行家拿出为数不多的资产，投资奈尔斯—贝门特—庞德公司的股票，现在过上了富足又舒适的生活；有个寡妇从肯尼科特同业公司获得的收益，足够买一所宽敞舒适的乡间宅邸。成千上万的人都在进行投机，炒股赚钱，压根不知道他们从中赢利的公司到底是什么行当，买进海岸航空公司股票的人还以为这是一只航空股呢。杂货商、电车司机、水管工、女裁缝和地下酒吧的侍应生都纷纷投入股市之中。连思想反叛的精英们也深陷其中不可自拔：他们为标准化和批量生产对美国人生活的可怕影响嗟叹不已，回过头来又准备收获股市的丰硕果实。文学编辑满心希望买进美国氧胺公司的B股，一起吃午餐的诗人却对城市服务公司非常信任。两人吃完饭起身离去，必然要到拥挤不堪的经纪人办公室里待一会儿；从前谈起高更就滔滔不绝的画家，如今把画笔丢在一边，大加赞扬国民贝拉斯赫斯公司的价值。大牛市已经成了席卷了全国的投机热潮。

六

在9月份，大牛市终于达到了辉煌灿烂的顶点。

赫伯特·胡佛冒雨驱车驶过宾夕法尼亚大道，在白宫宣誓就任美国总统，到现在已经过去六个月。他任命了维克夏姆委员会，调查普通法律和禁酒令的实施情况。在总统的建议下，国会通过了《农产品购销法》；身为新任联邦农业局局长的亚历山大·理雅各（Alexander Legge）认为，在他肩负的各项职责中，有一项“防止和调控任何农产品过剩”的重任。《凯洛格—白里安公约》已经宣告生效，新任英国首相拉姆赛·麦克唐纳（Ramsay MacDonald）准备乘船去往美国，协商裁减海军军备的新

从大繁荣 到大萧条

条约。关于哈定石油丑闻的漫长审判终于有了结果：斯图尔特上校不堪洛克菲勒施加的重重压力，不得已辞去了印第安纳标准石油公司董事长的职务，将哈里·辛克莱投入监狱里。陆军上校林德伯格无愧于国家超级英雄的形象，娶了安妮·莫罗小姐。海军少校伯德多次完成英雄主义的创举，在南极洲的无边黑夜里，他正在小美利坚考察站等待着驾机飞越南极的时刻。直航飞机的轰鸣声响彻美国的田园乡村，人们效仿航空英雄的行为无比荒唐，有个22岁的小伙子钻进了“黄鸟”号飞机的机舱，从缅因州的旧奥查德海滩起飞，经停阿索朗和乐菲芙，偷渡到了西班牙海岸。在美国数以千计的海滩上，女孩子为了晒出时髦的古铜色皮肤，拉掉了泳装的肩带。她们心里暗自琢磨，坐车到城里去的时候不穿长袜要不要紧，因为时尚杂志上宣称，不久晚礼服就要长裙曳地，不知道是真的还是假的。

在这个赛季里，网球名将蒂尔登赢得了第七个——也是最后一个美国业余网球锦标赛的冠军。这也是鲍比·琼斯称霸业余高尔夫球坛的倒数第二年，此前他连续七年包揽了美国业余高尔夫比赛和高尔夫公开赛的冠军。贝比·鲁斯依然刻苦训练本垒打，和1920年一样成功获胜，但他年岁渐长，运动生涯渐渐进入了终了的阶段。邓普希把拳王桂冠拱手让给唐尼，唐尼则把这顶桂冠束之高阁，转而投身文学界。此后再也没有人追随他们的脚步，创造200万美元的收入，吸引普通民众的注意。

大家在争相阅读《西线无战事》，跟着收音机里鲁迪·瓦利的歌声轻声哼唱。文学期刊为人道主义摇旗呐喊。然而，不论是日光浴、拉姆赛·麦克唐纳的亲善访问、人道主义，还是《西线无战事》，跟大牛市比起来都显得沉闷极了。高盛公司对目前的股价水平充满信心，投资了蓝岭公司，这家投资信托公司允许投资者用其他位居前列的蓝筹股股票来交换本公司的股票。按照当前的股价，联合化学漂染公司股价为324美元，美

国电报电话公司股价为293美元，联合天然气公司股价为395美元，通用电气公司股价为395美元，这份名单还不够吸引人吗？

让我们稍等片刻，看看1929年9月3日那天，疲惫不堪的股票价格收报机打出了几家公司的股价记录，就在这一天，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创下年度新高；把此时的股价和1928年3月3日的股价相比较，你也许还记得，那天牛市攀升到了危险的高度。下面的几组数字依次排列，第一列是1928年3月的股价，第二列是1929年9月的股价，最后一列是折合成1928年的股价，换句话说，是考虑到拆分股票、发行新股等因素修正后的股价。（只有这样计算，你才能正确判断这18个月里股价上涨的幅度。）

上市公司	1928年3月3日开盘 价/美元	1929年9月3日最高 价/美元	1929年9月3日调整 后的最高价 /美元
美国制罐子公司	77	181.875	181.875
美国电话电报公司	179.5	304	335.625
阿纳康达铜业公司	54.5	131.5	162
电气债券股份有限公司	89.75	186.75	203.75
通用电气公司	128.75	396.25	396.25
通用汽车公司	139.75	72.75	181.875
蒙哥马利—沃德公司	132.75	137.875	466.5
纽约中央铁路公司	160.5	256.375	256.375
美国无线电公司	94.5	101	505
联合碳化物公司	145	137.875	413.625
美国钢铁公司	138.125	261.75	279.125
西屋电器公司	138.125	289.875	313

从大繁荣 到大萧条

续表

上市公司	1928年3月3日开盘 价/美元	1929年9月3日最高 价/美元	1929年9月3日调整 后的最高价 /美元
沃尔沃斯公司	91.625	100.375	251

（说明：通用电气公司、美国无线电公司、联合碳化物公司和沃尔沃斯公司的股价考虑到1928年3月3日以后的股权拆分进行了修正。美国电话电报公司、阿纳康达铜业公司、蒙哥马利—沃德公司、美国钢铁公司、西屋电器公司和电气债券股份有限公司的股价考虑到其间发行的新股做了调整；以上反映了1928年3月持有的各公司股票在1929年9月3日的每股价格，调整的基础是假定在此期间发行的新股都得到了认购。）

还有一件事，当你看到1929年9月3日的股价达到新高时，要知道在那一天，很少有人能料想到，股市实际上已经达到顶点，绝大多数人还在满怀期待着大牛市持续上扬。

美国人的血管里依然流淌着开拓者的热血；就算他们把传统抛到了九霄云外，却依然保留着展望未来的习惯。即使1919年的残酷现实让人失望，威尔逊理想主义突然崩塌，政治犬儒主义四处蔓延，宗教信仰逐渐衰落，爱情的本质充分暴露出来，人们光明的希望完全毁灭，可那有什么要紧的？人们在大牛市里获得了补偿。美国人依然编织着美好的梦想——总有浪漫而又美好的一天，他会以不可理喻的高价卖掉西屋电器的普通股，住上富丽堂皇的豪宅，拥有一排闪闪发亮的汽车，悠闲自在躺在棕榈滩的沙滩上。当他展望本国的未来时，看到一个自由的美国——没有贪污，没有犯罪，没有战争，没有华尔街的大权在握，没有宗教信仰的缺乏，没有人性的欲望，因为早年的乌托邦让他心存疑虑、无动于衷；他看到美国消除了贫困，从辛劳之中摆脱出来。他看到了以科学思想和经济繁荣为基

础的神奇秩序：上百万辆汽车在公路飞驰而过，一架架飞机在天空中掠过，高压电线为了传输电力翻越一座又一座高山，让上千台节省劳力的机器轰鸣运转，摩天大楼在昔日的村庄建造了起来，大城市里建起气派宏伟的石墙大厦，道路上的交通有条不紊，衣着时髦的红男绿女消费、消费，再消费，而这些钱都是他们极有远见的投资所得到的，此时足以预见到将要发生的一切，这就是1929年的辉煌场景。

FROM GREAT
PROSPERITY
TO GREAT DEPRESSION

第十三章 大崩盘！

9月初，美国股市下跌，此后立刻反弹；9月19日，《纽约时报》工业平均指数甚至高于9月3日的水平。股市随后再度下挫，跌幅越来越大，到了10月4日，许多股票的价格都回落到很低的水平。比如说，美国钢铁公司股价几周前触及261.75美元的高点，现在下滑至204美元的低点；截至10月4日收盘，美国制罐公司股价比年度高点低了20美元；通用电气公司股价比年度高点低了50美元；美国无线电公司股价从114.75美元跌落至82.5美元。

可以肯定，此次股市下跌势头非常不好，不过在1928年6月和12月，以及1929年3月和5月，股市都曾经出现下跌，投机商利用从中得到的经验全身而退，他们认为股市下跌正是买入的好时机。据纽约联邦储备银行统计数据显示，即使面对股市剧烈动荡，经纪人贷款仍在10月2日创下新高，达到68.04亿美元，标志着买家并没有放弃股市，反而纷纷投入其中，至少投资金额丝毫没有减少。（经纪人贷款金额上涨，一方面可能是

因为经销商手里积压着没有卖出的股票，另一方面是因为投资信托公司不断出现，各行各业的公司继续增发新股。）看来历史还会重演，那些以109.75美元买进阿纳康达铜业公司股票，或是以281美元买入美国电话电报公司股票的人，此时还以为自己是聪明又理性的投资者。果然，股票价格再次冲高。10月初的一个星期天，英国首相拉姆赛·麦克唐纳和美国总统赫伯特·胡佛坐在拉皮丹营的一根圆木上，探讨裁减海军军备与世界和平的前景，一直到此时股市仍在一路上扬。

但是这次下跌来势汹汹，美国股市再次下挫。华尔街自以为是的投资者四处寻找股市下跌的根源，最终把目光对准了英格兰哈特利金融集团的倒闭（此事在外国投资者和投机商中间广为流传），以及马萨诸塞州公用事业局拒绝波士顿的爱迪生公司拆分股票。他们还指出，钢铁企业股价必然下滑，目前未被市场吸收的证券积压了太多太多。但是到了10月21日那一周，股市并没有敲响警钟。与此同时，大家对形势的看法是相同的，9月份股市的暴风雨尚未消退，股市自身在进行调整，进入“更稳定的技术层面”。

二

根据即将降临的灾难，回顾一下金融预言家在此紧要关头对形势的判断，会给我们提供很多启迪。这些上流人士名声在外，极富才能，他们仔细查看统计学家绘制的图表，根据曲线走向和指数变化的关系，就能预料到经济究竟是好转还是恶化。当然，他们对问题的看法也并不完全相同；实际上，经济观点从来没有完全相同的时候。对这些预言家的看法和知名银行家的观点加以审视后，我们必须得承认，不能完全相信看涨股市的声明：很少有人因为做出可怕的预测来承担散布恐慌的责任，银行家手里还

从大繁荣 到大萧条

有大量等待出售的证券，尽管心里感到惶恐不安，他们也不可能在此时危言耸听，让这些证券难以推销出去。到头来，人们只能说，预言家也就是个冒险碰运气的职业。尽管如此，大家在1929年10月对经济的普遍观点和1928年2月份和3月份形成了明显对照，正如我们看到的那样，此时的蓝天似乎没有那么晴朗。

当然，有些预言家与众不同，奉劝投资者千万要当心。投资顾问罗杰·巴布森（Roger W. Babson）在华尔街的精英人士里不算尽人皆知，很长一段时间以来，他都在警告自己的客户也许在未来会遇到麻烦，而且早在9月初他就预测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会下跌64点到80点。10月7日，标准统计公司的标准交易证券服务部门建议客户采取“极端保守的投资方式”，同时做出了大胆的预测：“我们认为在今后几个月里，普通股的价格趋势会持续下挫。”普尔公司的《每周商业投资通讯》非常明确地表示，“普通股的欺骗性实在是太大了”，预计“股市会进一步清盘”。在有头有脸的银行家里，保罗·沃尔伯格（Paul M. Warburg）几个月前就表示股市情况危机四伏。这些评论家——还有《商业金融纪事报》的主编、《纽约时报》的财经编辑——都应该以他们的明智的先见而得到1929年的金质奖章。

倘若真的要论功行赏，还有许多人应当获得一无是处的皮质奖章，哈佛经济学会都不一定能轮得上。该学会曾经解释说商界“正在面临新一轮的调整”；10月19日，哈佛经济学会预测：“假如经济衰退对商界造成了严重的威胁（目前尚无迹象显示已经到了如此地步），毫无疑问，美国联邦储备体系将会采取有效措施，放松货币政策，从而预防事态恶化。”哈佛预言家随后证实自己的预测根本不可靠：到了10月26日，在股市已经全面崩盘的情况下，他们还做出了乐观的判断，“尽管股市情况严

峻，但我们仍然相信股价下挫是市场中期变动，并不会成为经济萧条的序幕”——这个判断简直错得荒唐之极；不过另一方面，哈佛经济学会也不是一味看涨股市。克利夫兰信托公司的李奥纳多·埃尔斯上校（Leonard P. Ayres）也领不到这枚皮质奖章。在10月15日，他本人做出了这样的判断：“目前看来，似乎没有确实可信的证据表明，股价下跌会预示着严重的经济衰退。尽管钢铁生产有所放缓，汽车产量逐渐减少，建筑业日益低迷，但是目前的形势不会导致严重的经济萧条。”不过在埃尔斯上校看来，此时的天空晴朗少云，他表示：“我认为股市不可能从强势上涨转为萎靡不振，就像聪明的人不可能变得蠢笨一样。”

不过，经济学家欧文·费雪（Irving Fisher）教授的看法更加乐观。据10月17日的报纸报道，费雪向采购商协会表示：“股价已经永久地站在了高原之上。”他预计在未来几个月里，股市会远远高于目前的水平。就在10月24日大崩盘的前夜，费雪还预计股价会进一步反弹。在大崩盘两天前，《波士顿新闻报》报道，麦克尼尔金融服务机构的负责人麦克尼尔（R. W. McNeel）表示：“聪明的人现在还在买进股票。除非我们经历恐慌，否则没有人会相信股价将跌到低谷。”纽约国民城市银行的总裁查尔斯·米切尔一直富有热情地称赞股市阳光明媚。早在10月初股市下跌之时，米切尔依然乐观地表示：“美国的工业情况肯定是良好的，我们的信用状况无懈可击——公众对支付给经纪人贷款的利息过于夸张了。”几天后，米切尔再次断言：“尽管在某些情况下，美国出现了投机过度的趋势，但是总的来说，市场是健康的。过去六周来股价震荡走低，对股市非常有益。目前的股价具有我国经济普遍繁荣的良好基础。”到了10月22日，米切尔结束了短暂的欧洲之旅，回到美国，他充满信心地保证：“据我所知，美国股市、基础经济和信贷结构都没有根本性的问题。公众只是

从大繁荣 到大萧条

得了‘经纪人贷款忧虑症’。”

持有这种观点的人绝对不仅仅只有米切尔一个人。说句老实话，米切尔和其他金融界人士最主要的区别在于，他的嗓门更大。1929年初秋，有位声名远扬的美国银行家在做成一笔生意后私下里表示，此时的股市天空晴朗，连片云彩都没有。当然了，像阿瑟·卡顿（Arthur Cutten）这样一向觉得股市大好的人，依然坚持“股市上扬的看法”。10月中旬，据《波士顿新闻报》的“百老汇随笔”专栏报道，普通交易者大多赞同股价上扬的观点，认为“近来股市下挫只是为今年第四季度的大牛市而奠定的坚实基础”。毫无疑问，在那年夏天许多还认为股价过高的投资者，现在认为通货紧缩已经受到影响，纷纷再次买进股票。

无论你是家财万贯、位高权重、精明能干，还是蠢笨粗心、手里握着50股差额股票，那场即将来临的灾难注定使人既迷惑不解又坐立不安。

三

外界期待的股市复苏的时刻没有到来。10月22日，星期二，股市开始反弹，但是在当日收盘前最后一刻吐出来大部分涨幅。10月23日，星期三，股价清盘之势如洪水来袭。当天股市交易量超过600万股，等到下午3点收盘时，股票价格收报机的显示已经慢了104分钟，综合50家铁路和工业个股的《纽约时报》平均指数下挫18.24点，创下历史上最为急速的下跌纪录，使此前的跌幅显得不值一提。人们意识到，已经发出了数量巨大的保证金催缴单，寄给保证金不足的数千名交易者，情况会变得越来越严重。但是，也许明天就会出现转机。股价下挫的幅度已经远远低于过去两年的水平，这种势头肯定不会持续多长时间的。

第二天就是10月24日，星期四。

在这个意义重大的日子里，股市开盘相当平稳，不过交易量大得惊人。股票价格收报机显示，肯尼科特铜业公司的成交量高达2万股，通用汽车公司的成交量与其持平。股票价格收报机再次滞后于交易大厅的行情。抛售股票的压力巨大，令人感到紧张之极。股价直线下跌 股价下跌的速度越来越快 收盘前一个小时，股价已经创下了不曾出现过的跌幅，令人胆战心惊。在全美各地的股票经纪人办公室里，关注行情的人们不禁愣在原地，惊讶至极的同时又无比困惑。这股抛售股票的洪流究竟是怎么来的？

我们恐怕永远都无法得知这个问题的确切答案。但是，在10月24日开盘的一个小时内，股价下跌的主要原因并不是恐慌的情绪，也不是卖空行为，而是被迫抛售，股市以可悲的交易者的名义售出了数以万计的股票，而他们手中股票的利润已经彻底消失或者快要消失。股价建造的壮观大厦被投机信贷腐蚀得四处漏风，如今早已经不堪自身的重负而彻底倒塌。

不过，恐慌并没有减慢自己的步伐。随着股价暴跌，人们纷纷从股市中四散奔逃。到了上午11点，纽约证交所大厅里的交易者已经跳进了疯狂的抛售洪流之中。显示滞后的股票价格收报机还没将行情打出来，股价跌至谷底的消息已经通过电话和电报传了出去，抛售股票的订单数量顿时增加了一倍。就在交易中，位居前列的股票价格已经下滑了2美元、3美元，甚至是5美元。股价下跌，下跌，再下跌！此时此刻，那些应该抄底买进股票、挽救股市的投机商在哪儿？那些将在低价买进新股、为股市提供缓冲的投资信托公司在哪儿？那些声称股市看涨的巨商们在哪儿？那些能够随时撑住股价、手掌大权的银行家在哪儿？人们看上去没有任何可以依靠的人了。股价下跌，下跌，再下跌。证交所交易大厅里抛售的声音喧嚷，变成了人们恐慌情绪之下的咆哮。

从大繁荣 到大萧条

美国钢铁公司股价开盘报205.5美元，跌破200美元大关后，眼下已经降至193.5美元。通用电气公司股价几周前曾经突破400美元，今晨开盘后为315美元，现在下滑至283美元。美国无线电公司情况最糟糕，开盘报68.75美元，此后直线下跌至60美元、50美元和40美元，目前降到了44.5美元的低谷。至于蒙哥马利—沃德公司，曾经托付了成千上万人对连锁店的希望，被看作新时代的先驱，如今该公司股价从83美元暴跌到50美元。短短两个小时内，几十只股票失去了在大牛市中累积了数月的涨幅。

倘若人们能够随时准确了解将要发生的一切，股价暴跌也不会这么让人震惊不已。正是盲目无知让人们陷入了真正的恐慌之中。

在1929年10月24日中午12点到1点钟，假如有个人走进股票经纪人的办公室，第一眼就会看到占据了一整面墙的行情显示牌，上面记录着当天几只龙头股的价格。此时的最低股价和最新股价让他看傻了，他马上意识到，这些数字简直让人不敢相信：股票价格收报机随时更新股价，送记录卡片的小伙子就算跑得喘不上气，也赶不上这种变化，股价的变动不计其数，让人措手不及。他转过头来看行情显示牌，上面连续不断地显示股票价格收报机传来的数字。通常情况下，他只要观察一会儿就能知道股市的表现，虽然证交所只记录每个价格的最后一位数，但是他往行情牌上瞅一眼，就能凭借自己的记忆想起其余几位数。可是今天完全不一样，当他看到这一连串的符号和数字：

R WX

6.51/2.5.4. 9.87/8 3/4 1/2 1/4.8.71/2.7.

实在不能确定无线电公司股价的“6”到底代表着66美元、56美元还

是46美元；西屋电气股价到底是从189美元下跌到187美元，还是从179美元下跌到177美元。如今，他还听说股票价格收报机已经慢了一个半小时；现在是下午1点，可它显示的还是上午11点半的股价！那么他看到的数字早已经是众所周知的旧消息了。交易大厅里眼下的情形究竟如何呢？

每隔10分钟，墙角的股票价格收报机就会缓缓打出交易大厅精选出来的个股名单，经纪人的办事员一把抓住那条纸带，抄起剪刀剪下一条，扯开嗓子读出指数。他那单调的声音波澜不惊，旁边留神倾听的人吓得面色苍白，屋子里早就没有空位可坐下来，甚至连角落里也站满了人。他高声朗读的股价要比之前记录的低了10美元、12美元，甚至几十美元。那些没在名单上的股票究竟怎么样？我们真的没办法知道。由于全国各地都在打电话向纽约证交所咨询情况、下订单，电话线已经被打爆了。经纪人办公室的里间偶尔会传出吵吵嚷嚷的声音，急得发狂的职员在努力接通电话，只听他大声喊道：“钢铁股，96美元！”不过，人们要是知道钢铁公司此刻在做什么，也许会感到几分慰藉；除了美国钢铁公司，还有许多股票让人陷入绝望之中；大家全都无从知晓实情，可以尽情发挥自己的想象。即使他们下单买进或卖出股票，也不可能知道后续将如何发展。交易所记录实时股价和联系订单的系统对于这种紧急情况毫无招架之力，令人无比失望，激发了恐慌情绪的蔓延。

就像美国从南到北的数百家办公室一样，在这间股票经纪人的办公室里，你能看到人们脸上的沮丧失望。有人漫无目的地走来走去，浑然不觉地把纸撕得粉碎；有人满面羞惭，冷冷地笑着，如同葬礼上偷偷乐的小孩子；有人哀求经纪人助理，想知道美国和外国股市的最新行情；还有人一动不动地坐着，似乎吓得呆若木鸡，眼睛直勾勾地盯着显示牌上不断变换的数字，那些看上去无辜的数字意味着多年的希望都化为了泡影：

从大繁荣 到大萧条

GLAWWJMP

8. 7. 5. 2. 1. 90. 89. 7. 6. 3. 21/2. 2. 6. 5. 3. 2 1/2.

过了中午的几分钟之后，十分警惕的民众聚集在纽约证交所外的大街上，他们这时还不知道，大牛市往日的拥护者，四海皆知的查尔斯·米切尔，已经悄无声息地溜到了对面街角的摩根公司大楼里。摩根大楼在华尔街爆炸案中受到了炸弹袭击，而今过去了九年时间；摩根公司的主人眼下正面临着一场截然不同的灾难。紧随米切尔之后的是大通国民银行总裁阿尔伯特·威金（Albert H. Wiggin），担保信托公司总裁威廉·波特（William Potter），还有银行家信托公司总裁苏沃德·普罗塞（Seward Prosser）。他们前来和摩根公司的合伙人托马斯·拉蒙特（Thomas W. Lamont）进行会晤。五位银行家和第一国民银行的董事小乔治·贝克（George F. Baker, Jr.）经过几分钟的协商后，为了支持股市，同意代表各自的公司分别出资4 000万美元，这样一共筹集了2.4亿美元的资金。拉蒙特后来解释说，这笔资金并不是一定要把股价维持在特定水平，而是在必要的时候买进股票，保持股市交易有序进行。他们认为，首先应稳定几只龙头股的价格，作为带动整个股市的走向的领头羊。这是个冒险的计划，因为谁也说不准，随着恐慌情绪的蔓延，还会有什么样的灾难降临。但是除了孤注一掷，他们也别无对策。

银行家开始四处行动。拉蒙特在摩根公司的办公室里接受了一群记者的采访。他的表情异常严肃，不过言辞令人欣慰。他开口说的第一句话可以称为有史以来最为令人瞩目的保守言论。他说：“我们几家金融机构的负责人已经召开会议讨论纽约证交所有低价抛售的趋势。我们认为股市没有什么问题，经纪人报告显示股票保证金维持不变，令人满意。”他接着把刚刚发生的事情归因于“股市的技术状况”，而不是基本层面因素。

随着银行家召开会议的消息传到纽约证交所的交易大厅，股价开始变得平稳起来，随后出现小幅度回升。钢铁公司股价反弹到当天早上的开盘价。但是银行家对苦苦挣扎的大牛市的贡献，只有摩根公司合伙人那番安慰的话语。

下午1点半左右，纽约证交所副总裁理查德·惠特尼（Richard Whitney）出现在交易大厅。他通常充当摩根公司的场内交易人，此时他走到了钢铁交易柜台前，出价205美元——以当天最后一笔交易的成交价买进1万股美国钢铁公司的股票。实际上他只买进了200股，将剩下的订单交给了专业经纪人。惠特尼继续来到其他交易柜台，同样以最后一笔交易的成交价下单，买下了1万股15~20只其他股票，每次他都进行报价，把其他订单留给专业经纪人。短短几分钟里，惠特尼已经买进了价值高达2 000万到3 000万美元的股票。这样数额巨大的交易不是随便什么人都能办到的，惠特尼显然动用了银行家们筹集的资金。

孤注一掷的措施果然有了效果。股市表面上重拾信心。股价在一段时间内维持平稳的态势；尽管收盘前的一个小时，许多股票价格再次下跌，但是当天的最后结果本来会更糟糕。周三收盘时，美国钢铁公司股价实际上涨2美元，大多数龙头股经过全天交易后，股价跌幅还不到10美元。

尽管如此，这一天还是让人毛骨悚然。晚上7点，上千位股票经纪人办公室里的股票价格收报机还在嗒嗒作响；到了7点8分，股票价格收报机才打出来下午3点钟交易大厅的最后一笔交易。全天交易量达到1 289.465万股，创下历史新高。（“总有一天我们会看到单日交易量达到500万股”，这可是华尔街的英明智者在20个月以前的预言！）当天下午，令人难以相信的流言四处蔓延：11个投机商自杀，布法罗和芝加哥交易所已经关闭，军队被调集到纽约证交所之外，与愤怒的暴徒相互对峙。美国已经尝到了恐慌的痛

从大繁荣 到大萧条

苦滋味。尽管银行家投入资金，暂时阻止了股市彻底崩盘，但无法否认的是，经济体系已经全面崩溃。

四

星期五和星期六，股市似乎出现了好转趋势。交易量依然维持着巨大的规模，但是股价大多走势稳定。就在银行家谨慎地大量抛售周四动用资金买进的股票，准备应对未来紧急状况的时候，高价卖出股票的交易者希望股市已经触底，便再次置身于股市之中，买进新股。（不是常常有人对他们说“股市看上去最绝望的时刻就是买进的最好的机会”吗？）在报纸上，身居高位的大人物发表了一系列让人宽心的声明；连赫伯特·胡佛本人都在白宫声称：“全国的基本商业，即商品的生产与销售，都立足于健康和繁荣的基础之上。”但是，到了周六股市收盘时，股价再次下滑。

周一的损失非常严重：美国钢铁公司股价下跌17.5美元，通用电气公司股价下跌47.5美元，联合化学漂染公司股价下跌36美元，西屋电器公司股价下跌34.5美元，后面还有一长串让人沮丧不已的公司名单。从星期六下午和晚上到星期天，经纪人都在忙着做交易记录，检查客户的账目，寄出保证金催缴单，由此引发了新一轮被迫抛售的狂潮。惠特尼在周四大量买进，稳定了龙头股的价格，但是股价随后打破支撑位。显而易见的是，银行家的资金采取了战略性撤退。实际上，经纪人手里持有的股票已经“四处漏风”，换句话说，许多股票只有卖单，根本没有买家出手接盘。就算采取了明智的对策，仍然无力回天。6位知名银行家也很难阻止全美各地清盘的热浪。他们只能对股市略加干涉，暂时到处巡察一番。

更荒唐的是，股票价格收报机再次滞后于市场行情，经纪人办公室和银行大楼的灯彻夜长明，电报公司发出了数千份保证金催缴单，要求追加

抵押来支撑银行贷款。银行家、经纪人、办事员、信差已经精疲力竭；多少个白天与黑夜，他们一直面对铺天盖地的巨大交易量，强打精神跟上股市交易的速度。现在看来，他们也撑不了多长时间。然而最可怕的情形就在当下，第二天大祸临头了，那是10月29日，星期二。

周二上午10点，纽约证交所大厅里的开盘钟声刚刚响起，就出现了暴风骤雨般的抛售狂潮。不论价格如何，人们纷纷向市场抛售数额巨大的股票。股票价格收报机忙个不停，显示的交易量高达5 000股、10 000股，但是股价却低得吓人。抛售股票的不仅有数不胜数的小交易者，还有大交易商，这些新经济时代的领军人物几周前还有百万美元的财富。股票专家被急于抛售股票的经纪人围在中间，此时根本没有人打算买进。举个简单的例子：在大牛市期间，怀特缝纫机公司的普通股股价曾经高达48美元；到了10月28日星期一，该公司股价收于11.125美元。有传言说，在这个被称作“黑色星期二”的日子里，纽约证交所有个聪明的信差，突然灵光一闪，决定下单以1美元的价格买进一批股票。因为暂时没有人出价，他竟然真的以每股1美元的价格买进了这批股票！交易大厅的场景混乱之极。尽管通信系统严重堵塞，买卖股票的订单（主要是卖单）涌入的速度还是很快，让人们根本来不及处理它们；那天股市在收盘的时候，一位疲惫不堪的交易员才发现，旁边的废纸篓里面塞满了本应处理的委托单，他原本是为了安全起见，小心地放在一旁，没想到却将它们忘得一干二净。当天开盘半小时内，股市交易量已经超过300万股；到了中午12点，交易量突破800万股；下午1点30分，交易量达到1 200万股；当收盘钟声敲响后，一天的疯狂场面结束之时，交易量创下了1 641.003万股的历史新高。收盘时，股价有所反弹，但是综合50家工业个股的《纽约时报》平均指数下跌近40点。与此同时，其他市场——如境外证券交易所、规模较小的证券

从大繁荣 到大萧条

交易所和粮食市场，也出现类似恐慌的局面。

股市彻底崩溃，经纪人、职员和证交所的员工都失魂落魄。当天中午，在股市恐慌最严重的时候，纽约证券交易所管理委员会悄悄地召开了会议，讨论是否将证交所关闭。理查德·惠特尼在几个月之后回忆道：“为了不传出扰乱人心的谣言，这次会议没有在管理委员会会议室召开，而是转到了证交所交易大厅下面的股票结算公司总裁办公室。40位管理委员会成员零零散散地来到这里，尽量不引起别人的注意。他们举行会议的办公室从来没有召开过这样的大型会议，结果大多数与会者不得不站在一边，或者坐在桌子上。伴随着进行中的会议发生的，是楼上交易大厅里越来越浓的恐慌气氛。这些人吸烟的样子把自己的心情暴露得淋漓尽致，他们点起香烟，猛抽一两口就摁灭了，然后再点一支。不到一会儿，这间狭窄的办公室里就烟雾弥漫。”两位摩根公司的合伙人受邀参加这次会议进证交所大楼，他们打算悄悄溜进来，避免引人注目，导致新一轮的谣言的出现。不料他们被一名警卫拒之门外，直到管理委员会的成员出来解围才得以进入。经过充分考虑之后，管理委员会最终决定暂时不关闭证交所。

10月29日，星期二，这一天对银行来说至关重要。许多企业曾经为了8%~9%的利息，极其兴奋地通过银行把资金借给经纪人，如今叫嚷着要把贷款收回去。银行面临两难的境地，要么自己承担贷款，要么担负股价暴跌的风险。承担价值几百万美元的抵押贷款，这绝不是容易办到的事，到头来这些抵押品的价值可能只剩下从前的一个零头。当天的短期拆借利率没有高于6%，资金恐慌并没有加剧股市的恐慌，几家华尔街金融机构也没有立即倒闭，主要是因为有几位银行家勇敢地挺身而出。据说有位银行家不断签署文件，承担了一笔又一笔贷款，直到有位吓得脸色发白的下属告

诉他，银行已经没有偿还能力了。但是银行家仍然面不改色地说：“我也这么想。”他心里知道，如果不这么做，许多公司都要面临资不抵债的困境。

到了第二天——10月30日，星期二——股市突然幸运地放晴了。美国钢铁公司公布了发放额外股息的计划；美国制罐公司不仅宣布发放额外股息，还提高了固定股息。各界人士发表了新一轮抚慰人心的声明，尽管人们听到金融家欢欣鼓舞的言论，不免疑窦丛生。胡佛总统的商务部副部长朱利叶斯·克莱因（Julius Klein）对经济繁荣的美好景象大加称颂。约翰·拉斯科布宣称，眼下的股价非常合算，他和他的朋友都在买进股票。标准石油公司的创办人约翰·戴维森·洛克菲勒出面平息风波，他表示：“我相信国家的基本经济形势是健康的，目前的经济状况，不足以导致上周证券交易市场出现的股市下跌，几天来，我和我的儿子一直买入表现稳定的普通股。”更让人欣慰的是，股价平稳上升，富有活力。现在，证交所的紧张气氛终于有所缓解，没有引发人们过度恐慌的情绪。下午1点40分，证交所副总裁惠特尼登上主席台宣布，到第二天中午以前交易所不会开市，星期五和星期六两天休市，他的声明受到热烈的支持，而不是新一轮恐慌，这让他长长地松了一口气。

周四股市开盘只有短短几个小时，股市持续反弹。股价不断变化，固有的价值标准已经被颠覆，谁还能合理评价股票的价值呢？但是，这场可怕的狂风暴雨看上去已经趋于平静。金融界松了一口气，现在他们有了对金融机构进行整顿的机会。

的确，极端恐慌的时期已经过去。但是，股价还没有跌到谷底。经纪人逐渐清理账户，被迫进行清盘。银行要求追加更多抵押，这再度引发了恐慌的情绪。第二周，开盘后经过短暂的时间，股价延续了下跌态势，直

从大繁荣 到大萧条

到11月13日创下了1929年全年新低。下面的第一列是1929年9月份阳光明媚时的股价，旁边就是股市崩盘之后的悲惨行情：

| 上市公司 | 1929年9月3日最高价
/美元 | 1929年11月13日最低价
/美元 |
|------------|---------------------|-----------------------|
| 美国制罐子公司 | 181.875 | 86 |
| 美国电话电报公司 | 304 | 197.25 |
| 阿纳康达铜业公司 | 131.5 | 70 |
| 电气债券股份有限公司 | 186.75 | 50.25 |
| 通用电气公司 | 396.25 | 168.125 |
| 通用汽车公司 | 72.75 | 36 |
| 蒙哥马利—沃德公司 | 137.875 | 49.25 |
| 纽约中央铁路公司 | 256.375 | 160 |
| 美国无线电公司 | 101 | 28 |
| 联合碳化物公司 | 137.875 | 59 |
| 美国钢铁公司 | 261.75 | 150 |
| 西屋电器公司 | 289.875 | 102.625 |
| 沃尔沃斯公司 | 100.375 | 52.25 |

《纽约时报》综合50家工业个股的平均指数下跌近一半，从8月份311.90点的高位，降至11月13日的164.43点；《时报时代》综合25家工业个股的平均指数跌幅更大，从469.49点暴跌到220.95点。

大牛市就此终止，数十亿美元的利润（还有账面利润）不见踪影。杂货商、清洁工和女裁缝纷纷破产。每一座城市里，都有显赫富贵的人家

转瞬间负债累累。曾经梦想着依靠财富安稳地度过余生的投资者，猛然间发现他们回到了漫长致富道路的起点。报纸上天天都在刊登自杀惨死的新闻。

柯立芝—胡佛繁荣时代还没有就此终结，但是已经苟延残喘。在股市恐慌的打击下，美国经济受到很多问题的困扰。这些问题从前不是被人忽视，就是被股市的乐观情绪掩饰着，如同人的重要器官不能正常工作，病毒就会慢慢侵入身体一样。尽管有30亿美元的经纪人贷款遭到清盘，信贷金额有所减少，美联储下调再贴现利率，美国的大银行和大公司劫后余生，没有遭受重创，令人深受鼓舞，但是美国经济已经无药可救：资本过剩，企业扩张野心不切实际；在分期付款和股市利润的刺激下，商品生产过剩，许多商品价格水平被人为抬高，欧洲贸易形势低迷。无论有多少预见未来的金融巨头宣称经济状况良好，无论总统多么诚恳地以谦谦之语和召开白宫会议来尽力弥补损失，大萧条也不可避免。

繁荣不仅是经济形势，也是一种心理状态。大牛市不仅是商业周期的顶峰，也是美国民众的思想情感周期的顶峰。在这个国度，几乎每个人的生活态度都受到大牛市的影响，如今他们也感受着希望瞬间破灭的打击。随着大牛市和繁荣时代悄然消逝，美国人发现自己的生活环境发生了改变，需要进行新的调整，生成新的意识、新的思维习惯和新的价值观。社会心理气氛渐渐变化；美国人的生活随之改变，进入了新的轨道之中。

战后十年走到了尽头，一个时代就此终结。

FROM GREAT
P R O S P E R I T Y
TO GREAT DEPRESSION

第十四章 后记：1930年到1931年

要让整个国家承认柯立芝—胡佛繁荣的崩溃是无法避免的这个事实，难免会引来人们长时间的抗议。这枚实在难以下咽的果实，对共和党来说更加苦涩。他们早已忘了经济周期与政治策略毫不相干，误以为经济繁荣是共和党的功劳；赫伯特·胡佛更是满心苦闷，他还到处发誓，声称要消除贫困。

1929年10月和11月，股市到了崩溃的边缘，经济形势一落千丈，全国上下希望总统采取措施。只有立即出台相应对策，才能挽回公众的信心，防止灾难继续扩大。胡佛总统出身于商界，具有优秀的组织能力，历来善于对公众舆论进行引导；无论他在应对各界政治人物、处理纯粹政治上的问题方面有什么不妥，美国人都觉得，出现这样的突发性公共事件，他应该像社会上的其他人一样，知道解决的对策和处理方式。

果然，总统立即采取了行动，承诺削减税收，召集商界领袖们举行一系列会议，对于公众反对降低工资标准表达了自己的立场。他建议兴修公

共设施，来应对紧迫的就业萧条。他与幕僚们发表演说，坚定不移地宣称经济发展没有问题，日后定会有所改观，希望以此鼓舞商界低迷之态；他当时再三重申“经济形势基本良好”。1929年12月，胡佛总统在年度咨文中声称：“我坚信通过这些措施，公众的信心已经得以恢复。”1930年年初，财政部长梅隆预计：“经济活动会在今年春天回复活力。”2月，商务部长拉蒙特表示：“不必为目前的形势感到焦虑不安，我们有理由相信今年属于正常年份。”3月，拉蒙特给出了更明确的时间：他预计经济会在两个月之内恢复正常。几天后，总统亲自为政府承诺的经济复苏确定了期限：失业的影响将在今后60天内消失。胡佛总统新成立了全美商业调查委员会，委员会主席朱利叶斯·巴恩斯（Julius H. Barnes）一直不辞辛劳地为总统的乐观主义鼓掌助兴，他在3月16日表示：“1930年的春天，标志着经济萧条时期的结束……美国经济平稳恢复正常的繁荣发展。”仿佛经济困境已经不复存在。

从表面上看来，美国政府不仅阻止了工资水平大幅降低，还用库埃博士的绝招恢复了经济的健康发展。到1929年年底，美国经济水平跌到了低谷，300万人无家可归，而工业指标显示出转好的迹象。股市重新振作起来，再度上涨。普通股的诱惑力并没有消失；那些在恐慌中还没有失去全部家当的投机者，迫不及待地进入股市之中打算挽回损失。1930年的前三个月，出现了和大牛市似曾相识的小牛市。股市交易量和1929年明朗夏日的交易量基本持平。实际上，龙头股的价格已经拉高了股市崩盘的多半跌幅。有一段时期，华盛顿那些充满希望的预言家似乎说得很对，经济繁荣再度出现，股市可能会逐渐恢复活力，弥补1929年的惨痛损失。

但是到了4月，人们短暂的幻觉猛然间消逝得无影无踪。经济反应再次造成影响。等到总统和商务部长设定的60天期限结束时，商品价格日渐

从大繁荣 到大萧条

下跌，生产指数持续下降，股市出现一系列暴跌，希望一直没能实现，让美国人焦虑不安。库埃博士的绝招也无济于事：经济疾病不仅是暂时的神经衰弱，而是无药可救的器官病变。

华盛顿的医生们满面愁容，脸上挤出僵硬的笑容，接着背诵他们从《通过有意识的心理暗示进行自我控制》中学到的名言，将他们的治疗过程呈现在大庭广众之下，如果中途更改处方，免不了陷入尴尬的境地。5月初，胡佛总统表示，他坚信“我们已经度过了最困难的时期，只要我们共同努力，经济很快就能振兴起来”。5月8日，美联储主席承认，美国“看上去已经陷入了经济萧条之中”。（别当作看不见了——工厂接连倒闭，股价一路下滑，领救济的人在大街上排着长队！）但是华盛顿似乎没有人愿意面对这残酷的现实。5月28日，有报道称胡佛总统预计，到了秋天经济就能恢复正常。这幕冷酷的滑稽戏继续上演着，医生们对病人说着宽心的话，病人就当真了，病情却日益加重。最后到头来，每次只要有人发表经济形势乐观的讲话，市场就会出现新一轮下跌。等到病人濒临死去的那一刻，医生备感受辱的时候，政府才闭上了自己的嘴巴。

美国经济到底患上了什么样的毛病？让我们从以下几个方面逐一举例说明。

资本与商品的过剩。20世纪20年代，美国工业机械化程度提高，大规模生产的能力超过此前水平。在1928年到1929年的牛市期间，分期付款的方式和股市获得的利润暂时提高了美国人民的购买力，无数家公司兴奋无比地扩大生产规模；美国加快了工业资本化的进程，银行信贷日益扩张。等到股市利润完全消失，无处寻找分期付款的新买家，男女老少都暗自思忖，怎么支付汽车、收音机和家具的下一笔欠款，制造商不得已让自己生产力过剩的宽敞的工厂减少生产，最终变得无钱可赚，只有等待购买力慢

慢恢复。

人为操纵商品价格。正如戴维·弗莱德（David Friday）所言，在1929年，联营形式把许多商品的价格维持在较高位置。比如说，铜和棉花的联营；加拿大的小麦联营，巴西的咖啡联营，古巴的原糖联营，澳大利亚的羊毛联营。这些商品联营由于操纵商品价格，导致生产过剩，这种情形隐藏着越久就越危险。商品囤积的速度和消费的速度完全不成比例，最终联营形式不能够再支撑市场，当灾难之日到来，商品价格随即狂跌。

银价暴跌，部分原因是几个国家恢复金本位制，导致实行银本位的东方国家丧失了购买力。

国际金融秩序混乱，主要原因是大量黄金流入法国和美国。

外国局势动荡。随着国际越来越严重的经济萧条，战争造成的政治混乱和经济混乱浮出水面；1914年到1918年的战乱让人们自讨苦吃。在世界各地，都出现了革命和革命的威胁，平添了动荡恐慌的气氛，连带危及了美国的海外投资。

大萧条本身产生的影响。每家公司的破产、停付和减少生产都会影响到其他企业，商业界犹如打保龄球游戏，每个瓶子倒下时会碰倒其他瓶子；每个失业的员工都减少了全国潜在的购买力。

最后一点，1929年经济繁荣的深层心理反应。从根本上来说，经济周期也许是一种心理现象。只有等到艰难世道的记忆黯淡下去，人们才能完全重塑信心；只有信心膨胀到无所顾虑的地步，才会就此终止。对胡佛总统而言，要想阻止人们的“心理钟摆”向下坠落，其难度就像当初美联储阻止钟摆向上飞扬一样大。胡佛总统的乐观举措到头来毫无价值，此后的情景让人看了非常伤心。商品价格大幅下跌到令人震惊的地步。比如说，小麦的价格：1929年年末，芝加哥的冬小麦价格为1.35美元，而一年后仅

从大繁荣 到大萧条

有76美分。在此期间，春小麦的价格从1.37美元下跌至61美分。联邦农业局局长理雅各意识到，此次价格下滑会使小麦产区损失惨重；而他在上任之初，就承担起“防止和调控任何农产品过剩”的重任。于是联邦农业局在小麦价格暴跌的时候大量收购小麦，打算以此来稳定价格。不过，他们的收获主要是囤积了大量的小麦，与其举措相互冲突的不是《农产品销售法》，而是一条古老的法则——供求规律。等到一切烟消云散后，联邦农业局手里堆积了200万蒲式耳^①的小麦，而小麦价格已经一落千丈。理雅各的继任者宣称联邦农业局的收购计划让数百家向小麦提供贷款的银行免于倒闭，但此举并没有给饱经苦难的农民带来哪怕一丁点安慰。1930年夏天，严重的旱灾使许多地区的萧条更加严重。农民再次笼罩在可怕的命运之中。他们在柯立芝繁荣时代得到了有限的收益，却在1930年到1931年的那场噩梦中损失惨重。

与此同时，工业产值逐渐下滑。到了1930年年底，经济水平比正常年份降低了28%。股价在1930年夏天小幅回升后，在9月份急剧下滑，到了12月，股市经过一系列震荡清盘，股价已经远远低于1929年恐慌之后的水平。唉，这倒霉的大牛市！无线电公司的股价曾经在1928年和1929年达到举世瞩目的光明之巅，如今下滑之势又不可阻挡，早就跌破了三年前的发行价；还有许多股票的下跌幅度更大，惨不忍睹。经纪人贷款的数额急剧减少，交易账户不断注销。经纪人在亲朋好友的眼里，再也不是非凡的神奇人物；他温和机敏地应对着眼下的情形，就算时机不对地提到股市，别人也不会感到如鲠在喉。几家经纪公司遭受重创；大牛市期间建立的投资信托公司毫无保障，接连倒闭，欺诈作为原始目的被暴露在众目睽睽之下；在1930年，有1 000多家银行破产，导致房地产市场和股市双双受挫；12月，出现了美国金融史上最大的银行破产案，身败名裂的纽约

^①1蒲式耳（美制）=35.238升。

美国银行倒闭。美国失业率持续上升，到1930年年底，失业人数达到600万人左右；卖苹果的小贩站在寒风刺骨的街角，公司经理、职员和工人整夜无法安睡，不知道自己何时在街头流浪，无比焦虑地为失业基金投入大量钱财。在百老汇大街上，有家剧院即将放映查理·卓别林的电影《城市之光》，门外排起了长队。流浪汉看见这副情景，走上前来关心地问道：“这是在做什么，排队领救济还是银行要破产？”

在1931年年初，经济出现了一丝好转的迹象，萎靡不振的股市重现生机；到了3月，朦胧的曙光好像昙花一现，这年春天经济出现新一轮下滑。工业产值再度减少，商品价格持续下降，股价下跌到低谷，相比之下，1929年11月出现恐慌的股价水平简直无法企及。公司宣布下调或取消股息，破产倒闭接踵而来，人们失望的情绪越来越浓烈。难道股市永远都不会有跌到谷底的时候吗？

1929年绚烂的景象还没有彻底消散，值得一提的是，在1930年，持有大公司普通股的股东人数有所增加。投资者信心坚定地盼望着，股市总有一天会有转机的时刻。为了等待那个时候的来临，他们依然坚守在股市之中。然而股价接连下跌，经济萧条似乎永无止境，真叫他们伤心至极。1930年12月，《世界晚报》在纽约的各家报纸上附送了一则广告，上面写道：“无数民众，无论是商人还是工人，都渴望听到空穴来风的传言，而这些传言摧毁了人们的信心，营造出互不信任的氛围。在大街小巷和商品市场，这种虚幻的恐惧感使人们备受伤害，给社会造成威胁。人们都是受到大众心理的影响，才会感到惶恐不安。”

“大众心理”！在大牛市的日子，也是大众心理起着作用。如今有了作用力和反作用力的关系，这幅图画才算完整了。

两年前，胡佛在竞选总统时宣称要消除贫困，他小心地补充了几个

从大繁荣 到大萧条

词：“如果上帝保佑。”眼下在胡佛看来，上帝似乎和他开了一个既残酷，又有讽刺意味的玩笑。和当初比利时遭到侵略相比，胡佛总统更难摆脱20世纪20年代美国经济希望破灭的责任；他因比利时的救济工作而扬名海外，理所应当响应召唤来解救美国人民——他把消除贫困说得那么轻松，可民众却无法摆脱贫困的束缚。胡佛是才能出众的经济学家，也是处理公共危机的优秀领导者。阅历丰富的美国商人此前与胡佛一样，不相信经济萧条会长久地折磨着人们；然而等到美国经济走上毁灭之路时，这些商人就把自己的乐观主义抛到脑后，转过头来指责总统缺乏远见，毫无领导才能可言，不具备基本的经济常识。这些商人的言论不必被人铭记于心，可总统的发言却让人们难以忘却；这些商人不必承担重现经济繁荣的期望，可总统却被人们寄予厚望。到了1931年春天，胡佛总统的声望与当时的股价和利润一样，创下新低，民主党人满怀希望地憧憬1932年的到来，准备为当年11月总统大选的获胜鼓掌欢呼。卡尔文·柯立芝察觉到胡佛的艰难处境，在北安普顿的隐居宅邸里每天写下200字的文章，笔下既有嘲讽，也有吹捧。柯立芝心里肯定暗自庆幸，感慨自己没有参加1928年的总统选举；史密斯州长必定深有同感，庆幸自己恰好错过了那班开往断桥尽头的火车。毫无疑问，这届政府的乐观言论过于热烈，而胡佛平生最大的错误就是，他根本不该当选1928年到1932年的这届美国总统。

实际上，大牛市以来发生的一切，绝不仅是股价和生产的周期性下跌，而是国民经济的重大变化。然而，在情况最恶劣的时候，也还有令人振奋的迹象：比如，没有出现劳资双方的激烈冲突，当银行大厦将倾之时，美国联邦储备体系能够阻止货币恐慌。毫无疑问，美国最终还会出现经济繁荣的景象，但是无法同20世纪20年代的繁华岁月相媲美；经济繁荣无疑会立足于不同的基础，热衷于不同的行业，激发起不同的热情和疯

狂。恐慌已经为美国经济史的这一章画上了句号。

二

随着20世纪30年代的到来，美国也出现了许多变化的迹象。有些迹象在恐慌之前就有所显现，有些迹象在此后才衍生出来；但是，这些迹象都反映出美国精神和美国生活方式的显著变化。

当你在美国城市和乡镇的大街上漫步时，必然会注意到这些变化，比如在女装的样式上，随着股价的下跌，裙子的长度也有所下降，女性白天穿的裙子略长了几英寸，晚礼服则是曳地长裙。及膝短裙的拥护者的抗议声震天，结果新款长裙还是出尽风头。波波头渐渐过时，花边、荷叶边、绉纱卷边再次流行起来，这使紧身胸衣的制造商心花怒放。礼节规矩逐渐恢复旧时的风貌：男士们戴着长长的白手套，头戴丝质礼帽，身穿燕尾服。这些变化并不是服装厂商和时装设计师突然出现的想法所导致的。服装厂商和时装设计师虽然会公布流行趋势，但是只有公众心甘情愿的追随才能改变流行时尚。早在20世纪20年代，服装业不是使尽一切手段推销长裙吗？到头来还是白费力气。1930年到1931年间流行的长裙花边和白手套体现了男女关系的微妙变化。美国女性的理想形象不再是胸部扁平、双腿细长、无忧无虑、穿着低腰外套的清纯幼稚的少女，满腔热情的小伙子也不再受欢迎。1930年和1931年的时装广告描绘了一幅与之前完全不一样的场景，人们举止优雅、活泼开朗、魅力十足，高雅浪漫可能再度风行。

时尚流行的趋势可以通过各种论据得到证实。至少，道德教化的革命已经宣布休战。

然而，并不是20世纪20年代的旧习俗全部卷土重来。如今，步入中年的“年青一代”并没有扔掉当初时所竭力争取的自由。很难发现人们在运

从大繁荣 到大萧条

用自由方面有多少实质的变化。那种打破传统禁忌、颠覆道德观和离经叛道的激动情绪烟消云散。罪恶的代价渐渐不值一提，在某种程度上，人们对性的偏好已经一去不复返，而这正是战后十年的特点。色情书籍和两性话题也成了过剩的产品。1930年年末，作家罗伯特·本奇利（Robert Benchley）在《纽约客》杂志戏剧版上发表文章，表达了公众的观点：

“我打算郑重声明，我再也不想听人提起那些令人厌倦的与性有关的和旧房贷一样的戏剧题材。我烦透了叛逆的年轻人，我厌倦了维多利亚式的家长，我不在乎美国各地的小姑娘到底是遭到诱骗、自甘堕落还是保持贞操。我只想说，别再写这种题材的剧本了，也别指望我有耐心看完。”

显而易见，许多戏剧观众和读者和本奇利感同身受。戏剧评论家乔治·琼·纳森（George Jean Nathan）写道，百老汇最近出现了一批罗曼蒂克、充满诗意的剧作家，“愤世嫉俗的戏剧和文学风格显然渐渐没落下去”。亨利·赛德尔·坎比（Henry Seidel Canby）在《星期六文学评论》上撰写的文章，也得出了相同的结论。人们重新拾起沉默是金的美德，在战后十年结束前，百老汇上演了舞台剧《旅途终点》，这部戏真实地刻画了战争，没有亵渎神灵的情节，也没有烟花女子的亮相，获得了观众的喝彩，大快人心。《旅途终点》和《光荣何价》形成了鲜明对比，显示出大众品味的变化。《好伙伴》《天使街》和《水上吉卜赛人》等小说大获成功，也许是这种变化的进一步证明。凡事总有例外，这足以提醒人们，简单的概括并不可靠，不过有两条结论是确切的：性不再是头版新闻，优雅迷人开始盛行。

同样，人们不敢确定，体现维多利亚风格和19世纪90年代特色的东西会遭到现代人的笑。收藏家不再用蔑视的目光打量维多利亚式的家具；那些阅读《紫红色十年》和揭露真相传记的人，以前说起战前的旧习俗，

不免带着谦卑恭顺的神气，仅仅几年之后，他们就用艳羡的眼神看待威廉·吉尔特饰演的夏洛克·福尔摩斯（Sherlock Halmes），以及《甜蜜的艾德琳》里19世纪90年代的浪漫感伤。

20世纪30年代的年轻人对生活的了解，和20年代早期的年轻人不相上下，但是他们没有那么张扬，并不愿意向世人展示他们的早熟。拉马尔·沃里克（Lamar Warrick）在中西部的一所大学任教，她在1930年秋天的《哈泼斯杂志》上写道，阿道司·赫胥黎的生物小说，约翰·沃森（John B. Watson）的生物心理学和伯特兰·罗素的生物哲学，在她班上的学生中间很快成了过时之物。她发现，新的年青一代已经厌倦了所谓的“现代主义”，有个学生说“现代主义让你到了30岁就身心疲惫，牢骚满腹”。

《得梅因周日记事报》的一位记者为了证实沃里克太太的观点，询问了艾奥瓦州三所大学的多位教授和学生，大多数接受采访的人都告诉他，不仅在艾奥瓦州存在着沃里克太太的观点，在伊利诺伊州也一样。有位艾奥瓦州的大学学生说，他就读的大学里已经没有一个“时髦女郎”可以和“五年前那些身穿豹纹外套、开着名贵跑车、到处招惹是非的姑娘”相提并论。招惹是非似乎多半出自人类暴躁的本性；但是这些见证可以表明，炫耀张狂的人性不一定要像时髦女郎盛行的时代一样，弄得人尽皆知。

精英们的反抗已经偃旗息鼓。亨利·路易斯·门肯的高声呼吁不再能震动全国，从普罗温斯敦传到好莱坞。那些一直抨击乔治·巴比特式庸人和标准化危害的人，也开始感到厌倦。许多狂妄不羁的精英们暗自奇怪，生活是否真的如他们所料，是一场荒唐而又可怕的闹剧吗？虚无的哲学主题和文学题材已经不再演绎出什么来。海明威在1926年前后侨居蒙帕纳斯，被年轻人看作洞察万物的先知，然而在1929年年底出版的《永别了，武器》里，他改变了写作风格，流露出浪漫的一面；这本小说没有充斥浅

从大繁荣 到大萧条

薄的情感，而是描写了真挚的爱情，具有非凡的价值观，可约瑟夫·伍德·克鲁奇对这种价值观的未来感到绝望。1931年，刘易斯·芒福德（Lewis Mumford）声称，克鲁奇应该意识到，文明一直在蜕变着，并不会被人消灭干净；芒福德代表20世纪30年代的年轻精英们宣布：“失败的情绪已经不复存在，我们没有低头认输，就像惠特曼诗里的小船长一样，我们会不约而同地说：我们还没有开始战斗。”再说，简单的概括也不可靠；人们不禁怀疑，知识界的代表在谈到1925年的反抗斗争时，能否代表他那些紧跟时代的同行的意见。1925年风行的并不是旺盛的斗志，而是面对失败保持沉默的优雅风度。如今，精英们幻想破灭的情绪已经消失，他们身上那件失望之裳渐渐磨出了破洞。

宗教是否重塑往日的威信，倒还是问题。1930年，美国所有教会的净收益率仅有千分之一，创下1890年卡罗兰（H. K. Carroll）博士进行年度汇编以来的最少利润。不过，宗教场景已经全然不同。原教旨主义者和现代主义者厌倦了两派的没完没了的争执。代顿小镇审判案已经是家喻户晓的旧事。科学的声音似乎不再发号施令，义正词严地否定世间存在的精神价值。爱丁顿和吉恩斯的读者认为，在科学唯物主义的严谨体系里也存在空白，现代主义者牧师连忙解释道，这个空白足以让人承认上帝的存在，他们的观点没有遭到严厉的反驳，仅仅是因为这套新的科学理论晦涩难懂，持续多年的争论令人厌倦。哲学的声音曾经振聋发聩、令人晕眩，如今却威信扫地；很明显的是，无论是弗洛伊德还是沃森，对于人性的所有问题都没有正确的结论，心理学家之间的争执丝毫不逊色于民主党人间的矛盾。20世纪20年代渐渐远去，20世纪30年代悄然降临，那些留心大学宗教生活的人开始怀疑，不可知论者是否有减少的趋势，然而，他们发现人们的态度有所变化：对任何宗教心存抵触情绪的青年男女越来越少，就算

不相信宗教的人也有希望找到积极并丰富地诠释生活的依据的普遍愿望。这种趋势在大学里真切地存在着，在全美各地也一样流行起来：尽管教会很难占据优势地位，宗教影响已经日益衰落。如同道德教化一样，宗教也显露出稳定的迹象，立足于不同的基础。这些改变能否持续下去，人们还要看时间的验证。

美国大众像往常一样深深地被时代的潮流影响着。从1929年秋天开始，到了每天晚上7点钟，就有几百万台收音机准时响起，传出喜剧演员弗里曼·费舍尔·戈斯登（Freeman F. Golden）和查尔斯·詹姆斯·科雷尔（Charles J. Correll）的声音，两人以情景喜剧《阿莫斯和安迪》而尽人皆知。“我烦透了”和“仔细检查一下”已经成了人们平常的口头禅；安迪在餐厅遇到的麻烦和奎恩太太在人们心里的地位，仅次于经济起伏和股市动荡。1930年9月，美国商务部公布了一项显现出繁荣经济的数据：有3万个小型高尔夫球场投入使用，总计投资了1.25亿美元，许多高尔夫球场每月赢利为300%。在1930年的夏天，如果说美国人什么都没有买的话也不尽然，他们至少买下了用球杆打高尔夫球的权利。

但是，在20世纪20年代那些获得巨大成功的宣传手段已经失去了昔日的光彩。伯德上将飞往南极探险的经历，使他在美国民众眼里成了仅次于林德伯格的英雄。但是现在许多人却对此感到厌倦：尽管伯德的这番南极历险勇敢无畏，但是经过精心策划和报业集团的报道，这一壮举被宣传过度，失去了原有的光彩。在伯德飞抵南极后几个月，法国人科斯塔（Coste）和贝龙特（Bellonte）首次成功不着陆飞越大西洋；但是到了1930年年底，知道科斯塔和贝龙特的美国人比记得老将鲁斯的人还少。此时，航空英雄已经不再稀奇。飞行员日复一日地在空中盘旋，创造新的纪录，但是观看的人群越来越少，头条新闻的利润越来越低，他们的收入也

从大繁荣 到大萧条

越来越微薄了。说到曾经在20年代坐旗杆的西普雷克·凯利，据报道称因为他再也得不到人们的关注，在1930年他从派拉蒙大楼的顶端纵身跃下。还记得泳装选美比赛吗？亚特兰大市在1927年已经停办了一年一度的选美大赛。在整个1930年，没有举国都关注的谋杀案审判，没有轰动一时的拳击赛，也没有捧得桂冠的伟大的体育明星。

确实，那个辉煌的体育时代已经离我们越来越远。曾经名震一时的里卡德，组织过两场重量级拳击比赛，获得了高达250万美元的门票收入，如今黯然辞世；拳击运动再度声名狼藉。邓普希悄然隐退，唐尼转攻莎士比亚。鲁斯依然刻苦训练本垒打，不过鲍比·琼斯和蒂尔登转战职业赛场。20世纪20年代最伟大的橄榄球教练纽特·罗克尼不幸死于空难，美国总统对此深表遗憾。随着格罗夫·华伦离开政坛，就职于纽约沃纳梅克百货公司，曾经是大肆炒作源头的纽约城，失去了当初欢迎英雄归国的耀眼光芒；在1930年，已经很少有人把碎纸片和电话号码本撒向百老汇大道，也许是艰难时世导致了英雄的没落。但是，炒作的大好时光离我们远去。毕竟时代已经改变了。

战后美国公众却依然没有改变对政治活动和政治事件的冷漠态度。在1929年秋天，英国首相拉姆赛·麦克唐纳访问美国，他表达出和平友善的意愿，受到了热情的欢迎，这些场景不禁让人联想起伍德罗·威尔逊总统的用心良苦的教导。有一段时间，理想主义卷土重来，仿佛回到了美国恢复常态以前的时代。这种情绪持续了很长时间，削减和限制海军军备的《伦敦条约》在参议院顺利通过，这多半要归功于胡佛总统和国务卿史汀生；然而，仇世、沮丧的情绪依然占据着优势地位。芝加哥出现了恶名远扬的汤普森冲锋枪，纽约的坦慕尼协会也卷入了丑闻之中，引发人们的不满；在1931年的夏天，公众的普遍心态是：“努力奋斗又有什么用呢？”

敲诈勒索像野草一样肆虐，私酒商贩、禁酒问题层出不穷。

如果说这个国家依然对政界和政治家不抱有任何期许，对黑帮又轻易认栽、视若无睹，那么比起柯立芝繁荣时代来，他们对自由放任的经济政策更加不满。在1930年到1931年的经济大萧条期间，公众的态度和以往的经济衰退形成了鲜明对比。站在肥皂箱上振臂高呼的激进分子，远远没有红色大恐慌时期那么可怕。共产主义宣传没有什么惊天动地的变化，总体看来，公众基本上不关注这些事情。也许是因为经济危机时期，许多大老板谋划已久，尽可能降低工资水平，减少工作时间，而不是解雇员工；另一方面是因为在大牛市期间，激进分子在股市中吸收了教训，遵循财务保守的原则。人们很自然地认为，奉行个人主义的资本主义出现了问题，必须加以纠正：正是现有的经济制度让几百万家庭陷入吃不饱穿不暖的深渊，除此之外难道还有别的原因吗？

人们对苏联的社会实践重新产生了兴趣，其中不免夹杂着一丝冷静的敬畏。在股市恐慌的那个月，莫里斯·辛杜斯（Maurice Hindus）的《剖析人性》得以出版，这本书起初无人问津，不料到了1930年阴冷的秋天，它竟然成了畅销书。在1929年的夏天，苏联还像中国一样遥远；可到了1931年，随着大街上排起领救济的长队，苏联的五年计划成为焦虑的美国人最为关心的话题。工业生产停滞的时间越长——拖得也太长了！——人们对美国经济计划措施的需要就越迫切。这些措施会防止灾难再次发生，免得让那些渎职贪污的官僚机构独掌大权。

随着经济繁荣的全面复苏，这种需求毫无疑问会渐渐消失；人们不可避免地越来越趋于集权主义，虽然这种趋势在自我吹嘘的辉煌的20世纪20年代猛然中断，可如今有望再度归来。尽管美国人对国家社会主义以及与其的相关联想深感憎恶，但不容否认的是，经济体制本身非常复杂，机器

从大繁荣 到大萧条

生产有着惊人的依然难以掌控的威力。也许最大的困难就是，如何找到合适的个人或团体，他们的聪明智慧足以对国家施加约束，有足够的说服力控制局面。过去数年来的经验没有得到确凿的证据，显示金融家和经济学家能够判断国家经济问题的根源，让情绪多变的公众感到满意。然而，柯立芝繁荣时代的美国人依然存在着做梦也不曾想到的问题；1931年慢慢过去，一个月接着又是一个月，经济形势并没有很快复苏的迹象，而这个国家其他任何问题的重要性和紧迫性，都远远比不上这个难题的一半。

三

许多变化的迹象没有确切的意义，有些可能是不切实际的幻想。1931年的美国和战后十年的美国有完全不同的面貌，这一点是不容否认的。旧秩序已经彻底消逝，新秩序开始崭露头角。

20世纪20年代的身影会在历史的迷雾里变得模糊不清，当人们翻阅这些书籍时，会对那些繁华喧嚣的岁月记忆会心一笑：那时收音机还是令人兴奋的新鲜玩意儿；女孩子留着齐耳短发，穿着及膝短裙；横渡大西洋的飞行员会在一夜之间成为英雄人物，普通股就能让我们到达美好富有的乌有之乡。他们也许会忘记战后的希望落空，艰难岁月的幻想破灭，政界的石油丑闻，人们的精神麻木，贪图现在的享受；他们也许会对美好的旧时光侃侃而谈

即将到来的20世纪30年代会是什么样呢？

只有一件事情可以肯定：历史绝不会重演。时间的长河曲曲折折，但是总能为自己找到新的途径奔流向前。

FROM GREAT
P R O S P E R I T Y
TO GREAT DEPRESSION

附录 材料来源与致谢

这本编年史中，我大量引用了多部著作中的内容，谨此向各位作者表示真挚的谢意。首先，在第五章和其他章节里，我多次引用了《中心镇》（*Middletown*）内容详尽、描述精准的资料，这本经典的社会学著作的作者为罗伯特·林德（Robert S. Lynd）和海伦·梅丽尔·林德（Helen Merrell Lynd）夫妇。我觉得，任何一位认真并具有责任感的历史学家在研究美国战后十年时，都不会忽略这些珍贵的资料。查尔斯·比尔德（Charles A. Beard）和玛丽·比尔德（Mary R. Beard）所著《美国文明的兴起》的最后几章，为我的写作提供了很大的支持，特别是在描述华盛顿会议和其促成会议召开的情形方面。威廉·艾伦·怀特的《伍德罗·威尔逊传记》对威尔逊的描述，以及在《虚伪的面具》中对沃伦·甘梅利尔·哈定和卡尔文·柯立芝的描写，他对三位总统所做的独特的分析见解，为我的书提供了许多素材。我要特别感谢查尔斯·梅尔茨，他的《禁酒十年》为我提供了禁酒运动的许多史料和论点，令人钦佩的是这本著作客观而公正地记述了禁酒运动的前十年；此外，我还参考了梅尔茨的《福

从大繁荣 到大萧条

特来了》和《美国花车》等其他作品。最后，我在本书中参考引用了《世界年鉴》《纽约时报索引》和纽约公立图书馆的《纽约时报》档案所使用的大量统计数据。这本书难免要大量引用当时的报纸和杂志的刊文；这些报刊资料的宝贵之处不仅在于真实报道了各种重大事件，还在于其中的广告专栏和图片资料提供了那个年代的流行趋势、思想观念和社会氛围。

我在本书的第一章和第四章描写无线电广播的段落，其开头部分则引述自1928年4月21日西屋电器公司副总裁戴维斯（H. P. Davis）在哈佛商学院发表的演讲。

在写作第二章“回到常态”的过程中，我发现雷·斯坦纳德·贝克的《伍德罗·威尔逊和国际局势》有其特有的价值，文章详尽地描述了威尔逊在巴黎和会中的作用。当然，我把贝克的结论与豪斯上校、国务卿兰辛以及其他人的记述进行比较。我引述了洛奇写给亨利·怀特的私密备忘录，这段文字源自艾伦·内文斯（Allan Nevins）为怀特写的传记。对伍德罗·威尔逊生命最后一段岁月的描述，源自我在1923年11月对他的拜访。

在第三章“红色大恐慌”中，我参考了帕尔默大搜捕的史料和萨切瑞尔·查菲的《言论自由》。哈斯廷议员的发言引自1919年煤矿工人大罢工时《新共和》杂志的封面。“超级爱国者”的素材则从西德尼·霍华德1924年在《新共和》上发表的一系列文章中选取而来。我在仔细研究了查尔斯·约翰逊（Charles S. Johnson）的《芝加哥黑人》后，才进行芝加哥种族暴乱的段落的描述；描写华尔街大爆炸的许多史实，则以西德尼·萨瑟兰（Sidney Sutherland）在1926年4月26日的《自由》杂志发表的文章为依据。

在第四章“美国复兴”中，有关萨科—万泽蒂案件的史料主要来自《纽约世界报》当时关于此案的一系列新闻报道。

如前所述，我在第五章“道德教化的革命”中大量引用了《中心镇》的内容，还参考了保罗·尼斯托姆教授的《时尚经济学》、沃尔特·李普曼的《道德序论》，以及约瑟夫·伍德·克鲁奇的《现代精神》。

在写作第六章“哈定总统与丑闻”时，我大量引用了怀特的《虚伪的面具》和比尔德的《美国文明的兴起》、拉维奇（M. E. Ravage）的《茶壶山记事》，对1924年的石油一案进程做了鲜活的描写；同时还参照了布鲁斯·布利文刊登在《新共和》上的有关“俄亥俄帮”的系列文章；在第六章开头引述的哈里·多尔蒂的供词源自布利文在《新共和》上发表的文章。在石油丑闻的写作过程中，费城蒙哥马利—麦克拉肯律师事务所的乔治·钱德勒（George G. Chandler）律师对我施以难得的援手。

第七章“柯立芝繁荣”，在很大程度上参考了斯图亚特·蔡斯简明而重要的著作《繁荣，现实还是虚构》中的事实和评论，还有大量数据出自他的《当前经济变革》。有关超级推销员、宗教和商业的内容，我参考了商界人士杰西·雷恩斯福德·斯普拉格（Jesse Rainsford Sprague）发表在《哈泼斯杂志》上的多篇文章。查尔斯·弗格森（Charles W. Ferguson）即将出版的著作《参与者》，为我提供了互助俱乐部的统计数据；大学的商务课程和管理方法的段落，则从亚伯拉罕·弗莱克斯纳（Abraham Flexner）的著作《大学：美国、英国与德国》中选取素材。

第八章“大吹大擂的日子”的基本思想来自赛拉斯·本特的著作《大吹大擂》。我参考了这本书的许多内容，读过此书的读者一定很了解这点。战后十年宗教地位的统计数据来源于弗莱尔（C. Luther Fry）的《为总统了解社会趋势对宗教机构研究的初步报告》；同时感谢罗伯特·林德（Robert S. Lynd）为我提供了珍贵的资料。代顿小镇审判案的描写则以阿瑟·加菲尔德·海斯的《自由之声回响》的记述作为参考。西蒙—舒斯

从大繁荣 到大萧条

特公司的理查德·西蒙为我提供了填字游戏热的资料。前《路易斯维尔信使日报》记者米勒本人向我谈了弗洛伊德及柯林斯事件的经过。

我要特别感谢沃尔特·李普曼（Walter Lippmann）的《道德序论》和约瑟夫·伍德·克鲁奇的《现代精神》，这两本书对20世纪20年代幻想破灭做了精彩的分析；倘若没有克鲁奇先生这本一针见血的论著，我可能无法完成第九章“精英们的反抗”中对幻想破灭的论述。

在第十章“酒与阿尔·卡彭”中，我引用了以下四本书的许多内容：查尔斯·梅尔茨的《禁酒十年》、《维克夏姆报告》、弗雷德·帕斯利笔下非常具有吸引力的《阿尔·卡彭》，还有戈登·贺斯泰德和托马斯·奎恩·比斯利的《这是敲诈！》。

在第十一章“佛罗里达，甜蜜的家”中，沃尔特·希尔列举的许多数据、事件和引文，全部出自霍默·范德布鲁在《土地及公共事业经济学（第3卷）》上面所登载的两篇文章。对我尤为珍贵的其他资料还包括，格特香德·马修斯·谢尔比（Gertrude Mathews Shelby）在1929年1月份的《哈泼斯杂志》上发表的《佛罗里达热潮》。纽约办公楼的出租数据则是由一家当地金融机构的房地产办公室提供的。

在第十三章“大崩盘！”中，我所引用的很多内容来自1930年6月10日理查德·惠特尼在波士顿证券交易公司协会上发表的题目为《纽约证券交易所在1929年股市恐慌中的工作》的报告。

在最后一章“后记：1930年到1931年”中，胡佛政府官员的乐观言论出自詹姆斯·特拉斯洛·亚当斯在1930年8月份的《哈泼斯杂志》发表的《总统的繁荣》一文。

以上所引用的仅是本书大量资料来源的一部分；有些资料来源并未在书中出现，因而在此特别提到，以示我对他们的真诚谢意。

我在此向各位好友表示真诚的感谢，谢谢你们不辞辛苦地为我搜集资料，抽时间来阅读我的手稿，并提出宝贵的修改意见。我特别要感谢纽约公共图书馆的罗琳·阿尔杰·索耶（Rollin Alger Sawyer）、阿瑟·贝斯（Arthur Besse）、约翰·麦克肯提（John G. MacKenty）、厄尔·贝利（Earle Bailie）、埃里森·斯库里（C. Alison Scully）、迈拉·理查森（Myra Richardson）、戈登·埃马尔（Gordon Aymar）、艾格尼丝·罗杰斯·海德（Agnes Rogers Hyde）、斯图亚特·蔡斯、罗伯特·哈斯（Robert K. Haas）、阿瑟·霍顿（Arthur C. Holden）和艾米丽·林纳德·科布（Emily Linnard Cobb）。我要特别感谢查尔斯·梅尔茨，自从我担负这个长期而光荣的任务开始，他就一直给予我支持和帮助。最后，我要感谢我的妻子多萝西·彭罗斯·艾伦（Dorothy Penrose Allen），她给予了我难以估量的帮助，直到她生命的尽头。

弗雷德里克·刘易斯·艾伦



ONLY YESTERDAY

AN INFORMAL HISTORY OF THE 1920S



从大繁荣到大萧条

本书详细记载了美国自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繁荣到1929年华尔街大崩盘的历史，是一部公认的经典金融史著作。美国经济自“一战”后的大繁荣到1930年的大萧条，大有“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之感，从高度繁荣到迅速萧条的历史对当今世界，包括中国在内的所有国家都有着极其重要的参考价值。了解美国从大繁荣到大萧条的过去，有助于我们正视繁荣与萧条并存的经济现状，预知未来经济趋势。

上架建议：金融·投资

ISBN 978-7-5682-1441-4



9 787568 214414 >

策划编辑：宁雪莲 宋成成

责任编辑：刘永兵

封面设计：视觉传达

定价：49.80元